

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二辑目录

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蓬勃发展

革命先辈在阿都赖的足迹……齐达勒图供稿 田茂林整理 1

蔬菜 发展 史	昔日荒野 流沙滩 而今林茂 瓜菜香…… 苑 鸿 吉 4
	东河村的形成和蔬菜种植史语……〔回族〕 白 宝 31
	郊区蔬菜名种荟萃(二)…… 高 崇 岭 46

日寇侵包前后包头的政治经济概况…… 章瑞炽译 49

农牧 林水 简史	郊区林业发展概况…… 王 德 昌 105
	后营子乡畜牧兽医工作站今昔…… 章 瑞 炽 111
	后营子乡青山村果树发展史略…… 王 德 昌 116
	后营子乡灌溉机具的发展及沿革…照片撰文 章瑞炽 119
	文山解决五当沟水利纠葛…… 寇尚功 郭维哲 127

“风水宝地”麻池 史话…… 李 一 坪 128

万水泉今昔…… 温 惠 132

昔日穷山村 而今繁华城…… 田 茂 林 138

旧 史 往 闻	阎锡山占领包头史略…… 李 子 珍 143
	李英其人…… 安 治 亭 147
	蒙汉人民 共建城垒…… 官 步 生 154
	包头早年的武林界…… 罗 宏 根 157
	鄂尔格逊的“七十二行”…… 官 步 生 160

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剿匪和抗日几事……
……李中秀供稿 李文整理 162

抗日战争史话	抗日战争中的赵焯昌·····郭耀宗	169
	抗日时期的二三事·····官步生	196
	忆绥远抗日战争三事·····张崇德	199
	日伪时期鄂尔格逊烟市与俱乐部·····官步生	205
	抗战时期国民党驻绥远军队概述·····郭耀宗	208
别具地方特色的井坪梁冰窖业·····照片撰文 章瑞炽 215		
青山村的煤炭开采业·····王德昌 220		
解放战争片断	忆“九·一九”起义将领陈秉义·····郭耀宗 赵喜元	227
	一九四五年冬我军阻击西军之战·····田茂林	233
	我为解放军征收粮草的一点回忆 ·····王计小口述 程景华整理	238
	革命烈士李春秀同志·····官步生	240
文化艺术简史	解放初期县文化馆活动回顾·····武虎瑞	241
	活跃在包头县的一支文艺宣传队·····唐叶封	247
	包头地区的晋剧“票友”班·····罗宏根	251
	包头郊区的梨园谱·····官步生	254
	郊区兴建的第一座影剧院·····周富国 赵修明	256
民族与宗教史话	蒙古族地名的历史溯源·····〔蒙古族〕荣 阁	262
	包头回族土地经营史话·····〔回族〕白 宝马学民	266
	小巴拉盖天主教史话·····雷鸣春	270
	沙尔沁召喇嘛杨林匹尔·····〔蒙古族〕齐达勒图	275
	英勇无畏的郭家弟兄·····郭全孝、王佐口述 土夫整理	278
旧风俗谈	话“过年”·····齐志龙	282
	谈“娶嫁”·····齐志龙	288

昭君出塞与秦直道.....柴 阁 297

燕家梁元代古文化遗址的发现.....武虎瑞 300

质疑·补充·订正..... 302

△一九五〇年程远同志不任中共包头县委书记
.....张继先 302

△对《包头郊区清末时期教育概况》的两点补充
.....官步生 302

△对《包头郊区中等教育发展概况》的补充
.....田茂林 302

△《夜袭德胜泰》有两处不翔实.....郭耀宗 303

△一点更正与补充.....程景华 303

△来函照登..... 304

首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回顾.....

.....政协包头市郊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304

编后记.....编者 310

补白文史知识小资料六则

政协包头市郊区首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封二、封三.....郭怀恩、王文林摄影

本辑资料照片插图除署名者外，均为王文林摄影

革命先辈在阿都赖的足迹

齐达勒图 供稿 田茂林 整理

沙尔沁乡阿都赖村是蒙古语“牧场”的意思。这里背山面水，水草丰盛，最适宜放牧。清末僧格林沁出兵镇压太平天国回师后，把部分蒙族老兵分散在这里，划给牧地，这就世代相传，在此定居放牧了。

据出土文物考证：秦汉年间有过汉人遗物。如本村居民兰银宾盖房，在地基上挖出的铁钱币有《开元通宝》、《乾佑元宝》和手摇石磨等都是早年汉人遗物。

清朝时期政府派一位将军——贻谷为钦差来西北。贻谷上书皇帝允准垦放牧地。有部分汉人离别了自己的家乡，来此地定居，租典垦种蒙人的牧地，这就变成蒙汉杂居，亦农亦牧的村子了。

在黑暗的旧社会，农牧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身无遮体衣，家无一日粮，过着十日九断炊的悲惨生活。全村数百家生活好些，也不过常吃些小米和高粮面而已。日伪时期，在日本鬼子铁蹄蹂躏下，人民生活更加窘迫。有些年轻人，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当兵。在村的人，则只能刨那几亩地，养那几只畜，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更有甚者，有不少人染上了大烟瘾，精神萎靡，成了活死人。那时的悲惨景象是：

遥看有村庄，其村无人；
豺狼横街走，鼠兔中端游。
道有饿死骨，人去室且空；
山光树少绿，踪绝草丛深；
时闻哀声哭，闻者泪沾巾。

但正因为阿都赖村子小，居民穷，才引来了革命之火。

在这个村，最早参加革命的是巴维钊、全升茂。在二十年代初，这两个青年由地下工作者白云梯等人引进，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后来他俩跟随谷道夫、白云梯到宁夏，在一次跟匪徒的战斗中，巴维钊不幸牺牲。

一九二六年，革命老前辈奎璧、吉雅泰，李森（又名李小才）等人，来本村恒升家落脚，并在他家秘密组织革命据点，搞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组织上又派张明远同志到阿都赖革命据点工作。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不暴露目标，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恒升是本村的牧民，自不必隐身，吉雅泰则扮为医生，他身穿长袍，外套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耳挂眼镜，手提药箱，走街串户。他本身不懂医学，但困难难不倒革命者；他找了一本验方医书，苦钻细研，先从猫身上试验，然后再给人看。看几种常见病，用几味普通药，什么头疼脑热，跑肚拉稀，颇见效验，看好了不少病人。因为身体胖，人们都称他“胖先生”。李森在情况紧急时，把头剃的明光瓦亮，脱掉衣服，身披一块大红布为袈裟，手提一串数珠，在沙尔沁召的喇嘛群里，“嘛咪嘛咪”地念起经来。这并非“滥竽充数”，而是在人民群众和大喇嘛的掩护下，装成喇嘛的。张明远文化程度较高，由组织与村民联系，在永富村（紧挨阿都赖，原叫协盛窑子）办起了一处小学，他成为该校教员。这些革命者有时也扮做商人，奔走五原、包头、萨拉齐等地，倒卖几头牲畜（恒升卖过骆驼），以此进行革命串连，搞革命活动。

张明远白天认真教书，晚间编写宣传、联络和汇报材料。他们带来一架油印机进行印刷。他们为了长期隐蔽斗争，不暴露目标，所以在本村不发展党员，也不撒传单。

组织上曾介绍吉雅泰和恒升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二年，回来后吉雅泰同志潜伏到土默特小学当了教员，继续搞包萨地区的

革命工作。

李森同志配合乌兰夫和王若飞同志在包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包头史料荟要》记载李森同志的一段话：“有一次王若飞同志要到五原，乌兰夫同志又找我商议，由谁陪同好，我考虑到三德胜（原名三喇嘛，放马出身，是李森等同志在苏卜盖发展的党员）跟五原黄跟成比较熟悉，由三德胜陪同好。若飞同志和三德胜坐汽车到了五原，呆了一个星期，主要是了解情况，看看地方工作究竟是不是有人在做。若飞同志返回包头，他经过调查了解，认为我们地方上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今后，需要继续发动群众，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民族工作。在他准备往宁夏和陕北苏区走时，乌兰夫同志又来找我，让我同若飞同志一起走，并单独把我带到若飞同志的住处见了面，若飞同志让我买马，还要买些别的东西。一切准备就绪了，乌兰夫同志晚上又和若飞同志议定，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去同他一同启程……”。

王若飞同志被捕后，乌兰夫和李森转移出城，到阿都赖村息脚，之后便匆忙到土默川工作。过了几天，乌兰夫同志派李森返包探听王若飞情况。李森同志了解情况后，为了营救王若飞同志，迅速前往归绥市，托人拉关系，找到管理王若飞的一名科长，经过做工作后，答应在狱中给予照顾。吉雅泰同志通过各种关系，把包头铁路工人张有明同志放到监狱当警察，从此监狱里和外边通了气。王若飞的舅舅黄先生送的东西，多数是经张有明手送进去的。

革命老前辈们东奔西走，要来阿都赖息脚，全村人都熟睡了，唯恒升家窗户透出一丝光明，这是他们在研究革命工作。万一有情况，一出门就可入深山老林了。

日寇侵略归绥后，在察素齐成立“防共二师”。师长韩五。韩原来在古城湾当过长工，受苦出身。革命老前辈做韩的思想工作，使韩五由原来的反共转为拥共；二师成为掩护共产党的营

昔日荒野流沙滩 而今林茂瓜菜香

——青年农场建场巡礼

苑 鸿 吉

夏初秋末间，当您驱车经建设路五至七公里处向南眺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意盎然的景象。丛林碧绿，鲜花飘香，拱棚密布，温室成群。菜田中，柿子红艳艳，黄瓜绿参参，甜椒翠滴滴，茄子紫微微，娇脆喜人；绿荫下，道路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便是昔日荒野流沙滩，而今林茂瓜菜香的青年农场。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每逢由此经过，便浮想联翩：当年的创业者们

垒，许多地下工作者在他那里隐身。韩五送给大青山游击队马鞍二百个，还送大烟板子、布匹药材等大批物资。他的革命行动被日本人发觉，有二十四名军官被害，韩五脱险跑到大青山当了游击队队长。

在这个时期，李森、奎璧还动员了不少蒙族青年参加了革命。他们有的加入游击队，一部分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学完后，有的搞党务工作，有的参了军，与汉族人民共同战斗，在革命斗争中献出毕生的精力。

解放后，李森同志两次重返沙尔沁乡阿都赖村，找老友们促膝谈心，话当年革命艰苦情况。

一九六五年内蒙派人来在张明远所在学校院落、墙脚挖寻张明远走时埋藏了的油印机，结果未找到，如果找到就陈列在革命博物馆了。

（本文作者系退休干部）

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抗严寒，战风沙，艰苦奋斗，改造这片荒沙滩成为良田的；又是怎样通过科学种田，创出蔬菜高产的；他们为什么能在建场三年内，就有两年盈利，为国家积累资金十多万元，成为市、自治区和全国农牧场的先进单位，受到国家农垦部和团中央的表彰的……下面我们还是沿着当年创业者的足迹做一番巡礼吧！

一. 创建青年农场的历史背景

青年农场是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产物。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决定在包头建立以包头钢铁联合公司为主的工业基地。随后各路建设大军从祖国各地源源开来。到一九五七年，包头的城镇人口已发展到三十六万人，比建国初增加了两倍多。人口增加蔬菜供应问题便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包头原来的商品菜基地很差，不仅品种少（仅二十个左右），数量也不多。一九四九年，商品菜地面积只有二千五百亩，加上周围农民“捎办种菜”也不过六千来亩，蔬菜总产九百八十七万斤，按城市人口人年均一百斤菜。解放后，当地党政领导虽然重视了蔬菜的发展，但远赶不上城镇人口发展的需要。到一九五七年全年蔬菜播种面积发展到一万八千三百亩，商品蔬菜总产量为七千二百九十二万斤，人均二百斤。所以，以菜为主的副食品供应，已成为工业基地建设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因此，在一九五七年春末，市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在三年内把郊区基本建成副食品基地，增加副食品生产，保证供应。为了具体贯彻落实党代会决议，在市委、市人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市副食品生产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副市长王孟樵任组长，由郊区区长苑鸿吉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在作调查搞规划的过程中，于一九五七

年七月间提出要在昌福窑子村东南，利用国有荒地和青山区的生活污水，建立一个地方国营蔬菜农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市领导的原则同意。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还当面指示，要到自治区找分管农业的副主席高增培同志，分管财经的副主席王逸伦同志汇报，争取他们支持，给点钱。经请示，内蒙的领导也原则同意了，并作了具体指示。

二. 命名“青年农场”的来由

一九五七年，全国农村刚刚实现农业合作化（即高级社）一年多，农村非常缺少会计和农业技术员。因此中央号召城镇有文化的青年，也包括一部分城镇机关企业的中青年干部到农村去，当会计，当会计辅导员，当农业技术员，当驻社干部。当时这一工作是由各级共青团组织负责办理。在一九五七年春季，郊区提出要五十名有文化的青年下去当“两员”，结果全市报名的有三百多人，这样绝大部分人就下不去。包头团市委听到市里要建一个地方国营蔬菜农场，就主动向市委建议，要由团市委负责动员城市青年与下放干部相结合，组建蔬菜农场。一九五八年一月，市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农场的人员构成主要是青年，又是由共青团市委负责组建的，所以就命名为“青年农场”。

三. 青年农场筹建过程和规模任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在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原则批准了团市委要求建立青年农场筹备处的建议。一月十七日，由副市长王孟樵、团市委副书记梁满超二同志主持，成立了以刘俊同志

为首的青年农场筹备处。开始筹备处仅三人，后团市委委派刘昌荣、程锦奎二同志协助工作，到筹备工作进入紧张期，团市委又抽以副书记李文义为首的十名干部参加。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市人民委员会正式发出了《关于建立青年农场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场址位于新城乡东南约十公里处，东到二道沙河的太阳红社，西至长胜社，南邻万水泉村，北接连接路（现在的建设路），全部为荒地，约四千五百亩（经实地勘察为一万亩）。”

“劳动力来源，暂定四百名逐年扩大。机关企业下放干部的抽调由劳动委员会协助办理。凡下放干部，原机关必须负责到底，一般固定二、三年，所需桌椅、小农具、烤火用具应按下放干部统一规定执行。”

“为避免风沙灾害，今年春季农场要进行大量的绿化工作。农林水利局应负责同农场取得联系，满足农场所需要的树苗和技术指导。”

“抽调郊区副区长刘俊同志临时负责农场工作，共青团市委抽调二名得力干部辅助组成青年农场筹备处，立即开始筹备工作。筹备处由市人委直接领导，共青团市委应大力协助。”

“为保证农场今年生产，污水处理站应想尽办法于第二季度供水。”

《决定》最后号召全市各单位要大力支援农场建设，农场本身要艰苦创业，争取三年内基本建成。

四、改变对青年农场业务领导的原因

青年农场建设初期，是在市人委直接领导下，由共青团市委

具体负责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由团市委领导，在工作上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于四月初将青年农场的业务领导关系交由市农林水利局。市农林水利局当即于四月四日向自治区农业厅报出了《建立蔬菜农场初步设计》，于五月四日改青年农场筹备处为“青年农场管理委员会”，由李文义任书记，刘俊任场长。五月十七日，市农林水利局又正式报出《包头市国营青年蔬菜农场基建任务书》。《任务书》的基本内容是：农场分三年建成，占地总规模一万亩，其中农作物耕地面积五千五百六十亩（水地四千亩），人工造林一千二百亩（内果树为二百亩），人工牧场三千亩，场部占地一百亩，其它占地一百四十亩。三年总投资三十九万元，三年蔬菜总产量二千九百万斤，养猪一千口，养羊一千只。三年农场总收入一百四十二万元，商品生产成本支出五十五点五万元。《任务书》经上级批准备案后，青年农场便纳入了全国和自治区国营农牧场的组成部分，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积极地发展了生产建设。

五. 选定场址

为什么要选定在一片荒沙滩上建立蔬菜农场，经调查、分析、研究，有下列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

1. 其不利条件主要是：

①土质条件差：其表层土基本是灰白色或灰黄白色沙土，其中还有“见风就跑”的流沙。土地的肥力很差，所以很少长草。在三十至五十公分深的土层，根据二十个挖土取样观察，百分之五十的地方有黑、白、黄色土，有的很坚硬，有的有淤土层，因沙土覆盖层深，一般农作物难利用；

②表层上干旱，地下缺水。据当时提供的资料，年均降雨

量为二百三十毫米（后经三十年的观察年均为三百一十毫米），而且沙质土渗透蒸发快，不易保墒。地下水：五至十米的浅层水量很少，不适宜打浅井；三十米左右地下有分布不均的地下水流，但随着工业用水打井，水量逐年减少，很难保证足够的水源；五十米以下地下水量较多，但因某保密工厂限制不许打深井。唯有指望的地下水源是在昌福窑子、尹六窑子之间的河槽东侧，但要把西水东调，需修建八公里的长渠，水源也未必能保证浇地四千五百亩的需要。所以农场用水很大程度上要靠青山区的生活污水。

③风沙大而多：农场所处位置，正在董大沟等四条山沟风口汇合处，又同时受前口子的劲风影响，所以全年四级左右的风日占百分之四十六，最大风力达八级以上。

④据社会调查，农场中心地带正处在由前口子至王大汉营子的冰雹线控制之内，易受雹灾。

2. 有利条件：

①土地是国有荒地，符合“不与农民争利”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便于农场发展建设。

②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城市生活污水逐年增多，利用污水灌溉土地，改造沙滩荒地，变废为利。

③肥源条件好。能就近在市三区积肥，有利于节省生产成本。

④交通条件方便，对生产销售都有利。

⑤劳动力好解决，职工生活方便。农场的建立为城市待业青年就业提供了条件，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提供了场所。

⑥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建筑物增多和西北部防风林带的建设，农场本身农田林网建设，自然条件会由坏变好。

⑦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当时包头的蔬菜生产条件困难，蔬菜缺额约百分之五十左右，建立蔬菜农场大有“逼上梁山”之

势。同时改造沙滩对改善包头环境有利，一旦成功，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而且为农民改造沙滩荒地起到了示范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认为是利多害少，所以就下决心在这里建立蔬菜农场。

六. 艰苦创业，当年筹建投产见成效

按建立国营农场的一般规律，最快的速度也需要头年搞筹备，搞基建，第二年边建边投产。而青年农场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荒沙滩上，当年筹建，当年投产，把生产走在基建的前头，困难是相当大的。下面就看看创业者们是怎样战胜各种困难获得成效的。

1. 创业者的成员构成和生活待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份是全年人数最多的时期，有三百六十四名，后因种种原因人员有所减少，到六月份人员才基本稳定下来，共有三百一十八名。其中男二百六十四名，女五十四名，分民族为：汉族三百零三人，蒙族三人，回族十一人，满族一人；分原职业：青年学生一百二十五人，下放干部一百七十四人，指导生产老农十三人（来自解放社和古城湾村，其中有一人是从河北省徐水县请来种大白菜的。这些人由农场每月发工资四十五至五十元）。从上述数据可知，农场的成员构成是以下放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在青年学生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年仅十六岁。他们的籍贯，有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辽宁、江苏等省份。

创业者的生活待遇是比较低的。其中青年学生在五月份以前，每人每月由农场发给九元钱的生产自救费（实为伙食费）。经过三个月的实践，认为对劳动强度很大的年轻人来说，钱确实不足，因此，决定从五月份起，改为按徒工待遇，发给十八元。

在这十八元中，十五元发给本人，三元由农场统一掌握，用于出勤率高、劳动好、超定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和其它补助。因此，更加调动了青年学生的劳动积极性，也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随之也把集体伙食费由九元提高到了十元。到下半年，全国出现了经济建设大跃进，有不少青年学生想“高就”到工厂当工人，所以当时有三十九名青年学生退了场。针对这一情况，农场领导和市农林水利局领导都认为，单纯靠抓思想政治工作来稳定这部分人的思想是困难的。因此经研究并报上级批准，于十月份将农场改为工资制。参加评定工资的青年学生职工共一百零一人，分五等。一等生产模范人物十六人，月工资三十五点五元；二等农场一级工四十七人，月工资三十一元；三等农场初级人员三十三人，月工资二十七点五元，四等练习生四人，月工资二十四点五元，五等勤杂工一人，月工资二十一点五元。还有几人，因思想不稳定，劳动不好，暂未评定工资。评定工资后，安定了这部分人在农场干下去的思想。

下放干部虽然保持着原来的工资，老农也有月工资，但其生活也是艰苦的。他们和青年学生同吃同住，每月也吃九元的伙食，到五月份才改为十元。

2. 居住条件。农场刚筹建尚无一间房，而从二三月份开始就要来农场三四百人。人来了往哪儿住，这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后经多方联系并由副市长王孟樵出面，才向当时的华北建筑二公司（住包头，后改为第二工程局）借到三栋临时简易工棚，并只准使用到六月中下旬。这三栋工棚位于尹六窑子村东南，距农场开荒地约五华里，每天劳动都得迎着北风“北上”。为了多干活，少跑路，每天中午吃在工地上。春季的气候天天都有大小不等的风，人们只好把饭菜连风沙往肚里咽。所以人们都盼望着早点有自己的宿舍和食堂。

为建设自己的宿舍，农场克服种种困难，在市第二建筑公司

的努力下，仅用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将一千七百七十平米的职工宿舍搞完了（未铺地）。到七月一日，正式分房，同时公布了《房屋管理办法》。职工分到房后，又是跳又是唱，万分高兴。

职工宿舍和食堂先盖起来了，但其它建筑物又出了问题，因原材料涨价，原计划六万三千五百元的基建费不够用了，需要再增加七千三百六十五元，如连同增加温室建筑，共需增加三万五千元投资。经再三找市领导和自治区农业厅领导，也难以马上解决，怎么办？我们自己解决！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把宿舍的砖铺地改为用土垫地，节约投资四千元；第二，把猪圈、马棚、厕所改为自己脱土坯营建，又能节省投资四千零六十八元；第三，温室暂缓建。以上三项共为国家节省投资二万四千八百元。经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总算把问题解决了。

3. 开荒种田打硬仗。青年农场的农田基本建设，基本是按照因地制宜“林、田、渠、路”四配套进行的。

①规划设计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第一步。二月十日，农场筹备处在《关于筹备工作情况简报》中提出：“我们要农林水利局帮助我们作出绿化设计，供给足够的树苗。”市农林水利局领导看《简报》后，感到作为一个新型农场，光搞绿化设计是不够的，提出需要按照“林、田、渠、路”四配套搞总体规划设计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农场和市人委领导的赞同；副市长王孟樵并指示要在三月十日搞完设计勘测任务。市农林水利局刚成立不到半年，机构人员尚不齐全，在困难的条件下，由局长亲自抽调人员，从园林处抽调出何福梯、王新民等九名技术员和工人，从水利工作队抽调柴恒等九名技术员和工人，从农业上抽调张志英等三名技术员，连同司机共三十三人，于二月二十日开赴现场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风沙太大，工作总是停停打打，眼看十天过去了，全面勘测还没有搞完，按期完不成任务已成定局。经同农场领导商议采取“先急后缓”，先从西半部规划出二千亩地，到

三月十二日基本完成了任务。

正因为技术人员和领导共同实践了当地的特殊气候条件，所以在规划设计中，把渠和路按原设计进行，把林、田规划设计作了修改。其中的田，在每五十亩、一百亩见方的大方块中加小田埂，为二十五或五十亩的小方块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达到“大不平而小平”，省工省力，一旦条件成熟，再取掉小田埂，恢复大方块田；对农田林网，除按渠、路两侧栽树外，也采取在大林网中套小林网，经五至十年林网起防风固沙作用后，再取掉小林网，保留大林网。这样作的好处是见效快，困难的是多用树苗。实践证明，这两项改革是坚持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正确的。到一九六三年林网就起到了作用。

②开荒造田大军开赴现场。规划设计刚一结束，三百多名开荒造田大军就开赴现场。当时已是春季，风大气温低，创业者们就在生产工具落后，环境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人用铁锹向外扬土，大风趁势将沙刮向天空，远看就象一条条黄龙在空中飞舞，场面壮观。经过二个多月的奋战，开凿了三条支渠，三十六条小渠，全长一千四百七十里，土方六千二百四十二方（不包括被风沙掩埋又清理的土方），开垦土地六百八十四亩，动用土方三千五百一十六方，开荒造田一千二百三十四亩。

创业者们当时的战斗口号是：“不怕风沙不怕难，立志改造大自然。兴无灭资锻炼好，学习武松刘胡兰。苦战二年建农场，荒滩变成莱果园。”他们是这样说的，实际也是这样干的。如有一位名叫宜凤的女共产党员，是团市委下放干部，任农场一队政治队长，为带领全队开荒造田，她什么累活苦活都抢着干，她不仅手打过血泡，肩膀被压肿过，连手脚都肿过，并且得了大骨节炎。领导和同志们劝她休息，她坚决不肯，到医院看完病回来又到工地去干。类似宜凤同志的典型事例很多。象下放干部中的魏宏宴、韩廷、王廷敞、程锦奎等十多人，青年学生中的刘振帮、

王有兰（女）、李修业、常振华、许生荣、郭文远等十六名先进者，都是创业中值得歌颂的人物。

③积极积肥。农场领导一开始就注意了积肥。在二三月间，他们利用大地解冻之前，集中力量搞积肥。他们采取分队分组、分区（市三区）分片包干，规定积肥任务和记工定额，开展竞赛。到开荒造田开始后，又组成专业积肥小分队继续干，到六月份，共积肥一千九百六十四车，合四百八十六点五万斤，八百四十亩水地平均施基肥五千七百九十斤。

在搞积肥的同时，在郊区打井队的帮助下，打了一眼水井，一方面解决了农场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春季育苗浇地用水。



青年农场林带

④植树造林，巩固开荒造田成果。农场从四月八日至十五日开展集中造林，当时共栽二年生的实生杨柳树苗和切穗苗木四万株，路旁植树五百株，果树七十五亩，树木总成活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3. 保播种、保全苗、保产量。这“三保”不仅是对青年农场本身的实际考验，也是对要在荒沙滩建立农场的验证。在这耕地是新开荒地，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外码子”，能否获得收成确实使人担心。所以笔者在四月二十二日向全场职工工作的第二场报告，主要内容就是讲保播种、保全苗、保产量。在当年又偏偏遇上了风沙、春冻、春旱和夏季的冰雹、洪水等多种重大灾害。下面就看看创业者们是怎样同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而初战告捷的。

①在同风沙斗争中播种。农场于四月十日后，陆续开始播种菠菜、水萝卜、小白菜等春菜和为夏菜育苗。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种菜。有的播种后还没有等种籽生根发芽，就被大风把种籽刮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则是被埋上厚厚的一层沙上不能出苗，只好再重种或部分毁种。在二百零三亩春菜中，重种或毁种两次的有百分之五十，三次的有百分之二十。夏菜育苗因扎了风障，又有草帘子保护，受害较轻。到四月底五月初，春菜总算保住了全苗。

②在同风沙和倒春寒斗争中保苗。农场职工同农民一样“见苗三分喜”，可是在五月十三日却来了一次大风，风后气温降至零下三度，其它蔬菜区也受些灾害，不太大，在这四下无靠的青年农场却受不了，把刚出土的水萝卜和小白菜冻死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只好再次补种。

③在同旱灾作斗争中再度保苗。自五月中旬以来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总是刮风不下雨。到六月九日又来了个“火上浇油”，一场大风降温加霜冻，四十亩水萝卜在“旱、风、冻”三路进攻下不成样子了。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污水量也减少了，面对这种情况，农场只好采取了二条应急措施：一是减少原定蔬菜面积，增种一百亩草谷子；二是抽人打井抗旱。抽出刘昌荣、胡玉茂组织人在昌福窑子村东南打井垫渠，井打了十几米深，渠开了三里长，到六月下旬把水引到了地里。随后市计委一方面支援抗旱，另一方面也为长远打算，给农场拨水利专款三万五千元，继续由胡玉茂负责筹划打大型机电井。经过抗旱保苗，六月份的青年农场是一片绿油油。职工们无不兴高彩烈，笑逐颜开。

④受重雹灾，开展生产自救。正当青年农场职工兴高彩烈，喜迎丰收的时候，突然于七月五日下午三时许降下了一场大冰雹，仅三分钟，就把八百亩蔬菜全部摧毁，轻者受灾三至五成，重者达九成以上，有一百八十亩夏菜无收成，把百分之九十五的黄

瓜、西红柿秧棵齐腰打断，有的一条黄瓜被打成三节。青椒、茄子受灾也很严重，新盖宿舍玻璃被打坏三百八十六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万多元。

冰雹后，笔者很快赶到现场，和农场领导一道检查灾情，稳定职工情绪，组织生产自救，并当即决定，一方面对受灾部分，能抢救的抢救，不能抢救的可移苗、并苗，总之抢救几亩算几亩，其余的毁种秋菜；另一方面抓几项副业，增加一些收入。五天后，农场领导决定办四件事：第一继续抓打机井工作，继续抗旱；第二是建立土豆加工厂，发展养猪；第三建立颗粒肥料厂；第四成立运输队，节约运费开支，增加收入。

⑤抗洪斗争取得全胜。雹灾刚过，到了七月底八月初，连续降了二场暴雨，雨后山洪暴发，使全市近百万亩土地受灾。农场在这次抗洪斗争工作做得非常主动。当农场接到大雨防洪的紧急通知后，立即组织动员全体职工上阵，在农场北侧沿着连接路南侧打了一米多高、八百米长的一条防洪坝，并三次加固，保住了场区和八百亩青苗地未受损失。事后青年农场被评为全市防洪先进单位。

⑥同病虫害作斗争减少损失。在六月份，农场较普遍地发生了蛴螬等地下害虫，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大白菜又发生了软腐病。农场职工采取各种措施，手捉药杀，使作物减少了损失。

总之，青年农场的创业者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当年开荒造田一千二百三十四亩，其中水地八百三十亩，旱地四百零四亩。当年播种一千一百八十亩，水地因受灾实际收获六百五十八亩，其中蔬菜二百八十六亩，单产五千零六十斤，总产一百五十五万多斤；土豆三百七十二亩，单产两千二百斤，总产八十一万八千四百斤。旱地饲草饲料作物三百五十亩，收获饲草八万五千斤，有一百亩草谷子。浇过污水亩产达四百五十斤。全年总收入为七万零三百五十四

元，扣除自用和大炼钢铁损失的一万三千多元后，会计帐面决算收入为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七元，亏损四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元，这在当年筹建情况下，也算是好成绩。

除上述成绩外，在生产技术、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等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①在搞科学试验、培育高产田方面：试验的五亩高产大白菜，亩产达到一万二千斤，最大单株重十五点五斤；培育五十亩高产马铃薯，平均单产达三千七百五十斤，最重薯块为九两五；最大的萝卜重五点五斤。这些大白菜、大土豆、大萝卜曾在市农展馆展出过。

②观察总结了应用生活污水灌溉农田的经验。青年农场是在包头利用城市生活污水灌溉农田最早的单位之一，他们注意观察总结了应用特点和方法。

生活污水应用有四个基本特点作用：第一抗旱增产作用。凡是进行正常浇灌的土地作物都明显增产，象草谷子，浇污水的亩产四百五十斤，未浇的不足二百斤。第二有增加肥料、节省成本的作用。据市农林水利局化验，每千吨污水中含氮肥七十五公斤，磷肥四十六公斤，钾肥二十公斤。每浇一次水等于追一次化肥。第三培养地力，改良土壤作用。凡是用生活污水灌溉五次以上者，表面土层即由黄白色变为黑灰色。第四、有提高地温、使作物生长提前延后作用。用污水浇过的地，比用清水浇过的地温提高二度左右，作物发芽早二天左右。

在污水运用方法上：第一，最适合冬春汇地，又特别适合在沙土地上。如一次灌入三十公分左右深的污水，就能沉淀二指厚的一层淤泥，对于改良土壤很有利。第二、污水最适合浇灌根茎类菜和高杆作物，如土豆、萝卜、架豆角、西红柿、黄瓜和大田作物，但不适合浇灌刚出土的幼苗，因一旦灌了心就难保苗，如浇灌刚出土的四十亩萝卜，浇后土地表面结下一指厚的硬壳，结果

基本没有捉住苗。第三，浇灌果类菜时宜将污水与清水混合用或轮浇，污水浇后松一次土，再浇清水，效果较好。第四，浇蕻白菜、芹菜宜用污水浇。第五，浇灌大白菜，青白萝卜，不宜在幼苗期用污水浇，因一旦淹没了菜心心就影响幼苗生长，浇大白菜适合在“莲座期”和“包心期”，但不能漫灌，如漫灌易得软腐病。上述几种菜都适宜用污水清水混浇。

③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在生产实践中，锻炼了所谓“外码子”劳力，使他们初步掌握了一些生产知识，并在实践中培养提拔了场部工作干部十四人，培养了驾驶员等技工十一人，象前任场长许生荣、现任场长郭文远就是当时提拔的十四名干部之一。

④为了培养提高青年职工的文化科技知识和生产管理水平和于五月四日农场建立了业余农业大学。由笔者兼任校长，李文义、刘俊兼任副校长。语文、数学教员是在下放干部中选拔的，生产技术课由本场指导生产的老农和技术员干什么农活讲什么，有时也请外单位的技术干部来场讲课，时间不定。象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讲师陶辛秋先生（当时陶先生常住包头蔬菜试验站帮助工作），市蔬菜试验站技术室主任崔荣国、技术员张晶英（女）等同志都曾讲过课，此外还请过郊区技术推广站和市农林水利局植保站的多名技术干部来场讲课。名叫业余大学，但实际上未讲过大学课程。到一九五九年，业余大学进行了整顿，配备了专人，分细了班级，转向了业余学校，在引导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方面，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七. 胜利前进的五九年和六〇年

1. 胜利前进的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是青年农场走向农、牧、林、工、副全面发展的

一年，也是取得科学种田有效经验的第一年。

①人员构成和生产建制变化情况。这一年青年学生职工和
下放干部比一九五八年减少近三分之一，到秋后，下放干部大部
分回了原单位或调往其他单位工作。在青年农场需要增加劳动力
的情况下，赶上了大跃进和所有制升级的浪潮，于四月份就把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长胜大队划归青年农场。这样青年农场的户
数便由原来的一户变成一百八十九户，总人口为一千一百二十四
人，其中原农场为二百六十人，长胜大队为八百六十四人。职工
总人数达到四百三十一人（不包括下放干部），其中工人为三百
五十八人，技术员一人，企业行政人员二十五人，其他二十人。
另外，还有临时工二百五十四人（主要为盲目流入城市人员）。

生产管理建制：原农场的三个生产队仍以青年学生和下放干
部为主，适当搭配了一些社员职工；原长胜大队的三个生产队基
本保持原来建制，适当加强了领导干部和会计统计人员。各队在
场部统一领导下，生产实行分队管理，开展生产竞赛。

②继续扩大农田基本建设。一九五八年秋收尚未结束，原农
场就抽调一部分劳动力投入了开荒造田战斗。经过一秋一春，又
开荒造田一千一百五十亩，打井二眼，延长和新开渠道四十六
条，全长一千八百八十米，动用土方五千二百方，新增水浇地一
千一百五十亩，全场的水地面积达到三千一百八十亩（内有原长
胜大队一千亩），其中保浇面积二千五百六十八亩；植树造林二
十一万多株，新建果园一百亩，栽种各种果树七千四百五十八
株；新建温室六十间，职工宿舍二十间，新建猪圈二百一十间，
修理旧猪圈九十间。

一九五九年的农田建设同一九五八年相比有了不同，除了开
渠打堰还是用人工外，翻地用上了三台拖拉机，积肥拉肥也由汽
车、拖拉机、马车代替了人力车。但是开荒造田的战斗仍然是很
艰苦的。

③生产组织、计划管理和收获量。在生产组织、计划管理上，实行了由三部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领导，分队作业，按生产定额记工，超产有奖的办法，效果很好。但是因受当时“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极“左”思想的影响，也曾订过不切实际的“吹牛”计划。如什么“种植高产蔬菜田五百亩，亩产平均达到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二斤”，什么“放卫星芹菜亩产三十万斤，西红柿亩产十万斤，黄瓜五万斤，茄子四万九千斤，豆角三万二千斤，大白菜九万斤”等等。故职工称这个计划为“吹牛”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为应付上面的“大话”，所以基本没用它。相反，农场领导却注意了科学种田，培养高产出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和经验。

一九五九年总播种面积（直茬面积）为五千六百零五亩，其中蔬菜二千三百五十亩，种植春菜五百亩，夏菜六百五十亩，秋菜一千八百六十四亩。蔬菜总产达到一千六百七十三万多斤，平均亩产七千一百二十七斤，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四十。马铃薯种了六百一十六亩，平均亩产一千零六十四斤，总产六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六斤。饲草饲料（粮）二千五百六十四亩，实际收获面积一千六百四十九亩，平均亩产饲料（粮）六十五斤，总产十万零七千多斤，收获饲草三十一万一千多斤。种植中药材、瓜类作物四百七十五亩，产值四千四百七十元。繁育各种蔬菜良种七千零八十三斤，基本做到自给。

这年的畜牧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农场养猪（不包括社员）九百九十九口，年终存栏四百八十五口，育肥猪一百二十五口，除自食和支援有关单位外，卖给国家三十六口，平均重为一百三十六斤，出售仔猪三百五十六口，死亡三十三口，占百分之三点三。农场养羊三百只（社员职工养羊二千二百只），卖给国家羊一百六十只，产羊毛一千八百三十七斤，价值一千六百三十八元。

④实行科学种田，获得新进展。第一，引进增加新品种。在市蔬菜试验站、郊区技术推广站和市商业部门的帮助下，蔬菜品种由一九五八年的十六个，增加到一百零四个，成为全市蔬菜品种最多的单位之一。第二，发展了保护地生产。一九五九年温室发展到一百二十间，阳畦一千三百个。保护地生产的春夏菜比露地菜提前二十至三十天上市，共上市十三万斤。保护地育苗的夏菜也比上一年提前上市十五天左右。第三，实行间混套种，合理利用土地。当时，间混套种面积四百亩，增加产量八万八千六百斤，产值一千七百六十元。第四，进行合理密植丰产试验。如茄子、西红柿、青椒一般密度为每亩三千株左右，密植试验田则为四千至五千株，一般增产百分之十左右。第五，进行小区域试验大白菜播种期（即以零点二分地为一畦的小区），经试验观察实践的结果是：大青麻叶于七月五日至十日播种为佳，中青麻叶于七月十五日左右播种为佳，小青麻叶于七月二十日左右播种为佳，徐水县大青口、二庄子于七月一日至五日播种为佳。过早播种易感染病害，过晚播种生长期不够，难以保证包心质量。第六，重点培育高产丰产田。对十个主要蔬菜品种、七百一十八点七亩耕地，采取增施肥料，保证浇水，选用良种，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的措施，达到高产。结果平均亩产达到一万三千二百八十斤，比一般田亩产高出百分之一百三十。高产田面积占蔬菜总播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其产量却占蔬菜总产的百分之五十九。以笔者为主，试验的三畦（三分地）土豆，费力最大，收获最小，取得失败的教训。其操作过程是：深翻地二市尺，每亩施肥一万斤，选用品种“白发财”，播种期四月二十五日，每亩播种三千株。在生长期浇水五次，中耕松土三次，结合培土二次，秧株全高五十至七十公分。因浇水过早过多，密度大，秧株高，造成通风不良，光照不好，每亩产一千二百斤，薯块多而小，只有乒乓球大。

⑤在生产斗争中，五九年主要打了三大仗。春季战胜冻灾保春菜护秧苗，夏菜巧躲霜冻抢定植，秋季多收任务种大白菜。这三仗，充分体现了农场职工艰苦创业不怕苦累的作风。

⑥经济效益。有两种统计。按《青年农场一九五九年生产概况》的数据是：“全年总产值五十一万零三百六十五元六角九分，除自足外，为国家积累资金十万零八千三百六十五元六角九分。”按会计年度决算资料，总收入为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四十五元，生产成本支出为四十二万零六百零五元，纯盈利一万零六百元，上交税金一千元，两项共为国家积累资金一万一千六百元。这两种统计差别很大，但各有依据。生产上的“产值”是“满打满算”，财务上的“收支”是实收实支，“凭据”为准，予留不变价的产品不计算收入，如菜籽饲草饲料就不计算收入，而搞“一平二调”白花的钱却要计算支出。按实际说，还应以会计帐目为准妥当。

2. 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的一九六〇年。青年农场在前两年的基础上，一九六〇年进入了农林牧工副业大发展时期，一举盈利八万八千二百五十六元，上交税金一万七千元，共为国家积累资金十万零五千元。

农场广大职工在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推动下，在生产上决心再上一层楼。但是积极性再高，也赶不上当时的“大跃进”“反右倾”“鼓干劲”的浪潮要求。如在一九五九年十月间，农场和市农林水利局共同研究的一九六〇年的主要方针任务是：坚持三个为主，一个提高。第一，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坚持以巩固提高为主。在进一步搞好“林田渠路”配套，提高稳产高产田的基础上，再开荒一千亩，打井三眼，使水浇地扩大到三千五百亩（包括原长胜大队一千亩），其中保浇面积二千五百亩；再扩建苗圃二十亩，植树造林二十万株。第二，农业生产，坚持以蔬菜为主，保证种好二千五

百亩，力争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八千斤，总产达到二千万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种植粮食饲草饲料作物四千亩，其它作物五百亩。第三，在生产管理上，坚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实行“少种高产与多种多产”相结合，在上年高产丰产田基础上再培育亩产万斤以上的蔬菜高产田一千二百亩。粮食饲草饲料作物，也要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力争做到发展畜牧业的饲草饲料自给有余，减轻国家供应负担。在大田作物上培育高产田（特别是薯类），不仅对当年增产增收有利，也是为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的过渡条件之一。在畜牧业上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养猪发展到一千五百口，存栏六百五十口，养羊一千五百只（包括社员自养），养鸡二千只。“一提高”是：开展增产节约，提高总经济效益，力争纯盈利超过十万元。本来这个初步计划设想安排就是一个“跃进计划”，农场在上年秋后也按这个设想计划安排了生产活动。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党校召开了第八次农村工作会议（也叫四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又提出鼓干劲，反右倾，要求农牧林业主要生产指标，在两年内翻一番。据此精神，郊区人委于二月九日下达了“跃进”任务，农场自己也重新修订了前述任务。由于上述计划全属“冒进”计划，所以根本无法完成。但是在各项生产上，所取得成绩还是突出的。

在本年，农场的领导班子已有了小的变化，原书记李文义调北京，贾太山接任，场长刘俊、副场长范永和没动。由于贾太山民主作风好，能和原场领导合作共事，所以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因领导变动而受影响。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又取得新进展，一秋一春共开荒地六千二百零二亩，新开大小渠道三十一条，打大口井七眼，平整土地一千八百零七亩，共动用土方一万零二百二十四方。另外用二百人上阵，用六十天时间完成黄河总干渠土方工程一千九百方。新

建阳（秧）畦四百七十二个，扩建温室二十一间。修建各种棚舍一千五百平方米。春季完成造片林二百三十八亩，共栽树四万六千八百三十二株，积肥一亿五千万斤。

实际完成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播种面积为一万一千二百零一亩（实收获面积九千多亩）其中蔬菜面积四千五百零七点五亩（如包括复种面积为五千二百九十七亩。其中春菜一千四百零二亩夏菜一千零八十一亩，秋菜二千九百一十四亩），总产量为二千五百五十九万六千斤，平均亩产为五千九百九十七斤（实为五千六百七十九斤）。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四千六百零五点七亩，总产量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三十斤，平均亩产五十五斤（其中有山药一千二百八十九亩，总产五十九万三千一百六十斤，平均亩产四百六十斤）。饲料作物为二千零八十一亩，总产量九万三千九百一十一斤，平均亩产四十五斤。

在牧业方面：养猪存栏达到七百五十五口，（全年养猪一千四百五十五口，其中出卖小猪五百一十口，育肥猪一百五十口），养羊达到一千五百七十四只。春季养小鸡三千五百只，基本没有活。

经济效益情况：年终结算总收入七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九元，成本支出六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三元，盈利八万八千二百五十六元，上交税金一万七千元，全年共为国家积累资金十万五千二百五十六元。

一九六〇年是青年农场实行科学种田大发展的一年。在受春旱影响、大田无指望的情况下，大抓了水地管理和蔬菜高产丰产田。全年培育高产田（亩产八千斤以上）丰产田（亩产一万斤以上）共一千八百八十四亩，占蔬菜总播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亩产平均达到一万零七百斤，总产达到二千零一十五万八千八百一十斤，占蔬菜总产的百分之七十八。事实说明，大搞科学种田，荒滩也能夺高产。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农田基本建设是生产的基础，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是提高生产效能的关键。青年农场就是因为抓住了这两条，才把荒滩变成高产蔬菜区的。农场技术员李英同志（后在郊区任过技术推广站站长），坚持在生产实践中同职工同劳动，同学习，研究解决实际问题，随时进行技术指导，并且注意观察，记录作物生长变化过程，认真总结经验，在六〇年一年，以他为主就写出了五篇科技总结报告。分别是：《青年农场一九六〇年大面积丰产经验》、《葱韭丰产经验》、《黄瓜亩产一万三千七百二十斤的栽培经验》、《西红柿大面积丰产经验》、《秋芹菜大面积丰产经验总结》等。以上这些技术资料在当时有推广价值，就是在现时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八、建场三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与基本经验

青年农场自一九五八年春季至一九六〇年秋后，经历了三个生产年度。在这三年中，开荒造田四千四百亩，其中建成高产田一千八百亩。水地有效灌溉面积二千五百亩，保灌面积一千八百亩（以上均不包括原长胜大队的地）。三年共造林五十一万六千株。三年共产蔬菜四千三百五十二万斤，饲料粮五十六万斤，饲草九十五万斤。三年国家为农场总投资二十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元（原计划三十九万元），总收入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元，相差二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九元未完成原计划一百四十二万元的任务，成本支出一百一十二万六千三百元，超过原计划九十万元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四。三年中盈亏相抵后，纯盈利五万零四百三十元，上交税金一万八千元，共为国家积累资金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元。

为什么青年农场在短短的三年中能够取得生产建设的好成

绩，其基本经验有以下几条：

1. 有一个团结战斗能带领职工前进的领导班子。五八、五九两年，农场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有李文义、刘俊二同志，支部七名委员中有下放干部五名。这个班子当时的特点是善于联系群众，团结战斗，以身作则，在艰苦条件下能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议，遵守制度，不搞特殊，得到了职工们的信任。

2. 坚持政治思想工作领先，让职工明确劳动目的。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五条措施。①生产队长、组长要发挥组织生产与做政治思想工作两个作用；②党政工团工作人员要与职工同劳动，同学习，了解情况作政治思想工作；③作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力组织学习生产技术和技术革命相结合，把业余课堂教育与生产实习结合，把职工的思想引导到学习生产技术上来；④积极开展劳动竞赛，鼓励职工争先进，活跃思想情绪；⑤开展比劳动、比学习、比爱护公共财产、比遵守纪律、比思想、比团结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全场评出先进生产者一百二十一名，“五好青年”四十名，内有十三名加入了共青团。

3. 建立健全生产管理责任制，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农场建立不久就逐步建立了以生产管理与财务管理为主的各项制度，并公布于众。各项制度对农场建设都起了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定额记工制”更直接起着调动劳动积极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作为考核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好坏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二，作为对青年学生“多劳多得”的奖惩和转为正式工人的基本条件；第三，又是作为评先进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当时的“劳动定额记工制”就成了推动人人争先进、加油干的杠杆。一九五九年又在劳动定额记工的基础上，推行了以队定工和“任务卡制”（类似小包工）。到一九六〇年又试行了“基本工资加奖励制”，把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五作基本工资，百分之十五作超任务奖励工资，这样对生产劳动更起到了促进作用。下面

抄录一九五八年“劳动定额记工制”二例加以说明。

开渠土方定额：

(1). 开渠、指定取土地点，每完成一方记工二点五分；

(2). 行夯、每人行夯二十立方记十分工，必须由三寸夯到二寸。

(3). 挖土、白夹土每方记三分工，丢坑记十五分工。

打井：实行包工，打大口井，三丈包工为一百八十个。打井下水记工十五分，穿水裤雨衣的记工十五分，不穿的记工二十分，两班调换打水记工八分，挖泥的记工十分。

4. 社会各单位大力支援为农场发展建设创造了条件。建场初，社会各单位给了农场很大支援，大到汽车，小到大头针，应有尽有。其中市委支援一部旧汽车；华北二工程局支援旧拖拉机二台；市卫生系统通过卫生局从第三医院调拨常用小医疗器具九十二件；团市委支援了中小农具、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二十六项三百八十三件；包钢团组织发动团员和青年职工捐献抽水机一台，现金六千元；石拐矿务局团组织通过发动青年义务劳动，支援青年农场煤一百吨；市农林水利局两年调拨树苗四十七万株，支援铁锹十二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单位给了支援，其中特别是青山区污水处理站，为农场提供了最有效的长期的污水支援。

5. 党政领导的重视，对农场的建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建立青年农场，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办公会、市人委市长办公会曾多次研究讨论。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同志，市长李质同志、副市长王孟樵同志等曾多次亲自同市有关领导部门和郊区的领导同志一起听取过汇报、讨论，研究决定一些问题。在农场建设过程中和发生重大灾害后，苏谦益、高锦明、李质、王孟樵等也曾亲自到农场看望大家，听取汇报，作指示帮助解决问题。在筹建农场过程中，团市委副书记梁满超、李文义，市农林水利局局长苑鸿吉，郊区区委书记冯喜富同志也作过大量具体工作，给予了积极

支持。在农场直接负责的是团市委副书记李文义同志和郊区副区长刘俊同志，他们为农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县团级干部，却照样拖泥下水跟群众一起干，真感人至深。实践证明，要办好一项事业，如没有党政领导的重视，没有上下左右的互相配合是不行的。

6. 附带说明青年农场为什么没有达到《任务书》要求。市人委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和五月十七日下过两个《任务书》，其中规定了农场的“四至”界限和三年内的发展规模，但到一九六〇年，并未实现《任务书》的设想，其原因不在青年农场本身，而是受以下四方面影响而造成：

第一、受“大跃进”所有制升级的影响，将长胜大队划归农场，使农场顾西顾不了东，使开荒造田速度放慢；

第二、受“大炼钢铁”和义务挖黄河总干渠影响，使劳力不够，影响农场本身发展；

第三、受“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国家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国家未按原定计划投资，农场财力不足，影响发展；

第四、领导上的安排。一九六三年，农场划归郊区，郊区将原为农场规划地的东半部建立了果园，限制了农场向东发展。

九、青年农场二十九年小结

青年农场建场至今，已经过了二十九个生产年度。二十九年来，农场将一个“风沙活埋人”的地方，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树成荫、蔬菜飘香的蔬菜区，成为一个农林牧工副综合发展的农场。

到一九八六年农场的现状是：土地面积为四千五百亩，其中可耕地二千三百七十亩，稳产高产田一千六百六十五亩；有水井

十八眼，大中小渠道合计总长为九千六百米，保灌面积为二千六百六十五亩（其中污水日为二千九百吨，有效灌溉面积七百亩，保灌面积三百亩）；造林现保存面积九百二十一亩，有树十万零八千株，四旁植树为八万二千株，两项共为十九万株；有各种大牲畜四十五头，羊四百二十只，猪八十三口，鸡一千一百只，其它一百零八只；有汽车四部，大中型拖拉机四台，小四轮拖拉机五十一台，胶车十辆；有工厂两个，卫生所（有病房）一所，学校一所，房舍总建筑面积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二平方米，在场职工总人数五百一十九名。

小结青年农场的主要成绩，除改造了这块沙滩外，为社会生产出商品蔬菜二亿三千二百一十斤（包括原长胜大队产的一千三百五十万斤），生产商品蔬菜种籽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五斤（除供应自治区的一些盟市外，还供应过山东省菏泽、淄博等市、东北地区的鞍山、大连、锦州等市，山西省的太原、大同和雁北地区，青海西宁，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生产粮食三百二十万斤；饲草（包括青贮）一千六百四十万斤；采伐木料四百二十方，间伐椽材二万多根。

二十九年的经济效益情况：从财会帐目收支资料看，现金总收入为一千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九百九十四元；在二十九年中十三年盈利计四十二万五千零十九元；十六年亏损计一百六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六元；国家总投资九十三万三千三百八十一元，农场上交税金四十二万五千五百零五元，收回折旧费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四元。算总收支帐如把利润、税金、折旧费均计算为收入，收支相抵后净亏损七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二元。但是要是算生产财富总帐不但不亏，而是大有盈余。不要说全部生产财富，就以现保存树木十九万株一项，以大小平均每棵树五元计价，就有九十五万元。

总观全局，青年农场建场近三十年，社会效益和生产效益都

是很好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六年增产增收，使农场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

在将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提一下，当年艰苦创业，为农场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们，现在在农场的还有：郭文远、李世勤、丁世兰、沈风英、丁世仲、张义恒、刘凤玺、刘朝兰、李淑萍等诸同志。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爱场如家、扎根农场，把青春献给农场的老创业者。

（本文作者系包头市人民政府农林水利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

节 俭 治 国

《书》曰：“稼穡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然则家犹国，国犹家。是以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其义一也。

《齐民要术·序》

〔译文〕《尚书》说：“农业生产是艰难的。”《孝经》说：“凭借天时，利用土地的效能，谨慎处世，节制使用，来供养父母。”《论语》说：“老百姓的生活不富裕，谁又能使君主富足呢？”汉文帝说：“我为天下人管理着财富，怎么可以随便浪费呢？”孔子说：“管理家庭的道理，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治家的道理如同治国的道理，治国的道理又如同治家的道理。这是因为，家庭贫穷，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妻子；国家荒乱，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宰相，其道理是一样的。

（王 辑）

东河村的形成和蔬菜种植发展史话

〔回族〕 白 宝

东河村是郊区河东乡形成较早，规模较大的村庄。大约形成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该地原系蒙古族草原，内有沼泽地，隶属土默特右翼，沙尔沁佐领行政管辖下的蒙古族户口地，由催领巴信负责。

东河村北依大青山下的黄土山，南邻银匠窑（现巴彦塔拉大街东段），东至山架沟、壕口，西抵东河槽，方圆一百多平方里。村西北有遐迩闻名的转龙藏，转龙藏附近有解放后建成的内蒙古工人第一疗养院。村内有较大的五道庙。村民集中居住在沿土山一带村北。

历史上的东河村是一个乡级政府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也是军事战略要地。

东河村的沿革

东河村原与南龙王庙村是一个村（行政、生产、水利为一个体系），解放后才分开。村内无史料记载，村民有些家谱已湮没，只能凭回忆得到一些史实。来村较早的是现在的七十六岁的张荣（张六十六）的十代先人张贵，原山西代县阎村人。初来此地住在现第五木器厂附近，随后赵全亮、韩克英等先人，先后在这儿定居，故取名“代州营”。由于当时沼泽地（本地叫蛤蟆窝）和东河槽流水漫溢，难以耕种，于是上山向蒙古族租地，开荒种田一百余亩，春送肥，秋拉粮，无路上山，只好绕村西小山沟上

山，故取名“代州沟”，沿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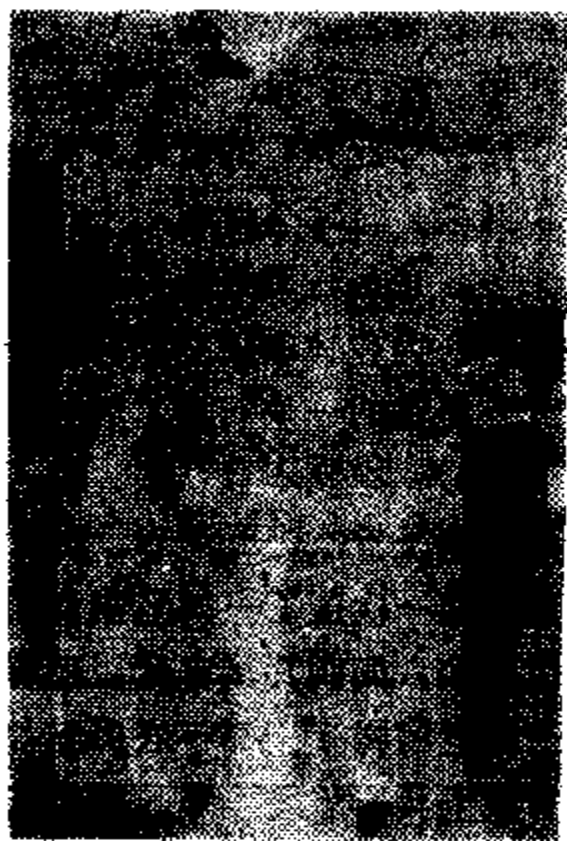
到清嘉庆年间，随着包头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人口已达四万多人，消费增加。村内农民看到村西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河水，村庄又靠近城镇等有利条件，决定建立商品蔬菜生产地。农民们用洪水淤澄和人工填垫方式造田改壤。到清道光年间初步形成五百多亩清水地，八百多亩洪水地，上千亩旱地。与此同时，商业、手工业组织起行社。包头先设公行，后分组。菜农也组织起园行。东河村农户在园行管辖下，以个人名义取园名。下表简略地介绍当时的情况。

东河村种植蔬菜园行简表

园名	占地面积	园主
义和园	一百六十亩	张有成（小秃老财）
兴旺园	四十亩	尹二
万福园	三十亩	卜太平
园恒西	二十七亩	李子元、李子章
和合堂	五十一亩	张林义
同仁堂	十亩	牛红山
园恒泉	十三亩	刘凤山
福义园	一百亩	陈长命
禄祯堂	一百一十亩	王有珍
马粉房	二十亩	马根成

拥有土地较多的还有陈喇嘛三十亩，张兰柱旱地一百五十亩。

上述各园土地，绝大多数是清水地，全部由园主自营，但因劳力有限，每年须雇用长工，（多的二三人，少的一人）农忙时还雇一些短工。但没有一家能象后来城里的“复盛园”那样，具有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一直持续下去的。



照片1 竖立在新村乡的石碑

种植，自行销售。在清水地，春季以种植叶类菜为主，夏季种植豆角、黄瓜、茄子等，秋季种植黄萝卜、园白菜等，总共二十多个品种，产量也不太高，又销不出去。于是又增种西瓜、甜瓜、香瓜，还是销路不佳。因此改用一部分水地种经济作物蓝靛和麻类，在洪水地种黄萝卜、毛良谷等，旱地有山药、高粱、谷子、夹心滩洪水地种高粱、糜黍。当时，小型工商业也在村内逐步发展起来，有张文明、曹世杰办的“义和昌”粮店，珍珠大头银

一九二六年，包头先设治局，后改为县。原第一个区后改为七个镇，东河村属圃丰镇，由镇长王怀德行政管辖，（东河村当时为东新乡，照片1）但农业生产仍归农工社领导（有的说与东新乡并存），其首领称甲头。先后有翟林、张有禄、张双喜、贾玉珍等担任此职。其主要职责是：蔬菜地浇水的管理，民事纠纷问题的解决，地方上花费摊派的收费以及天旱祈雨等事宜。

当时包头县对蔬菜的生

产、销售都无计划，全靠自由

柱小开的肉铺，康有义的油酒杂货铺，赵堂、赵光的干货铺，绰号“三崩子”的“兴隆泉”粉房，还有王尔俊的“三和”铁匠铺和郑搬不动的“福合炉”铁匠铺。冬季农闲时，有些村民进城学一点手艺，如张云学毯子手艺，后在南龙王庙村开“云计”毯子房，解放后进了包头地毯厂。

一九二八年，包头县公署改为包头县政府，县下仍设乡，东新乡（东河村）乡长是王有珍，他又是包头商会评议员。但乡的实际工作是贾玉珍负责。到一九三四年，乡下设闾、邻、闾长是李保、李惠，三十户为一邻，设有邻长。与此并存的有东大社，负责人称会首，由刘高升（刘喜喜）担任，当时全村有七十二处院落，每五院选一会首，为五道庙服务。东河村五道庙与别处不同，因为有个传说：早在清咸丰年间，村内住户李三全家开设一个小店，慈禧太后幼年来包暂住于此。坐过的一块石头（后称落凤石）还运回了北京。太后回京后下圣旨，李家不敢认帐，差人的圣旨送不到，怕回京交不了差，只好将圣旨放进五道庙。因此东河村后人对五道庙进行了两次重建。第一次盖了一间坐东向西的小土庙，一九二四年又建两间老道房和六间砖瓦接官厅，还有坐西向东的戏台（现在此地还有一棵老柳树）。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许愿唱戏，庙上住过的老道有张士兵、陈老娃等。这种庙会主要由东大社会首负责，其花费和老道生活费由村民分摊。在此前后，转龙藏设有园泉社，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唱戏，花费由菜农负担。城内大行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也在玉皇庙唱戏，十分繁华。

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十四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包头，将原来的七个镇并为统合镇（镇长刘澍），下设五个区，东河村仍为东新乡。乡长由包一中齐寿康提名，张文明担任，任期不足两年由贾玉珍接任。乡内分总务组（组长武荣）、经济组（组长田子园）、文教组等。乡下设甲，甲长由李宝、郝红、任孝廉担任，

甲 下设排，每排三十至三十二户，排长有张荣等人。

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村南建“铁牛”部队营房，占地二百七十亩，并建成康复医院（现二九一医院）。

日寇统治东河村时的蔬菜生产状况

东河村蔬菜生产由日本人控制时，曾设有立服、主富江、小铃的三个部队。立服部队和主富江部队管辖村西到村东菜田，小铃部队主管村南菜田，村内有张德昌、张有仓、王万锁、张保负责联系。蔬菜品种增加，有牛蒡、四五大根白萝卜、葱头、小芋头、“一窝猴”西葫芦、“朝天嚷”青椒、“灯泡”茄子、“小牛心”茄子、火茄、西红柿、早生大根萝卜、刺黄瓜等。每年春季按户下达种植计划，籽种到兵站（现金龙王庙万人会堂）领取，不收款，农民按计划种植，一切管理全部自理。到收获时，由管辖部队通过联系人要菜，农户送去，任日本人定价。农户种牛蒡收入高些，种园白菜、芋头等就低，生活困难。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左右，日本人卖给农户一些白面，以示慰问（当时市场白面短缺），实际是笼络人心。除日本人安排外，农户为求生存，自己再种一些蔬菜、瓜类等，其销售是预订和自销相结合。特别让人痛心的是被日本人强迫种植大烟，最大种植面积占全村清水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使我们广大的同胞受到了严重的毒害。

国民党在东河村时的生产状况

日寇投降后，村内蔬菜生产又恢复了日出种植。销售有三种方法：一是自销，二是城内菜商预订包销（如财神庙街的“永和泉”菜铺、民生街的“公和裕”菜铺，新兴大街的“聚盛泉”、“聚义泉”菜铺等），三是个体商贩预订菜。

一九四六年市县划分，乡设自卫大队，保设小队，征粮由民政科兼办。原东新乡改为福中乡，乡长赵如义、张保，指导员陈文瑞，乡下设东河村为第一保，保长张荣、任孝廉。生产无明显变化，菜农的生产也没有怎样提高，就是禁止种大烟。当时市县建立参议会，原东河村卜安、卜文兄弟为县参议员。

冯玉祥将军买地

这是一个小小插曲。冯玉祥将军于一九二五年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提前派秘书来包头买地建造营房，共购得东河村、壕来沟、陈户窑、银匠窑土地十二顷。营户建在现蔬菜公司菜窖，当时称督办处，沿传至今。这年夏末，公署迁至包头，冬天冯将军到包，军纪严明，军队与当地居民很团结。冯将军号召植树，在军营东南栽榆树二十亩（现在三医院门前路北还留有三棵）。以后乡里为管理好树木，大约在民国十五年还立石碑为记。营内生产自食蔬菜，在二老汉圪旦（现三医院东）建土温室十多间。其构造为三面土墙，正面木窗，上糊白麻纸。室内种青椒、茄子、黄瓜、韭菜、西红柿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冯将军部队离开包头时，将土地全部奉送给成立不久的绥远省立第二中学作为校田。后由村民刘高升（刘喜喜）把土地揽回，分别租给一些农民，每年秋天农户将租子交给刘高升，他集中交到二中，这样过了三年，再后无人租用变为荒田。直到解放后，原四个村各自收回邻近土地，东河村收回四百多亩。

绥远省和平解放后东河村的变化

一九四九年九月绥远省和平解放，东河村归属包头第二区第一间，间长李奎河，副间长张荣、杨铁锁、杨锡光。全村有二百

一十三户，其中工人六十二户，农民八十六户，军人四户，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四十一户。劳动力四百五十人，可耕地二千二百多亩，其中清水地五百亩，洪水地八百亩，旱地九百多亩。一九五〇年党号召大生产，包头地区也提倡开荒，三年不交农业税（公粮）村内农民积极行动，开荒种地。同年元月，废除保甲制，成立了农民协会，由十三名农民组成。冬天，由市二区区长李恒丰、书记陈远主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训练班，村内参加学习的有樊悟田、张荣、李月英等十人。通过学习，自己组织起农民协会，向地主、富农进行减租减息。同年，第一间还成立了护林委员会，主席李奎河，副主席张荣、张保，委员有樊悟田、寇四锁等多人。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开始真心管理自己的土地了。

一九五一年冬，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东河村内十几家大户土地划归全村所有。当时主管是农会主席屈占泉，贫下中农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生产了。他们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开始了新的生活。村民鲁兰成当年创毛良谷亩产一千斤的历史纪录，成为劳动模范。一九五二年市政府号召组织互助组。村内第一个常年互助组由云赵小达（蒙古族）、田楞狗、贺福旦、贾铁柱四人组成，他们吃住在一起，十分团结，充满信心。当年又分到十一亩水地，还有牲畜、农具、车辆等。他们精心种植各种蔬菜，值得称道的是这个互助组创了小籽茄子亩产六千多斤，大籽茄子亩产八千多斤的纪录，他们还种植铺沙西瓜等，生活不仅有了保障，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村内党员、干部积极带头搞互助生产，农具、牲畜、车辆等都集中在一起。带头人有辛金保、寇二锁、赵福宽、张和尚等。同年，东河村、南龙王庙村、刘保窑、先明窑、大小井平、东西刘柱窑编为一个行政村，村长是王广才，副村长秦全小，党支部书记郭来宝，团总支书记是樊悟田，民兵大队长徐万银。

一九五三年土改复查结束时，由樊悟田、秦全小、张杰、云

赵小达、邢发富五人组织起来第一个党小组，积极领导和推行互助合作，使村内互助合作运动掀起高潮。由王有仓等十三户组织起常年互助组，还有李季节性互助组、变工组。

一九五四年七月东河乡信用合作社成立，由樊悟田、张佳二人任理事，积极发动农民入股。他们又集中农村闲散资金，发放给农民做生产和生活贷款，对农村资金周转，扶助生产起到一定作用。同年冬，由樊悟田等四十三人组织起“四季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樊悟田，副社长辛金保。全社有水地一百一十亩，旱地二百四十亩，蔬菜产量不断提高，黄瓜亩产达六千多斤，年终每个工值一元二角，农村的收入增加。一九五五年冬，东河村与南龙王庙、刘保窑、先明窑组织起解放菜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址在原复盛园内。东河村为一个管理区，区主任王有仓，分设四个生产组和一个车马组。

头一年入社的社员有的积极带头，也有的持观望态度，劳动不积极。经过年终分配，每个工值三元六角一分，加上根茬款可得三元九角，有力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一九五五年党和政府提出要在我市建立重工业基地。郊区提出：苦战三年建成副食品基地。一九五七年，解放菜园总社按照国家要求下达种植计划。各村为完成任务，采取了复种、间种、点播、混种等措施，这一年虽遭自然灾害，全年蔬菜产量仍达六百多万斤，社员收入仍比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五点一三。

蔬菜产销挂钩 国家扶持菜农

国家逐步实行了统购包销政策，各生产队每年在落实生产计划的同时，还向蔬菜公司签订分月按日上市合同。这样生产者的目的明确，少受损失，消费者也能吃上新鲜蔬菜。村内还有两名专职推销员，他们经常深入田间察看蔬菜长势，到市场考察销

售行情，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一次掀起高潮，他们汗洒菜田，不辞劳苦，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太阳不出打早起，摘菜不怕沾露水，车载肩挑送鲜菜，保质保量送城里”。

国家关心菜农，积极扶持，解决生产实际困难，农民们深受感动。包头市商业局蔬菜购销批发部正确执行政府的统销包销政策，市场价格稳定，保证菜农合理收入。对蔬菜积压，调动一切力量扩大推销，菜农们对此十分满意，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了新的认识。

一九五八年一月，市蔬菜批发部支援阳畦生产，为东河村阳畦生产的发展作了有力的援助。当年遇到水利困难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批发部拨给解放菜园无息贷款五万二千元，木料二十三立方，玻璃八十四标箱。合作社把这些资金和木料重点放在东河村建立四十亩地的温室和阳畦上面。社员们提出蔬菜装筐成问题，批发部就送来菜筐和麻袋，这不仅节省了装运的时间和人力，还节省了农业开支。为适应市场需求，政府提出增加种植面积和提高产量的问题，并给以合理补贴，使种植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四十亩增加到一百一十亩。

由于国家把产销政策落到了实处，社员们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还有了长远打算，再也不愁种出菜卖不出去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国家对蔬菜的防虫工作也极为重视，先后给东河村派技术干部黄选、阎玉明、吉秉祥、胡淑英、赵世华等同志作指导，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村里建立了防虫组织。对几种常见的、危害大的害虫采取了具体的科学防治措施，配备了常用的农药，教给菜农使用方法，提高了蔬菜的质量和产量。

人民公社化

一九五八年全村在总社统一规划下，共分六个生产队（即七至十二队），同年冬全部进入人民公社（社址设在东河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李志刚，社长是张荣。屈占泉同志也由解放菜园调到公社当书记，主管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一九五九年，村内六个队合为东西两个大队，联队书记是张德科。为蔬菜副食品基地的建立，公社党委和解放菜园的领导把东河村列为重点，将办公地址由解放菜园（当时称第一营）移至东河村（现东河小学）。在加快农业发展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有养猪、养牛、养鸡、蔬菜腌制、铁木加工等。

一九六二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东河村又分为四个队。一九六三年收入好的东二队只有一户欠帐，其余农户都有节余，这与两位队长的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生产队长张换喜以身作则，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关心集体，依靠群众；政治队长刘祥，更是关心社员的生活，凡生活、生产有困难的都能给以及时解决，社员工分多，生活较稳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附一九六九社员收入情况表）

队	户	户均收入 (元)	人	人均收入 (元)	劳力 (个)	劳力均收入 (元)	工 值 (元)
一	75	464.03	280	124.29	120	290.02	1.03
二	65	520.55	238	119.00	110	307.60	1.21
三	76	384.60	264	109.46	110	265.72	1.08
四	75	379.62	273	102.79	113	251.92	1.01
总	291		1100	115.52	453	280.50	

三中全会后东河村的状况

东河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九七九年，全村已有三百六十六户，比解放初增加一百三十五户。人口达一千二百九十人，户均人口三点五二人；有井水地八百八十亩，果园二百七十四亩，自留地一百二十八亩，（拱棚十一亩，温室六百一十间，占地一百三十三亩），共计一千二百八十二亩，蔬菜产量为八百三十六万斤（其中春菜二百四十三万斤，夏菜二百六十九万斤，秋菜二百九十二万斤，温室拱棚菜三十二万斤），人均产菜六千四百八十斤；总收入为五十一万三千元（其中种植业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元，副业十万三千六百五十元），上交税金一万六千零三十五元，公共积累三万八千五百元，社员消费为二十五万五千元，户均收入一千四百五十元零八角，人均收入四百一十一元六角。上述统计数字表明社员生活水平已有显著提高。由于人口增加，住房紧张，村内拨出旱地三十二点五亩，解决了一百三十户住房困难问题，八〇年分大队后仍集体核算，一直到八四年。八五年起土地承包到户。现在东河村属郊区河东乡。村党支部有二十五名党员，书记贺文莲，设有村民委员会，村长李畅荣。

据一九八六年统计，村内有可耕地一千一百九十五亩，（其中菜地八百二十三亩），人均土地零点九亩，果园二百七十四亩。全村现有四百三十一户人家，比解放初增加了二百户，人口达一千三百二十四人，计划生育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全年总收入达八十六万三千元（其中种植业收入五十万五千元，第三产业收入三十五万八千元），扣除生产费用外，上交国家税金二万二千元，第三产业上交积累五万一千八百元，户均收入一千六百

五十九元，人均收入五百四十元。

从合作化到现在，原固定资产五十三万一千元，除逐年折旧外，现有固定资产净值三十八万二千七百元。从现在设备看，加温和不加温温室八百一十八间，占地一百六十三亩，拱棚七十三亩，共计二百三十六亩，占全村菜地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八六年春、夏、秋三季蔬菜订购任务为三百五十万斤，而实际交售了五百五十万斤，超计划百分之五十七。水果种植方面，一九八五年产苹果、梨、水李子等二十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菜田归到种田能手手中，菜农张德明（原四队队长）分到田后，一年收入达一万元，王明月年收入也达一万元。村内年收入六千元以上的有十三户，五千元以上的有十七户。郊区、乡两级政府重视技术推广，在农闲时派专业干部到村内讲授农业技术，进行季节性技术指导，为农民科学种田，治穷致富做出了贡献。

为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村内每年为分田到户的农民和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代交农业税二万一千八百元，两年共代交税金四万四千元。

第三产业的发展

村内剩余劳力响应政府号召发展第三产业，由村民委员会发起，以有专长的个人兴办。刘四小等五户办起了奶牛场，共养奶牛二十五头，年产鲜奶十二万六千斤。刘四小被评为郊区一九八四年养牛专业户先进个人。还有运输专业，汽车两辆，手扶拖拉机五辆，平板车二十辆；糖业烟酒小卖部两户；饭馆一户；外出做工一百多人。集体兴办的有：食堂、缝纫部，年承包八千元，旅馆一处，可容纳四十八人，年交利润一万元，为去

三医院探病的人提供了方便；还有年加工量十万斤的豆制品车间；合资水泥预制厂，年交利润八千元。以上各项共解决剩余劳动力二百一十四人，纯收入三万一千五百元。除解决农业投资外，八六年还投资六万二千元，建托儿所一处，占地三百二十一平方米，可容纳一百一十名幼儿入托，现已有六十名幼儿入托，分大、中、小三个班。（见照片2）



照片2 东河村新建的托儿所

水利建设的发展

东河村原与南龙王庙村共用一条河水。东河村还能利用的另一股水，是由转龙藏三条石龙吐出的泉水与代州沟山泉水在村西北汇合而成的。解放前，这股称为“小水”的水流，只能供村前的赵全亮、牛风山等几家农户使用，灌溉五十亩土地，以点香计时轮浇。

村南的八百多亩平整洪水地，由于水源不足，无法制定用水制度，其灌溉有三种渠道：一，在春季清水地用水间隙时灌溉，称春汇；二，在初冬上游不用水时灌溉，称冬灌；三，在夏秋季山洪来时，将山洪搅到地里灌溉和淤澄。可见当时用水浇地的

艰难。

一九五八年解放菜园领导重视水利建设，投资四万多元，在转龙藏山脚下建截伏流连环井（东西长一百米），与大河水并用。后来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于是一九六一年又投资四万多元，在村南四十亩地打了一眼深一百二十米的水井，一夜可灌溉四十多亩土地，可是水质差，浇幼苗不行。一九六四年河水干涸，又在村前武菜的地里打了二号井，深一百二十米，每小时出水量为一百二十吨。一九六七年在村东（现果园）投资四万多元，打深一百三十六米井一眼，每小时出水量为八十吨。一九七一年又投资三万五千元，在河东公社路南打六号井一眼，每小时出水量八十吨。一九八二年在银匠窑打了两眼井，坏了一眼。能用的一眼深三十五米，每小时出水四十吨，投资近万元。一九八五年在二九一医院南侧打七号井一眼，深一百二十五米，每小时出水六十吨，投资三万四千四百元。一九八六年又在银匠窑打一眼井，每小时出水八十吨，投资一万八千五百元。同年在村路南砌防渗渠五百五十四米，消除了明水渠的不利因素。以上水利总投资为二十六万零二百元，使浇水时间由过去十三天轮一次变为三天轮一次，基本上解决了农田用水的困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前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广大菜农踏上了迅速富裕的康庄大道。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菜农们心里都明白，只要有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生活就会日益提高，各项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写在后面

我不是东河村人，只是在一九五四年信用社成立才与东河村人相处。三十多年来，由于生产工作上的密切往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产生了写“东河村村史”的念头。遗憾的是本人文化水平较低，深入了解不够，再加资料短缺，不能写出东河村几百年间象样的历史，仅凭调查，走访得来的材料，写成了这篇粗线条的历史文稿，其中缺点毛病一定不少，望读者阅后给予批评指正。

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承蒙各方支持，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东河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东河志史办，郊区档案局给予大力协助，原副乡长张荣，八十六岁的老农张和尚，八十四岁的张文明，一九三三年任教的倪玉林老师，王绍清，张根马，赵全亮，寇三锁几位老人，解放后的老干部屈占泉，樊悟田，辛金保等都亲口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此深表谢意。

初稿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日在东河村幼儿班完成，并由村民委员会主持的老农座谈会上讨论通过。参加人有原河东公社党委书记屈占泉，村党支部书记贺文莲，干部刘祥，张保厂，老农张根马，寇三锁，赵六十一，张长世。

（本文作者系郊区综合服务大楼会计，市政协委员）

郊区蔬菜名种荟萃（二）

高崇岭

麻池的葱头

麻池乡是包头市主要蔬菜基地之一，对城市的贡献越来越大。麻池产的葱头更是品质优良，颇有名气。葱头学名洋葱，别名园葱。原产亚洲西部高原，我国种植历史悠久。它以硕大的鳞茎供食用，含有丰富的营养。据资料介绍：葱头有降血中胆固醇的明显作用。常吃葱头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产生。欧美等西方人大量食用葱头，他们把鲜葱头经过工业程序脱水制成葱头粉，供人们随时消费。我国维吾尔族人民特有的“抓饭”，葱头是不可少的辅料。麻池葱头有两种，一是黄皮葱头，一是紫皮葱头。黄皮葱头肉质浅黄而柔嫩，辣味较淡，早熟耐贮。紫皮葱头外皮紫红色，质地脆嫩多汁，辣味淡浓适口、中熟耐贮。在人类祖先长期培育下，葱头的鳞茎最外数层鳞叶变成干膜状，具有保护作用，也就是葱头耐贮的内在原因。

麻池乡的土地肥沃，土性多属砂壤，麻池的地下水源较为丰富，适宜块根、板茎作物生长。解放前后其村南的“十里下湾地”主要靠自流泉水浇灌，泉眼遍布坡前，有永茂泉、郑三壕等大泉水七股，小泉水不计其数，潺潺流水，四季不停，浇灌着一千二百余亩好地。六十年代之后，随着工业用水的开发和早年的影响，地下水位逐年下降，麻池泉水由大变小终至断流。进入八十年代完全靠井水灌溉。

麻池种葱头始于五十年代后期，经过长期摸索和农业、科技

部门的指导，麻池菜农总结出三条种植经验：即早育苗、浅定植、防蝇蛆。“惊蛰”前后播种育苗，因葱头较耐寒冷，育苗阳畦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再盖蒲帘就能育苗了。阳畦按常规管理进行，直到“立夏”节左右就可露地定植。栽葱头切忌深埋，根部入土就行。浇水缓苗后多中耕，有利鳞茎膨大。葱头蝇蛆发生在七月中旬，六月下旬可喷药一至二次防蝇，只要适期喷洒农药，蛆就不会发生为害。麻池的葱头除供应包头市场外，还远销京、津、沪等地。八十年代初麻池每年种植葱头千余亩，亩产一千五百公斤，高的达二千公斤。近一、二年由于销路不畅，种植面积锐减到百余亩。据一位去港友人谈：“香港市场的葱头质次价高，很难看到象包头这样好的葱头。”麻池葱头若能打入香港市场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后营子乡的旱地大葱

旱地大葱以其特有的辛辣醇香而著称于市场。不言而喻，大葱在人们生活中是离不开的调味菜，春夏秋三季多有青葱应市，漫长的冬季居民们要靠自己储备来保证每菜必有的大葱消费。每年秋末冬初，后营子乡的大葱经过国营、农贸、小商贩等多种渠道，源源运往各个城区、矿区供应人们选购。旱地大葱质地优良，葱白粗且长，干物质含量高，耐冻、耐储。深受城市人民的欢迎。大葱品种有孤葱、枝葱之分，据老农讲包头最初的大葱由“口里”引进，经过祖先栽培而演变成当地农家品种——孤葱。后营子乡每年种植大葱三千五百余亩，产量在二百八十万公斤上下，占郊区商品葱的百分之七十，举足轻重。这个乡的大葱产区集中在近郊的黄草洼、前营子、西北门、庙坨塔、刘柱窑等村。这一带地处丘陵旱作区，靠天雨种田。旧时，人口稀少，习惯轮

歇耕作，头年休闲长草，“伏天”耕翻压青，接纳雨水保墒，第二年再行耕种。而今，随着人口的增长，市场需求的变化，轮歇制已废止。广大农民种葱向精耕细作迈进，舍得花工投肥，夺得一个又一个丰收年。旱地拔葱亩施基肥三千公斤，“夏至”前后，土壤晒暖，杂草丛生时边撒粪边耕翻，隔两犁栽一行葱，七月进入雨季，葱秧得水而旺。增加葱白的长度是提高单产和质量的关键，葱农们采取两种培土方式达到高产目的。一种用锄“放葱”一遍，一种是用刮耙拔土二至三次。大葱年景好坏，取决于当年降雨多寡。

我国大葱种植历史久远，《齐民要术》有这样的记载：“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选得五亩：二亩半种葱、二亩半种诸杂菜。”《齐民要术》是我国很早的古农书，它记载了公元五世纪及以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状况。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近郊种菜的做法；二是葱的消费在当时就占重要位置。时至今日，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正向“小康”发展，种好旱地大葱，也为“四化”建设立下了一功。

古城湾的玉头

玉头是包头地方俗称，学名球茎甘蓝。诸多地区通称茺蓝。郊区的广大菜区均有种植，面积比较集中、品质较优的要数古城湾乡，近几年种植亩数稳定在二百至四百亩之间，单产四至五千公斤，占郊区玉头面积和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古城湾产的玉头皮瓣个儿大，削掉皮洁白如玉，嫩水欲滴，有透明感。生吃起来多质嫩，脆甜爽口；腌成酱菜是佐餐下酒佳品。老包头的居民中西人最多，生活习俗中免不了带点“山西味”，入冬前家家户户

日寇侵包前后包头的政治经济概况

(1936年——1938年)

章瑞焯 译

编者按：日寇侵华，蓄谋已久，就连当时的塞外小城——包头，他们也置于鹰爪之下。侵略前，他们从各方搜集情报，以供侵略者之需；侵略后，更将其触角伸向各个角落，以掠夺包头之资源，掌握包头之命运。我们从章瑞焯同志的译文中，不难闻到侵略者的血腥气。同时，我们从译文中，也可看到一些当时包头

腌一缸酸咸菜就是一例，玉头被视为腌渍骨干品种，那时候古城湾的玉头就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

古城湾包括上、下古城湾共八个村，耕地万余亩。背靠大青山，面向黄河，呼包公路、京包铁路横亘其间。自然分成三条东西长的带状区域。土壤多冲积淤澄而成，结构好且肥沃。加上百余种玉头的经验，一代传一代，形成独特的栽培技术。他们把玉头栽在高埂上（埂高十五厘米，宽十厘米），受光好又通风，有利玉头的生长发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玉头、黄萝卜套作，高埂栽玉头，埂下种黄萝卜，两种作物各得其所，互不影响，可获得同时增产。高埂栽培玉头施肥集中，土壤透气性好，是高产的重要原因。

古城湾乡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除玉头特产作贡献外，保护地生产亦有了大的发展，全乡菜农正向多品种、四季生产鲜菜迈进。

（本文作者系郊区蔬菜局副局长、农艺师、区政协文史委员）

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于研究包头，了解包头，无疑大有裨益。

今年七月七日，是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卢沟桥“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回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我们特选编了章瑞焯同志从日文翻译的二篇真实史料。这二篇史料，前一篇来自“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 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北支经济资料第十七辑（昭和十一年六月——一九三六年）”，后一篇来自“《东亚》十一卷九月号（一九三八年）”我们将其冠以“日寇侵包前后包头的政治经济概况”的标题，合在一起，供读者研究。

包头一般经济情况

凡 例

一、本篇为西北贸易的重镇、包头县的一般经济情况概论。

二、用一个礼拜到现地考察后，主要综合以下参改资料。

绥远省政府年刊（民国十九年度）

绥远建设季刊（民国二十一年三月）

绥远民政刊要（民国二十四年五月）

绥远政治实察所工作概要（民国二十年）

包宁铁路的计划和建设（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卓宏谋编

西北问题〔第一卷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第

四期〕

开发西北（各号）

绥远西北日报

绥远日报

包头日报

三、到绥远的笔者 冈田信一

昭和十一年六月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天津事务所调查课

第一章 概 说

这个地方历代是蒙古人的据点（注一），“包头”在蒙语中是“土地会合”的意思。现这个地方为乌兰察布盟的东、西两公旗、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及归化的土默特旗四个旗的相会之地。

汉人开始来此，始于乾隆年间，当时在城西五里的西脑包村开始经商（注二），尔后当局为奖励移屯开发西北，汉人移居日增。包头镇是萨拉齐县的一个镇，民国十二年设治局，十五年改县，到二十二年设市政筹备处。

包头北靠大青山，南临黄河，地势居交通的要冲，古称“高阙塞”，为口外贸易的一个据点，当建成平绥铁路成为终点站以后尤为显著（注三）。今日的包头，是远至新疆、甘肃、宁夏各省，近至河套、内蒙古及平、津各地的物资集散地，商业繁荣，是西北的一大商业城市。

看来要建设包宁铁路是困难的，由于包头用费低廉，才拥有强大的商业势力，还带来和维持了今日的繁荣，要是陇海铁路向西延长，则包头作为铁路终点站的重要性便会被夺走或暗中消失，今天包头的繁荣早晚会衰退。

注一：包头疆域沿革表

秦	并州塞外
汉	云中郡的犍和县及五原郡的稠阳、临沃、九原等县
后汉	并州地的郡县与汉代相同，但犍和、稠阳两县被省略
三国	鲜卑
晋	五原郡、云中郡的最西部
北魏	朔州广宁郡的石门县之地
隋	榆林郡金河、榆林两县的西端，五原郡安化县的东北部
唐	丰州九原郡通济县的东部
辽	今县北境、云南内州开远军的南部境、东胜州武兴军榆林县的西部
金	今县北境、云南内州开远军的南部境、东胜州东胜县的西境
元	大同路云内州南部及东胜州西境
明	蒙古
清	萨拉齐厅的一部、即达拉特旗、乌拉特三公旗的一部及土默特旗的一小部
民国	十二年包头设治局，十五年设包头县，二十二年设市政筹备处

注二 包头俗语“先有脑包，后有包头”

注三 包头在没通铁路前，黄河上物资全集中在河口镇（包头下游一百五十市里的托县城的河港）集散，再经绥远陆运。包头发达后，托县则完全萧条了。

第一节 位置 人口 面积

一、位置

包头站向西约二十公里是东经 110° ，向北约二十公里是北纬 41° 。东——萨拉齐县，西——伊克昭盟杭锦旗，北——安北设治局、固阳县，南——东胜县。

二、面积

1、当局公布的数字不一样，判断困难，列记于下：

（1）、民国二十年六月调查（绥远政治实察所工作概要七十页）二万一千七百二十八平方里（东西一百九十四里、南北一百一十二里）。

（2）、民国二十三年一月调查（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出版民政厅季刊）九千七百六十六平方里。

2、总之，汉人搞行政区划，同时开拓蒙地，根据什么与蒙民订哪些土地契约，是有伸缩性的，方式难以确定。

三、人口

1、民国二十五年三月末（包头县政府发表）23179户、113524人。

计 开

	公安局管 辖	第一区管辖	第二区管辖	第三区管辖	第四区管辖
户 数	13254	3291	1972	2988	1674
人 口	62246	15676	10709	15743	9150

2、民国十九年（十九年度省政府年刊）27760户、178761人。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刊民政厅季刊）——122723人。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包头县政府调查、包头日报刊登）19189户、91610人。

注：包头移民地的色彩仍还浓厚，居民春来冬回较多。

第二节 气候

本地近北纬41°，和沈阳附近同一纬度，海拔一千零一十六米，因远离海洋与沙漠相接，所以呈大陆气候，冷热温差大，雨量稀少，炎夏温度甚高，可达34℃，入夜急降，一日间温差可达20℃以上。降霜期很早，秋风后便可见严霜，自霜降至清明为冰雪期，气温在冰点以下。十一月至一月温度达零下十多度。多西北风，春、秋两季多狂风。结冻的河水，常清明节后开始解冻。

包头还没气象台和农业试验场，温度和雨量无法统计，据《西北问题》第一季第二期148页记载的数据如下：

月 别	1	2	3	4	5	6	7
温 度 (°C)	-11.59	-6.29	0.65	8.39	15.51	20.89	24.89
雨 量 (毫米)	5.32	2.97	5.84	7.55	27.31	74.43	84.25
	8	9	10	11	12	总平均	总 量
	22.40	15.90	8.89	1.09	-9.28	7.37	
	100.40	91.40	25.78	14.06	50.08		442.85

第三节 居民

居民多为山西人和绥远托县人，山东、河北两省人次之。

汉蒙间难区别，居住的蒙民也多和汉族同化，纯蒙民不多。

县城内居民多商人，乡镇居民从事农业。生活程度比他县稍高又复杂，风俗稍奢侈，民情强悍、贪懒又很迷信。乡镇农民全为破产状态。

第四节 行政

一、县内被分为四个区，在县城尚设有市政筹备处。

区 别	乡 镇 数	等 级	区公所所在地
一 区	24 乡 镇	一 等 区	县 城
二 区	59 乡 镇	一 等 区	麻 池
三 区	98 村 镇	二 等 区	(苏)木图村
四 区	161 村 镇	三 等 区	大 树 湾

本县属一等县，分秘书、第一、第二科。第一科分总务、民政两股，第二科分建设、教育、（地方）财政三股，年经费八千六百四十元。

二、以前土匪横行，各乡农民东逃西躲，未曾在村中久居。近来，社会治安渐被维持。

警务关系方面阐述于下（据民国十九年度省政府年刊）：

项 目	警官	警察	枪 枝	弹 药	马匹	经 费
包 头 市	28人	269人	69枝	2838发	9	4289元
包 头 县	4人	44人	19枝	1818发	8	533元

总之，包头市警务，在省内是第一。另一方面，乡村有保卫团的组织，据同时十九年度省政府的调查

团数	人数	步枪	弹药	马
16	202	166支	3194发	7匹

三、本县行政上属绥远省，然而军政全为山西省军（王靖国七十师）所掌握，值得注意的是其行政、经济形势，都受山西省阎锡山的政策所牵制。

第五节 市街 公共机构

一、市街

1. 县城的周围约十六点五市里，北部大半是小丘，南半部为平地。有东、南、西、东北、西北五个城门，城内人口约六万。

繁华的街道有前街、后街、财神庙街等，以前街最繁华（城内中央呈东西向）。

2. 民国二十年六月，据绥远政治视察员调查，本县内百户以上的村子有十五个，五十户以上至百户的村镇五十个。

二、公共机构

七十师司令部、绥西保安司令部、绥西护路司令部、绥西护路副司令部、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七十师第四一五旅司令部、七十师第四一五旅四二九团团部、七十师第四一五旅四二九

团团部、七十师第四一五旅四三〇团团部、七十师第二〇四旅第四〇八团团部、晋绥宪兵队第九队、第十五路军驻包办公处、包头市公安局（第一、二、三分局）、稽查总处（第一、二分处）、塞北关分关、邮政局、电报局、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团部、包头水利管理局、包乌汽车路管理局、包头地方法院、包头商会、包头农会、包头教育会、包头征收局、包头屠宰厂、省立第二中学校、中国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包头图书馆、包头公园、中国红十字会包头分会、县立小学六所、平市馆钱局分所、垦业银号、山西省银行、飞机场（欧亚航空公司）、包头日报、包头维新派通信社、包头文化派通讯社

第二章 交 通

包头处于水陆交通要冲，也即陆路有车驼之便，水路有黄河舟楫之利，道路通向四方。然而交通机构还不十分发达，难以形容。

本县境内铁路长十五公里。黄河上的汽船勉强开始航行，向西通五原的长途汽车呈不太发达状况。

第一节 铁 路

一、已建铁路

现包头站，是位于平绥铁路的西端，本铁路的终点站。在县内通过的铁路约长十五公里。

二、予定的铁路

以包头作为起点，西至宁夏，有全长约五百四十余公里的铁路建设计划。

民国十一年十月，高恩洪任铁道部长时，和白耳义营业公司商订借材料款八十万磅，王瑚任督办，开始搞本路的建设计划，然而因资金不足，便没开工。

民国二十年四月，包宁铁路工程局局长郭恩海，呈请铁道部部长孙科，派遣陈延光等六人组织经济调查队进行实地调查，快到临河县时，因土匪横行而调查中止，只调查了全路的五分之三。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由于经费不足和敌寇深入，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便将包宁铁路工程局交给平绥铁路管理局接收。

最近听说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张维藩，以积极的手段，搞其第一段（包头——五原间一百七十公里）的铁路建设计划和概算书，并向铁道部申请能从铁路建设公债中，支付给上述经费。

如按上述概算书，建设经费需要五百二十万元（用新钢轨）或四百四十万元（用九十磅旧轨）。（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绥远日报刊载）

第二节 道路 汽车

一、道路及汽车运行的地区

1、向西的通路

包头——安北——五原——临河——乌拉河——宁夏，此路为民国十四年西北军所建。以包头西行经水臭子、麻池、达子店、公庙店、小庙子，约二百三十余里。从西山咀折向西北行入安北，经南牛棋、扒子补隆、把总地、东大濠、白家地，再向西斜行，进入五原县境到燕安和桥，长约一百三十里（包头——五

原间约四百八十里)。五原——临河间约一百八十五里，临河——乌拉河间约六十里，从乌拉河入宁夏境向南行至西磴口，约二百八十里，西磴口——宁夏间约三百七十里，全长约一千二百八十里。

路面宽平均为一丈到二丈，通过的各地与包宁铁路计划线略同，目前汽车运行在包头、五原间，其他区间通稀少。

沿途渠道纵横，架设的桥梁又狭又简单，多用杂木树干架设再垫上土，车运行很危险，不过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已多次派调查员在五原——乌拉河之间进行道路测量，结果表明五原——临河这段路，地势低洼多水湿，考虑到被水淹的可能性大，认为不如改变这段路线，决定修筑从五原至太阳庙的道路（简称五太路），太原绥靖公署拨款十万元，派七十师二团已完成修筑任务（在民国二十三年开工，二十四年冬竣工）。

但太阳庙至宁夏的公路还不能连接，需再改道，经陕坝、黄羊木头至乌拉河，在此处与宁夏公路相接。现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初，王靖国师长在这段路之间试运行汽车，结果宣告良好。

2、向北的通路

向北至固阳县的所谓包固公路（一百二十里），还没见有汽车运行，不过看样子冬季可能运行汽车，途中什拉诺尔坝很险要，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正在修筑中，予定民国二十五年春竣工。

3、向南的通路

从包头渡黄河南至东胜县，约为三百五十里，由东胜县向南行至陕西神木县，向西南行是鄂尔多斯的郡王旗、求萨克旗（原文如此——译者注）、乌审旗、鄂托克旗等各旗地，再向西南行使至宁夏。

在夏季可用船在南海子渡黄河，在冬季可于二里半从冰上跋涉而过。还有包头——东胜间的交通，从来很不便利，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出于防共和便于人民来往，派四〇七、四二九两团士兵

修筑了本公路。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旬竣工，军用汽车试运行结果良好。

4. 向东的通路

到萨拉齐九十里，此路也是七十师四二九团所修，能走汽车。

5、还有从包头东北行至武门约二百八十里的路，年久未修，车马来往也不多。

二、汽车

1、包头官府用汽车有四、五辆，出租汽车没有。

2、包头、五原间的长途汽车，定期运行的汽车行有四、五家，属包乌汽车路管理局。各汽车行有车两、三辆，隔日运行。

管理局定的包头、五原间的运费和路程如下：

A、运费 乘客每人每里一角

货物每百斤每里一角八分

B、区间 包头 $\xrightarrow{50\text{里}}$ 昆都仑河 $\xrightarrow{60\text{里}}$ 塔湾 $\xrightarrow{110\text{里}}$ 公庙子 $\xrightarrow{90\text{里}}$ 扒
子补隆 $\xrightarrow{30\text{里}}$ 怀末 $\xrightarrow{60\text{里}}$ 五原

C、所需时间 从包头至五原约八小时

另据该管理局的职工反映，该局每月收入约为九百元，人和物件费支出为四百元，修路费为五百元。

去年度（民国二十四年）的乘客，月概算为五十至六十名。除包头——五原间以外，还没见汽车定期运行。（不过绥新长途汽车公司最近运行从归绥至包头，再由包头向北行到中公旗）。

第三节 航 空

有独资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从民国二十四年开始，便定期

飞行于包头——宁夏——兰州之间。

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来，每周往返一次，已改的时间如下：

每星期三 兰州——宁夏——包头

每星期五 包头——宁夏——兰州

每星期四 包头——（上午八点）宁夏——包头

（上午十点半返回）

运费

乘客 包头——宁夏一百三十元 宁夏——兰州一百四十元

包头——兰州二百七十元

货物 普通货物 每公斤 包头——宁夏一元三角

宁夏——兰州一元四角 包头——兰州二元七角

贵重货物 为普通货物运费的三倍

〔尚有日本北支航空公司还未正式开始营业，听说北平—张家口—张北—绥远—包头间每周往返飞行一次（北平—包头—星期一，包头—北平—星期二），机场使用欧亚航空公司的〕

第四节 水 运

一、黄河从山西河曲经绥远省的河口、包头、宁夏省的宁夏、中卫、五方寺至兰州，能利用民船，尤其是从河口到五方寺之间，舟楫之便利很大。现平绥铁路延长到包头，西路货物的外销，是以包头作为中心，所以航行在包、宁间的船只最为频繁。

包头以西的水路运输，历来是用民船和筏子。从西宁、兰州东行，仅能乘用筏子随水流下行，不能逆行。因民船设备多为简陋，航行呈困难状态。

逆行船从包头到宁夏（水路全长一千零五十八市里），最少

要一月余，最多要五、六十天，平常几乎没有乘坐船的旅客。运载的货物，也仅是粗杂货，品质良好的货物多用驼运。

因民船是就使不定期航运，商品行情随货物的到达而随时涨落，对市场情况影响重大，加上一些行为不端的船夫，在航行途中偷取货物等，导致额外损失，使商人宁可多花运费，依靠驼运较为便利。这是包西水路运输不振的一个原因。

黄河通航期，以每年清明节（旧历三月一日）化冻时开始，到立冬前结冻时止，最长为七个月。在此期间，普通运货航船，运行在包头、宁夏的往返次数不过两次乃至三次。

在这区间，民船约八百只，一年运输的货物额，上行约三万余担（每担三百斤），下行约四万余担；此外下行皮筏子约三百余只，装载量据称达一千余万斤。

甘绥轮船公司曾用汽船作了试航尝试，以后甘肃省政府还造了两只汽船，在包头、兰州间试航，也因设备不适合实际而归於失败，终于在社会上被传说黄河上不可能航行轮船。

适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有李纫菴、岳亦民等人，对包、宁间的黄河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黄河有固定不变的正流，但水势常有变动。历来小轮船航行的失败，也有种种原因，应认识到不光是河道的原因。阐明如果仿效长江上流（川北）通航的方法，采用新式浅底轮船，并且在河道上设置适当的设备，航行故障便可消除。

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山西省政十年计划的中心机关），准备从包头到宁夏间的黄河中，企图航行汽船，作为西北建设之一。民国二十三年新造小汽轮一只，在包头下水进行试航，因发生故障而中止（水草缠住螺旋桨造成故障而停止转动）。等第二年化冻后加以修理，再进行试航，结果良好，逆水航行时速达二十余里，顺水航行时速三十八里。

接着以后新造同样汽船，逆水向宁夏航行，十三天到达目的

地，不过其后到结冰期只航行一个往返。

本年（民国二十五年）在结冰期内，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派杨思诚、张世明等人，在包头组织该会驻包机船办事处，在南海子设立船坞，制造机船，在积极准备开始营业，就便在包、宁间分为八段，各段设办事员一名。

尚有绥远省政府计划中的螺旋桨机船的航运。

二、历来黄河航行的民船、筏子样式有以下几种。

1、民船

七站船 长四丈、宽二丈，载货量下航三万斤、上航二万斤。

高梆船 长三—四丈、宽一丈七尺、深四尺五寸，逆行载重量比七站船多。

盐船 运盐专用，长五丈，构造同七站船，载重量三百余担（每担三百六十斤）。

小五站船 长二丈，载重量八千斤。

2、筏子

木筏 在宁夏以西的木材产地，居民以木材作筏，载少量货物顺流运向下流。

皮筏 牛皮筏用整张牛皮密缝，先在青油和盐水中浸泡，数日后取出，用人工吹气使其膨胀。数十或数百个联贯起来制成一皮筏，载重量一万斤左右。

羊皮筏 作法同牛皮筏，因皮质脆薄，仅能作短距离航行或渡河用。

3、汽船

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制造的蒸汽船概况如下：

船长百尺，宽十七尺，船舱深七尺。总吨数九十一吨，三百马力，装煤十吨，时速十一海里（平常流速），可载客二百名，并可拖带百吨的拖船，时速为八海里半。装有两个汽缸的发

动机，汽缸的尺寸长八寸、十六寸，直径十寸，蒸气锅炉压力为一百五十磅。平均每小时耗煤七百磅，平均每日消耗油约五元。

三、包头的码头有三个，即南海子、二里半村、王大汉营子。

南海子的地点距城十五市里，距离火车站十市里，是现今船筏停泊地，设有简易的码头设备，因河面很窄而水深流急，所以船筏停泊不便。

在南海子依靠各船主组织船筏总会（船筏的征收机构，每船往返一次，船主交税六元，行商商人交税十六元）及河路社（船主互相间或旅客间发生纠纷争吵的评议和调停机构，每船往返一次，船主交税一元二角，行商商人交税一元）。黄河解冻以后，各地物资便云集到这里，很繁华。南海子——包头间，大车和骆驼共同运货，每百斤运费为两角；但冬季黄河结冰后，骆驼能在二里半过河，在南海子过河的不多。

二里半村正如其村名，是位于城南二里半的地方，没码头设备，同时河岸高七、八尺，不过是能勉强拴小船的停船地，作船舶停靠不适合。正如上面所述，这里是冬季渡河地方，而在黄河解冻后，便靠渡船摆渡。

王大汉营子距包头车站三里的地方，建铁路后，船主便渐由此迁走。

将来作为汽船码头，据调查，可选择在王大汉营子和南二里半之间的地方较合适。

四、水路运费，按民船运输习惯，逆行运输布、茶、砂糖、小五金、洋杂货等货物，以担（每担三百斤）作为计算运费的标准。下航货物为皮毛、药材、兰烟、谷类等，习惯上以一只船作为计算运费的标准。

运费表

包头——宁夏每担八——十元 包头——五原每担三元左右

后套——包头运谷类每担一至一点二元 包头——临河及陕坝每担四元左右

宁夏——包头每船（下航时三——四万元）三百元左右 磴口——包头运谷类一船（约百担）一百五十——一百八十元 包头——宁夏间乘客一人包括伙食费，预定十五元。

五、从包头到宁夏水路为一千五百零八市里（与本节开头写的一千零五十八市里不一致——译者注），时速为十一海里的载货船，在平均水流速每小时二海里半，逆行时要求再减去二海里半，时速成为六海里（十九市里），同时下行船如时速以三十五里计算，往返全程要一百五十小时。

第五节 其它交通工具

洋车 约六百辆 轿车 约二百辆
大车 约七百辆 骆驼 约千余头

第六节 通 讯

一、邮政

包头邮政局本年（民国二十五年）一月成为一等局。管理全部邮政，汇兑业务，还有包头、固阳、安北、东胜、萨拉齐各县以下的邮局，也归包头邮政局管辖。

1、新设的村镇信箱

固阳、兴顺西、舍窰、白灵潭、永德成、银号村、大榆树滩、固阳新城、萨气、后店子、石拐沟、五当召、安北台梁、黄茂壕、包头大树湾、傅家圪堵、萨拉齐、东大社、四柜。

2、设有邮政所的地方

固阳——疙团忽洞、垦殖公司。

萨拉齐——东新村、兰顶圪梁、西大社

包头——苏木兔、玉兴德、洋大地、色葫芦圈、升恒号乡、
马营长地、大兴公司。

3、设有代办所的地方

包头车站、麻池、东胜县。

二、电话

甲、市内电话约十八余部。

乙、长途电话

A、民国二十四年度县政府建设股架设的线路有：

1、县城——麻池 2、麻池——昆都仑沟口

3、麻池——傅家圪堵（也叫富家圪堵）

4、傅家圪堵——桃尔湾

5、桃尔湾——公庙子 6、县城——大树湾

7、公庙子——卧羊台 8、县城——沙尔沁

9、什拉淖沟口——大庙子

B 绥远省政府建设厅架设的长途电话

归绥——萨拉齐——包头——安北——五原——临河

C、计划架设的线路有

1、麻池——桃尔湾 傅家圪堵——升恒号

3、傅家圪堵——兰虎圪堵

4、傅家圪堵——苏木兔

5、苏木兔——扒子补隆

6、大树湾——二锁圪梁

7、二锁圪梁——小淖 8、小淖——同心东

9、西碾房——南葫芦头

10、南葫芦头——烙林特拉

11、大树湾——西碾房 12、烙林特拉——魁素

三、电报

有无线电台一个、电报局一个

第三章 产 业

本县内几乎没有什么物产，只是与它有关系的地方输入进来的货物进行集散的很多，才使包头的商业逐渐繁荣起来。

第一节 农业及农产品

农业在本县不是重要产业，一般土质干燥，加上受连年水旱灾和土匪横行，所以农业还没充分发展。不过中滩一带，占有三滩河之利，土质也好，农产品也多。

农民中有十分之六是自耕农，十分之四是佃农，可是这些农民多数还带有春来冬回乡的移民风气。

关于农产品的数量，尚不十分确实，只能推断揭示如下：

A、据民国十九年省政府年刊登载的包头县农产品统计

种类	年产量	种类	年产量
小麦	六千石	莜麦	四千二百石
大麦	——	糜子	四千一百石
谷子	二千石	糜子	七百石
麻	绿	六万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黑	五万二千四百斤	
高粱	一千石		

B、据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绥远建设厅季刊登载包头县农产品统计

小麦	二万石	谷子	九千六百石
大麦	—	麻子	一千六百石
莜麦	一千六百石	高粱	二千石
糜子	四万石	杂豆	五万石

C、昭和八年（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一日天津驻军调查

粮食 七万三千石

包头县开垦状况

已放垦地一万二千四百顷，未放垦地一千五百十顷，可耕地四千三百余顷。

地价：旱地每亩四角五分，水浇地每亩一元二角。

水利：引黄河水修渠筑坝灌溉。

包头县境内已开的渠有：

渠名	渠长	灌溉面积	渠名	渠长	灌溉面积
七股渠	七里	十三顷	五股渠	七里	十顷
十股渠	十里	十五顷	石家渠	五里	七顷
四股渠	三里	五顷	二十二股渠	四十里	八百顷
马家渠	三里	二顷	东大渠	四十里	二百二十顷
张四渠	六里	六顷	西大渠	二十里	八十顷
高家渠	七里	十五顷	西官渠	二十里	五十六顷
幽风渠	十五里	七十顷	公济渠	七十五里	一百三十顷
普济渠	十五里	十顷	民福渠	二十里	六百顷

第二节 矿业及矿产品

1、煤

据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建设厅季刊，年产一万七千九百十六吨，产于石拐沟、正沟和五当召沟。有土窑数百家，几乎全为手工采掘。

2、石棉

鸡毛窑子附近有少量出产。

大体上本县的矿产说起来还不多。

第三节 林业及林产品

林业很薄弱，县内的树木也很少。

民国二十年，经林务委员会的努力，勉强建起一处林场，有十五亩，只栽有杨柳四千三百一十七株。

第四节 畜牧业及畜牧产品

一、畜牧业不发达。

二、畜牧确切数量尚不明，据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绥远建设厅季刊登载的包头县牲畜数量如下：

马一千匹 骆驼一千五百头 驴四千头

牛五千头 青山羊一万二千二百只

羊二万六千只 盘羊九百只

三、畜产品统计（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绥远建设厅季刊登载）

羊毛一千六百六十万斤 羊绒一百一十万斤 驼毛二百六十万斤

（注）：据与下面民国十九年度省政府年刊对照，这些数字看来过于夸大。

羊毛四百万斤 羊绒五百万斤 驼毛一千五百万斤

四、皮革类及其它（据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绥远建设厅季刊）

牛皮五万四千张 马皮三万二千张 羊皮九万六千张 狐皮八千五百张 狼皮六千五百张 猪、羊肠五万付

（注）：据与下面民国十九年度绥远省政府年刊对照，这些数字也过于夸大。

山羊皮八千张 老羊皮六千张 羔羊皮二千张

第五节 其它物产

一、水产品（据民国二十一年绥远建设厅季刊）

鲤鱼一百二十万斤

二、药材（据民国十九年度绥远省政府年刊）

茯苓十五万斤 枸杞十五万斤 大黄四万斤 当归一万斤
锁阳六万斤 羌活四万斤 甘草二百五十万斤

（注）：据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绥远建设季刊登载的甘草一百二十万斤

第六节 工业

一、包头的工业，多为手工业。现代化的工业，说起来只不

过有包头电灯面粉公司并非夸张。

二、先阐述该公司的情况。包头电灯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为三十万元，股东多是住在包头的山西人。民国十九年五月开始发电，民国二十年五月附设面粉部。

甲、发电部

有二百瓩发电机一部，约供给一万盏电灯（仅供城内及其附近），还供面粉部用电。

室外变压器总量二百零五千伏安，电线杆总数五百七十八根，高压线总长七千四百八十六米，低压线总长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米（民国二十四年末调查）。

乙、面粉部（建三层楼一栋）

设备

德制精麦机六台 德制制粉机四台 德制钢磨四座 美制电动机一台

生产能力：日产八百袋（每袋五十磅）

现在生产状况：

每日（白天加工）产三百——四百袋（大约一等粉二百袋、二、三等粉一百五十袋）

原料

作为原料的小麦，有固阳附近产的（后山货）及五原、临河附近产的（河套货）。后山货品质好，河套货夹杂物多，品质也差。前者用车马运来，后者用船运来包头。据推算，两地一年运来的小麦可达十万石。

有关核算方面：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调查，从一石小麦约可制精粉四袋（每袋五十磅）。如小麦质量好，能制粉更多些。

小麦一石（二百五十磅）十二元五角——十三元。面粉一袋，一等粉三元五角，二等粉三元一角，三等粉三元。

商品：

为双驼牌商标，全为本地消费。一等粉为绿袋、二等粉为红袋、三等粉为兰袋。该公司经理讲，在民国二十四年销售面粉十万——十二万袋。

经营成效：样子良好，详情不明。

三、其次还有一家制粉业，即晋源西粮油面粉公司，也是较现代化经营的企业，有德制精麦机、制粉机、钢磨各一台，旧式石磨六个，使用二十马力的柴油机一台。每日消耗原料为三、五石。

日产量为二等粉一百三十袋、三等粉十袋、四等粉五袋。

也兼营其它粮油业务，经营成效良好。

四、除上述的电灯、制粉两工业外，其它全为手工作坊，确切数量也难弄清。

甲、纤维工业

西北的畜产品从水、陆两路运来包头，再转运平、津和其它地方，便很自然地促使包头这种加工业的兴起，不过由于资金不足和运费等关系，使加工业还不十分发达。

毛织工厂有三家，工人四十名，每日产量为五十七尺。工资每人二角八分——三角四分。三家工厂中最大的是“新兴工厂”。

毛毯工厂有二十七家，工人四百九十六人（内有学徒二百六十五人，工人二百三十一人）。资本一千元——二千元。全年产量为二万二千余平方尺，全年产值为三万九千余元。

毯业工厂有十六家，工人一百三十四人，年产量为毡帽一万顶。

毛口袋业有七家，工人五十二人，日产量五十二条，每条六角——一元二角。

其它皮毛加工业的全年产量为：

毡鞋一万双	皮衣	羔羊皮	一万三千件
皮褥五百条		老羊皮	一万件
		山羊皮	

麻绳业有四家，工人二十四人，日产量为四百斤，每斤一角五分——四角。

乙、榨油业有三十三家，年产量为三十六万斤。

丙、造纸业有二十二家，年产量为六万三千朵。

丁甘草膏制造业，有一家工厂叫“永茂源甘草公司”，有资金约三千元，为芬兰人经营。民国二十年春，被省政府收买，由绥远平市官钱局经营。

从三百五十斤甘草原料，可制取甘草膏一百斤，为旅行者和军队所需，主要运销天津，每百斤约三十五元。日产甘草膏约为二百六十斤。设备方面有锅炉十四个，靠人力和畜力发动。

第四章 商业、金融

甲、商业

第一节 一般商业

包头是西北的一个商业城市，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使商业长期不振，市场萧条。包头依仗交通便利，没见因萧条而破产的，多少还有些物资集散，大多数商号不获盈利，损失不大，使商情得以维持下来。对于包头各同业公会，民国二十四年度对各业商情作了调查（参看第二节）。

1、皮毛业

能获盈利的有广恒西、广丰厚等两、三家店，其它各家都很艰难地维持营业。

2、粮油业

同年附近农村没受水灾，获得丰收，粮价也高，一般经营良好。

3、米面业

年末本市人口增加，粮价上涨，一般经营良好，资本不足的店，多数倒闭，资本雄厚的有魁复、聚成等两、三家能获得盈利。

因连年不景气，才渐渐兴隆起来，各商号尚都有亏损。

4、杂货业

年末各方面的购买力减退，始终呈不景气状况。

5、京货业（绸缎业者）

能获得盈利的有恒聚兴、增盛魁、鸿志昌等店，其它店因顾客减少呈萧条状态。

属于百货店的德华兴、大德成，如与往年比较，也不景气。

6、运输业

自平绥铁路开始肩负运输任务以来，使从业者蒙受重大打击，他们多数是天津、河北省人，秉性机灵，面对困境，能随机应变，设法克服困难，维持营业，尚能获得盈利的有两、三家。

7、货店业（代客售货）

因受资本所限，还无能力长久保存货物，除义德诚外，都逐渐能维持现在应有的状况。

8、牲畜业

各种牲畜的销路良好，多少可获得盈利，不过大的盈利则没有。

9、药材业（甘草业、药房）

甘草业商号永恒西，获盈利甚大。

天德堂、永利正、常泰和等药店能稍获盈利外，其它都是一般状况。

10、布业

该行业在土布销售关系上，顾客几乎全是农民，在农民购买力急剧下降之际，获盈利甚少。

第二节 商业机构及活动状况

1、米面业

包头城内的米面商店有二十二家，资本最大的有五千元，最少的有一千元，一般的有二千五百元。

著名的店有复巨成（开设五十余年）、义成永（开设三十余年）、大有魁（开设二十余年）、公合兴（开设五十年）、广恒茂（开设十余年）、如盛泉（开设五十余年）。经营者山西人最多，包头人次之。

经销的商品几乎全是本地的，从天津运来的洋面粉，数量逐渐减少。

每年交易最兴旺期为七、八月，闲散期为一、二、三月。卖主将粮食用骡马驮到粮油行后，经粮油行介绍卖给米面业。中间的运费和各种运费由粮油行负担，但粮油行要收取三分（百分之三）手续费（卖主负担二分、买主负担一分）。

本行业还兼营谷米加工和榨油业务。

2、粮油行业

有十六家，资本一千元——二万元。具有数十年历史的著名粮油行有复盛西、通和店、义盛、复顺恒、恒兴长、公义合等。经营者都是山西人。全年营业总额约九千万元（金额太大，恐为九十万元之误——译者注），经营商品的利润，本地货九厘，外

来货一厘左右。

本地货有谷米、糜米、春麦、荞麦，年销售额约十万石，八十万元。

外来货有大米、胡麻子、杂谷。大米来自北平，年约三百石，一万二千元。胡麻来自五原，年约一千石，四千元。杂粮年约八千石，八万元。

每年交易最旺期为九、十、十一月，每年交易闲散期为一、二、三、四月。雇用人数约三百人。

3、皮毛业

营业的有二十一家，资本一千元——五千元。著名的店有广恒西、天成恒、义同厚、双顺裕。全行业年营业总额约为二十万元，经营的商品全部是外来货，即羊毛、羊绒、驼毛、羔皮、山羊皮、老羊皮、狐皮、牛皮、狗皮。

羊毛主要来自宁夏。筏运费，每担（二百六十斤）十五元，驼运费，每驼（三百斤）十七元。

驼毛主要从蒙地来，用自己的骆驼运来。

交易最旺期五——八月，十一——一月；交易闲散期二——五月。

4、牲畜业

营业的有六家，资金一千元——三千元。著名的店有双顺裕（兼营皮毛业）、德和隆、天顺恒、和合德，都为山西人经营，全年营业总额为六万元——八万元。

经营的牲畜有牛、骆驼、羊、马，全来自蒙古，也即蒙古行业经牲畜行业之手，将牲畜卖给买主，牲畜行业主向蒙古行业和买主双方按头收取下列手续费：

牛、马六钱 骆驼一两一 羊八分

雇用人约八十人。

（译者注：据了解当时一头骆驼售价五、六十两白银，一头

马售价二、三十两白银，一头羊售白银一两左右）。

5、蒙古行业

在包头市由于和蒙古方面交易因而产生的一项特殊行业，其主要业务依靠包头各行业，带着各种杂货运向内外蒙古，用以物换物的方法，将换得的蒙古土产带回来。营业者约有二十家，资本一千元——五千元，也大部分为山西人经营。

民国九年以前，业务最为繁荣，每年由包头卖给蒙古的货达三十万两银以上。

民国九——十九年最多达十五万两银子。接着民国十九年春以后，到外蒙的通商路被拦断了，货物仅限于运向内蒙，其价值达十万两银子。现在尚没有恢复与外蒙通商的趋势。

6、杂货业

经营洋广杂货、布匹、糖、茶、烟草等商品的约五十余家，资本二百元——五千元。业主山西省沂县、代县人最多，其次是天津人。

经营的商品全为外来货（多为邮送），在本地区销售。交易最旺期为一、二、三月，交易闲散期为七、八、九月。

店员总数约一千人。

7、货店业

本行业也是特殊行业，为卖主保存商品、介绍买卖及安排住宿，经营者有六、七家，多为绥远人，资本五百——五千元。

客商（来购买西路或从内外蒙来的货物的商人）来包头便投宿货店，也有运来货物，并将货物寄存在货店内，委托货店向市内各行推销。还有的客商在拿到货款后，也委托货店从市内各行购进洋广杂货及其它物品。在这种场合，货店要向买卖双方各收取一分（百分之一）的手续费。

货店业雇用的人约有五、六十人。

8、纸烟煤油业

是把从上海、天津运来的纸烟、煤油，再转卖给新疆、甘肃、宁夏各省的业务，共有两家，都为天津人开设。

忠义恒，开设七年，资本五千元，民国二十一年销售额达百余万元。

永利义，开设九年，资本五千元，民国二十一年销售额为五、六十万元。

交易最旺期为八、九、十月，闲散期为一、二、三月。

纸烟主要是英美烟草公司产品，估计于民国二十四年在包头经销。

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有：

哈达门三千余箱（十分之七向西路销售）

仙岛烟及司太飞二百余箱（本地消费）

永太和二百余箱

国产纸烟有：

南洋兄弟公司 长城、连球

白金龙

上海华成公司 美丽、三仙 四百余箱

琴棋

山西晋华公司 云岗、五台山

煤油有美孚（鹰牌）、亚细亚（亚细亚、铁猫）、华成火油三种。

全年交易额约一百六十万元。

9、药材业

业主有十五家，资本一千——五千元，多为山西代县人。药材大部分是外地货，主要有苁蓉、红密、锁阳、大黄、枸杞、甘草。

年进货额约三十万元。交易最旺期为四、五月，闲散期为六、七、八月。

第三节 物资集散状况

关于包头集散的物资数量，据车站没能统计的以外，全按黄河和陆路的西路及与蒙古的交易数量推断。

民国二十四年（一至十二月）度中的包头站到达与发出的重要货物数量于下（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包头站调查）：

发送

羊毛 一万三千吨 驼毛 一千吨 水菸 三千五百八十五吨
甘草 三千吨 药材 一百七十六吨 小米 一千零六吨
高粱 四百吨 发菜 一百吨 皮毛 四百吨

到达

棉纱布匹 一千八百四十吨 烟草（纸卷） 一千二百一十吨

土布 九百吨 砂糖 一千吨 蔬菜四百吨

食品 八百吨 小麦 九百吨 纸二百吨 茶 六百吨

其次有关集散物资数量，如果按两、三种的资料（推断）刊登于下：

A、开发西北第二卷一、二期《包头市现状概况》一五八至一五九页

民国二十二年包头出入物资总数

1、直接输出货物

运向内蒙及新疆、甘肃、宁夏各省的有：

剪口铁五十万斤 生菸一千笼 糖类三千包 三九砖茶五百

第一棉织品一万二千五百匹 丝织品 一千五百匹

第二、转口

羊毛六十万斤 羊皮六百六十万片 羊绒五十万斤 老羊皮四十万张

2、直接输入货物

从内蒙（归化）直接输入的有：

羔皮二点五万张 骆驼一点一万张 驼毛一百万斤 羊毛六
百七十万斤 羊绒五十六万斤 老羊皮四点五万张

从天津输入的有：

棉花五万斤 剪刀铁五十万斤 粗洋布五万匹 冰糖五百包
白糖三百包 赤糖五百包 斜纹布二点四万匹 尖茶一千支 火
柴八千箱

从湖北输入的有：

二九砖茶八千箱 二四砖茶三千五百箱

从山西曲沃输入的有：

水炭三千五百箱

从河南消化镇输入的有：

水烟一千二百箱

B、民国二十一年版林龙著西北丛书

1、转口

各种布匹一点五万匹 杂货三点五万斤 砖茶五十一万斤
洋油七千箱 荆草及卷烟草四千五百箱

2、输入

毛皮一万余张 粮食三至五万担（每担二百六十斤） 各种
绒毛一千一百万斤 水炭三万箱（每箱一百四十斤） 羊皮三十
万张 枸杞二千箱 甘草一千万斤 盐一千一百万斤

C、民国二十二年十月版卓索谋著《包宁铁路的建设与计
划》三八至四三页

1. 最近二年从内蒙、西路来的各省货物

粮谷（从宁夏、五原、临河）年三千吨（每吨一千五百斤）

杂货（宁夏）年一千五百吨 红白盐（宁夏）年六百至七百万吨 碱（内蒙）年二百吨

从包头运向西路各省、内蒙的货物

糖类（向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每年三万包（每包一百五十斤） 砖茶（运向内、外蒙） 每年七千箱（每箱一百三十斤） 中国制布（向西路各省）十五万匹 外国制布（向西路各省）五万匹 外国铁条（向西路各省）五百吨 中国制烟类（向西路各省）每年六千件（每件一百三十斤）

2. 运向蒙地、西路的货物（民国二十一年份）

砖茶二千五百箱 洋布三千匹 斜纹布一千匹 绸缎二千匹

从蒙古来的货物

驼毛、羊毛、马、羊、牛、骆驼。其数量难以推算，但据从每年运向蒙地及西路的杂货和其它东西来推算，这些皮毛、牲畜的数量，每年估计有四、五十万斤。

第四节 物 价

昭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调查：

一、皮毛类

羊毛	后山货	每百斤	35.6元
	宁夏货	每百斤	38.0元
	王府货	每百斤	40.0元
驼毛	公王货	每百斤	95.0元
	西路货	每百斤	90.0元

	榆林货	每百斤	90.0元
羊绒	王府货	每百斤	80.0元
山羊毛	白	每百斤	50.0元
	黑	每百斤	24.5元
狐皮	北路	每张	11.2至13.4元
	西路	每张	10.0至12.3元
	河套	每张	9.7至8.9元
狼皮	北路	每张	16.7元
	西路	每张	17.8元
	本山	每张	14.5元
老羊皮	北路	每张	1.45至1.89元
	甘肃	每张	1.56至1.89元
	宁夏	每张	1.23至1.45元
	西宁	每张	1.89至2.12元
羔子皮	永昌	每张	2.10元
	宁夏	每张	2.56元
	河套	每张	1.78元
	艾叶	每张	20.0元
豹皮	金钱	每张	24.5元
牛皮		每张	0.30至0.45元
马皮		每张	2.56至3.23元
狗皮		每张	3.56至4.34元
灰鼠皮		每张	1.34至1.56元
羊猓獭皮		每张	47.8元至54.9元

马猓獠皮25.6至27.8元

扫雪 每张40.0元

沙狐皮 每张5.45至6.0元

山羊皮 每张1.88至2.12元

二、谷类（每十斗）

麦子6.23元 小麦6.56元 荞麦3.24元 豌豆6.45元

糜子4.67元 谷米6.78元 黑豆6.89元 谷子3.78元 胡麻8.0元

麻子7.23元

三、面粉

双驼牌（包 头制粉）	}	一等（绿）一袋3.8元
		普通（红）一袋3.2元
		二等（红）一袋3.1元
		三等（兰）一袋3.08元

五塔寺牌（绿）（绥远制粉）一袋3.3元

四、石油

大华火油一箱6.0元 亚细亚一箱6.1元 美孚（鹰牌）一箱6.1元

五、肥皂

白兰香皂一打1.65元 利华日光皂一箱（七十二块）8.0元

六、卷烟草

哈达门一包1.5元 司太飞一包1.55元 红宝石皇后一包（大）3.66元、（小）3.10元

七、铁丝类

十六号一斤0.16元 八号一斤0.15元 六号一斤0.145元
镀锌薄铁板 一张1.4元

八、蔬菜

白菜一斤0.07元 豆芽菜一斤四个铜板 葱一斤四至五个铜板 香菜一斤北平货0.12元、本地货0.06元 芹菜一斤北平货

0.20元

九、大米一斗3.2元 红豆一斗1.4元 绿豆一斗1.6元 小米一斗1.5元

十、纸(草纸)一刀(九十张)0.10元

乙、金融

第五节 金融 货币

一、金融概况

自货币实行废两改元以来，金融行业只不过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最近中国、交通两行业开始附设仓库，为商人抵押贷款提供方便。

银行存款利率 { 活存款 无利息
定期存款 年约八至九厘。

放款利率，根据金融市场的松紧有差别，年八厘至一分二厘。

汇兑费，汇天津每千元 1 至 3 元，汇太原每千元 5 至 10 元。通汇地区，主要是天津、太原，其它地方尚没有通汇。

钱庄放款利息，一周一厘五至一厘八。

汇兑费，汇天津每千元 10 至 15 元，汇北平每千元 10 至 15 元，汇张家口每千元 3 至 4 元，汇绥远每千元 1 至 2 元。

每年二至七月为金融迟缓期，八至一月为金融活跃期。

(附)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包头金融的混乱情况和善后处理。山西省银行(山西省官行)发行的纸币(流通在山西各县、包头等地)及绥西垦业银号(本店在包头)发行的纸币，同历来使用的法币(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和绥远票(平市官钱局

发行的纸币)同价值流通。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初，山西省内开始讨伐共产党，使纸币每天急剧贬值，巧好使奸商乘机将山西票(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带到包头攫取巨利，使纸币迅速贬值(三月十六日山西票总换法币，每千元要付贴水八十多元，绥远票兑换法币，每千元要付贴水二十多元)，为一段落。绥西垦业银号依靠平市官钱局纸币来回收同行纸币也不奏效，三月十八日遂使两种纸币在市面断绝流通(包头税务机关拒绝接收，平市官钱局拒绝汇兑)。

持有这两种纸币的一般百姓，其痛苦之情不用说了，纸币的急速贬值和物价的飞涨，使百姓为生活担忧，金融混乱也达到了极点。

鉴于上述形势，包头商会在三月二十日召集各税务局、农会、教育会、各同业公会、各银行、银号及地方人士协商各种善后措施，马上作出以下六项决议。

一、地方各团体联名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所属各税收机关接收山西票。

二、在交涉期间，各税收机关应收纳山西票。

三、在交涉期间，奸商带来的山西票，应设法制止。

四、向省政府请愿，省立各银号、钱局应进行兑换山西票和汇总业务。

五、派出代表向省政府接洽。

六、各税收机关使用山西票是否妥当，应向省当局请示。

这个协议会的代表(商会主席董五三、包头日报社社长李聚五、包头营业税务局局长柴桂生)于三月二十二日赴绥远，与财政厅进行各种接洽处理，三月二十五日勉强取得解决办法回到包头。办法如下：

一、山西票在原则上认为不可流通；但历来流入绥远，包头地方的山西票可流通。

二、各税务局限在五日内可收纳山西票税金；但税金额超过五十元的不行，超过部分拒收山西票。

三、三个月份的营业税，可用山西票予交；但每月不可超过五十元，要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补交。

四、凡持有山西票的人，限三日内，可在市内各商店买东西，但每次不得超过五元。各商店在此期限内，不得拒收山西票。

五、本办法从三月二十五起实行。

适值上述办法实行之际，包头税收机关（营业税局、征收局、烟酒事务局、屠宰检验厂）根据财政厅的命令，上述收税期为二日，使社会各团体再次发生纠纷，是因从财政厅的电文写错引起的，便平安解决了。后来包头的金融便平稳了。

二、货币种类及流通数量

名称	种类	流通量
银元		现在不见流通
银元票	平市官钱局票 (有一元、五元、十元)	总发行量一百五十万元，估计其中三分之一即约五十万元在包头流通
	丰业银行票 (有一元、五元、十元)	约三万元
	山西省银行票	约二万元（总发行量约六万元，整顿金融后急减）
	绥西垦业银号券 (有一元、五元、十元)	约十七万元（总发行数量二十万元）
	法币（中国、交通、中央银行） (有一元、五元、十元)	估计七十万元——一百万元
	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支付券 (有一元)	不详（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初开始发行）
铜元	大的（二十文）小的（一文）	甚少

名 称	种 类	流 通 量
角 票	平市官钱局发行，有一角、二角	
	山西省银行发行，有一角、二角（流通在绥远、包头）	
	中国银行发行，有一角、二角	
	中央银行发行，有一角、二角、二角五分	
	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支付券有一角	
铜票元	平市官钱局发行有，十文、二十文	

第六节 金融机构及其活动状况

一、银行

名 称	成立年代（支店）	内 容
平市官钱局 （支行）	民国九年	每年营业额 存款约五、六万元 放款约十五万元 汇兑一百万元 一百十万元 民国二十四年盈利约八千元
中国银行 （支行）	民国二十年	不 详
交通银行 （支行）	民国七年	除搞汇兑抵押放款以外，不经 营其他业务，每年汇额约 一百五十万元

名称	成立年代(支店)	内 容
丰业银行 (支行)	民国二十一年复业	存款三万元、放款十万元、汇兑约七十万元
绥西垦业 银 号	民国二十一年 太原绥靖公署经营	有资金四十万元，用于银行业务，还有纸币发行 存款 四十五万元 放款 八十九万元 稍大了点 汇兑 三百八十万元

二、钱庄

名称	性 质	成立年代	具有资金	民国十九年 盈 利	民国十九年 营业总额
宝昌玉	合资	光绪二十三年	一万两	一千五百两	百余万元
懋和允	独资	光绪二十二年	三万两	七千两	八、九十万两
正义 银 号	股份 有限	民国十六年	八万两	七千两	百余万元
德中庸	独资	光绪十九年	三万两	一万五千两	二百余万元
晋泉源	独资	民国十五年	三万两	六千两	百余万元
复兴泉	独资	同治三年	五万两	——	百余万元
广顺恒	独资	光绪三年	三万两	二千五百两	三、四百万两
德兴恒	独资	光绪十八年	一万两	七千四百两	二百余万元
兴复永	合资	民国五年	二万两	三千七百两	百余万元
宏远 银 号	股份 有限	民国十九年	五万两	——	七、八十万元

(原载《北支经济资料》第十七辑)

昭和十一年六月(一九三六年六月)

包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

《东亚》十一卷九月号（一九三八年）（原文作者未署名）

一

包头是日本国力伸展到的最西端的地方。

包头市区在绥远省的首府厚和（旧名归绥）以西三百三十市里的地方，它北靠阴山山脉，南临黄河，是京绥铁路的终点，向东经绥远、察哈尔、山西、河北四省而达京、津。通过黄河水路，向西南可到五原附近，与鄂尔多斯平原相连接，是内蒙经济的中心地，它通过宁夏，可对远至甘肃、新疆、青海的货物进行集散，是内蒙屈指可数的大城市，有人口七万七千人，一万二千七百余户。

日军于去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将这个地方牢固地掌握在手中，有强悍的内蒙军骑兵作呼应，把太阳旗飘扬在绥远城头，日军便直向西进，松浦、长谷川两部队在萨拉齐附近击败了马占山的五百国民军。川村部队艰难地占领包头后，为确保牢固占领，又向五原的敌人进击。另一方面，田中、川村部队陆续进入包头后，把包头郊区的黄河码头——南海子都掌握在手中，使包头的辽阔原野，全在我日军控制之下。

日蒙军占领包头，意味着华北、内蒙的大动脉——京绥铁路全线不仅牢牢掌握在手，而且在军事上、政治上具有划时期的重大意义。关于这一点，当时军方当局已发言指出：“我们隔着黄河睥睨着五原的辽阔原野和鄂尔多斯沙漠，把从北面外蒙来搞赤化的进路给斩断了。”

还强调其重要性在于：“占领包头和绥远，就意味着切断了共产国际赤化的进击线”。

也即苏联搞赤化进出作战的路线，一条从外蒙越戈壁沙漠，经阿拉善平原到包头；另一条通过绥新公路，自新疆经迪化、哈密、肃州、兰州、宁夏而达包头。所以，包头的确是被苏联看中作为华北的满洲搞赤化的基点。

而且最近在新疆省内，对吐鲁库西普铁路的从阿拉木图经伊犁向迪化，及从赛鲁伏布经塔城到迪化的二条公路的完成情况，表明赤色路线自中国事变以来更加强化在这种形势下，假如苏联军历来对满洲国采取了迂回包围，是使日本所谓的内线作战不利立场，现一变而为外线作战的有利立场，包头的占领，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何重大意义，已得到证实，某外文报对占领包头作了如下述评。

“是在外蒙和华北的中间打入的楔子，使国民党军在华北从西部内地的军需品的补给已深受打击”。

包头还是山西军阀傅作义的重点，也是作为守备归绥城的重要军事据点，所以常驻有许多军队，有第七十师司令部、绥西保安司令部、骑兵第四旅司令部、晋绥军补充第一团司令部和第二团司令部、宪兵第九队等。这与其说是畏惧对抗外敌，不如说是为了压迫蒙古民族，防止独立运动这一目的，当时石王事件、百灵庙的变乱，作为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及德王等的蒙政会，对事件充当了扰乱角色。再有包头公安局长、法国留学生、共产党员巴文俊，是根据傅作义的推荐就任的，唆使赤化分子在百灵庙的蒙政会内部暗中活动扰乱。

还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一九三六年春，陕西的上著共产军刘志丹和从江西长征到陕西的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的共产军合并，其一部分又从陕西入山西，趁王靖国部队返回山西，趁虚袭击包头。再有黄河两岸的共产军，通过水路在西南向包头进发，

被设在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剿匪总司令陈城部下的中央军及山西军、内蒙军所击退。

在日军占据包头后，作为防共亲日的政权——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着手确保了厚和、包头二大特别市的治安。具有蒙古民族独立光荣、卓越功勋的蒙古军，面对着占据在五原，处于日夜寒风吹袭的残敌，继续进行着守备。满铁、善邻协会、蒙疆羊毛同业会的采购团、电气事业调查团等，作为大包头建设的先驱，进行了视察调查。由于受开设吐鲁库西普铁路、外蒙独立、山西银行纸币暴跌等原因的恶劣影响而萧条挣扎的包头市民，却燃起了新兴意气。

二

包头作为华北经济动脉——京绥铁路并和内地相连结的一个点，是开发西北的策源地，是通过包头调节京、津和西北的供需，宁夏、甘肃新疆、青海等内地，由黄河依靠舟筏水运，还有用骆驼车等将羊毛、驼毛、牛、羊、药材等输入包头，与从京、津地方用火车运来的纺织品、砖茶、砂糖、杂货等进行交换，其交易额每年从五百万元到二千万元，有时达一亿元。根据一九二八年度京绥铁路的调查，包头的贸易状况如下：

从西北各省聚集的物资

牛皮一万余张 各种绒毛一千一百万斤

甘草一千万斤 水烟三万箱（每箱一百四十斤）

羊皮三十万张 盐一千一百余万斤

白麻三十万斤 枸杞二千担

粮食五——三万担（每担二百六十斤）

向西北各省输出的物资

各种布匹一万五千件

杂货一万五千件 砖茶五十一万箱

河南水烟及卷烟草四千五百箱

洋油七千箱

上面统计的是过去输出物资品种，现在有了大的变化，原进行交换的主要是畜产品、矿产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而目前日本贸易方面宣称最需要的是羊毛。作者拟就最近关于包头货物的集散状况略加叙述，以便阐明包头的经济地位。

聚集在包头的羊毛，其产地是包头附近的王爷府、乡镇及黄河上游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诸省，主要从西宁、兰州、宁夏、石咀子通过水路运输出来，经包头中转，由火车运到天津上市和出口。

现利用黄河水路运输，也开始用汽车公路运输，但运费高，吨数也受限制，特别是陆路上土匪多，担惊受怕，象羊毛体积大，但不急于输送，这是有利的方面，所以使用皮筏、民船运输羊毛。

从天津装载羊毛出口的年贸易额为二千六百万，其中七、八两月达六、七百万元至一千万元。今年由于受中国事变的影响，使从产地运来上市出口成为不可能，与天津的交易也被中断。日军占领了张家口和包头，并恢复了治安，使内地的羊毛也开始外运了。然而京绥铁路的运输力还不充分，去年十二月末所见空前积压的货物，在张家口有一百万斤、厚和有二百二十万斤、包头足有六百万斤、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由蒙疆银行妥善地进行了统一币制的金融工作，同时钟纺、兼松、大毛、日毛、满蒙毛织、满洲畜产、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八个公司，取得了蒙疆羊毛同业会的统制权，能顺利地进行了收购，使积压的货物也逐渐减少，到二月末的情况如下：

品 名	张 家 口	大 同	厚 和	包 头	合 计 位 单 (万 担)
羊 毛	41	45	20	93	199
山 羊 毛				29	29
山 羊 绒 毛	16		19	95	130
骆 驼 毛	1	13	3	95	112
合 计	58	58	42	312	470

关于收购价格，二月二十一日在张家口的蒙疆羊毛同业会的价格决定会议上，决定的标准价为套毛0.85元、抓毛1.6元。月末包头方面按最初的价格进行收购，预计每年上市高达二千三百万元（内羊毛一千五百万元），预计占收购总金额的垄断地位。

倘若把包头、厚和作为中心，与新疆、宁夏方面贸易，今后吐鲁库西普铁路通车，互相进出口贸易，运到苏联方面的必然很多，而且倘若年贸易额达三、四千万元时，同时共同恢复治安，则日本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必然会流入，事变以来那种与内地断绝状况再重建贸易，就为期不远了吧！

三

从包头作为内蒙交通中枢地位出发，显示了包头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宛如扇形的道路网，以京绥铁路、黄河水路作为大扇骨，以大小长短不一的公路为代表，接着是骆驼车道通向各方。

铁路

京绥铁路延伸到厚和、包头间，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历来张家口、丰镇、厚和都是作为聚集货物的车站而繁荣起来。去年十

月十七日日军占领包头并把整条铁路掌握在手，同时缴获装甲车、客车一百五十辆，次日十八日早上列车便立刻开始运行，治安恢复，铁路运输恢复正常。从本月二月一日起，行车时间表如下：

东	行
上午八时五十分	包头发车
(次日)上午六时四十分	张家口发车
下午二时十分	到北京

西	行
上午四时十五分	北京发车
下午十一时三十分	到张家口
(次日)下午八时三十分	到包头

水路

河流航运与铁路相对而言是更为重要的，黄河水流从包头到宁夏为四百英里自然水路，一九二八年更向上游可航行二百英里至兰州。航行从三月末开始，八、九月时是最盛期，如过了十一月就结冰断行。民船逆流而上可装载少量货物，支上帆再在岸上用绳拉牵曳，船航行需要时间长，一年只能往返三、四回。航行的情况如下：

黄河航行的舟筏

种 类	船 长	往返地点
高帮船	三丈八尺——四丈	包头——宁夏
七站船	四丈	包头——宁夏
小五站	大小不同	五方寺——包头
牛皮筏	牛羊筏皮一百二十个	兰州——包头
羊皮筏	木编八个气球十二个	同上
木排	木编	同上

舟筏航行黄河所需日数

西宁——兰州（四百八十市里）	三——五日
兰州——中卫（七百四十市里）	三——四日
中卫——宁夏（三百五十市里）	三——四日
宁夏——石咀子（一百九十市里）	二日
石咀子——磴口（二百市里）	二日
磴口——包头（一千 里）	七——十日
合 计二千九百六十市里	二十——二十七日

黄河舟筏运费

一、包头——宁夏

杂货一担 6 —— 9 元（折合每吨 33 —— 50 元）

二、包头——磴口

杂货一担 4 元（折合每吨 22 元）

三、青海、兰州——包头

皮筏一只 300 —— 850 元

四、宁夏——包头

羊毛、甘草、药材一件 3.7 —— 4.25 元（折合每吨 40 至 48 元）

五、磴口——包头

羊毛、甘草、药材一只 480 —— 1000 元

羊毛一件 1.4 —— 2.0 元（折合每吨 15 —— 22 元）

六、后套——包头

杂谷一担 1 —— 2.2 元（折合每吨 5.5 —— 12 元）

（注：一担=300斤、一件=150斤）

在汽船航行尚未实用之前，中国在清朝时反倒已着眼搞黄河水运，其后甘肃省督军张广建、包头段绳武作了实测调查。民国二十三年阎锡山着眼于将此作为西北建设的一项，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建造了一只小汽船（总吨数九十一吨、动力三百马力、船长百尺、中间宽十七尺、船深七尺），计划航行于包头、宁夏

间，因出了故障而中止。接着在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驻包汽部亦曾开，在南海子码头又进行试航，在包头、宁夏间设立了八个划艇队，成功地往返一次，后由于又出现故障而放弃。阎锡山只在此下游将航运延长到山西河曲，距中卫二千五百市里，航行日数，据说计划上航二个礼拜，下航一个礼拜。河曲已归我日军占领，当前对河岸进行了修整，日本先进技术的引进，使开设汽船定期航行就不困难了。

公路

以包头为中心的公路，已开辟了远至新疆省的汽车路，如绥新公路，在这种沙漠地带也使用许多骆驼、牛、马运输物产，这样反倒更为合适。

一、包宁路（包头、大余太、五原、临河、宁夏）一千二百九十市里

属这条线的还有包头、厚和之间，以及延长到宁夏、兰州、西宁、迪化五千九百八十市里，由新绥长途汽车公司的汽车运行。这原是一九三一年时由于要建设包宁铁路的目的而被修建的路，是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平绥铁路整理债务协定后和张库线一起搞的计划。

二、包东路（包头、东胜、榆林）五百二十五市里

三、包固路（包头、武川、固阳）二百一十二市里

还有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会议已计划修建以下四条线路。

一、包兰路（包头、五原、宁夏、兰州）二千二百四十市里

二、包塔路（包头、赛尔乌苏、科布多、承化寺、塔城市）六千零四十五市里

三、包西路（包头、榆林、延长、西安）一千八百九十市里

四、包库线（包头、库伦）二千二百市里

航空、通讯

关于航空事业方面，事变前在包头有飞机场，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兰州经宁夏，一个礼拜飞行二次，满洲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个礼拜飞行一次，而现在的情况完全改变。此外，电报局、电话局、无线电台，前五日在张家口创立，由于蒙疆电气通讯设备公司的创立，使统一加强了内蒙通讯事业，包头和东京间的试通话也将迅速实现。

四

在想象中包头附近的地下资源、储藏量相当丰富，然而开采的很少。如据说固阳的铁，储藏量为七十万吨，煤炭矿区有六十平方里，以及大青山一带的石棉有六十八万吨，都还没有开采，煤炭是用土法开采，产量很少，各矿的情况如下：

绥远省地下资源一览表（善邻协会调查）

种类	产地	面积 储藏 量	出产状况	年产量
铁	白云、固阳、萨拉齐、武川、清水河、包头	储藏量8500万吨、在固阳70万吨、在武川县、白云山有1000万吨		约100吨
碱	鄂托克旗、和林格尔、杭锦旗	在鄂托克旗东西、湖面积1750平方里，湖底有一尺厚结晶物及物资		1800吨 40325万担
钠	鄂托克旗	不	明	不 明
硫磺	固阳、武川	曾产于大青山侏罗纪炭层		
石棉	武川、萨拉旗、东公旗、包头、乌拉特旗、固阳、厚和、安北、察右旗、察素齐、伊盟	大青山一带储藏量约68万吨		20吨

种类	产地	面积	储藏量	出产状况	年产量
粘土	固阳、清水河	不	明		2000吨
石墨	厚和、兴和	不	明		不 明
水晶	陶林、武川、 固阳、兴和	不	明		不 明

对于包头一般产业略作叙述，就畜产而言，张家口、丰镇、大同、厚和都是大量上市的地方，一年中有马三千、驴一千五百、骡六百、牛五千五百、羊二万等，从内蒙东、西两公旗聚集，输出到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河套地区的农业也是有名的，米、麦、大豆、玉米出产很多。工商业方面有绒毯、甘草浸膏、面粉、毛织品等工厂十六个，大、小商店一千余家。包头及附近各县政府对被调查的重要物产数量及输出入物品总值列表如下：

各县物产种类及产量表
(民国二十年度)(单位：头)

县 别	马	牛	羊	骡	驴	猪
包 头	428	4360	8217	39	2348	3251
五 原	1205	14743	59409	279	2833	1145
临 河	1194	5080	26292	661	2631	7226
固 阳	844	5110	134160	126	1115	7530
东 胜	966	1375	19671	35	3499	1811
安 北	534	10826	147093	150	3713	5340
沃 野						

县 别	羊毛(斤)	羊绒(斤)	油(斤)	大黄(斤)	甘草(斤)	粮食(石)	毡子 (平方尺)	栽绒毯 (平方尺)
包头	3064	1291	500000	—	716375	86410	420000	44000
五原	101914	12961	150000	10000	300000	73947	29000	30000
临河	12154	4996	150000	5000	—	139435	24000	11000
固阳	110500	68950	130000	—	8000	48278	5400	1000
东胜	7814	3842	8000	—	—	56750	6000	—
安北	145712	61062	4700	—	6000	93495	—	3500
沃野	—	—	—	—	—	—	—	—

各县输出入物品总值比较表（民国二十一年度）

县别	全年输出 总额(元)	全年输入 总额(元)	出入超过	主要输出品	主要输入品
包头	340241	35318192	(入超) 34977951	粮食、甘草	绸缎、布、呢、茶、糖、瓷器、烟花、 铁、煤油、果品
五原	129323	67331	(出超) 61992	皮毛	布、烟、糖、瓷器、茶、盐、
临河	1324527	787848	(出超) 536679	牲畜、皮毛、粮食	绸缎、布、烟、茶、糖、日用品
固阳	359312	70252	(出超) 69060	粮食、煤、羊毛	布、糖、煤油及日用品
安北	918010	35318	(出超) 882772	粮食、牲畜、皮毛、药材、鱼、煤	布、烟草、糖、火柴、煤油
东胜	59721	—	(出超) 59721	牲畜、皮毛、药材、煤、红柳	—
沃野	5265	2260	(出超) 2905	粮食、皮毛、甘草	布、火柴、盐

五

最近蒙疆联合委员会，对旧绥远省黄河流域南部的鄂尔多斯地方未开垦的一千二百万町步（一町步合99.2公亩——译注）地区，可能允许经营水田，供日本移民，委托日本农民开垦，据说这事由拓务省和朝鲜总督府之间作了了解后决定的。

所谓黄河流域和鄂尔多斯地方，被认为大体指归绥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后套平原，这个地区作为河套地带水利沃野，名声很大，自古以来就有“黄河百害，独利一套”的谚语。在清朝末年，已由归化将军贻穀大臣督办垦务，设立教头水利局，搞灌溉工程，那就是今日富饶的五原、临河地区。

数年前，由旧绥远省政府开始搞绥西屯垦工作，阎锡山自任主任，在太原设垦督办事处，作为绥区屯垦委会，则设在包头，拟定计划输送七百万移民，五亿斤农产品，七百万元地亩税为目标，而作为第一步是中央实行裁减兵员并实行兵垦政策，还有在五原的五百名山西军士兵，划拨给约一千三百公顷垦地

后套地方的官渠及灌溉面积如下：

渠名	塔布渠	长济渠	通济渠
县境	大余太	大余太	大余太
灌溉面积(顷)	6000	5000	5000

义和渠	沙河渠	丰济渠	刚济渠	永济渠	合计
五原	五原	五原	临河	临河	
3000	3000	3000	3000	8000	36000

此外，约使有三十万顷民渠的广大地区也能获得灌溉。

鄂尔多斯地方向南是渐升高超过五百英尺的高原，在这些地方全是沙漠，没有灌溉设施，然而黄河的水还充分具备搞进一步灌溉的条件，如果以日本的农耕技术来进行开拓沙漠，使其变成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可能的。

这个地方的土质是否适于种水稻，还未进行过研究，在此转载有关公主岭农业试验所池田实氏的恰当报，根据该氏提供这个地方的土地碱性反应强，而且含有盐碱类碳酸钙的肥料种类很多，如果注意施肥方法，进行适当灌溉，便可获得相当的成就。（见下页表）

也即降水量极少，气候干燥，含有无用的盐类极多，呈碱性反应。作物有谷子、高粱、荞麦、小麦、黄豆、亚麻仁、落花生、大麻，土豆等，还栽培有园艺作物罂粟。如果不下雨，有灌溉之便的土地，作物生长良好，地下部分也比普通大五十倍以上。对阿鲁喀利地带呈酸性反应的土地栽培水稻，如有充分灌溉之便，收成也不减。

这样沙漠变为绿洲之日，成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包头，其繁荣就惊人了，也就是现在成为商队的通路，横贯在鄂尔多斯的许多小路，联接安北、五原、临河，密如网眼的通路，将一切物产集中在包头，是因不论是黄河上流各地或是聚集在下流河曲的山西北部农作物、鸦片、羊毛等物被吸引过来。

据说根据最近满铁领导机关的意图，成立铁道公司，当然也包含蒙疆地区的铁道，也就是由于蒙疆在政治上的独立，才使经济取得独立存在。京绥的铁道有运输能力，已恢复到事变前水平，北京前门车站一天有七十个车皮，二千吨货物输入，作为动脉的京绥铁路，能顺利地进行客货，华北蒙疆经济交流也能顺利进行，将期待着它的繁荣。在这一点上，将来的包头也会如此。

采 取 点	深 度 (厘米)	土 种	水溶性全 盐类(%)	氯化钠 (%)	碳酸钠 (%)	硫酸钠 (%)	碳酸钙 (%)	PH值
民生渠第二水门	0—30	砂壤土	0.1160	0.0367	0.0623	0.0170	18.42	8.43
侯 家 营 子	0—33	沙壤土	0.3880	0.0796	0.0525	0.2550	11.01	8.48
侯家营子东首	0—33	粘 土	0.4300	0.2326	0.0525	0.1449	12.70	8.30
白 彦 广 汉	0—33	粘 土	0.1750	0.0498	0.0558	0.0243	14.44	8.31
八根牛背子	0—33	沙壤土	0.1500	0.0490	0.0558	0.0242	14.44	8.40
大 沙 金 圈	0—33	沙壤土	0.1130	0.0459	0.0492	0.0189	11.06	8.38
双龙镇东门外	0—33	粘壤土	0.2930	0.1377	0.0853	0.0700	9.01	8.89
定襄营子南首	0—30	沙粘土	1.0470	0.6242	0.0852	0.3375	9.07	8.85
定襄营子南六里	0—33	粘 土	0.1350	0.0557	0.0656	0.0143	13.62	8.05
陈魁海子东首	0—33	沙壤土	0.1230	0.0459	0.0656	0.0115	8.18	8.16
小 百 子	0—33	粘 土	0.2960	0.1652	0.0590	0.0718	9.55	8.34

采取地点	深度 (厘米)	土种	水溶性全 盐类(%)	氯化钠 (%)	碳酸钠 (%)	硫酸钠 (%)	碳酸 (%)	酸钙 (%)	PH值
东阿家树园圪	0—33	粘壤土	0.4040	0.2570	0.0525	0.0541	10.80	3.65	
百万顷营子	0—33	沙壤土	0.0910	0.0275	0.0525	0.0110	9.91	8.50	
把 闸	0—33	粘 土	0.2370	0.0673	0.0590	0.1107	12.34	8.35	
张红家圪堆	0—33	粘 土	0.1940	0.0918	0.0656	0.0376	7.34	8.18	
包 头	0—25	含砾沙土	0.1080	0.0428	0.0459	0.0192	6.89	8.44	
包头西南二十里	0—33	粘 土	0.3970	0.1238	0.1508	0.0224	9.76	8.87	
包头东十五里	0—33	沙壤土	0.2850	0.1561	0.1048	0.0237	9.03	8.68	

又气象情况，据厚和农业试验所在1915——1929年的十五年的观测结果如下：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平均
气温(摄氏)	-11.7	-7.0	1.3	8.3	15.6	21.0	24.4	24.8	15.3	9.8	1.0	-9.7	7.3
降水量(毫米)	5	9	7	5	20	63	97	102	76	21	4	6	415.0

郊区林业发展概况

王德昌

森林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木材、保护农田，而且还具有蓄水保土、减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等多种作用，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建国初期，我区树木稀少，好多村庄连一株树都没有。如：二道沙河村、王应基村、二相公窑子村、宏庆德村、韩庆坝村、赵家营子村、曹家营子村、哈林格尔村、厂汗村、西沙湾村、东西哈拉补村、任福窑子村等村庄，每到夏季，太阳暴晒如烤，人们想在树荫下乘个凉都是办不到的啊！

那时，我区树较多的地方，有新贤城、麻池、万水泉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这些地方栽种的树木，绝大部分是小叶杨，生长缓慢，还有少许柳树、榆树。除此以外沿着黄河河头，散生着少量的红柳、乌柳等灌木。农业生产常遭受风、雹、冻、旱等自然灾害，人民生活贫困，小麦种植极少，只能播种一些糜黍和谷子，而且，往往因为风沙大，每年春播需播种二至三次，甚至五、六次才能捉住苗，亩产也很低，大都在几十斤。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一场向大自然进军的号角吹响啦！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植树造林。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这十年间，共植树造林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亩，四旁植树七百三十一万三千一百株。（见表一）

这个时期，群众造林技术不高，掌握不住适地适树的原

则。同时也没有什么优良树种。那时我区一没有苗圃，二没有林场，植树造林的种苗，全靠从外地调运。由于到河北、东北等地调运种苗，长途运行，加上保管等原因，回来后苗木失水严重，再加上栽植时土壤干旱，栽植后不及时浇水，甚至有的不浇水，因此，造林成活率很低，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有的不足百分之十，只是百分之三、四。）群众说：“春天造林，秋天当柴烧”。有的虽然当年成活了，但是由于放松护林管理，幼树苗在冬春之际，树皮被牲畜啃吃了，结果还是造成了树木死亡。正如群众所讲：“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王”。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林。

六十年代，林业生产战线上提出大抓植树造林的物质基础——种苗工作，实行四级育苗。我区前后共建立起社队办林场、苗圃和果园、林业队三十多处，面积有一万多亩，从业人员达一千人左右。

当时经营面积比较大，办得比较好的有全巴图公社的“五一”林场，哈林格尔公社的西沙湾林场，高油房果园，河东公社的解放大队果园，刘宝窑子林业队，臭水井林业队，前明公社果园，东园公社的东园林业队，公积坂果园，黑麻坂果园，后营子良种场，王应基林业队，青山大队果园等等。哈业脑包公社卜尔汉图队，也办起一个有六十亩地大的果园，栽种有大小苹果、梨、李子、杏等果树，成为我区第一个牧区果园。

社队办林场、苗圃、果园，在林业生产战线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年都进行大量的植树造林、育苗和果树定植工作。同时也将林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广大农民群众中去，起到了示范表率作用。因而有许多社队办的林场、苗圃果园受到区、市、内蒙古三级的表彰和奖励。如全巴图公社“五一”林场，一九六三年受到自治区的表彰，该场场长王永昌同志，光荣地出席会议。“五一”林场、东园大队林业队、西沙湾林业队、高油房大队果园、

土合气大队林业队、章盖营子生产队都曾多次受到市区的表彰和奖励。

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年年大搞植树造林，营造了大量的农田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改变了自然环境条件，绿化了家园，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哈林格尔乡的西沙湾村，过去遍地是沙丘，“风起沙跑‘黄龙’叫，播种五谷收不到，生活贫困让人悲，一年四季吃不饱”的穷村子，经过大力植树造林，营造农田防护林带，现在是田成方，树成行，房前屋后林木旺，农民群众盖新房。全巴图乡“五一”林场现在是绿树成荫，职工经济收入也较高，在过去大集体时，虽然每个工值儿角钱，但也占到周围社队分红的第二位或第四位。过去外地在总结植树造林的经济效益时说，一棵树一年能增长一元钱的价值，植树造林就等于建设绿色银行。我区的植树造林实践，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文革”中的十年，我区广大农村虽然也在大力植树，而且从统计表上看，数字还不少（见表二），但由于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不少弊端，群众造林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我区林业生产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开始了大搞平原绿化，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到一九八五年，全区平原地区有八个乡、二个国营农场基本上实现了林网化。八个乡分别是：东园乡、沙尔沁乡、古城湾乡、河东乡、麻池乡、新城乡、哈林格尔乡、全巴图乡；二个农场是共青农场和青年农场。

平原绿化营造农田防护林面积一万六千五百零九亩，计三百〇六条，长二百五十华里，构成农田防护林网络五百一十多个，防护农田面积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亩。同时绿化区级公路六十五公里，铁路五十三公里。

在营造农田防护林的同时，在平原地区的荒滩、荒地上还营

造了大面积的用材林，计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一亩。

从一九七八年，我国开始进行“三北”防护林营造。我区属于“三北”范围，在第一期工程中，是以平原绿化为重点，平原绿化也属于“三北”防护林范围之内。在丘陵山区乡村，如国庆乡，后营子乡还结合水土保持工程，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植树造林是生物措施之一。“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期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区共完成造林七万零六百一十九亩，造林成活面积三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亩，占统计造林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四旁植树九百三十二万株，成活三百一十七万株，占百分之三十四。（见表三）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我区林业生产发展迅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势头。一是造林进度快，数量多，质量好；二是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林业“两户”（即专业户和重点户），造林和育苗专业户达四百五十户；三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中要求，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它绿化任务。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国务院颁布的“森林法”开始在全国施行。自此，林业有法可依，以法治林，从而大大提高了林业战线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林业的认识，所以，我区林业生产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而且成活率和保存率都比过去提高。

农村中出现的林业重点户，近几年搞得较好的有后营子乡王应基村的王文亮，王明亮，国庆乡南、北福永居村的武长富和郭海生，前明乡郑二窑子村的史二成，哈拉黑尔乡打圪塔村的蔡家兄弟（蔡英、蔡富），还有哈业胡洞乡的王志升，哈业脑包乡乌兰计的张厚城等同志。集体经营林业的社队办林场中东园林业队

(表一)

时 项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小 计
造林 (亩)	4789	4088	5382	15224	15524	765	293	387	3918	9805	60175
四旁植树 (万株)	20.00	12.64	58.26	69.06	162.50	102.52	36.05	25.86	97.12	146.30	731.31

(表二)

年 项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计
造林 (亩)	20530	16430	2671	6362	7136	2337	3735	3518	3125	4131	2198	72173
四旁植 树(万株)	241.42	140.00	/	140.00	114.84	115.58	148.06	138.48	116.29	126.18	119.82	1400.67

(表三)

项 目	年 度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计
造林面积 (亩)		5337	8056	8762	7368	8208	9126	10768	12994	70619
四旁植树 (万株)		174.01	202.00	162.00	98.00	93.00	54.00	96.00	53.00	932

负责人陈三洪，“五一”林场负责人郭福成二同志，成为我区林业战线上的带头人。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为郊区林业生产迅猛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郊区林业生产基地苗圃一角

（本文作者系中国林学会会员、郊区林业局工程师、郊区政协委员）

后营子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的今昔

章瑞焜

一 建制沿革

后营子乡畜牧兽医工作站（简称兽医站）的前身是一九五四年成立包头市畜牧兽医工作站时，在郊区第一区（区政府设后营子）建立的一个分站，由市站投资两千元，购置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乡里派人建房四间，分站共有七人，全为西医，刘锦华任分站站长。

一九五八年秋，郊区成立兽医站，除刘锦华同志进修学习，李明之、高增、武秉德、王邦绥、荣耀庭、王永清六人全调区站。此时已成立后营子公社，便在原分站旧址和利用分站设备，建起公社兽医站，站长由公社办公室主任李世宏兼任，仅有一名中兽医范玉斌和参加学习的四个大队的四名防疫员冯九云、郭金小、许其生、乔文华。一九六〇年春又从东河区调来一名西兽医殷忠同志。

一九六三年因经营不善、业务收入不多而关闭，人员各自散去，不久由东河区冯大兽医站派人再重组建公社畜牧兽医站，站长马登英（中兽医），全站共六人。

十年动乱中因站领导被揪，同时经费短缺，一度曾与公社卫生院合并，一九七〇年才又分开独立。一九七六年因站房被公社

卖掉，便改迁到两间民房办公营业。一九八二年落实政策时两间民房退还给私人后，便在供销社西侧建起占地一百五十平方米房屋为砖瓦结构的新站。

自一九七九年以后，因业务收入不多，不敷支出，渐陷入困境，曾搞副业炸麻花、做豆腐、贩卖牛、跑运输等活动，反而更赔钱，到一九八二年便进行改革精简，站里只留下四名兽医，每人分包三个大队的牲畜，搞预防和治疗工作，药品、器械全自理，收入也归个人。

历届站领导人名单

年 度	姓 名	年 度	姓 名
1954—1958	刘 锦 华	1968—1970	与卫生院合并
1959—1962	李 世 宏	1971—1977	张 双 兰
1963	马 登 英	1978—1980	张兰涛、张双兰
1964—1966	张 兰 涛	1981—1983	张 双 兰
1966—1967	寿 福 彭		

一九五八年以前，分站归市兽医站领导，为全民事业单位，每年经费、药品、疫苗等全由市里下拨。一九五八年秋成立公社兽医站，属集体单位，自负盈亏，行政上属公社领导，业务上受郊区兽医站领导。

二 开展防疫治疗情况

本乡在五、六十年代牲畜最为兴旺，羊最多时达二万二千头

以上肉畜和生猪最多时达两、三千头以上，所以防疫、治疗任务较大。自十年动乱以来，大小畜锐减，自一九八二年放宽政策，允许个人自由发展牲畜，除大小畜数量才逐渐回升，到一九八六年末，全乡有羊一万三千多头，大畜一千七百多头，生猪两千一百多头，使畜牧兽医工作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二、服务方式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分站业务是面向郊区第一区的后营子、内猫、兴胜、东河、三道沙河、蒋毛窑子、邓家营子、三里半、周官、万水泉、什大股、古城湾等十二个小乡。一九五八年一月又将沙尔沁、鄂尔格逊两小乡从萨县划入郊区一区，扩大了分站服务范围。全站同志实行分片负责下乡，巡回搞防疫、治疗、配种和圈猪圈羊等工作。当时条件较艰苦，需身背药箱徒步下乡，足迹踏遍各村落，白天为牲畜防疫治病，晚上经常召集饲养员、羊倌座谈，了解牲畜、生猪饲养管理，疫病状况，提出改进意见，并进行技术指导。还宣讲普及牲畜饲养管理、防疫等知识，改革了原来用土法熏羊治疥（方法繁杂、又不安全），推广用“六六六”液剂或“六来合剂”外浴羊治疥，既简便又安全，疗效又好。

此外，还曾在分站分场举办防疫员、饲养员、羊倌训练班，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同时市兽医站和郊区畜牧部也经常派人到基层亲自来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存在问题。加上各农业社领导也重视，支持，使农村政通人和，六畜兴旺。所以一九五七年公益大队防疫员冯九云、羊倌王元外、魏二、陈应群、张廷碧都出席自治区畜牧业先代会，并在会上介绍先进经验。金大队有万头羊、人均羊头多，每年百母超百仔的公益大队，一九五九年也曾被评为内蒙畜牧业先进集体，大队书记王二罗代表集体去博乐出席会议，受到大会奖励。自一九五八年秋分站撤消，人员调走后，又建社公社，

站，技术力量薄弱，但下乡巡回医疗、为牲畜搞防疫、治病的好作风一直保持下来，直到一九八三年公社兽医站改革精简，只留下四名兽医，每人负责三个大队牲畜的防疫治病工作。

2、防疫、治病

本乡牲畜常见的多发病有猪瘟、猪胆毒、猪肺疫、牛炭疽、牛气肿疽、牛肺疫、羊胸膜炎、羊疥癣、羊痘、羊快疫、骡马易患消化道病、劳役过度症、鼻疽等病，还曾发生布氏杆菌病、口蹄疫等传染病，但通过积极防治，都已消灭。一九五六年在后营子村，通过显微镜检验羊粪，曾发现有羊肺丝虫、蛔虫卵、节节虫卵、毛厚线虫卵，以后通过饮水免疫和灌药得到治愈。

乡兽医站在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时，针对本乡常见的多发病，按季进行重点防疫和治疗，上级站也常来人配合，会同各大队防疫员到各村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作，也使防疫员的业务水平得到提高。在春、秋两季，主要给牲畜、生猪打防疫针，对羊进行内灌外浴，即灌药驱体内寄生虫，用药液洗浴灭疥癣，在夏季要预防牲畜肠道传染病、羔羊下痢等，在冬季要做好保育过冬，搭棚备饲草，冬春季做好接羔保羔工作。

3、人工配种改良绵羊

本乡原公益、鸡毛窑子两个大队有辽阔草山、草坡，适于放牧，羊群最多时分别达万头和八千多头，所以在这两个大队搞人工配种改良绵羊。郊区畜牧局的武秉德、刘文明、冯九维等同志也下来配合公社搞配种，并无偿支援种公羊和配种器械，大队防疫、配种员冯九云、郭金小也参加。

公益大队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搞人工配种为苏联的茨盖（半细毛羊）和美利奴（细毛羊），前者每只羊年产毛十几斤，比本地羊多五、六斤，后者每只羊年产毛十斤左右，也比本地羊多三、四斤，两种改良羊产肉都比本地羊多十几斤。共配种改良四代，基本上把全大队羊群都进行了改良。一九六二年后贯

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羊群便都划给小队所有，就
没再搞配种改良，品种便逐渐退化，以后因领导管理不力，羊群
也逐渐减少。

鸡毛窑子大队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也搞人工配种改良绵
羊，品种和公益大队相同，共改良三代，达六、七百头。一九六
一年以后郭金小同志被调回小队劳动，全大队牲畜、生猪的防
疫、治疗工作，是请公社兽医站和东河区兽医院来承担，配种改
良绵羊没再进行。一九七三年大队又恢复郭金小的工作后，除防
疫治病，又搞配种改良绵羊，品种为美利奴和半细毛羊，到一九
八二年共改良四千多头，使百分之九十的羊是改良羊，每只羊年
产毛比本地羊多三、五斤，产肉多二十斤左右。

一九八二年郊区畜牧改良站孙桂林同志到青山大队搞改良绵
羊配种，至今已连续五年，平均每年改良九百只左右。一九八二
年至一九八四年改良品种为英国的边区来斯特（中粗毛，适合织
地毯），其特点是腿长，适于在山区放牧，不择草，食性广，产
肉比本地羊多十几斤，年产羊毛也多二、三斤，一九八五年开始
搞英国的道赛特和林克两品种的改良羊，前者比边区来斯特产毛
又多二、三斤，产肉多七、八斤，后者羊毛也适合织地毯，年产
毛约十斤左右，产肉四十斤左右。

4、其它

一九五八年以前，分站曾在公益大队推广用玉米杆、高粱
杆加工作青饲料贮藏，共搞两年，有的窑藏好了便发酵，有酒香
味，牲畜爱吃也易上膘，但有的窑藏失败，青饲料发霉变质无法
用，由于当时不缺饲草，所以没有推广应用。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公社兽医站又为各大队培训两批共
二十多名防疫员，上级站也来人讲课，每批讲课五、六天，再带
着防疫员下去实习操作训练十天、八天，以巩固学习成果，以后
每年春、秋季郊区和公社两级兽医站下大队搞防疫时，也让防疫

后营子乡青山村果树发展史略

王德昌

后营子乡青山村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北约十五公里处，为东河流域的最前部位，属半干旱丘陵山区，由魏君窑子等六个自然村组成。村北、村南山峦逶迤，东南方是巍峨的老谷山，海拔一千七百四十一米。该村范围内海拔高度在一千三百一十一米至一千五百三十八米间，土壤多为黄土，土层厚度不等，薄者只有二、三十公分，厚的可达数米，就绝大多数地方则山岩嶙峋裸露地表。

长期以来这里的人民，常年累月爬山越岭耕种坡梁旱地，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人们常比喻说：“种一坡，收一车，碾一场，煮一锅”。主要农作物糜子、谷子、高粱、山药（土豆），果树非常罕见。

自一九六二年，在“以菜为主，多种经营”方针指导下，便开始发展果树生产，先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共栽植各种果树二百八十八亩（见表一）。主要品种有：黄奎、黄太平、小国光。

员配合。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每年还评选三、五名为公社先进防疫员予以奖励。此外在一九七七年曾为青山、王应基两个大队培训兽医三名，培训期为一年多。

青山公社兽医站，因积极防疫、治病，减少了牲畜患病和死亡，每期能完成羊、生猪的征购任务，所以一九七八年被郊区评为先进集体，受到奖励。

123、306、花紅、大狀、核果等大小苹果和葡萄梨、雪花梨、苹果梨、麒麟洋梨，还有李子、杏以及葡萄等。

青山村果树种植面积统计表

表(一)

地点	年 度	1992年	1984年	1973年	1975年	1976年
一隊魏君坝(坝梁)	面 积 (亩)				17	
二隊小东瓜(七场坡)					17	
三隊大东瓜(二毛地塌)		11				
四隊井子沟(西坡)					54	
六隊皂火沟(东坡)					12	
大隊林业队(南梁)				97		
大隊林业队杨树沟(西坡)						40
大隊林业队水泉沟			40			
面 积 合 计 (亩)		11	40	97	100	40

回顾当年栽种果树时，在市、区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在业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勤劳的青山村人民，起早贪黑，上山挖土，修筑梯田，刨树坑，掏大井，开水渠，筑贮水池，提水上山，浇灌果树，成活率较高。

从果树栽植后起，各队就抽调专人，大队还筹建起林业专业队，认真培育，加强管理，每到果树管理的关键季节，任务繁

重，劳力不足时，还临时增派人员，以保证果树生产需要。

在技术管理方面，他们除必要时请有关部门的专业科技人员亲临现场指导外，还始终注重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先后培养的农民林业果树技术员有程世俊、程德荣、郭跃云、倪五豹等。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技术员，都很热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年。现任技术员倪五豹同志，从一九八一年接受果树技术管理工作到现在，一直是辛辛苦苦，努力钻研业务。在他之前的几任技术员，如郭跃云同志，从一九七二年一直干到一九八一年，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不得不离开。程世俊同志和程德荣同志也无一不是这样。

经过二十余年的精心培育，那时栽下的筷子粗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大树了。树体三米多高，主干直径在十几公分以上，枝叶繁茂。每年春天，鸟语花香，秋天硕果累累，往日的汗水换来了今天的甜美之果，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经济收入(见表二)。

水果产量情况表

表(二)

年 度	队 别						
	产量 (斤)	大 林 业 队	一 队	二 队	三 队	四 队	六 队
1982年	72700						
1983年	28975						
1984年	76448	1000	3500	/	/	4000	
1985年	43150	1000	3500	/	/	4000	
1986年	77395	1000	3500	/	/	4000	
合计(斤)	298868	3000	10500	/	/	12000	

后营子乡灌溉机具的发展及沿革

章瑞炽

建国前，我乡农业生产极为落后，生产工具也极简陋，包括灌溉机具在内，都是靠手工劳动，既费力，又费时，工效很低，因而在平均年降水量仅三、四百毫米的包头，便无力抗御以旱灾为主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外出逃荒或卖妻卖儿，其惨状不难想象。自清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据现有资料粗略统计，较大旱灾便达十三次，

建国初，农田灌溉仍然沿用千百年来固有的秤杆井、轱辘井等落后工具提水，一九五一年以后，随着土改和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国家对农业的不断投资，灌溉机具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青山村人民，在果树管理上积累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浇水、施肥、修剪、打药都有章可循。这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有曲折反复，而更多的则是美好的前程。象前几年分树到人的惨痛教训将一去不复返了，而更好的承包制正在完善，未来的青山村，将更加名副其实。

在这里，我们还要记下几个老一代创业者的名字，他们是郭本楼、赵连宝、李喜和等，他们带领广大群众，为种果树日夜奋战，为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纪念。我们望创业者的业绩和果树并存！

青山啊，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满目青山，绿树成荫，碧水长流，万壑鸟鸣，人民世代安居乐业的青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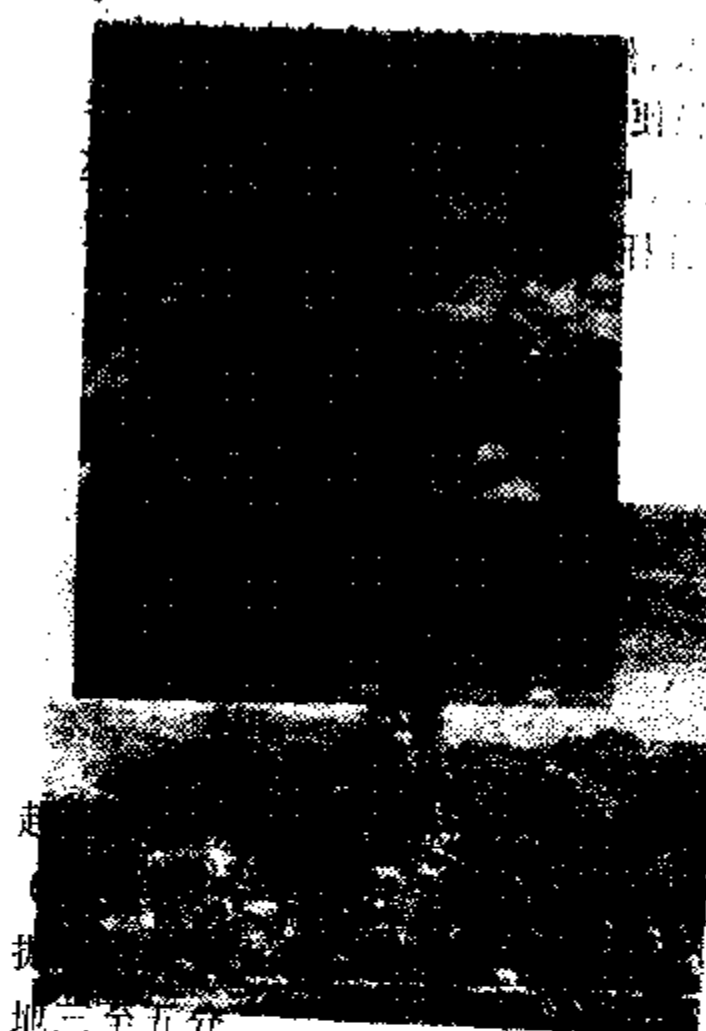
展。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有用畜力提水的解放式水车；一九五六年后又有了以煤为燃料的锅驼机带动水泵抽水，这是农业生产上最早实现机械化的一个环节；一九五八年前后，又有了以柴油机作动力的抽水机，它比锅驼机操作方便，功率也较高；一九六〇年前后，随着农村电力网络的逐步形成，又有了以电为能源的电机井，它操作更简便，成本低、效益高；自此，以锅驼机和柴油机作动力的抽水机，都在两三年时间内便先后被淘汰（只个别偏僻地方，因没电源，才仍使用柴油机井），电机井的普及，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增强了抗旱能力，为建设丰产、稳产农田打下了基础。

随着灌溉机具的不断更新，原来靠人力、畜力提水的小水井，因井浅容积小，蓄水量少，已满足不了机电井抽水的需要，所以普遍改打直径四、五米的大口径竖井，并增加井的深度，使蓄水量能满足机电井灌溉的需要；有的地方也打斜井，斜着向地下挖井，挖到有地下水时，再扩大挖成一个蓄水池，这种斜井，挖土方量比竖井要少的多，但需在狭窄而黑暗的洞里施工，不如打竖井施工方便。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对外开放，引进新技术和设备，我市于一九七九年向美国凡尔蒙特公司购进两台先进的灌溉设备——时针式喷灌机，于一九八〇年安装在我乡的井坪村，建起了全市唯一的喷灌站，使灌溉机具又跃进到更现代化的水平，这样便在建国内较短的三十多年中，使我乡的灌溉机具向前迈进了五大步。

现将各时期的灌溉机具的主要构造、性能、效率简述于下：

1. 秤杆井（照片1）这种提水工具是借助杠杆原理，以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自古以来便被农民所采用。因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科技都很落后，只有这种简陋的提水工具，



走
提
地三至五分。

... 贫苦农民也能置得起，
... 但只局限在地下水位高的
... 地方使用，如井水位距地
... 表三、四米以上，便难
... 够到提水了。

秤杆井由立杆、横杆、
秤杆、吊水杆、吊水桶
(多用柳条编制)和压首
(绑有石头)组成,当操作
者将吊杆向井下压时,系在
吊杆头上的吊水桶便浸
入水中,接着再把吊杆提
起,吊水桶的重力,将盛满水的吊水桶
水渠里浇灌农田。因靠人力
一天只能提水十吨左右,浇

2. 辘轳井(照片二)照
这种提水工具是靠支架上
装有一根轴承(有木制的,
也有铁制的),轴承上又
装有一个带摇把的辘轳
(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
而得名,不论井中水位高
低,均可提水,所以在秤
杆井提水探不到时,使用
辘轳井浇地。



提水时,在辘轳上系
一根绳子,绳子的终端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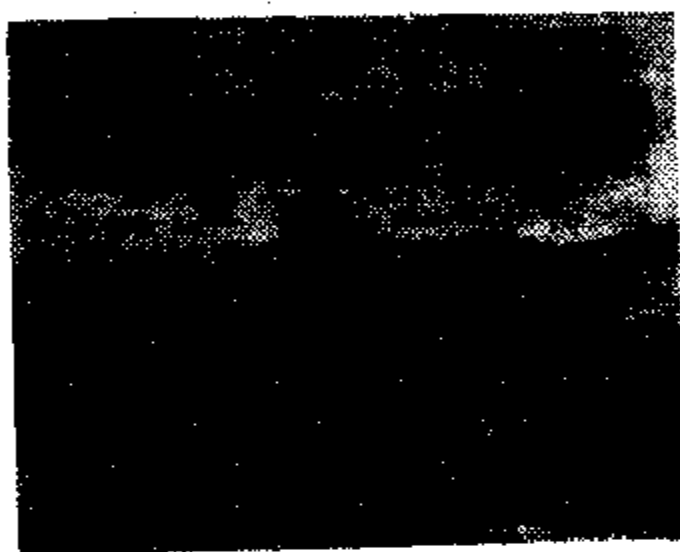
照片2 辘轳井

上一个水桶,将水桶吊下井盛满水,然后抓住摇把摇动辘轳转动,

(有的辘轳装有套珠,摇动较轻便),使系在辘轳上的绳子逐圈绕在辘轳上,最后把水桶吊上井口,将水倒在水渠中浇地。这种提水工具也费工费力,效率和秤杆井相似,如地下水位低,则提水更费劲,费时。

3 水车井(照片3)

解放式水车是一九五一年包头矿山机械厂开始生产供应的,改用畜力驱动提水,比用人力提水的秤杆井、辘轳井进步了一大步。



水车井由水车架、大八字齿轮(卧轮)、小八字齿轮(立轮)、磨杆(搅杠)抽水管、链轮、提水胶皮碗、水簸箕等组成。

照片3 水车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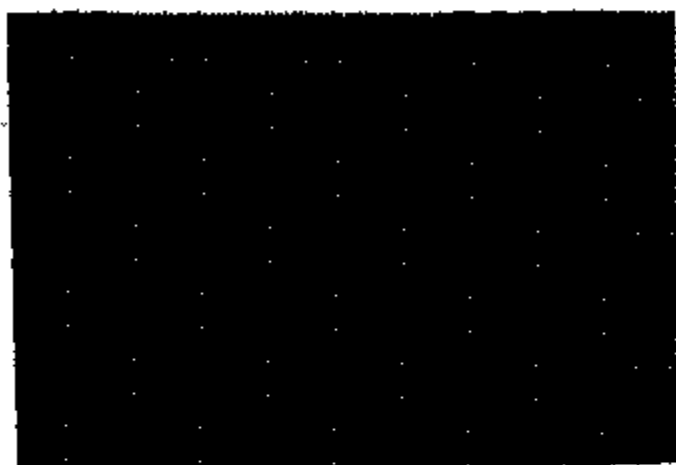
当套上牲畜拉着磨杆围着井走动时,使大八字齿轮随着转动,然后又带动小八字齿轮、链轮、链子、提水胶皮碗逐一转动,井水便通过抽水管被提上来,通过水簸箕流向水渠。

用水车浇地,不但使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迈向半机械化作业,并且比人力提水提高效率八至十倍,一天可浇地二至三亩。

4 锅驼机井(照片4)

随着我市机械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包头矿山机械厂便生产锅驼机(分立式和卧式两种)支援农业生产,当时农业已实现合作化,依靠集体经济力量,也有能力购买锅驼机作动力带动链轮抽水浇地,需有人常加煤、加水,以

维持机械正常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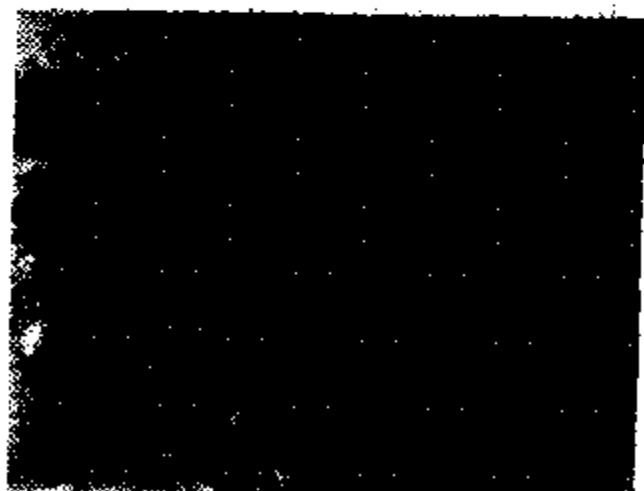
照片4 锅驼机

锅驼机有五马力和七点五马力，卧式锅驼机为十马力，扬程二点五米，一天可浇地五至六亩，比水车井工效约高一倍。

柴油井(照片5)

我市机械工业的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又生产出柴油机（分立式、卧式两种）供应农业生产需要，以替代锅驼机作为提水的动力机械。它比锅驼机具有启动快，操作较方便、扬程较高、体积小、马力大、抽水量大等优点，但也需有专人看管，不时加油，加

锅驼机由锅炉、气轮气阀、气压表、皮带轮、安全阀等组成，提水工具与水车井相同。浇地时先生火点炉，待把锅炉中的水烧开达到五个左右气压时，打开气阀，使蒸气驱动气轮机转动，并通过皮带轮带动提水链轮转动，使水顺提水胶皮碗，通过抽水管被提上来经水簸箕流向水渠。



照片5 立式柴油机井

自六十年代以后，我乡开始购置小型潜水泵，也是以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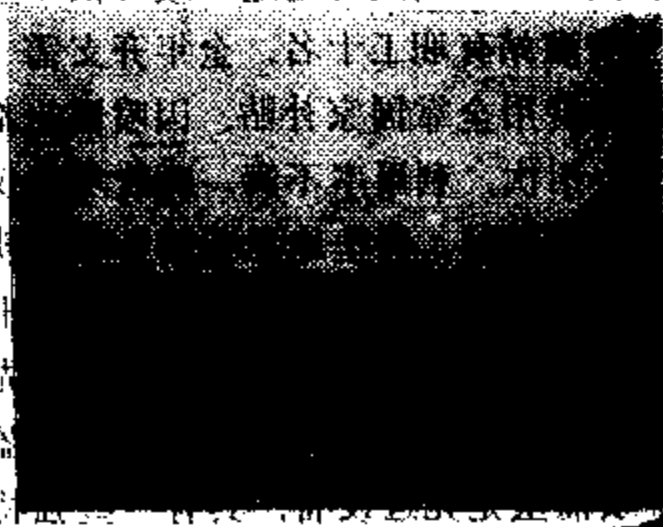


照片7 潜水泵（7.5和22瓩）

动力，将密封的电动机和水泵衔接成一体。体形呈圆柱状，将它投入井下水中，接上电源，便能抽水浇地。因电动机功率小，水泵口径仅一寸，抽水不多，浇地很少，所以使用不多。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我乡陆续购置了性能更好、较大功率的潜水泵（照片7），功率有3.5、4.5、7.5、11、22瓩，配置的水泵口径有二、三、四、六寸，现已用它更替了部分旧电井。这种潜水泵具有比原电井电耗少、出水量大、启动更方便、不需向水泵灌水等优点，但购价较高。

7. 喷灌机（照片8）

一九七九年，我市向美国凡尔蒙特公司进口了两台时针式喷灌机，以后便拨给郊区，经一番调查考虑，决定把两台喷灌机安装在我乡王家塔旦，成立喷灌站，建立泵房、操纵间、值班室等房屋共二百三十平方米，是由内蒙水利厅出资，总投资为五十万元，其中两台喷灌机为



照片8 1071喷灌机

十八万元。喷灌共分八个区，每台喷灌机喷灌四个区，设计喷灌总面积为一千四百六十亩。两台喷灌机的特性如下：

灌机型号	跨数	系统长 (M)		
4 0 7 1	5	1 9 8		
4 1 7 1	2	1 3 8		
喷幅 (M)	控制面积 (亩)	净面积 (亩)	工作压力 (kg/cm ²)	喷水量 (吨/时)
2 2 5	2 3 7	2 3 1	4 . 2	2 1 6
1 7 0	1 3 6	1 3 2	4 . 6	1 2 6

动力用电为三百八十伏电压。喷灌时需先用深井泵 (22瓩) 将井水抽上来，然后加五个大气压 (大喷灌机为80瓩、小喷灌机为40瓩)，使水通过地下管道流向浇灌机，水从喷孔中喷洒到农田。在喷灌机各塔架底梁上，安装有不同转速的电动机 (4瓩)，转速高的 (27转/分)，安装在塔架末端，所以喷灌时塔架上的灌机呈时针式缓慢移动，待旋转一圈，喷灌便告结束，需用拖拉机将灌机牵引到另一灌区继续喷灌。

喷灌比地面灌溉省水百分之三十，不太受地形高低限制，因不需修水渠。春季每亩喷水六十吨，夏季每亩喷水四十吨，每吨水收费四分，当风力超过三级时便不宜喷灌。

喷灌站有职工十名，全年开支需一万一千元，职工工资、机器维修费用全靠国家补贴，因喷灌的都是大田作物，一年仅需喷灌三、四次，利用率不高，所收水费仅够电费。自一九八一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给各农户耕种后，由各户自主经营生产，与喷灌站关系就不协调了。如果土地能统一管理改种经济作物，则可提高喷灌机的利用率，发挥先进设备的作用，这样可减少或省去每年靠国家补贴，还可能有盈利。

喷灌虽是先进设备，具有一些独特优点；但它多道工序用电，耗电较多，设备昂贵，技术又较复杂，目前尚不能推广应用。

文山解决五当沟水利纠葛

郭伟哲 寇尚功

五当沟水出山沟后东边是东园村，西边是沙尔沁村。两村土地均在河槽两岸，自古以来常为浇水起纠纷。双方上渠浇水时六亲不认，为争水轻则吵闹，你推我拉，重则打得头破血流，或按在水中淹没。最严重时，竟雇上名叫“死命鬼”的打手去抢水，打死打伤由雇主负责到衙门打官司。这两村属萨拉齐管辖，官司积案累累，得不到解决。

咸丰元年，萨拉齐厅的同知（相当于今县长）文山查阅积案后，坐轿来到五当沟口，亲自勘测了地形，然后召集两村甲头、会首和有水份的农民渠头等到现场。他当众指定地方，划出规格，令凿石筑池，引水入池内，再分两个均等水口，东口水归东园，西口水归沙尔沁。他所设计的水口，是利用了水池中的水不论深浅，水面总是平的，只要水口大小相等，流量就会相等的道理。工程基本完工时，经放水试验，两个水口流量相等。正式放水时，两村民众都来观看，齐声赞扬文山的德政。文山也说了“官清吏难清，久打官司家业损”的道理。自此两村不再为争水打斗，也息了争讼。

文山系满族镶白旗人。自咸丰元年至光绪五年任萨拉齐同知三任，计十五年。两村百姓为纪念他，在沙尔沁村东门里奶奶庙正殿内塑上了他的象，并刻石树碑。

（本文作者均系退休干部）

（本稿部分资料由杨勇工程师、喷灌站殷、李站长、王世纲、吕润根、康万华等同志及包头矿山机械厂提供，谨此致谢）

（本文作者系后营子乡干部）

“风水宝地”麻池史话

李一坪

水是人类首要的生存条件。自古以来，人们大多都依河傍水聚居。即是游牧，牧民也得逐水为牧。

麻池乡水源充足，南邻黄河，西傍昆都仑河，有大小水库三个。公社化以前，横贯全乡约十里南湾泉水汨汨。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古城，就曾有昆都仑河的支流环绕城池流归黄河，至今河流故道还依稀可辨。

据考古调查，这里曾有原始人类的踪迹。后经数千年的沧桑变化，到战国和秦汉时期，这里更趋繁荣发达。赵、秦、汉都在这里设置过重镇，汉代的郡县城——临沃城的遗址至今犹存。西汉时期，这里作为一个县城，竟兴盛了百年之久，成为汉、匈民族频繁交往的枢纽。汉代的朔阳道就经过这里。汉以后，这里也曾是鲜卑族的领地。隋唐时代属单于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尔后又相继被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所占据。

金元之际，先民们在这里烧制精美的陶器。在麻池古城西南五百米处，至今还有当时瓷窑的遗址。被定为包头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据有关人士考证，当时的陶器是经黄河、朔阳道运往西部、北部地区。

清朝咸丰年间，有大量陕、晋等地的汉民来此放牧做工（按季节有活即来，干完就走），后来在往来中又兼作买卖。同治年间，山西河曲人燕耳如（今麻池乡西壕口村燕氏家族的九世祖）

来此地，定居在古城西南约五百米处，后来人们便称这里为“燕家梁”。之后河北、山西、陕西的农民、商人逐渐多了起来，一般是春来秋回，与蒙古人民共同开垦荒地，种植糜、谷、黍，高粱、豆类、山药，也有少量的麦子，有的农民也逐步定居下来，先后便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居民点，象“梁家湾”、“郝家圪卜”、“吕华圪旦”、“韩五圪堵”、“卜家村”、“武家圪堵”等。随着蒙古民族放牧的迁徙，这里人口急剧增加，逐步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方。

昆都仑河源远流长，自“鹮风社”建立，在昆都仑沟口筑起了水泥大坝截住河水，昆都仑河便成了季节河。由于河槽下面的土质多为砂土，于是部分河水钻砂而下，流至麻池形成很多泉水。十里南湾共有清水泉十八眼，从现在的西壕口至东壕口，一字排开，大部分集中在麻池村的正南。大泉水的流量每小时为六百五十吨，小泉水每小时一百吨。一年四季，涌流不绝。遇到天旱断流，深挖泉眼一米五左右，水流如故。当时这些泉水都被一些大户据为己有，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有燕家泉一眼、吕家泉一眼、王家泉两眼、董家泉一眼、张家泉一眼、卜家泉二眼、武家泉一眼、范家泉一眼等。清朝末年，全巴图、官将、上黑麻淖、哈林格尔一带的麻农开始大量种麻。在当地挖土坑引黄河浊水沤麻，俗称“土窖子麻”，沤出的麻黑，极不受欢迎。因麻池泉水清澈透明，又是活水，人们便在这里修建沤麻池，沤制大麻。一个泉眼一个池。大池有三十多平方米，五六米深，小池二十多平方米，四五米深。上面全部采用大青石压顶，在池的边沿某处开口并安插板以控制排水，时隔七天左右换一次水。这样沤出的大麻，有韧性，耐磨损，又白又利，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村庄遂被称为“麻池”，百年来相呼成习。

光绪年间，在今麻池中心小学的校址上，修建了一座大庙，有一座正殿，两座偏殿，东西设有禅房，殿堂分别设有泥塑的龙

王、观音奶奶、马王等神像，供善男信女烧香叩拜。整个大庙是古式庙宇建筑，壮丽宏伟，古朴典雅，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颇具民族特色。殿内的墙壁上，均有五颜六色的壁画，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有三头六臂，面目狰狞的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有持戟挥戈舞剑的民族英雄，以及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画面的画面。整个壁画的工艺都具有我国古典艺术的风格和特点。庙里有铁铸的大钟，晨钟暮鼓，不绝于耳。大庙的前面有一座大戏台。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庙举办一次庙会，周围的农民，都来烧香磕头，祈求神灵保佑，一年中免灾祛难，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庙会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流。每逢四月初八日，是“奶奶”的生日，四面八方的农民又集中在奶奶庙，烧香磕头。妇女不生育，祈求奶奶降子，盼望生儿育女。新婚夫妇祈求早生贵子。如遇天旱久不下雨，人们又在龙王庙烧香磕头，进行祈祷，同时献上各色祭品，祈求龙王施云布雨。每年的农历六至七月间演一回戏，一唱好几天。以演出地方小戏——二人台和传统大戏——晋剧。时值夏收，特别是日伪时大种洋烟，此时正是烟市，所以人们为了喜庆丰收，活跃文化生活，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扶老携幼，一家妻儿老小，赶车的，徒步的，纷纷赶来看戏。庙会上，有卖粮食、蔬菜、各种水果的；有卖各种布匹、鞋帽、针头线脑的；有开店、开饭馆的，还有各种风味小吃等，好不热闹。

麻池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据有关资料记载，今麻池乡窝兔壕村是战国时期的遗址，一九五八年曾出土三件石质“安阳”布范。在乡政府西侧的麻池汉代古城遗址，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区级重点保护文物。古城南北两城，城角相联，呈双菱形（即∞），总面积一百万平方米。古城周围分布着几百座古墓，解放后曾先后清理了一些墓葬，出土了一批批比较珍贵的文物。在古城周围出土的器物中，有战国时代的青铜器，铸有“安

阳”、“中都”、“平阳”、“鄂氏”、“襄垣”、“戈邑”等字样的大小方足布，所铸字为当时铸造布币的地名。在古城西南约五公里的召湾，有汉代墓葬群，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单于和亲”和“单于天降”铭文瓦当，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九八一年又出土了“四夷平服”瓦当，所有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汉代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另外在麻池乡东壕口村，也有一座古城遗址，包括大城一座，小城十座，总面积十二万平方米，据文物工作者考证为清朝初年的军营。

麻池乡拥有良田一万五千多亩，土质好，水源丰富，堪称沃野平川。解放以后，一直是包头市蔬菜生产的重要基地，生产的青麻叶大白菜誉满包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农民解放思想，种菜热情空前高涨，年产各类蔬菜一千二百万斤。今日麻池乡，人口近万，街衢通达，生活富裕。勤劳的当代麻池人民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设自己更加美丽富饶的家园。

根据卜文先生的口述和有关资料整理

（本文作者系麻池乡宣传干部）

万水泉今昔

温 惠

万水泉是国营包头市共青农场场部所在地，是农场范围内最早形成的村庄之一。村后紧倚三、四十米高的坡梁，包兰铁路沿梁地阳坡穿过。这儿，绿树参天不见村舍，防护林网围裹着大片大片苹果和枣园果网。春季鸟语花香，生意盎然；秋季果实累累，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以前，这儿还是一片荒沙野滩，是蒙族同胞的游牧之地。坡梁下，东西散落着十余个大小不一的天然水泉，常年涌吐着晶莹清澈的泉水。附近土地受泉水的滋润，生长的牧草特别茂密。更为奇特的是，泉水冬暖夏凉，人跳进泉眼洗澡浮而不沉，温凉适宜，非常惬意。

自有人傍泉定居后，人们便称自己居住的这块地方为“泉子上”。因泉子分布杂乱，或聚或散，水无固定流向，纵横交错，故又叫“乱水泉子”。解放以后，以“乱”的谐音“万”取代了“乱”字，改称“万水泉”。

听这里戴姓第五代传人七十多岁高龄的戴起世忆述，他的第一代先祖来这里定居已二百多年了。即当有山西代州姓戴的夫妻二人，辗转从和林二十家子村迁来这儿定居。姓戴的来以前，这儿已有了两户人家，没过多久，又都迁往他地，所以姓戴的就成了这村最老的住户了。

有关万水泉之泉水，群众中有许多美妙的“传说”，现择其

动人者录下三则，以飨读者。

一、据戴起世说：“这里的许多泉子，原来水都不大。听父辈人讲，在清朝光绪三年，门上的两个泉子突然冒了三天三夜白糊糊水，水里有好多活蹦乱跳的小鱼。三天过后，白糊糊水又变成了清水，小鱼不见了。尔后，这两个泉子水变大，就成为灌溉全村农田的主要水源。”

二、戴老人又说：“这地方原来是一片干旱荒漠地带，有一年，康熙皇帝骑马打此路过，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命从人四处索水而不可得。于是他说，昆都仑河水那么多，都从山后白白流走了，为什么不往这地方流，言罢，他的马蹄坑里就冒出了泉水。从此，他的马蹄所到之处就出现了好多泉子”。

三、戴氏老人还说：“南蛮子善于取宝。一天，一个来北方取宝的南蛮子，偷取了东河上‘转龙藏’的宝水，出包头城西门，马惊脱跑到这儿，马背上驮的水瓶子跌下来被摔碎了，水溅到哪儿，哪儿就是一个泉子，因之就有了好多泉子”。

这几种说法都带有传奇神话色彩，显然是后人美化出来的，不足为据。泉源究竟来自何方？群众中较普遍而又科学的说法是这样的：昆都仑河水流到沟口子（前口子，古称“石门”）外，在一个叫“河上湾”的地方，往东南方向，水潜入沙土层。当这些水流到“万水泉”这个地方后，遇阻复出地面，形成了众多泉子。昆都仑河水又是源出固阳县阿塔沟，阿塔沟的水在固阳县“东官井”地方潜入地下，而后从昆都仑沟复出流到“河上湾”。这种说法颇有道理，从水的流向而言，亦合乎情理，但总归推理之言，缺乏科学考证。

如今，万水泉的泉子都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消失，又是怎样消失了的呢？解放以后的许多年，这儿还是依靠泉水浇地。自从造纸厂在村西北梁地上先后凿两眼深井后，这儿的泉水就成了涓涓细流，仅可供人、畜饮用。而后，铁路部门在村中偏西北处修

建一座水塔，并凿下去，下进水泥管子，却被地下一股大水冲击，水泥管子东倒西歪动荡不定，管子四周被水淘空，井管难于立足，于是采取填塞石块阻流措施，注入数十立方米石块，水流阻住了，管子立稳了，村里的泉子也就从此干竭了。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

早年，依靠泉水浇地时为了解决争水矛盾，村民公议，按水浇地亩数把水划分为十一股半，排定次序轮浇，每水流一昼夜为一股，每股水约可浇地六十来亩，十一个半昼夜轮一遍。轮水期间若有余水，欲浇旱地者，可以临时出钱买水。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开始按股轮水。春秋冬季无人用水则任水流往坝外漫滩。

在垦务放地之前，汉族人种地都是向蒙族私人租来的，这叫私垦。初时向蒙族人直接租地，地租很小，而且土地广，实际耕种的面积少，有扩展的余地。后来就出现了有人向蒙族人租来土地再转租给他人耕种，地租就高多了。有的采取拌种（佃地）形式，按倒四、六分成，即秋收时在田间分捋子，出租者得六成，佃农加上投入的成本只落得四成，剥削量相当大。

一九一八年垦务放地以后，有些家住包头城里的人在这儿挂领了土地，春来秋回自耕。这时，人们名义上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了，然官府的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匪、兵刁抢时有发生，加之吸食鸦片流行，人们还是艰难困苦地挣扎着过日子。

在旧社会，这儿家家户户种大烟（罌粟），尤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包头时期，种大烟之风更盛。当时，大烟价格昂贵，人们把它视为发财捷径，户户都种三、五亩大烟，有些大户种植更多。每年农历五月初开刀（小籽），六月里正式开刀割烟，外地人蜂拥而至“赶烟市”（即出卖劳力，被人雇佣割洋烟）。这是人们最红火、最得意的时候，是吃足抽（抽大烟），夜间不睡，早晨不起。直到近中午露水消退后才起来下地割烟。据说，这时候“奶子”旺。过了“烟

市”，人们仍旧过那贫困潦倒的生活。一九八六年故去的享年七十二岁的赵福召，那时，每年种三、二亩大烟，两口子都染上了吸毒嗜好，只有一个独生儿子，胎里带的大烟瘾，从出生那天起，每天大人得给他口喷三次烟才行。而赵福召每年春季向人借贷才能种上地，指地借债，按大烟计算，借一还二。烟割完，债还清，自己就一无所有了。冬季靠偷砍别人家的枯树进城买干柴度日。年复一年，年年如此。类似这样的人家何止他一户！因此，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六月里吃月饼也不甜，腊月里打纸摺也没钱”。意思是割烟时足吃足抽好生活，到了冬天手头连买香表纸的钱也没有。或说：“春季里借债背利，腊月里典房买地”。这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村里有一棵最古老的大柳树，它还记载着这儿的歷史，现在它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仍站立在哪儿。谁也说不出其的确实年龄，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听他们的老辈人这样讲的：有一年下大雨电闪雷鸣，把这棵树劈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树头弯抵地上，着地处复生根发芽又长成了大树。如今它两处主根并存，虽是弯腰弓背的态势，然观其枝叶繁茂如巨伞的树冠，仍不减当年的威严。老人们还说，这棵大柳树旁曾经有一汪清泉，经常聚存满满一钵子（坑）水，但不外溢。行人路过这儿，爬倒喝上几口清泉水，坐在树荫地里歇歇脚，颇为方便。



万水泉的古柳树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这儿共有了七十多户人家，三百来口

人。都是住着土木结构的低矮土屋，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小农村，耕地面积九百来亩，水浇地五六百亩。以前，都依靠泉水浇地，水浇地多种“大烟”，只有旱地才种些糜谷系杂粮，小麦极少，原因是小麦病害严重，从来收成不好。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有人试种过少许番茄（西红柿），人们只当作观赏之物，皆不敢食用。个别户割罢大烟地里也种点白菜（二黄白），自食或向村民出售腌渍酸菜。

解放以后，一九五〇年政府禁绝了大烟，才以种植糜谷黍山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为主，小麦仍很少。互助合作期间，除过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以外，也捎带种些萝卜、菠菜、小白菜，主要是自食。一九五五年村里建起第一个有十几户人家参加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泉丰社，地址在今农场的第二生产队。村民的耕畜农具作价归社，土地入股分红。一九五六年，泉丰社开始种植了几亩茄子、圆白菜（甘兰），有了少量商品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经过两次飞跃：先初级社转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继而大跃进，公社化，这儿就成了包头市郊区麻池人民公社泉丰大队（大队部设在“航运局”）的一部分。

一九六〇年建立国营包头市共青农场，这儿又成了农场的第二大队。进入农场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渠打井，兴修水利，大量开荒造田。据一九八五年土地承包兴办家庭农场的第一年统计：耕地面积扩大到五千三百三十八亩，为解放初时的六倍；虽然以后失去了泉水，水浇地面积仍发展为四千三百七十八亩，为解放初时的七倍多。

共青农场是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农场。万水泉是农场的重点蔬菜生产区，一九八五年，共种植蔬菜二十八种一百二十多个品种，三千三百九十一亩，总产量七百九十三万七千八百公斤，商品菜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了提高蔬菜产量质量，不断改进蔬

菜生产技术，大面积推广地膜复盖，采用电热线、热炕头、无土快速育苗等蔬菜育苗新方法，向工厂化专业化发展。保护地面积三十七亩多，其中温室七栋，塑料大棚十八座。蔬菜生产正向规范化进军。

一九六四年开始培植果树，五百七十亩果树均进入盛果期，苹果、梨、李子、葡萄等产量已相当可观。尤其这儿的水李子，个大味甜，在包头地区颇负盛名。每年收获李子的几天里，李园购李子者人流如潮，各式汽车络绎不绝。

如今万水泉已发展成包头市郊区较大村镇之一。人们居住的条件大大改善了，砖石结构的房院较普遍，原来低矮土屋已不多见了。部分农户安装了自来水，既方便，又卫生。这儿是共青、红旗两个国营农场的场部所在地，有场属的制砖、炼铁、制碱、地毯加工等工业和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出现的许多个体工、商、服务行业户，逐渐改变着农村的产业结构。驻地单位还有造纸厂、涤纶厂、乳品厂、毛巾厂、商店、供销社等工、商企业，以及地质勘探队、银行（营业所）、邮政（代办所）、铁路工区、火车站等事业单位。有共青、红旗两座医院；两所小学，入学儿童九百多名。聚居总人口达到五千人左右，比解放初期增长了十五、六倍。万水泉已形成了这一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本文作者系共青农场干部）

昔日穷乡村 而今繁华城

田茂林

当您茶余饭后漫步在宽阔平坦的青昆两区繁华的街道时，当您在夜晚欣赏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上那闪烁的霓虹灯时，您是否想到这里过去曾是原属包头县的几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村村？它们是昆都仑区内的南牌村，青山区范围内的公忽洞村、镰片窑村和狗兰圪卜村。

南牌村位于昆都仑区公共汽车总站的北侧。现在附近各村农民到昆都仑区仍称去南牌。名谓南牌，因原系昆都仑召膳召地，召南二十华里为南牌界地故称南牌。

南牌村的历史并不算长。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东牌界地报垦后，南牌、西牌界地相继开放。昆都仑召大喇嘛林格利，素与达拉特旗西抢盘村高锁祥认识，平素交往不错。由林格利喇嘛拉引，高锁祥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来此地伙同石喜珠、白彦门肯（蒙族）包租了昆都仑召漫漫黄沙、蒿草萋萋的南牌界地几百顷，东至曹家营子，南至韩圣基窑城北，西至河槽，北至喇嘛柜地。包租年限为三十年，契约上规定许种不许夺。包地分为五股，因而南牌又称“五股地”，年出租糜子三十石，其中高锁祥两股，年出租十二石，石喜珠两股，年出租十二石，白彦门肯一股，年出租六石。他们三户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在包股地中间打水井一眼，同年三户都盖起了房子，从此这里住下了人家，南牌村诞生了。他们住下开荒种田，但瘠薄的沙地，收成甚微，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三户投入借贷筹资从昆都仑沟

口到南牌村开了一条洪水渠，称五股渠，长约十华里。当时由于资金少，开的渠既浅又窄，山洪暴发时流入渠内洪水不多，每年只能灌溉部分土地。这时他们几户除雇工耕种土地外，还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张海成、杨石匠、杜同保等是最早来南牌村的佃户。过了十来年，三户有了积蓄，把五股渠重修了一遍，在原渠道上加深加宽，渠口又往北延伸几百米，接近赵家大渠的渠口，从此以后，大量山洪流入五股渠，每年澄不少的淤泥地。这时他们又跟召庙交涉，出水租每年要了三天清水，清明前接南五村的水。这时正值冰雪融化之际，水位猛涨，每天可灌六、七顷地，三天可浇二十多顷，这样就能保住春苗。随着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石两柜的自耕地也扩大了，需雇用更多的长短工种地。土地也肥沃了，于是佃户逐年增加，佃户种他们的地，按地好坏分“四六”、“三七”股子纳佃租，不多几年，南牌高柜、石柜同东牌的邓柜、赵柜成为牌地的四大地户。（邓柜：见“包头郊区文史资料”一辑《颿风社创建始末》）

在日伪时期因扩大土地面积，东牌的赵有才、南牌的高六样（高锁祥去世后由其弟高六样掌管家务）差一点遭下大祸。情况是：东牌界地垦放时，有一位名叫曹巨成者购地三十三顷，在土地中间盖了房子招来花户种地，称曹家营子。曹巨成从曹家营往昆都仑沟口开一条洪水渠，因资金不足，渠开到中途停工。渠未开成，便把地卖与国民党一军官刘效贤，刘吃租取利。

日本鬼子入侵包头后，刘效贤随军跑到伊盟，于一九三九年他托堂兄刘玉山秘密来包将地卖与东西地邻赵有才和高六样，契约上把卖地人写成刘玉山。这一消息被素因浇水发生矛盾多次打架的南五村（韩圣基窑、高油坊等村）人得知后，向包头日本警备司令部告密，说赵、高私通国民党，买了刘效贤的土地。警备司令部将被告赵有才、高六样扣捕入狱，严刑审讯，被告硬不承认。经多次审讯就要以私通敌军论罪，判处死刑。这一消息透露

后，赵家高家到处请客送礼，并搬动包头大字号广恒西的“掌柜的”出而担保，花了许多钱，才把赵、高二人暂时放出监狱，重行审案。二人出狱后，知道警备司令部宋翻译有实权，说了算数，便拿银洋七百元，大烟四百两送给宋翻译。宋翻译吃了贿赂，替赵、高柜办了事。把地约上的刘玉山的“玉”字，上边加了个“人”字，左边又加一点，便改成“刘金山”，并让赵、高柜两家在绥西饭店包酒席十桌，请司令部有关人员百十来人吃饭。在酒席宴前宋翻译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日本话，讲办案的经过。大意是：经调查赵高二姓买的是刘金山的土地（当众让日本人看了地约），原告说他们私通国民党实属诬告，并无其事，我们要认真办案，不能听上原告打死被告。在坐的有些头头接受了送礼，宋翻译这样一宣布就算结了案，高家免遭大祸。从此南牌村外来户逐渐增多，不仅本村有四十多户农民种五股地，曹家营有二十来户农民也种他们的土地。

青山区范洞内的公忽洞、狗兰圪卜、镰片窑子三个村的农民，于一九五三年搬迁到新线、甲尔坝、前庄子、磨池、哈林格尔等村。公忽洞位于二机厂与二电厂之间，狗兰圪卜位于向阳商场北端，镰片窑子在一机厂南端。

公忽洞村历史较长，明代这里就有牧民居住。据老者传说：清雍正年间有苗、雷、郭三姓，分东、中、西各租距一里多住下来开店。这里有东达归化城（现称呼和浩特）西通宁夏的一条通道。《一九三三年包头地理概要》记载：“公忽洞为包头主村”。

“包五大道以包头为起点，经石桥沟、毛鬼神窑子、公忽洞、沙坝子入安北”，那时来往于河套之间的车辆、骆驼驮子，需在公忽洞息脚，阴山外的牛羊群以及皮毛驮子从昆都仑沟出前山，去萨拉齐、归化城出售，也要在这里过宿。因而原先的住户以开店为专业，而且店业兴隆。民国初年，大小店有十来家。

清末时期有了农户。《一九三三年包头地理概要》记载：“千支汉印独地九百三十八顷，于光绪三十三年中公旗报垦，出租者西路公司，位于包头西北四十余里。”这正是公忽洞、井卜什窑、尹六窑一带的土地。至此除苗、雷、郭家外，又迁来些杂姓买了土地，开店兼垦荒种地。

清末时期包头人口集中起来，特别是于民国十二年平绥铁路修到包头，包头商贾云集，日益繁盛。包头商行派人用茶、布、烟、糖及日用百货，到草地做买卖，换牲畜的较多，秋天成群的牛羊赶回来，暂时处理不了，揽给公忽洞居民放牧，有少数商行自己搭起帐篷放牧。开店、种地、放牧是这时这里的居民的三大职业。每年七至十一月，城里的桥牙子和屠宰场的人，成群集队来公忽洞买牲畜，有买有卖，成为牲畜交易市场。而且每年秋天搭台唱戏四五天或十来天，城里的大批商人到这里在戏台周围搭起帐篷做买卖，百货日杂，吃喝拉杂应有尽有，加上牲畜交易，热闹非凡，还有在不少帐篷里掏宝赌博，更增添了这里的热闹气氛。

包宁汽车公路，乃民国十四年由西北军所筑成，从麻池方向通往河套；包五公路日伪时期重新修筑，从公忽洞到前口子分道，一条沿乌拉山前入后套，一条由昆都仑沟入安北。这两条公路的修成，虽然不需设运输车辆，但骆驼驮子和牛车，却逐渐减少，公忽洞村车马店业也便逐渐萧条。由于耕地面积扩大，牧场逐渐转移到井卜什窑、窝兔壕一带。到解放前夕，这里的居民便以种地为其主业。但东村苗家、中村雷太平，西村郭某仍在开店。

这里的土地是沙石土质，而且均为旱地，靠天吃饭。解放时东村苗姓十户，中村十户雷家生活都不富裕，西村郭小八等二十多户郭家中只有郭有仓一户有牛羊群，开碾磨坊和油坊，雇长短工种地，是全村约五十户人家中的首户。

镰片窑子：因最早有人开铁匠炉打镰刀片而得名。解放前夕有刘喜贵、苗二两户人家，刘喜贵和苗二各有数子，后分居为十来户人家，形成一个小村村。这里是沙质土地，以种麻为主，每年靠出卖麻杆、麻纸和麻籽来维持生活。

狗兰圪卜：清光绪年间有姓张名狗兰的人住在这里放牧，并因地形低而得名。这里系属昆都仑召东牌界地，民国三年报垦，萨县知事邓书山代表米、胡、逯等多户，八十三股，集银洋四万元买了这块地。当年在狗兰圪卜盖了房子买了车辆马匹，由米德功经领，称邓柜。邓柜雇秃老李、张留套、张补套等人圈起七八眼水井，用秤杆打水灌田地。后邓柜大渠开到狗兰圪卜后，将瘠薄的沙地，逐年变成清洪水地，佃户越来越多，全村农户都租种邓柜土地。一九五五年迁居时有祁升止、杨全有、张来眉、王十翻等三十七八户。

雄鸣一唱天下白。包头解放后，中央派来了大批干部和测量人员在南牌、公忽洞、狗兰圪卜周围进行周密勘测，接着派来了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和包头各族人民共同用勤劳的双手在这几个村附近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

一九五五年春，南牌、狗兰圪卜、公忽洞，搭起了施工的帐篷，工程设计人员精心绘制图纸，施工大军夜以继日垒砖砌石，经几年的兴建，南牌、狗兰圪卜栋栋宿舍平地而起，公忽洞村幢幢厂房巍然而立。建设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奋发图强，攀登高峰。

随着包钢的建设和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建设，这几个村址及其附近，高大建筑鳞次栉比，数不清的管道凌空盘绕，弯弯曲曲伸向各个厂区，高大的烟囱耸入云霄；公路铁路四通八达，火车汽车满载着包头生产的钢材、有色金属、机械等产品，运往祖国各地；市内公共汽车南来北往，络绎不绝，早已结束了公忽洞、狗兰圪卜、南牌村慢悠悠的“牛车”的历史，几个村村的

阎锡山占领包头史略

李子珍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阎锡山率领民军占领了包头。

阎锡山统治山西四十年，人所共知。但阎锡山统治绥远，恐知者不多。尤其阎锡山占领包头的情况，更鲜为人知。

阎锡山究系何许人也？如何爬上大都督的宝座？又如何窃取山西辛亥革命起义的成果？这一切有必要先简述清楚。

阎锡山字伯川，别号龙池，山西五台河边村人。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决定派一批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山

周围，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油光的马路两旁，云杉小丽吐香争艳。夜间盏盏电灯照耀如昼，霓虹灯闪烁着夺目的光彩；灿烂的金鹿，凌空欲飞；商店货物琳琅满目；公园里红男绿女熙熙攘攘。

赵继武同志《请到包头走一走》的歌中唱道：“……举目北望大青山，南眺黄河滚滚流，西睹包钢钢花飞，东看土默川上绿油油，花香鸟语赛江南，昔日黄河沙低下了头，小丽花开满钢城，云杉郁郁添锦绣，工业生产大丰收……”。

这首赞歌充分表达了塞外钢城人民的心声和对未来的憧憬。

（本文访问了南群村老农高存宽、高焕宽和原公忽洞居民郭金良、郭有万、郭银万）

（本文作者系郊区政协文史委员，退休老教师）

西由于巡抚衙门指定，因而，阎锡山得便赴日学习。阎锡山赴日后，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当时，在日本的旅日侨胞和留日学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之，阎便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阎于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加入了该会。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阎在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日军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联队实习期满，正式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三月，阎锡山从日本毕业回国，先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三个月后，升为监督和山西陆军督练公所教练员。同年十一月间，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的士官生举行会试，阎考列为上等。十二月三日赏给阎锡山步兵科举人并被提升为八十六标教练官（山西兵制为一个混成协，辖步兵两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统归山西陆军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指挥）。于一九一〇年阎又被提升为八十标标统。

阎锡山既得到清室官吏的信任，自己则培植扩充私人之实力，因而野心得遂。

自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响应。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大为惶骇。遂在太原召开军政官员会议，会后阎锡山又召开了亲信的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于是利用八十五标开往蒲州的机会，给八十六标下令诡称“八十五标有兵变”，调动部队保护抚署、军装库，待姚以价起义军攻击太原南门时，阎锡山配合攻打满州城，至此，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宣告结束。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原起义后，为筹商大计，推选领导人，因阎锡山系同盟会员，加之会前又有活动，所以被推选为山西大都督。

太原的起义，震惊了清廷。十一月十五日，任命张锡銓为山

西巡抚，统率第三镇曹锟所部，企图扑灭山西的起义。十二月十日，在娘子关战斗中，民军大败，娘子关失守。清军乘胜直逼，阎锡山无奈，于十月十二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撤出太原，取道静乐、宁武，直趋包头。

阎锡山行至保德，张培梅、吴信芳率雁门、怀仁民军与阎汇合。又行至古城镇（河曲县十里长滩附近），包头的杨瑞鹏、王肯堂等亦与阎相遇，因之一道北进。

在辛亥革命前，包头已成了同盟会活动的重要据点。原因是：自清代中叶以来，包头逐渐由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发展成一个拥有四、五万人口的商业城镇，已成为沟通中原和大西北的交通枢要。虽然这样，包头仍属萨拉齐厅下的一个镇，只设一个巡检，所以是清廷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同盟会最初来包头开辟工作的是王建平，王是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山西发展的首批会员。他先在萨拉齐耶苏教会学校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后来转移到包头，乔扮成算命先生，发展会员。包头有王鸿文、郭鸿霖、王肯堂，杨瑞鹏、王定圻、李茂林、李士元、李士修等加入同盟会，特别是蒙族青年云亨、经权、安祥等也加入了同盟会。大同的同盟会员李德懋以武术为名，在包头士兵中交朋结义。王鸿文、郭鸿霖、云亨等人利用包头咨议局议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由于包头革命气氛高涨，既有塞上英贤，又有民主革命的基础，所以阎锡山撤出太原直趋包头。

山西民军行抵距包头十五里的大茅庵村时，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以和谈为名，请阎到南海村开会。因樊恩庆在十二月下旬，假地方绅商名义，公宴革命军军官，当杯觥交错，酒宴正酣之际，樊子先布置的军警，突然包围开枪，当时死难四十余人。故阎锡山心甚疑之，乃派孔庚、吴信芳为代表前往。甫至南海村，被清军包围。阎对樊的诱骗行为，极为忿怒，分三路进攻包头。樊见

阴谋未遂，慌恐无所措施，率队五百余人，向归绥逃遁。包头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被阎锡山占领。

阎锡山进入包头后，行辕设在前街官盐店（解放路穿心店对面的南大院），接着张贴安民布告，阎的官衔是“秦晋蜀北伐先遣军大都督”。委任杨瑞鹏的父亲杨巡检为包头衙署的州官，将包头改为“包东州”，衙署设在草市街。

绥远城的将军瑩岫，得报阎锡山占领了包头，即调谭永福率步马炮兵二千余人屯兵萨拉齐防堵。一月十五日，阎派统带王家驹率步兵两营，骑兵一营，炮兵一队，开往鄂尔格逊村，与清军对峙。一月十六日两军相战，清军退入萨拉齐城。由于炮击，清军无法逃向托克托城。

阎锡山进入萨拉齐后，住到德昌货店，并令同知呼延庚继续在衙办公。阎在萨拉齐只停留了五天，即向托克托城进攻。

托克托厅通判包荣富，大为震惊，一时风声鹤唳，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包荣富赶紧召开地方绅商，共谋对策。但有一些知识分子如阎懋、刘兆瑞、李永清等，与同盟会素有联系，即称地方势力薄弱，无力抵抗，主张欢迎阎军。包荣富亦自知力不能抵，乃顺应舆情，决定开门欢迎。

主张欢迎阎军最力的知识分子是阎懋，其人是托克托厅河口镇人，清末秀才，同盟会员李德懋到托克托秘密宣传革命时，阎懋和李便有较多的来往。此时武昌已经起义，阎懋认为革命必然成功，因之，力主迎接阎军。

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已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山西局势亦定。于二月十八日，阎锡山放弃对归绥的进占，沿黄河南行，经河曲、神池、宁武，抵达忻州，于四月四日返回太原。

（本文作者系离休干部、包头市民革成员）

李英其人

安治亭

李英，乳名李交其，系今郊区古城湾乡磴口村人，出生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其父李福喜，世居磴口。种田为业。后因家境贫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辛劳过度，因病早逝。其母李赵氏，三十四岁失去丈夫，在本家叔父的帮助下，守寡拉扯五个孩子，一心希望他们早日长大成人，自食其力。

李英幼时读过两年小学，从小贪玩，在家不受管，在校不服教。从十三、四岁起失学在家，搂柴弄草拾料炭，后来，也曾给人放牛和做短工。打短工不但工钱少，有时还要挨骂。二十岁以后，他“身不受其罪，心不受其气”开始过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生活。

李英身材高大魁梧，方脸庞，高鼻梁，厚嘴唇，二目炯炯有神，说话铜钟亮瓦，自带三分恶气。他专好交朋友、结弟兄，拉帮结派，出尽风头。他办事粗中有细，颇多智谋，因此，在当时一班年轻人中，享有较高威望。

日寇侵占包头以后，当地普遍种植大烟，为防土匪刁抢，各村都成立自卫团。一九三八年冬，金宪章通过亲戚关系，征得土默特旗政府保甲自卫团办事处主任满纳生的批准，在磴口地区成立了保甲自卫团，团总由金宪章担任。该保甲自卫团下设两个分团：磴口村为一分团，分团长由吕存罗担任，实有团丁二十五人，步枪十六支，手枪一支，当时，李英在该团当团丁；二分团为阿善沟门村，分团长由李新旺担任，实有团丁十五人，步枪十二支，手枪一支。磴口村一分团的枪支系村民筹集，用钱和大烟

买来的；阿善沟门村二分团的枪支，大部分则是从日伪驻沙尔沁警察署逃跑的两名警察手中夺来的。有一天，沙尔沁警察署的两名警察携带九支步枪、两支手枪逃出来，想收罗人马，占山为匪。在阿善沟内遇到该村云旺旺，便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云旺旺。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之后，云旺旺带一支手枪回了村，被李新旺发觉逼着该云带路去找警察，在山上，两名警察被击毙，所带全部枪支，均归阿善沟门村自卫团所有。

磴口自卫团成立一年多，有一年，国民党匪徒邬四儿率二十余人上山抢了当地一百多只羊，正要从磴口村西南涉过冰河，被李英同另一名团丁发现，二人打散群匪，接回羊群，除他们分化宰杀，还敬送了他们的上司。还有一次，从河西过来两名残匪，欲乘晚间行劫，被放羊人赵玉成发现告知李英，李英扮作拾粪的人担着粪箩头顺路而行，迎头碰见匪徒，突然掏枪将二人打死夺得两支枪。从此，他的声誉大振，正赶上吕存罗辞退了团长职务，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岁的李英就当上了自卫团长。

李英当了自卫团长以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筹措了一笔款，买了两匹大走马，让团丁王明亮给他当护兵，每日里带上护兵，骑上走马，东游西窜，交结官府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一九四〇年五月，他又想方设法通过磴口火车站日军小队长肖木村，买到一口东洋大刀和高筒大马靴，这一下，李英更加耀武扬威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李英将上、下古城湾、毛其来的两个自卫团也归自己管辖，并且重新加以整编。整编之后，各村分团长改称队长，他接替金宪章的职务，当了自卫团团总，自卫团的团丁由原来的四十多人，发展到八十余人。为了扩充势力，他一方面与日伪包头市长金朝文联系，当上包头乡村保安自卫团团总，一方面又与商会会长王明勾搭起来，共谋私利，还同萨拉齐县保安队驻沙尔沁、土合气两村警察署官林国良（蒙族人）结拜

为弟兄。从此他们狐假虎威，狼狈为奸，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值烟市，李英亲自出面找商会会长王明说要解决军饷，经王明与烟土合业组协商，协定收购的烟土由李英的团丁负责护送，从中收取护送钱，李英也插手倒贩大烟。于是，李英就以护村护路为名，带领团丁来往于沙尔沁、海岱、土合气、巴拉盖和邻近诸村，通过保甲长收取“官害”。然后，他将起要的官害洋烟，转手出卖，作为本钱，收购大烟。就这样，李英在一个烟市就通过倒贩大烟和收取护送费，收入蒙疆币四至五万多元。此后，每年烟市他都经营这两项买卖，而将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作为团丁的津贴；百分之二十敬送官场人物；其余百分之五十归己有。他这样做，既收买了团丁的人心，又得到官场头面人物的支持。土默特政府保甲自卫团办事处主任满纳生和包头市市长金朝文都称赞李英以经商养兵，护村护民，真有办法。

一九四二年六月，匪手张耀（古城湾村人）在外丧生，他的副官朱占海，将余匪四十多人和五十多支枪带回古城湾村，通过张有恒（张耀的次子）与李英协商，将五十多支枪全部卖给李英的自卫团（实际后来李英只给了一部分大烟和钱），又将余匪中好枪手留下十二、三人，其余的人，给了路费打发回家种地。买下这批枪之后，李英又从各村挑选了十八、九名团丁，还从外地招回十四、五名得力助手，又买了几匹骑马，从此，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

一九四四年二月，李英又通过日伪包头市长金朝文与日伪蒙古军军长李守信协商议定，将自卫团改称“蒙古军地方保安团”，李英任保安团团团长，授团级军衔。他更加得意了，出门总带五、六名护兵甚至进城门也不下马。他经常到沙尔沁、鄂尔格逊村收购大烟，只给三分之一的钱，转手倒卖；也公开向保甲长收“官害”，当地百姓被他搅得不得安宁。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傅作义的部队向京津进发，九月一日，国民党包头市政府成立，李英部被改编为民众自卫团，他仍任团长。但是他忧心忡忡，伺机待变。一九四五年十月，解放军来攻打包头，李英乘机带领一百二十多名团丁，逃奔黄河南岸的德胜泰村，去找他的结拜弟兄林国良（该林由土合气村调任伊盟公署驻达旗德胜泰保安中队长，日寇投降后，归附国民党，暂未整编）在河曲，虽有林国良帮助，但李英队伍中百分之三十是吸大烟的“料面鬼”，烟瘾难挨，经常夜间出没，来沙尔沁、土合气一带刁抢大烟，或过河来东坝，掌盖营、什大股、毛其来一带要烟要钱危害百姓。后来，李英听说国民党六十七军由榆林开赴伊盟一带，该军一个守护旅旅长何保山驻在展旦召。李英亲自去拜访何保山表示愿意归附。还没等办理手续，李英竟打出六十七军旗号，更加明目张胆地骚扰百姓。因此，当地流传着民谣：“六十七军没根，穷人托冬，但等春暖花开，各奔逃生”，“六十七军是大害，偷鸡杀羊捞白菜；偷鸡捞菜还不算，临走摸几个山药蛋”。

一九四六年三月，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从后套调来包头一个守护旅，旅长赵炽昌将李英整编为包头县东三保民众自卫团（东三保指：一保磴口村，二保古城湾，三保壕来沟），共有团丁一百六十多人，他又打着守护旅的旗号，继续为非作歹。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晚，解放军第二次进攻包头，国民党二十二军邓宝珊和三十六军刘万春奉傅作义命令，放弃包头，撤退到后套，解放军二十兵团二纵队和蒙绥游击队，一枪未放，解放了包头。在此之前（十月二十二日）李英听说解放军打包头的消息，就带领全部人马，从磴口乘船渡河南逃，与林国良合驻德胜泰。解放军驻扎包头后，游击队长李秀山和蒙绥军司令巴音巴图让金宪章劝降李英。这个金宪章曾是李英的上司，也与林国良为友，并是李秀山的同学。经过金宪章的活动，李英和林国良

率部投诚，李英部驻薛家营子，林国良部驻邓家营子村，待令整编。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在金宪章的引见下，李、林二人见到李秀山洽谈投城具体事宜，李英被编入李秀山部，任营长；林国良编入蒙绥军。十月二十九日，李英率众进入包头，驻在哥老会院内（即今东河区公安分局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撤离包头东进，李英打算叛逃，他将部队拉出城外，并暗杀了三区的高区长，然后急行军抢到大部队前面，行至古城湾，又下令缓步前进，拖在部队后尾。午夜，来到永富村西，李英发出暗号，团丁们由村西的小山沟迅速进山，仓惶逃到阿善沟里，不敢休息，匆匆向鸡儿沟窜去。十二月一日，李英派王根材、刘二来贵更换便衣下山进城去找刘喜喜，该刘是包头县参议员，他立即找参事们商量，大家认为，解放军东去，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过来，城内空虚，为确保商会安全，决定请李英进城守护。十二月二日晨，李英派兵分别把守五个城门，还在城中张贴布告、安设岗哨，当起了“城防司令”。十二月五日，邓宝珊、刘万春率军从后套返回包头，李英做了三天“城防司令”，美梦就破灭了。但是，李英叛变解放军的行为，暂时得到国民党的赞赏，在十二月十日中山堂召开的军民大会上，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拍着李英的肩膀说：“你是一位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并得到董其武的嘉奖。这段时期，李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派护兵王明亮将他的姘头（磴口村高某之妻）接入城中，住在商会，参事们和商会以为是李英妻子，招待甚是热情。半个月之后，高某某前来寻妻，李英恩威并施，他一面给高某某一部分钱，一方面又威胁说：“如果声张，就打死你！”高某某含泪回村。王明亮劝李英说：“已经腊月了，让人家回去过个年吧！”李英不但不听劝，反而打了王明亮几个耳光，王明亮一气之下回村种地去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包头市长康保安让李英回乡守护地方，当时，正赶上国民党大抓壮丁，当地青年不

得不紧家变产，花钱到李英部下当兵，李英的势力又得到发展。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惯匪倪八子抢劫民财以后，夜宿永富村，李英乘众匪熟睡，突然袭击将众匪全部缴械，只有倪八子一人得逃，倪八子认定是永富村民报信，迁怒于村民，伺机报复。

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军沿平绥线西进，李英预感末日来临。九月五日，他为母亲“庆寿”掩盖他的空虚。这一天，他从市里请来“水上漂”的晋剧团，为他母亲唱十五天戏（磴口八天古城湾七天）。李英在戏台上讲话说：“唱戏花钱全由我支付，不用乡亲们摊钱；我李英下令，官赌十五天！”包头商会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来祝贺。还没等戏唱完，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包头也插上了五星红旗，市里通知他，原地驻扎，待命整编；倪八子派人送信，索要大烟和钱，不然要与他作生死搏斗，李英只好将大烟和钱送还倪八子。当地青年为了躲抓壮丁才跟他当兵，如今解放了，都交出枪支，衣物不干了，当下，李英的人马走散了许多，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一九五〇年三月，李英残部编入十二旅，驻防固阳一带。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上级派任德山同志为指导员。李英的部属大部分是游手好闲之徒，又吸食鸦片，不愿参加生产劳动，还屡次触犯军纪，受到指导员多次批评教育，于是怀恨在心。四月五日晚（清明节），李英暗枪打死了任指导员，策动全连叛逃。四月十五日晚李英在西脑包大照壁旁抢劫巴盟水利局灰色干部服百余套；四月二十一日，李英派张贵罗等二十来人在预定地点等待，又派高三威和二来贵等四五个扮作商人，闯入南圪洞，将商会会长覃锡树绑架出城，由张贵罗等接应回山，然后又派人送信，限三日内将料面、纸烟、球鞋、衣物等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将覃锡树处死，广恒西闻讯，立即备齐衣物，才将覃锡树赎回。

从此，李英盘据大青山一带，合并小股土匪，发展到一百七、八十人。有一次，夜间进入东坝村欲抢劫黄河运输船，为封

锁消息，竟在农忙季节一天一夜不许村民出村下地。连续几个月，李英匪徒拦劫路人，阻断交通，危害百姓闹得人民不得安宁。上级调来黄厚二十二师的一个骑兵营，由陈如山营长带领剿灭这股土匪。经过一个多月的追击，大都匪兵被歼灭，李英率五、六十人潜入大青山，追剿队一面紧追不放，另一方面派人出面，劝其投降，李英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后来，李德亮（李英的堂兄，磴口村保长），带着书信入山寻找李英，劝其投降。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李英在阿善沟外向陈如山营交械投降，当时仅余三、四十人。七月二十六日，李英被押送绥远省管教队。

由于李英占山为匪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生产，民愤极大，群众多次写信给省管教队，要求严惩，加上李英枪杀革命干部，血债累累，绥远省高级法院根据他的罪行，判处其死刑，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被押回包头，就地处决。这就是危害百姓的匪首——李英最终下场。

（本文作者系退休干部）

· 小资料 ·

“梨园”之义

“梨园”者，原来是指唐玄宗即李隆基（亦称唐明皇）训练歌舞艺人的地方。此后，旧时代便用“梨园”来泛指有关戏曲方面的事物，如通常把“戏班”称为“梨园”，将“演员”称之为“梨园弟子”，称“戏曲界”为“梨园界”。宫步主同志所撰“梨园谱”，实指在戏剧界中颇享盛誉的“名角谱”。

（洲识）

蒙汉人民 共建城堡

官步生

叭！叭！几声震耳的枪声过后，从鄂尔格逊村西北方向，出现了一百多荷枪持弹之人。这些人有的拉着马，有的牵着驴，身着不同服装，凶神恶煞，朝村里涌来。人们第一次见此场面，都吓呆了，忘了回避，只是用痴楞楞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这事发生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的深秋。当时的鄂尔格逊村人已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纷纷磨镰备车，准备秋收，却不料来了一股祸水。这股祸水事后才得知是卢占魁匪帮。这伙土匪刚抢劫了沙尔沁，便立即转向了鄂尔格逊，这下子村民可遭了殃。他们进村后，杀猪宰羊大吃二喝，翻箱倒柜，大肆劫掠，闹的鸡飞狗跳，哭声震天。特别是该村的商号“源聚和”更被抢劫一空，一家当铺，被烧为灰烬。事后统计，全村共损失财产六万多元（以银洋计算）。劫后村民悲愤地说：“这伙天杀的土匪，老天爷怎么不睁眼整治他们呀，官府怎么也不管管呀！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靠那个不给人民办事的官府，我们应想办法自保！”突然从人群中冒出一个宏亮的声音，接着便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走向人前，人们一看，才知是本村的蒙族青年满泰，表字子舒。

“对！子舒说的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就得靠我们自己来保。”有个嗓音洪亮的人斩钉截铁地陈述着自己的意见。此人头戴兰布手巾，身穿黑土布大衫，四十上下，粗眉大眼，手拿一根铜烟袋。他是本村的热心人贾三栋。贾三栋性情耿直，常为地方

上修路补桥办好事，人们很敬佩他。

“怎么办？！……”人越聚越多，七嘴八舌，纷纷追问。

“建城堡防土匪！咱们村五百户蒙汉人民，都长着两只手，拧成一股劲，三人成一心，黄土变成金！”子舒又一次铿锵有力地说。

“此事应从长计议。”贾三栋又开了腔，“咱们先计划计划，准备准备材料，等个适当时机再干！”就这样把事情定下来了。

民国十四年，京包铁路完工。贾三栋一看机会来了，便召集全村有代表性的蒙汉村民，商讨建筑城墙之事。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和铁路工人联系，请他们来三个队支援建筑城堡，并当即议定：

一、集中居住，把当时分散居住的西沙梁、风干梁、北沙梁三个小村合并到大村鄂尔格逊。规划城周长为五点二里。

二、建城墙的费用全村均摊。

协议基本达成后，就由贾三栋主持，满泰的父亲耶拉什撑腰，和铁路总队签署了合同。合同大意如下：

1、城墙规模，底宽一丈，高一丈一尺，顶端加五尺城围，并留出枪眼；

2、城门高一丈六尺，宽两丈，城门洞深一丈三尺，门楼上并建炮台；

3、城上修三个垛口，并建炮楼；

4、一切用料由本村备齐；

5、要求一年交工，验收后，不欠工程费，工程费由银元为标准支付。

合同签订后，铁路工人马上开工。由于工人离家日久，想家心切，所以一年的工程，提前三个月完成了。真是：

对明月满身汗乐而忘倦，

喝粗茶吃淡饭笑语满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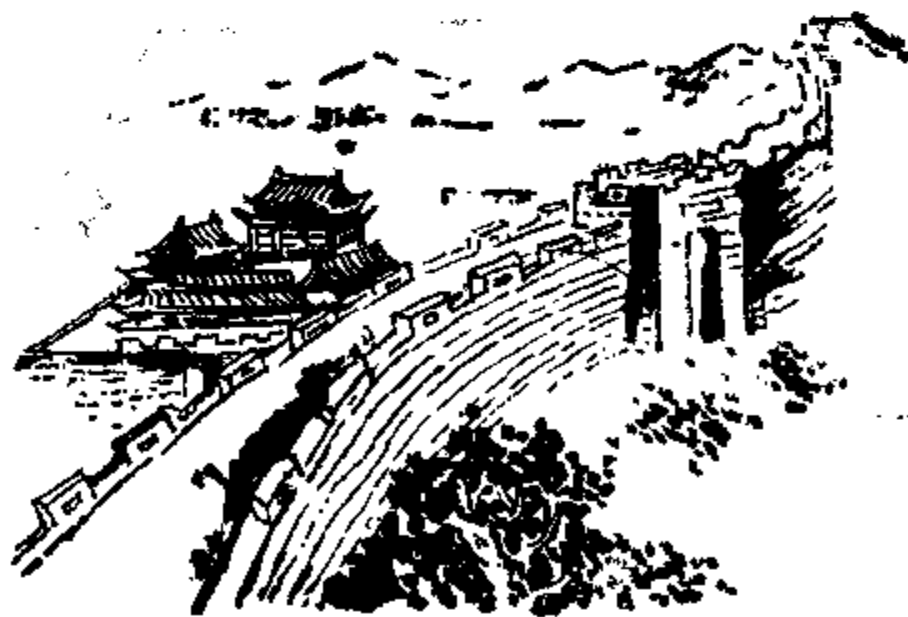
工人的困难村民给补填……

验收后，整整花费大洋一万元。适逢当年遭旱，庄稼欠收，

又因有些村民拆了旧居盖新房，有的村户确实困难，拿不出钱来。贾三栋为筹款忙个不停，可几天过去了，毫无结果。可巧满泰又到外求学未归，缺了帮手。三栋心如火燎，寝食不安。他看看新垒的城墙，又看看为筑城而累坏了的工人兄弟，而且工人中还有二十多人累病，二人死亡，他更是心如刀绞。他前思后想，觉得只有一死，方能报答村民，报答工人兄弟。于是便一头撞在关帝庙石阶上，以身殉村。村民们被他这种义举感动了，便公推满泰之父耶拉什主持起钱。当时有十来户小康之家带头，拿出二千元银元，随后，全村按贫富均摊，付清了筑城之费。

解放后，匪患虽除，但当年蒙汉人民共筑城墙之举，特别是满泰、贾三栋那慷慨义举，却深深印在人们心中，至今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系退休干部）



原鄂尔格逊村城垒一角 何作全作

包头早年的武林界

罗宏根

梅景林先生祖籍郊区鄂尔格逊村。现已八十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暇时还看书习武，真是老当益壮。

梅老从青少年时期就苦练武功，受教于白云亭先生（梅先生称白师兄）。云亭先生在包头河套武林界享有较高声望，远近闻名。他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武术功底都是受人尊崇的。白先生主练“长拳”“太极”，对“形意”也有造就，拜师太原的邢先生。传说冯玉祥的四十一军武术教官白子清慕名请教于云亭先生，实则心术不正，企图见机露一手给先生看。那知在过手中被先生看破了他的用心，未经几个回合，先生就用蛇形掌将他缠住摆不脱身，白子清只好承认“领教”而去。梅老很佩服云亭先生的功夫和为人。但他也有一件终生憾事。据梅老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包头前，白师兄避居河套陕坝镇，曾收过两个徒弟，有个叫赵瑛的徒弟深得师兄的宠爱，不料在“文革”年代他这个徒弟整了师兄的材料，将师兄斗了个死去活来，最后含冤死去。梅老为此特意强调“收徒弟宜精不宜多，不主张多收徒弟，收徒弟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看其心志和武德”。梅老喜练“鞭杆”（当然其它拳术器械方面的功夫也都比较深）。他说：“鞭杆”这玩意往往不被人重视，实际使用方便，变化莫测，很有意味。

梅老谦恭好学，从不以所学为足，他曾向前辈、同辈不耻下问，学到如“竹林剑”“太极”（包括吴氏、杨氏太极）等技艺，而且又无私地传给了后人。

梅老还谈起三十年代与云亭先生、韩世清、于德保先生等人

和我的祖父罗培元经常习武，共同取长补短的情况。当谈到早年武林前辈时，梅老回忆说，包头最早教过场子的有来自托县的杨云（回民）还有覃振奎（主教杆子）。杨云是吴桐的徒弟。吴桐在原绥远地区很有名望。传说曾参加过南京政府摆过的“擂台”赛。因打败了一个校级武术教官而轰动了南京，赛后回家被跟踪到托县企图报复，但以失败告终。还有从山东来的一位号称蝴蝶张的武师。当时我的祖父正患癆症（肺结核）在大口吐血。一天在草市街（今民生街）一家钟表铺碰上了这位蝴蝶张先生。先生见状，问我祖父想不想把病治好？祖父说：“求医多人不见好，愿听先生指教”张先生说：“我一不扎针，二不开方，就是让你跟我练武，保准治好你的癆症。”于是祖父就跟随张先生学练武功。终于把病彻底根除，还学到了不少拳术、器械。祖父后来把他学到的十八趟罗汉枪的中八趟传给了白云亭先生，下五趟传给了韩世清先生。还把二郎拳，“竹林剑”及吴氏太极等个别传给了他们。同时也传给了我的父亲罗温如。据说我父亲把十八趟罗汉枪都掌握了，而且还练了杆子和虎头钩，可惜以后参加革命没有继续练，把功夫基本上丢光了。蝴蝶张先生还教过一个叫三仁子的徒弟，曾和我的祖父练过“对子”（即对打）。祖父在世时曾给我讲过，蝴蝶张先生的功夫过人，尤其在枪法上很是精湛。他曾让人放一叠铜钱，指其中一个钱为标，张先生一拧腰就用枪尖将这枚铜钱挑出去了，而其它铜钱却原封不动，实在让人叫绝。张先生还让十几个年轻人站到他周围攻他，结果一个人也拢不到身边。另外还有贾五（托县人，长拳门）宋标（回民八卦门）等前辈在武林界也都是深负重望的。据说贾五先生也是吴桐的弟子。先生曾将一位得意门徒邢生贵先生（现已年逾古稀退休在家）推荐给我的祖父专习了吴氏太极。邢先生的功夫很有造诣，年轻时，为了武功姿势不佳，曾对着镜子专门矫正姿势，最后终于在各个场面上露了身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包头后严禁中国人练武，从此包头的武林销声匿迹。各种器械都埋到地下（我家就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包头市政府有个民众教育馆（设在东河区原交通中队院内），曾号召武林界人士聚集活动，但由于当局一无设备，二无经费，重视也不够，所以人们无心积极活动，只是每日下午应付一下了事。有时国民党搞纪念活动，也让武林界到“中山堂”（今人民电影院）表演武术。我那时在牛桥街小学念书，在一次节日里也代表学校去中山堂表演过竹林剑。不久又从太原来了三位武术师父，一位是当今还活跃在武林界的名师李云龙先生，另两位则是刘天喜、曹佩山先生（刘、曹二先生均已谢世），人所共知，云龙先生以杨氏太极为著。当年来包头后曾和我祖父有过频繁的交往，祖父曾给他的师弟子们讲：“武术这个玩意各有长处，各有奥妙，我练了多年的吴氏太极，看了云龙的杨氏太极后，觉得有好些长处可学，云龙的推手也很好，建议你们一学。”解放以后，云龙先生以及天喜、佩山等先生都传授了不少后人，还出了一些高徒。

如上所述当今除了象梅老及云龙先生的声望外，健在的武林前辈还有冯金贵、李把式等先生（当然还有我不知大名的其它武林前辈）他们都把各自身经百练的好功夫传给了后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包为包头现代武林的活跃和群众的健身积极地贡献力量。愿后人珍重前人所教，发扬前人武德，为振兴中华武术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离休干部）

鄂尔格逊的“七十二行”

宫步生

鄂尔格逊除了种地外，还有七十二行，人们常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确实不假。以民国年间记述：

石匠：梁满喜，收徒师留拴，主营砍磨，做磨、刻石，做碑、开山等。供奉鲁班为祖师。

口袋匠毯子匠：王三俊，以地毯为主，手艺精巧，图案新颖。供奉轩辕黄帝为师。

泥匠：白关元，以盖房为主，也能盖庙。

木匠：郭水，盖房、刻工刀法精致。

铁匠：杜丑，刀刃特好。

以上三匠都供奉鲁班为祖师。

金炉匠：师仁熹，金环银手饰样样兼通，供奉太上老君为祖师。

皮毛匠：于秃子，皮揉，皮制，皮衣制做良好，供奉关云长为祖师。

黑皮匠：赵和，家传，制做皮绳索，套缨子，车马用的绳索，供奉白旦右佛为祖师。

鞋匠：刘老九，皮鞋、布鞋、钉纳、制做。供孙武为祖师。

染匠：刘布套。刘二老好，各种颜色，都能调染。供义仙为祖师。

豆腐清水行：陈满良，豆腐能“以线提拿”堪称绝妙。供奉清水仙翁为祖师。

裁缝：张风英，剪裁旗袍、马褂、背心旧式衣服。

画匠：魏拴虎，能画庙宇公案，泥塑佛像、做纸货等，供吴道子为祖师。

屠宰行：袁小秃，以宰杀大牲畜为主；肖聋子，宰杀和卤肉为上，兼杀猪羊，供关公为祖师。

饭馆：邵桂林，以做稍美和炒菜闻名邻村，供关公为祖师。

糕点行：李四，康虎挠，粗细八件，均能制做，手艺精良。供介文皇帝为祖师。

理发师：陈德方，剃光头驰名。供罗增为祖师。

药铺：赵效先、贾六十五、陈玉良、侯宝山、高振国，各有所长，供孙思邈为祖师。

鼓匠：李长有、李四领班。婚丧嫁娶都要被聘演奏，供狼神为祖师。

柳匠：张长命，以编制箩筐、早午用的车篷为主。供鲁班为祖师。

笊箩匠：贾三宝同，以制箩、蒸笼、棚子为主。手艺很高，邻村上下很有声誉。

“鞭杆子”：以霍四最早，后继有李四，专以抬埋死人为业，供奉狼神为祖师。

粉匠：杜九旺、王三员外，制作粉条、粉面为主，行业兴旺，民不可缺，供奉清水仙翁为祖师。

醋酱业：张崇金，以酿造醋酱为主。供清水仙翁为祖师。

酒头：石十猫人称酒大师傅，创誉鄂尔格逊，供杜康为祖师。

油匠：(亦称油头)周志丑，炒蒸火候协调，出油量大。供油仙为祖师。

麻绳匠：李老子，制套绳、车索绳，单索子为主。供玉皇大帝为祖师。

陆陈行：以加工、卖粮油为主。供财神。也称粮行。

货郎子、收破烂、糖匠、八股劲(筋)、……都在百货行内，也属七十二行之列。

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剿匪和抗日几事

李中秀供稿 李文整理

一九三一年，傅作义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同年又颁任绥远省政府主席，遂成为绥远省的军政长官。但在他上任之初，面临着一个生产凋敝，盗匪横行、社会秩序不安、天灾人祸接踵的破败局面。这且不说，更有甚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九·一八”以后，把侵华军事矛头又指向我华北平津一带，也日渐向着察、绥而来！面临着这一险恶形势，当年的傅作义先生便采取了大力剿匪清乡，以保证社会治安和积极抗日御侮为国守土保边的爱国爱民的态度。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战之前的六年间，傅无论在政治上的治理绥省，和在军事上的抗击日寇，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为时人所称颂。今将所知所闻历述如下。

一、剿匪清乡

自民国变乱以来，到处出现土匪，侵害地方百姓。绥远境内，土匪更为猖獗，大、小匪伙有好几十股。较早的有民国七年，绥东兴和县一带的匪伙卢占魁等众，共有结拜弟兄十人：卢占魁、苏雨生、三大人、白玉、小状元、赵有录、白高旦、高四

修脚、搓澡、说书、戏剧亦在其中。

在旧社会里，人有上、中、下，行业有贵贱之分。分成三教、九流。解放后随着思想意识观念的改变，各行各业，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别，更没有什么贵贱之分，都是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虎、李生金、何山等，俱为匪首，大都是绥东丰镇县、兴和县人，他们勾结起来，为非作歹，成为当地的祸患。当时丰镇、兴和县共有十一个区，每区有区兵三十余名，也有枪支。卢占魁等歹徒相约，用暴动的手段，沟通各区兵营里的人，同时动手，抢夺了十一个区的武装，枪支弹药都被掠去，随即混了一群有一千多人马的大股匪帮，地方官兵无力除灭。后来奉军占据绥远，卢匪归附奉军。但终因匪性不改，遂被杀。

卢占魁以后，又有王英、杨猴小、赵半吊、苏美龙等匪首，率众搔扰，为患一方。在民国二十年前后，这些土匪的势力很大，从察绥等省到宁夏甘肃，均为他们活动之地；在绥远境内，东至武川，更是土匪们经常出没窜扰的地方。真是弄得路断人清，鸡犬不宁。……

匪患的形成，究其原因是由于那时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战争连年不息，造成散兵游勇流窜，枪支弹药乱扔的状况。再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即所谓“民国十八年”，绥东和察哈尔地面，二年没有落雨，寸草不收，积成大旱。当时的粮食价格很高，一块银元仅能买到白面七斤、买小米拾斤。穷人无钱买粮，只好向财主们借钱借粮过活，背上很重的债务。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卖妻卖女，饿死者甚多。有些青壮年，苟图衣食，就结伴当了土匪。因而绥远省那时土匪成群，民不聊生。

傅上任后，视察了绥远的民情，制定了治理绥远的规划。头一条就是剿匪。明令告示：凡本人身为土匪者、或是与土匪勾结、替土匪办事者，均系土匪，如主动缴枪投诚、悔过自新者，既往不咎。若抗拒政府、继续为匪者，一旦查获，都处死刑。先以此令布告四方，震慑匪徒，安抚民心。遂选派部将，进行剿肃。记得绥东一带，是董其武去的。董其武率领所辖四三六团屯驻兴和县三瑞里村。其部与匪股日夜战斗，不停追歼匪敌。经过

二年时间，当地的土匪均被击溃，少数潜逃，大多数被捉获处决了。至一九三三年，绥远境内的匪患基本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董其武因杀法严厉，绥东民众称颂其功而诰称其为“董肉铺”云。

绥远自清乡工作结束，地方面貌便逐渐呈现出新的景象。城镇里原来倒闭停业的商号又恢复经营，也陆续新添了各样的商铺货栈。城市的工商业户联合成立起商务会，以求繁荣经济。地方上还出现社会福利性的活动，比如“万字会”的救济会有时也发放一些物品给贫穷的人家。在农村，再不像以前那样村庄破烂不堪，村民四处逃散了。逃亡的农民都返回家园，重新收拾房院，务养庄田。可遇那几年又是风调雨顺，年景很好，吃的又便宜了，这时一元银币可买白面一百斤。从一九三三年到“七·七”事变以前，确实比较太平了几年。

二、推行乡政建设

傅作义治理绥远省，欲从乡村建设做起。他于一九三四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了“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傅亲兼主任。决定培训乡政建设干部，结业后由省里分配到各县、乡去实施乡建工作。一九三五年开始，分期分批训练“乡村工作指导员”，先后共训练“乡指导员”一千二百多人，分配到了各地去执行任务。按“乡建会”的体制，由省到县，由县到乡，各级政权中，都由乡建指导人员掌权，乡建人员在县里的称为“干事”，在区、乡级的称为“指导员”。乡建工作提出“教、养、卫”〔附注：“教、养、卫”徽章为枪杆、锄杆、笔杆三样联在一起的象征图案〕三位一体的口号，傅的宗旨，是想通过这一途径，改造旧农村，实行乡村新政，以富强绥远省，巩固他的统治基础。但由于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天主教堂的势力很大，乡建会的工作，往往不能顺利推行。当时的人民群众，由于思想封建保守、生活习惯落后，接受新的改革也较迟钝。有的地方还曾给

这一工作编了一套顺口溜，说：“傅作义，胡毡闹，撤了区兵放五道，放下五道不盖庙，钻在村里瞎胡闹。”慢慢地，人们也扭转了看法，局面也向前推进了一步。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这一工作即告停止。

三、参加长城抗战

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接着又向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进军，威胁北平。国民党一部分军队，已在长城诸口抗击日军，但战况紧急。傅作义乃请纓蒋介石、阎锡山，要求出兵开赴长城抗日。傅得到蒋、阎许可后，即率三十五军从绥远到昌平、怀柔一带接应抗敌。在傅军到来之前，何应钦指挥的战斗节节失利，待傅军赶到阵线后，与敌交战，持续很长时间，不分胜负，而何应钦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缓兵不战，与日军妥协，悄悄地订了《塘沽协定》，通知傅作义停战后撤。傅作义返太原将战况汇报于阎锡山，于六月二十八日率部撤回绥远。路经张家口时，冯玉祥在张家口也正组织抗日，对傅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甚是称赞，冯以老将帅身份亲赴车站欢迎傅作义军队得胜而归，市内人民男女老幼拥满了街头，沿街摆设着香茶水果糕点，热烈欢迎傅军，鼓掌与呼口号不绝。其它慰劳品也极多。各界代表人士持着锦旗、幅联相赠，有的写着“气壮山河”、有的写着“为国干城”等语，都对傅作义三十五军的战功表示赞颂！三十五军官兵多数是绥远子弟，一路上兴高彩烈地回到了绥远家乡。

在傅抗战东去后，绥远有留守司令掌握军政。阎锡山的嫡系王靖国驻防包头，一时修衙门、盖公馆，宣扬傅作义不回绥远了，王靖国将主政绥远。民众听见这话，更是盼望傅主席赶快回绥，直至见到三十五军又开回来，大家才安下了心！

四、组建国民兵常备队

一九三三年日寇占据热河后，又逐步蚕食，使察北六县相继沦陷。如察北的商都、尚义二县即与绥东接壤，日寇再图东进，

铁蹄便伸向绥远。这点，傅作义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就采取积极防备措施。先是在绥东边境的陶林县（今乌盟察右中旗）和兴和县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在长达四百华里的防线上，根据地形状况，修有战壕、碉堡、防空洞、交通沟、鹿角障碍、铁丝网、各种重武器掩体。在全体官兵和民众的配合协助下，经过一年的时间全部完成了这一阵地工事建筑，该工程浩大宏伟，确实可观。

在加紧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傅更是十分注意积蓄粮食，以备抗战之军需。此外，就是大力训练壮丁。一九三六年，归绥成立壮丁训练班，地址在小教场，袁庆曾为教导主任，下设五个大队。训练的人员由各个县轮派，以中等生活家庭的子弟为受训的主要对象。每期四个月，一期训练三千人，以军事训练为主。毕业后回到各县去，协助乡建人员再训练本乡的壮丁。这样，全省在抗战爆发前，已训练出壮丁十万人之众。后来，各县壮丁中的骨干人员，上面配给枪支，称为“国民兵常备队”。傅作义的意图，即是一旦日寇侵犯绥远，战争打响，此即是广泛的兵源。若打开游击战，各地便可组织自卫。我是第二期壮丁，四个月毕业后在兴和县常备队当文书。后来确实也配合正规军参加过战。此事在下文中交代。

五、绥远抗战，誉满全国

在一九三六年的冬季，日寇果然对绥远发动了进攻，傅作义便奋起抗战，痛击了日寇，成为全面抗战的先声！

先是，日关东军派遣伪蒙古军第一军李守信部，由察北之尚义县向绥远之兴和县进攻；另一路是命王英的“大汉义军”，由商都向陶林红格尔图进攻。红格尔图是绥远的大门，有战略意义，西可与战略要地百灵庙接成一线。王英一听攻击目标叫作“红格尔图”，得意地说：王英是“鹰”，红格尔图是“兔”，鹰定可以捉兔。但傅早已定好作战部署。俗语云，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敌人装备超过了我们，人数也比我军多，

但我军的官兵都受过严格的训练，有精良的军事素质，作战能力远胜于敌军。伪军指挥官王英，率领其部张万庆，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安华亭、王子修等共两万余人，后部有日本皇军为援，由商都出动向红格尔图猛攻，我方利用早已做好的防御工事，官兵英勇阻击。激战数十天，由于我军防守严密，敌人屡攻不胜，死伤惨重，终于撤退商都化德而去。另一路的李守信伪蒙军由尚义县向西六十华里的兴和县扑面而来。兴和县守军是傅军董其武部四二六团，时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军也出动飞机，每日侦察轰炸扫射，装甲坦克在地面突击。虽然敌人以重兵攻城，但因我军有坚固的工事，又加以强有力地抵抗，故我方军民没有很大损失。兴和县固守在我军手中。有一天，董其武决定出动向尚义县反攻，派我们常备队为先头部队搜索前进。我那时在常备队当上士文书，参加了这一行动。记得是由城关镇范指导员带队，全队人员三十几名，分成三个小分队，那天是夜间行军，按照上面吩咐，我们搜索前进。走出离兴和县城三十华里的打尖沟村，正遇敌人的宿营地在那儿，敌人先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便还击。我们只有三十余人，又没有好武器，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这时董其武的大部队赶到了，接应我们突围出来。敌人也没敢追击，但互相又开枪射击乱打了一阵，我们一边射击，一边掩护，蛇蜕皮式往回撤退。我们基本是跑步速度，约三小时工夫，全部返回县城，没受损失。只有常备队的一名分队长，叫张佃宏，年令较大，撤退时是跑步行军，返回时吐血而亡。此后兴和县又被日伪军攻打十几天，日伪不得胜，双方便按兵不动，各守其地，绥东战局暂告停息。

不久，敌人用大批汽车由后方绕过红格尔图，向百灵庙运送军用品，给养武器弹药，又派遣伪蒙古军骑七师驻守百灵庙。百灵庙在绥远正北边防，日寇侵华，把百灵庙视作战略要冲，作为它进犯绥包河套以及西北各省的根据地。而且，伪蒙德王的“蒙

政会”也设在百灵庙，所以日寇对百灵庙非常重视，又调王英部金宪章、石玉山两个旅进驻百灵庙，配合伪蒙军骑七师（师长穆克登宝，又名长胡子）这一支蒙古军中的劲旅防守百灵庙大营。日寇又派日系军官二百余名，担任伪军各部指挥官。因为日方也估计到傅作义对百灵庙要争夺，因此这样重兵防守。

傅作义在进攻百灵庙之前，曾秘派便衣扮作商人侦察过地形和敌军情况，在出兵袭击前故意装作没有一点行军打仗的动态以迷惑敌特，使敌人未做战斗准备。进袭之日，傅派孙长胜骑兵旅、孙兰峰步兵旅（乘汽车）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向百灵庙进发。归绥距百灵庙三百华里，天不亮已达目的地。待稍布阵容后，突然一声号令，火力齐发，向敌军猛攻，敌方措手不及，慌忙应战。经一天一夜激烈战斗，傅军收复了百灵庙。是时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傅作义先生自一九三一年主政绥远，作为国家边疆大员，勤政保民，安定社会、治绩斐然！一九三三年日寇犯我长城，傅主动请缨，率部赴难，克敌有功。迨日寇侵华气焰嚣张、威逼疆土，傅则置蒋不抵抗训令于不顾，奋起抗日，守土保边。绥远抗战，威震中外，傅公名垂青史、功在国家。此斯人所以为念也夫！

（本文作者系郊区政协委员）

抗日战争中的赵炽昌

郭耀宗

一、赵氏总柜

赵炽昌，字正卿，原绥远省包头市第三区黑柳子村人（现归巴盟乌拉特前旗），富家子弟出身，北平某大学毕业。其父赵三锁，弟兄五人，即赵大锁（早年去世）、赵二锁（抗战前去世）、赵四锁、赵五锁，还有族弟赵润锁。祖籍山西省赵城人，自幼来到包头，由赤腿穷汉给人当雇工，发展成绥西威名大震的“赵氏总柜”。我的父亲曾在赵柜当过家兵，经常给我念叨赵柜发家致富的经历。

赵二锁天资聪明，热爱水利，由渠工而渠头，开渠打坝样样精通，搞水利多年，颇有经验，全部精力都用于兴修水利，因而颇受中滩人推崇和欢迎。民国初年，垦务放地，赵二锁以多年的积蓄在中滩黑柳子置买了土地奠定基础，继而在包头西脑包置买了房院，开设粮店（陆裕行）；此后又在太和堂、蓓蓓滩置买了大量土地，扩大农业生产，城乡配合生意兴隆，加之弟兄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数年之后，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雇用很多长工，短工，赵家成了包头市第三区的大户富翁。

赵二锁继娶妻生一子名帮昌，久居西脑包掌管粮店业务。赵四锁在蓓蓓滩掌管家业，族弟赵润锁掌管太和堂家业。而黑柳子赵柜是赵家的总柜，由赵三锁掌管一切，赵五锁协理家业。赵柜每处设有“头儿”，总管农业生产。赵家总柜养着家兵（名额属

第三区民兵），即区自卫团队，每逢新区长到任，首先得拜望赵三锁，而后才能顺利开展工作。抗战前夕，赵三锁死后，全盘家业由赵二锁掌管，黑柳子总柜由赵五锁负责。赵家弟兄团结得很好，直到绥远解放还没有分家。赵氏弟兄共生子十九人，生女四人。赵焯昌系赵三锁亲生。弟兄十九人中，只培养出赵焯昌一人大学毕业。在当时的我国西北，尤其是绥远地区文化落后，人才奇缺，而赵焯昌接受过高等教育，热爱祖国，关心同事，进入了绥远省知识分子行列，参与地方政治活动，特别在绥西，渐次成了头面人物。赵焯昌所接触的人当然是地方绅士、知名人士。据我所知，他与当时绥远省的党政文教上层人物都有密切关系，如：于存浩、张清、张遐民、潘秀仁、王则鼎、牛申之、李聚五、刘效贤等，还有后套的安三、王乐愚、王乐天、李干臣等，皆是后套绅东大户。

抗战前夕，赵焯昌又在五原县境（后划归安北县）黑泥池买了土地、房院，县城买了一处院落，供其二老婆（二姨太）居住。在临河县境陕坝以南索台梁宋二圪卜也买了土地，并盖有房院。这样，从包头经中滩、五原直至陕坝，都有赵柜的土地房院，其土地数量据人说有千顷以上。一时赵氏总柜远近闻名，尽人皆知。但是，赵焯昌弟兄中，只有老四其昌和老九其昌管理家业有方，其它皆凭借老人产业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抗战开始后，赵氏家中青年男女都进后套避难，黑柳子、太和堂、藉蒙滩等地仅留下赵三锁、赵四锁、赵五锁和赵润锁分住各自领地，但因年事日高，力不从心，生产全靠各柜的“头儿”管理，家境从此逐渐败落。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赵五锁和赵三锁相继去世，黑柳子总柜失去了顶梁柱，仅留下两个老寡妇勉强支撑，除黑泥池外，喧赫一时的赵柜家业凋零空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二、起兵抗日

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大敌当前，困难当头，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救亡图存。赵炽昌抛弃了富家享乐生活，决意艰苦抗战，救国家之危亡，拯民族于水火，立即整顿了家兵，充实了武器装备，随后又收容了正在窜扰伊盟的流寇、原中滩区长王文才部的王万富、田子忠、刘占魁等部队，编成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由绥西警备司令（骑六军军长）门炳岳委任为“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支队”，赵炽昌为司令，田、王、刘各任团长，特务营长由游击军派了一位姓邓的担任。一九三八年赵炽昌又兼任了包头县长，县政府随军游击，实际上就是“抗日前线支差局”。赵炽昌眼前的唯一得力助手叫赵一恒，山西省崞县原平人，此人学识渊博，政治敏感，对当时战况相当熟悉。他与赵炽昌志同道合，消灭日寇，收复失地，完整中华，意出肺腑。每与人谈及日寇无端侵华之暴行时便恨得咬牙切齿；对于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汉奸走狗，以及在困难当头乘机大发国难财者恨之入骨。赵司令庄严忠告所属：我们决不当亡国奴，不管抗战如何艰难困苦，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坚持抗战，只要我们全国上下精诚团结，众志成城，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赤诚的爱国之心，必胜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感动了下属官兵，尤其是启蒙了我的爱国思想。当时我正值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跟随赵炽昌参军抗日，能够听到这些爱国为民的教诲，在当时确实是求之不得的。也可以说抗战初期，在绥远的地方武装抗日自卫部队中是罕见少闻的。

一九三七年秋末，日寇在包头整顿就绪后，即率汽车配有坦克部队，并有日伪蒙古军（德王李守信部）第八、九师和日伪游击部队

李根车部杂牌军配合，沿包五公路西进，向后套发动进攻。日伪蒙古军和李根车部走南路，扫荡中滩直抵蓿荻滩。而我抗战部队自进后套，立即沿西山咀退水渠以东，直至长牙店，迅速构筑防御汽车的坚强工事，北起乌拉山，南至蓿荻滩，挖有三道品字形的陷坑，每道长约百米，每道间距约二华里，由绥远游击军步兵伏其战沟内，并附有战车防御炮和重武器，阻击消灭敌人。我主力骑七师（俗称铁帽子军）布置于密林深处，同时配有安华亭的新五旅和赵炽昌部民众自卫军作前导。蓿荻滩东西约七十多里，南至河畔北至套路（包五公路）全是密林，其中有开垦种地村落十几处，间有从白金堡开口至三岔口的三湖河通过其间，这道弯曲不正的三湖河长达二百多里，到中滩中部又从三湖河各开支渠，南边名叫垦务大渠，直达三岔口入黄河；北边又开一渠名公济渠，直通现在全巴图乡土黑麻潭。此外尚有无数的南北支渠纵横交错，这种错综复杂的地形，敌人依靠地图，当然不如我们当地人熟悉。敌人一进入蓿荻密林，简直辨不出东南西北，机械化部队根本用不上，只有骑兵最适宜活动，这正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据守在西山咀至长牙店一线的我绥远游击军，在每道防线的坑道后均筑有战沟并沿乌拉山东西之线也筑有工事，部队伏其内，敌人机械化部队虽有强大的轻重火力猛攻直扑，但进至我陷坑（上有伪装）纷纷掉入坑内，拼命挣扎不能出去，即便冲过头道也难过二道，经我军正攻侧打，沿山伏兵居高临下猛烈还击颇为应手，一场恶战至晚，敌人已溃不成军，除遗弃坑道内的军车和尸首外，余者狼狈逃窜。已陷入我军分割包围于蓿荻密林中的日伪蒙古军，因受蓿荻密林限制施展不开，我正面守军发起猛追，日寇仓皇东逃。而我南线守军也于同时发起猛攻，日伪蒙军各点，早为我赵炽昌部侦知详情，分领各路主力，分割包围，敌人指挥不灵，不能互相支援，特别是地理生疏不辨东西，一露面即被我军击毙或捕获，我军反攻得力，集中火力逐点消灭，战斗异常

激烈，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只杀的日伪蒙古军晕头转向，只顾夺路窜逃，而李根车部见势不妙，无心恋战，早已逃之夭夭，因而该部损失不大。损失特大的是日伪蒙古军，横尸遍野，遗弃武器弹药军车辎重遍地都有，这一战的确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此再也不敢西进一步。敌人机械化部队撤退包头，留日伪蒙古军和李根车等残部退出蓿荻滩，据守划子补隆南北一线整顿据守。

这一仗打完后，我军在蓿荻滩仅留下骑七师朱巨林的十九团和安华亭旅，以及赵炽昌的抗日自卫军。骑七师主力二十团、二十一团由师长率领转赴后山攻打大余太去了。在日伪军退出蓿荻滩之际，日伪李根车部第三团，由曲步霄率领乘机反正，与我赵炽昌部合兵一处共同抗日。因曲乃黄埔四期学生，上级任命曲为司令，赵为副司令，整顿军队严阵以待。

一九三八年初春，我前线部队奉命反攻驻守中滩之敌伪军，以安华亭步兵为主力，攻取划子补隆之日伪蒙古军，骑七师朱巨林团为侧翼，以曲、赵部攻取李根车部，同时发起猛攻，蒙古军企图顽抗固守，猛烈还击，战斗十分激烈。但因日伪蒙古军在蓿荻滩一战损失惨重，尚未恢复元气，官兵遇我强攻猛打，早已胆战心惊，不到半日，敌全线溃退，我安旅虽获全胜，但伤亡相当严重。救伤埋死清理战场，因而暂时放弃尾追。而我曲、赵部攻击李根车部得手，拼命冲杀，日伪李根车部哪里还敢恋战，便节节后退而逃。此役我军又一次大获全胜。我安旅因伤亡惨重，奉命调返后套整补。中滩前线仅留骑七师的朱巨林团和曲、赵两部驻守。驻包日军自去冬西山嘴大败返包后，一直再未出动接应伪蒙军，因而伪蒙第八、九师残部自划子补隆战败后，直退包头以东，以后去向不明。日伪蒙古军第八、九师乃蒙奸德王嫡系，蒙人多，汉人少，勇猛善战，战斗力很强，因而日寇常用以攻坚夺强。也正因这点，这支军队相当骄横，纪律也最坏，走到哪里，哪里遭殃，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此次中滩之战苦了百姓，

一场灾难浩劫，几乎血洗中滩。人民东逃西散，十室九空，土地荒芜，一片凄凉。至今老年人回忆起当年伪蒙军第八、九师的残暴行径，仍然切齿痛恨。

日伪蒙军第八、九师惨败后已溃不成军，驻包口寇复派伪蒙军十二团进驻中滩之升恒号一带以拒我军；派蒙军十六团驻守土黑麻淖。该团长陈化民，虽属蒙人，但能约束部众不让欺侮百姓，人民较为安宁些。日伪李根车部仍驻中滩，和伪蒙军十二团互相策应。李根车本人是土默川蒙人，其部属绝大多数是土默川人，军纪十分不好，其暴行仅次于第八、九师。而李部自曲步霄率其第三团反正后，现仅存三个团，其中以三罗汗团战斗力较强（副团长名叫喜喜，皆蒙名），也是李的得力助手，其参谋长名叫齐焕章，东北人，据估计可能是从日伪满洲军调来的。我军短期休整后，又发起反攻，以骑七师十九团对付伪蒙十二团，以曲、赵部攻取李根车部。李部乃乌合之众，亦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战斗经两小时后人溃东逃。攻击升恒号伪蒙十二团的我方十九团团团长朱巨林用兵得当，指挥有方，而且武器装备在当时是绥远境第一流的。朱团长布置得当，敌人外围几个据点均被我朱团围困，然后采取掏心战术，直捣敌人团指挥部，敌人企图顽抗，怎经得起我军轻重炮火齐发猛打，敌伤亡惨重，已处于被动挨打境地。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我曲、赵自卫军击溃李根车部后立即赶去增援升恒号战场，敌人本已难以招架，又遇援军，敌人指挥部顿时被我十九团攻破，敌人顾不得其外围据点，狼狈逃窜。其外围据点见团指挥部已被击溃，也纷纷抱头鼠窜，一直退回包头，再也不敢露面了。战斗结束，我十九团另有任务暂时调离中滩，整个中滩仅留曲、赵部的自卫军，继续追赶日伪李根车部。李部退至三顶帐房、吴家圪旦南北之线（北起梅力更庙南至柴脑包）占领阵地，企图顽抗。我自卫军田、王、张、刘四个团，先将三顶帐房、吴家圪旦之敌击溃后，随即向固守于梅力更庙至柴脑包

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李根车指挥部设在哈业胡同，曾令其前沿阵地坚决抵抗，不准后退一步。命令再严也制止不住其部属，零星不断从前线撤下去，声称护送伤兵，实则借机早逃。战斗持续至日落西山，敌人全线撤退，指挥部也撤向了乌兰计。拂晓前我曲、赵部已占领哈业胡同南北之线。至此中滩全部为我军收复，缴获枪马补充我军。李根车部撤到乌兰计后，因有驻守土黑麻淖日伪蒙古军十六团的支援，相互策应，暂时得以喘息。敌我双方就各自阵地相持对抗。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骑七师十九团复返中滩，协同消灭当前之敌。具体任务是：十九团围攻土黑麻淖守敌伪蒙十六团，曲、赵部攻乌兰计守敌李根车部，南北两部皆夜半接火。攻土黑麻淖之敌的十九团因地形不熟，虽集中轻重火力强攻猛打，至天亮未能攻破，且伤亡不少，攻击顿挫，少事休整后，又发起二次猛攻。据守土黑麻淖之敌也伤亡惨重，眼看支持不了将要撤退之际，敌人的包头援军一个骑兵师，附装甲汽车数辆，飞也似地蜂拥而来，我十九团处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便避开不利再找战机，立即下令后撤。敌人对我军情不摸底，也未敢追。而北线之敌经我曲、赵部突然袭击，天亮前早已溃逃。从此日伪李根车部包头以西踪迹皆无。而据守土黑麻淖之敌亦先后撤退，从此昆都仑河以西再无敌踪。伪蒙军在昆都仑召庙、前口子、新城、麻池等处，各驻守骑兵一个团，敌我双方好象是不谋而合，罢兵息战，各守疆界。我骑七师十九团奉命调返后套，紧接着曲步霄司令也调进后套，赵焜昌率田、王、刘团及司令部特务营，移驻中滩，分段设防。最东柴脑包，西驻划子补隆。从土黑麻淖东至昆都仑河无兵驻守，竟成了真空地带。

赵焜昌率领的绥西民众抗日自卫军，由此改属绥远游击军，由马秉仁（游击军司令）领导，包头中滩自日军失败节节退走后，人民才得安宁，已经逃亡他乡的民众，先后返回，重建家

园，务农经商，渐趋正常。赵部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军用粮草一律由后套供给，军械弹药由游击军司令部按需领取。军粮供应在前方第一线优待，面多米少，在后套大车几乎是八米二面。赵部在后套的起粮点，在临河头道桥，陕坝的园子渠口，扬家河的二道桥等处。因那时后套交通困难，军用汽车寥寥无几，所以拉运粮草全靠雇用民船，往返一千多公里，需很长时间，有时军粮一时接济不上，赵焜昌就将自家粮米慷慨支付，以解燃眉之急。

沿乌拉山畔原属乌拉特前旗（西公旗）的部队和旗政府，由奇俊峰率领，早已随我大军进入后套；自哈达门沟以东属乌拉特中旗，其部属由巴云英（小王爷的母亲）和司令史钦芳率领也进入后套。而西公旗东官府的鄂宝斋、西官府的色令布（郝游龙之父）、阿贵沟的大长命、洪克尔，乌不浪沟的色尔塔令以及门亥贾格气，还有中公旗平房沟的肉三秃（系绰号，名不详）等未走，他们都成为大蒙奸德王的帮凶，这些人各自手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军队，其中西官府色尔塔令属下郝五保任全胜中队队长，本人及属下多为汉人，经赵司令晓以大义率部反正，编入赵部，郝为营长。这些附日伪蒙军，经常出山，沿包五公路到附近农村扰乱，胡摊乱派，征税要粮，勒索钱财，鱼肉百姓和过往商贩，老百姓恨之入骨，纷纷请求赵焜昌司令率兵剿除，以安民生。赵焜昌应百姓要求，遂即发兵征讨，由西向东逐一扫荡，大小战斗十余次。脆弱无力的日伪蒙旗部队，怎经得大军扫荡，其主要首领东西官府、色尔格令、肉三秃等见事不妙，各带亲随，逃进包头避难，其部队均翻乌拉山向后山逃窜，我军占领上述各处据点。正当我们毁其简陋军事设施之时，突然沿包五公路自东向西开来十几辆日本军车和坦克重炮，其先头军车已过打拉亥村直奔乌兰计，企图切断我军归路。我军立即依山布阵，阻击敌人。昆都仑河以西各村居民纷纷奔向我军，我军让百姓进山躲避。敌人每到一村，十室九空，仅见部分看家老人，敌人好象疯狗一样，见

人就打。贺丑福的父亲就在那天被日寇打死。敌人下车后，徒步向我军猛扑，轻重火力集中发射，而我军以山为屏障居高临下，正好还击，弹不虚发。敌人爬山仰射，困难很大，只听我方枪声不见人影，迫使敌人不敢接近，战斗延至夕阳西下，敌人伤亡惨重，掩护伤亡，陆续后撤，上车后立即返包。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胜利返回中滩沿三湖河南岸设防据守。从此，伪蒙旗部队再也不敢随便下山欺压百姓，人民方得安居乐业。

一九三八年初夏，日寇派出十几辆汽车，沿包五公路向西武力搜索，进至张油房梁时，因地形不熟，惧怕河渠纵横交错，不敢贸然进入中滩，只派三辆军车缓缓向西搜索前进。我军前哨巡逻尖兵发现后立即快马飞报赵司令，赵焯昌从望眼境中看得清楚，立即下令进入沿河（三湖河）阵地，观其动态。正巧我游击军柴玉峰率全团赶到，与赵焯昌研究对策，决定以柴团主力（留下一个营）东去袭击张油房梁停留之敌，以赵部一个团快马绕敌背后断其归路，赵部主力和柴团一个营消灭日寇三辆军车。东西两线同时接火，拦腰切断，让敌人首尾难顾。东线敌人虽属主力，火力强硬，但因受我军前后夹击，归路已断，也无法接应西去三辆军车，两处之敌已陷入各自为战之态。由于敌人轻重火力密集发射，我军在白天很难接近汽车停留处，但天黑我军奋力猛攻，便克敌制胜。这时，东线敌人舍了西线三辆军车，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包头。而敌人西行的三辆军车至鞋匠店遭我军赵部突然袭击，仓促应战，轻重火器猛烈射击，我军虽三面包围敌人，伤亡二十多人还未接近，直至日落前敌人仍在顽抗。入夜，赵司令组织了奋勇队，浴血奋战，敌人只好放弃汽车，向北山逃窜，山边自有附日伪蒙旗部接应进山。这一仗我军缴获三辆军用汽车，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二十多支步枪，还有大批弹药食品。战斗结束后，因我部无一人会驾驶汽车，只有放火烧毁，然后复返三湖河休整。第二天，驻包司令官小岛樫森成怒，便派大

批日军，分乘十几辆军车，牵引十余门大炮，还有坦克数辆，气恨恨地沿包五公路向西扑来，要报昨日惨败之仇。当敌人到达鞋匠店后，见到的只有被烧毁的三辆军车和日寇尸体，寻找我军踪影不见。敌人越发气恼，有心过三湖河追杀我军，又怕河渠纵横，只好隔河炮轰三小时；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返回包头。

此战结束后不久，敌人又从东面调来大批伪军（即自治军），司令官叫于志谦。于志谦系失意官僚，日寇利用其招收土匪流寇，在大同组成西北联盟自治军，替日寇卖命，这也是日寇侵略我们惯用的以华制华的战略手腕。而于志谦本人亦想凭借日寇的扶植，大显身手出头露面。其军中年号既不用日寇昭和年号，又不用蒙疆的成吉思汗年号，反而窃用中华民国年号，以蛊惑人心，这和后来的大汉奸王英是一丘之貉。于部的下属以高振兴为第一师，李兆兴为第二师，夏金川为第三师。三个师的人数多少不等，估计每师约一千人左右，司令部加直属单位也不过三五百人，都是临时招收的乌合之众，各怀异心，都想借投靠日寇之机，扩充自己的实力。于部开赴绥西包头前线，派高、李二师为第一线，分驻乌兰计、土黑麻淖南北一线，距我中滩赵炽昌部仅十里左右。

双方态势及战斗经过：

赵部虽属地方武装，人数少于于部，然我赵部乡土观念很强，守土抗战保卫家乡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其一；其二，军队纪律尚好，不扰民，不害民、不欺民，军民联成一体，民众都是义务情报员，就连包头日军情况也了如指掌；其三，军队久经战场，战斗经验多，上下一心，抵抗日寇。

于志谦虽老谋深算，想以众欺寡，击溃或消灭赵部，独占中滩，也太不自量。于志谦下令高、李二师进攻中滩，驻守乌兰计的高振兴师反而借故按兵不动，静观动态。当伪李师部队从土黑麻淖出发，过段四挖堵时，一问居民，说三湖河西岸的赵炽昌部

于昨夜已全部撤走，因而李兆兴下令趟水过河尾追，岂料我赵部早已埋伏于三期河西岸各支渠内。兵法云：“凡河川战半渡而击之，可奏奇功”。赵炽昌正是采用这一战法。日伪李师见前卫渡河无阻，大胆争先过河，蜂拥趟水抢渡。我军见时机已至，一声炮响，从四面猛烈射击。已上西岸的伪李前部被我军切断，正在趟水过河的多数中弹落马，顺水漂入黄河，其后续部队见势不妙，掉头就逃。这一战我军又一次大获全胜，生俘击毙敌军一百多人。敌师长李兆兴负伤，仓皇率残部退守山羊圪堵、打不气一带。我军随后尾追，进至全巴图，伪李部又退守兰柜窑子、哈林格尔一线，此后李借口负伤，再未出兵，两下暂时停战。我军利用战斗空隙，立即展开政治攻势，以动摇伪军军心。记得有一次，赵司令命我持信面见高振兴师长，劝其反正抗日，高看信之际，我环视左右，见数名护兵侍立前后，看样子对我存有戒心。高看信毕，回头与其参谋长耳语了几句，然后返回头问我：“你来了几人？”我回答：“仅我一人。”

“这是两国交战，你单人独马竟敢前来，难道不怕生命危险？”

“咱们中国有句俗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毕竟师长你是中国人，真的能忘了祖国的安危吗？我想你绝对不会，依我想师长你暂时寄人篱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将来定会有宏图大展，为国为民之志你岂能弃之不顾？”

“你仅一人，偶遇意外，怎么办？难道你真不怕死吗？”

“生命谁人不惜，我今单人来见师长，非我个人私欲，实为抗日救国而来，虽赴汤蹈火，义不容辞，即便身死不足为惜，我抗战事业尚有四万万同胞，抗战必胜！”

高见我对答从容，谈吐自若，遂用和蔼的音调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回答十八岁。他上下打量我一番，情不自禁地自语道，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会亡；转过头和其参谋长说：“

这孩子年岁虽小，却有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但愿我国同胞皆能如此。”随即吩咐随从带我吃饭喂马，休息一会即来取回信。两小时之后，我复见高振兴师长。高说：“复信交你带回，并对你们赵司令说，我们虽不相识，但我早已闻其大名，自中日开战，他即能主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自卫军抗战守土于最前线，而且屡立战功，可喜可佩。复信中我已表明短期内以实际行动回答美意……”我说：“谢谢师长以诚相待，我按你心意原话禀告，望你保重。”我返回后向赵司令交待了去复原委。至于李兆兴处派谁去我不知情。果然未过一月，两师先后反正，和我军合兵一处，共同抗战。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委任高、李二人分别为我绥远抗日游击第一、二师师长，以下级职全然未动。不久奉命调返后套整训。此后不久，日伪于部夏金川师亦叛于而去，于志谦部便全部瓦解，于本人去向不明。

三、正式授衔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我第七集团军司令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派副军长马延守，回到绥西慰问抗战军民，借此了解绥西抗战各军情况及绥远民情。这里我附带简要说明一下傅作义将军情况。傅将军系当时绥远省主席兼陆军三十五军军长。芦沟桥事变中日开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山西，调包头驻军（晋绥军）七十师王靖国师和绥东赵承授部速返山西，紧接又调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回保山西，参加忻口和平型关保卫战，归卫立煌指挥。忻口会战尚未结束，而娘子关战事又在吃紧，阎锡山对保卫山西也失去信心，立即命令要傅作义将军（当时已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率军速返太原，军队驻扎城外，阎锡山有意退守临汾，想留一军断后。在太原最后一次高级会议上，与会者有赵戴

文、卫立煌（郝梦麟将军于平型关、忻口战场为国捐躯）、王靖国、杨谒元、孙楚、周岱、赵承授、楚溪春、傅作义等高级将领，阎锡山说明忻口和娘子关失守后太原难守，长官部暂移临汾指挥，太原城谁愿承当保卫，与会将领无人承担，唯傅作义将军激昂慷慨，请命自守，苦战六昼夜后，城破，巷战白刃肉搏，傅将军当即下令：除留我一人与城共存亡，其余一律撤走。众将士怎忍心留下傅将军而去，参谋长当机立断，说听我命令，警卫员立即保护傅将军随同全军将士立即西撤。部队越城过汾河且战且走，撤至晋西石楼、中阳等地，收容整顿，与八路军（后改十八集团军）交错驻守，八路军对傅军帮助很大，又从延安送来一批干部协助整军，傅军渐次向保德、河曲移动，经整补后部队恢复原状，已做返绥准备。一九三八年秋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组成巡回督导组来绥西前线慰问前方将士，也来中滩慰问赵炽昌部，就在升恒号召开大会。除物质奖励外，亲授赵炽昌捍卫祖国锦旗一面。此后傅将军又派总参谋袁庆曾专程赶来，慰问绥西前线将士，并做傅军回绥准备工作。蒋介石在武功召集西北各军高级将领会议后，于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傅军率三十五军（七十三师留秋林二战区长官部保卫阎锡山未带来），附炮兵二十五团（乃阎锡山拨调归傅），返回绥西进入后套，后套军民欢欣鼓舞，热烈欢迎傅主席回绥。当时驻守后套的主力军十五路军（后改十七集团军）的八十一军马鸿宾军，留其三十五师马腾蛟师和马英才骑兵旅归傅指挥，仍留后套，其余各师由马鸿宾率领回兵宁夏中宁驻防。抗战开始时，由东北渐次西来的东北挺进军，由马占山将军率领来绥（临时代理绥远省主席职务）的军队，仍由马将军率领，移驻河曲伊盟准旗一带。原后套阎锡山屯垦军归傅改编为五临警备旅，由徐子珍任旅长，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番号撤去改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朱绍良驻兰州），长官部设在五原，绥远省政府随军（五原战后一并移驻陕坝）。傅长官自入套

后，调整防务，整训军队，轮训壮丁，奖励农田水利，开展政治宣传，安定人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后套气象焕然一新。随后即在百川堡（狼山县境）组成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分期调训各部队连级以上（包括游杂部队）干部学习讨论，根据当时抗日建国纲领，研讨对日作战战略战术问题为中心内容。第一期即有赵炽昌，赵本人勤学认真，接受教育进展很快，而且本人乃知识分子，善交际，很快就被董其武将军所赏识，深受器重，建议傅长官将赵部编入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傅接受建议，将该部编为骑兵团，任赵为团长，并调回后套，驻安北县扒子补隆整训，董其武又派少校参谋为该团团副，师政治部也派政工人员协助整训。从此赵炽昌由领导地方民众武装已正式进入国家的国防野战军行列，其团长职务由国家任命，这也是他自抗战以来努力为国，抵抗外侮于抗日前线的成果。也是绥远境内由地方武装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沙场，而转入正式国防军建制的第一个人，直接受着董其武将军和傅作义将军的教育和培养。

四、包头大战

一九三九年秋后，我由一〇一师骑兵团调师属野战医院任看护班长，在董师长身旁工作。十一月中旬，奉上级密令，全军出动，昼伏夜行，奇袭包头。大军进入稽菱滩，才由师长宣布命令。我绥境部队为策应湘北战役，牵制敌人南下湖南而发动进攻包头。十二月十三日，傅作义将军在五原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了攻打包头的任务，大致是：前线指挥员由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担任，安青山团长率全团附炮兵一营为攻城部队，派王雷震、刘景新为攻城指挥官；孙指挥部设在黄草洼，游击军部埋伏在包固公路阻击打援；三十二师为攻城打援第二线；董其武师

为总预备队，随傅长官行动；骑七师和骑四师由伊盟取道萨县，任务是攻取萨县城后占领车站，然后炸毁铁路桥梁阻击归绥敌人援军；以归绥南北之游击自卫部队佯攻归绥，造成假象迷惑敌人；以李兆兴、高振兴部和王万富游击独立团等部，攻占包头飞机场后迅速占领包头车站（现包头东站），控制飞机场。一切部署就绪，原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为攻城之时，但由于我军快速行军，运动神秘，日伪外围麻池、新城、昆都仑、前口子之敌始未发觉，我前哨三十一师安青山团已于十九日夜间兵临包头城下，于是傅将军当机立断，下令改为二十日拂晓攻城，战幕就此拉开。

我一〇一师野战医院随军前进，医院医护人员各团都分配有人，我带几名回骑兵团随军工作，负责第一线伤员包扎、换药、安排担架、随时退出火线，转运后方。当我一〇一师于十九日夜到达昆都仑召时，驻扎在前口子新城的日伪蒙古军第一师一个团尚未发觉。我们当即将其团团围住。第二天天刚亮战斗打响，两小时后全部解决前口子日伪第一师一个连，并生俘团长于振胤，解除其全连武装。我听说活捉敌团长，凑热闹跑去看，只见该于团长体态魁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只是面色苍白，全身发抖。原来该团长的狐皮大衣、战刀、手枪、望远镜等均被我军搜去。被俘官兵都集中在一起，就地而坐。我正看着，忽听人喊师长来了，我扭头一看，是董其武师长乘马而来。于团长见我董师长来临，就马前跪下迎接，那时候毕竟我年幼无知，满以为师长一来，一声令下立即枪决，岂知董师长当即下马，笑容满面双手搀起于团长，并且说：“我们都是同胞手足，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你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要团结抗日，枪口对外，一致对敌，消灭日寇，收复失地……”善言安抚，并环视左右问，谁拿了团长大衣快拿来。大衣拿来后，董师长亲自给于团长披在身上，当时于团长深受感动，诚恳地对董师长说：“师长对我天高地厚，恩重如山，对我等的处理完全是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业，我于

振胤并非草木，岂能不识大体而顾个人。现新城战斗仍在进行，请师长下令停止，我这里就写信派亲随进新城面见我的副团长，立即率众举城投诚。”于团长和董师长并肩步行，边走边谈，于说：“昨天午后，接到情报，发现昆都仑河以西有中国军队，多少不明，我们估计错误，认为是中国游击杂牌地方军前来扰乱，根本不加戒备。下午我到前哨连安排后想即回城，适天色已晚，就在这里安歇，可万没想到傅长官率大军已进入包头，这样很好，从此我们再也不受亡国之苦，更可以有会为国出力了……”距离新城不远，果见城头树起白旗，城门大开，城内军民出城欢迎我军入城。董师长善言安抚，各安其业，并派几名政工人员入城安民，宣传抗日，并把缴获的武器弹药交还该部，仍留新城驻扎。军民改换旗帜，举城欢庆。我大军绕城而过，仅带于团长去见傅长官。

长官部临时指挥部设在筐罗铺窑子，傅长官着令于团长立即向日伪蒙古军开展政治宣传，争取反正抗日。我随师属骑兵团增援攻城第一线，到黄草洼天已二更，人马休息两小时后，孙兰峰师长命令我骑兵团增兵三黄号。原来是固阳日军闻包头城破，出动二十六辆军车，增援包头，适遇我予伏打援的游击军马逢辰旅拦截堵杀，战斗异常激烈，直打了半日又半夜，敌人凭借轻重火器顽强抵抗。正在此时我骑兵团赶到，赵炽昌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将敌人分割包围，切断其指挥系统。天将亮，敌人大部被歼，仅仅跑掉一辆军用汽车，到西北门又被我攻城部队俘获，我军大获全胜，敌人汽车全数被我军焚毁。早晨结束战斗后，击毙多少敌人，细情我不全知道，我仅看到被俘日寇，集中在山沟中席地而坐，游击军派兵持枪看守。我骑兵团伤亡十八人，其中有一中尉排长王二白（回族）阵亡，也是赵炽昌心爱部下，临时就在原地召开简单追悼仪式，赵炽昌痛哭失声。掩埋阵亡官兵后立即返回孙兰峰指挥部，待命行动。

我攻城部队于十九日晚夜半接近城下，二十日晨五时左右，乘敌人巡逻军车沿城外巡查灯光，我军埋伏观察，看清城外战壕、碉堡、铁丝网等障碍物，各自选择登城路线。敌人军车过后，我军立即爬城。城上守卫乃日伪蒙军，见此情景亦料定是大军登城，随问道：“你们是中国军队吗？我们欢迎你们，帮你们进城。”就这样一枪未发，大军一拥登上城头，并由伪蒙军带路直扑西北门。日寇驻有一个分队守城门，正在睡梦中，已被我军全部消灭。入城我军占领丰备仓制高点后，分路前进，直到进至前街，日寇才发觉。日寇小岛司令慌忙应战，敌我两军展开巷战。我攻城指挥所已设西北门，此时四店梁、官井梁直到瓦窑沟均为我军占领，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全城。唯我进攻东北门一带登城部队，因在城外进入护城壕后，壕深且壁陡，很难上去，即使有缺口可上之处，敌人轻重火力封锁，一时很难上城，耽误很长时间。后经我方炮轰城上守军，掩护我军登城，敌不支，全线撤退。我军大开城门，并占领召梁制高点，掩护部队前进，在后街亦与敌人展开巷战，战况进入胶着状态。敌人的机关、辎重、家属等非战斗人员及军用汽车，均已集结在富三元巷以南及火车站，已有撤退迹象。然而，派往敌后的骑七师攻取萨县，骑四师负责萨县以东断交通、毁桥梁的任务，都未能按计划完成，即过河进伊盟取道返后套而去。特别是王万富、高振兴、李兆兴等游击部队负责占领飞机场和火车站均未完成。情况是这样：王万富率其部首先乘夜进入飞机场，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摸不着头脑，便仓皇撤出，王万富不遣歼敌人，也不处理停在机场的飞机，反而打开敌人仓库，大发洋财，你争我夺，乱成一团，敌人乘机一个反扑，赶走了王万富。高、李部刚到亦随之撤退，一直退到麻池方才收住阵脚。而敌机却可肆意起落轰炸扫射我军。傅作义将军于后半夜来到孙兰峰指挥所了解战况，当即命令攻城指挥部改为“守城打援”（因傅将军已接到撤往伊盟骑七师来电），估计阻

击绥远日寇援军任务落空，当即另行布置一番，而后返回筐罗铺窑子指挥部。我骑兵团负责保卫孙指挥部，指挥部附近除特务连外，尚有七门山炮参战。天亮之后战况越见激烈。大约十点之后，敌人援兵已到，共分三路：一路由车站取道西脑包向井坪梁进攻，坦克装甲车开道，步兵随其后；一路由车站直扑转龙藏；一路进南门支援城内之敌。敌人得此生力军后，变守为攻，很快占领转龙藏，而后居高临下控制我城内之军，我军只好节节向西靠拢。我西北门内守军顽强固守。前街日寇也开始反攻，渐次向财神庙街发展，逐巷逐屋争夺。西脑包之敌攻取井坪梁后，继续攻庙坨堵等村，我军退守二道沙河东南制高点。当时敌凭借装甲汽车、大炮、坦克猛冲硬攻，更有飞机轰炸扫射，战斗十分紧张。孙兰峰下令骑兵团增援西南高地。敌人后续部队陆续蜂拥而来，直扑我孙指挥部，勇猛向前，势不可挡，已将我孙指挥部包围，并将我骑兵团和各据点步兵及城内我军切断。同时，占领转龙藏之敌，以火力控制我东北门城内外战线，其后续部队沿刘宝窑、前营子等地迅猛进攻。敌人陆空联合作战，我军已进入被动状态。在此危急紧要关头，幸有我三十二师一个团快速赶到指挥部前边与敌展开拼死血战，总算击退来袭之敌，指挥部才得安然转移。我骑兵团因受敌机和坦克威胁，不能久停，借干河沟撤至三道沙河。午后，我一〇一师一部赶到击退来敌，并命令步骑兵复夺黄草洼，接应前线各部。我当时左额受伤，血流不止，乘马也不知去向，我步行去见团长，团长命我去筐罗铺窑子指挥部并随之行动。我到指挥部时已是晚上十时左右，才觉得肚中饥饿。因为我与前线各部官兵同样，都是自十九日吃饭后再未进食，我好不容易找到点水，才勉强就水吃了点干粮。傅长官不知何时离开此地，指挥部仅留几名参谋，代表长官传达命令：1、白天因有空袭，务必坚守各自占领阵地继续战斗；2、夜晚在彻底摧毁敌人城防内外军事防御设施后，按序撤离包头；3、各师及军属骑兵团，

不能西撤，乘夜穿越敌人封锁线绕敌背后（包头以东），奇袭敌后，造成敌人错觉，掩护主力西撤。我在筐罗铺休息约两小时后，约会几人乘夜西返，到前口子时已中午，远望敌人军车数十辆滚滚而来，到新城附近与我断后部队接火，一场恶战，互有伤亡，我军顶住来追之敌，分数路继续西撤。敌人机械化离开公路施展不开，只好停车炮击扫射而已。当我们沿山西撤至大台平房沟时，日已西斜，日寇追兵也就返回包头去了。包头战役打了三天二夜，到二十二日晨结束。

五、绥西诱敌

包头会战后，我们回到五原，师部已在五原西门处驻扎，我仍回野战医院，紧靠董师长处。敌机每天飞临上空轰炸扫射，我们每天给受伤百姓换药包扎。傅长官下令全城空室清野，每院除留老弱看守家门外，年轻力壮者一律出城，下乡暂避。长官部根据敌后转来的各种情报，综合整理成册，下发各部学习研究。其内容是：敌人不断从包头增兵，从同蒲平正太线调集重兵进攻后套，企图一举歼灭傅军。册内敌情很详细，注明敌人各路陆空军的番号、代号、长官姓名、代字、代号、兵种、兵力、战斗力的强弱，指挥官能力性格，部队装备优劣，以及军车战车（坦克）装甲汽车辎重等情况。学习研讨战略战术，重新部署我军阵容，作好战前一切准备。后套此时处于空前紧张状态，军民人等都在担忧，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傅长官又下令拆毁五原城墙，城内凡能通行汽车的街道全部堵塞，重新开辟新的人马通道，每晚军队在城内演习巷战，白天防空。后套军民人心惶惶，予料不久将有一场大难降临。军民对傅长官虽绝对信赖，但面对力量强大的敌军，心中无不为之担忧。年轻幼稚的我，只知盲目恐惧，殊不

知傅长官胸有成竹，已做好了应付这场大战的一切准备。我从外形上看军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遍布全后套，五原前线仅留一〇一师驻城周围，我骑兵团驻黑塔圪塔。长官部何时离开五原我尚不知。

一九四〇年一月（农历腊月下旬），日寇分三路入侵后套。其主攻部队穿昆都仑沟经台梁大余太直取乌兰脑包；佯攻部队走乌拉山前沿包五公路直取西山咀；其助攻部队由包头过黄河，经柴磴、万兴公、西奎素，直取马七渡口进后套。据当时战报称：敌人进犯后套军车约二千余辆，上有飞机，下有坦克重炮，来势凶猛，好象是所向无敌。除日军外，还配有日伪蒙古军第八、九师；绥西联军三个师及特务团、司令部直属单位的王英部；游击师李根车部等。当时我军战报都统计其人数，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敌人的三路进攻几乎是同一时间。坚守南线的我军主力是骑六军门炳岳部的骑七师和骑四师，最前线是骑七师的朱巨林十九团，在白金堡对岸的二圪旦湾，阻击敌人军车约三百辆，血战三昼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敌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到第四日我军完成任务后奉命后撤，进入伊盟（二圪旦湾为骑七师十九团阵亡将士立有纪念碑，迄今尚存）。中线攻西山咀之敌，亦遭我埋伏步兵和一部分骑兵迎头痛击，任务完成后立即后撤。北线攻乌兰脑包之敌主力军，企图一战消灭我守军十五路军八十一军三十五师马腾蛟师（宁夏马鸿宾部）和傅军一〇一师及宁夏骑兵马英才旅。我军依险设伏痛击敌人，敌人死命争夺，陆空配合，战斗空前激烈，因而双方伤亡严重。我军坚守三昼夜，敌人终未得逞。当时我司令部正在五原城，夜晚远望乌兰脑包，硝烟弥漫。腊月二十二日司令部奉师长电令离开五原城，开往四柜（五原东北四十里），见到董师长，命令野战医院就地开设绷带所。此时医院看护长杨椿升调往团里工作，遗缺由我代理。我们包扎转运伤员，一天一夜不知过了多少，只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腊月二

十四日拂晓前，董师长命令军医处刘处长，率司令部各处人员包括野战医院，迅速撤离前线，向五原撤走，从此再也不知师长及各团去向。乌兰脑包放弃后，敌人长驱直入，进入后套。敌人以为我前线一战，彻底失败，逃之夭夭，岂知此乃是傅长官布下的口袋阵，故意诱敌深入的。

当我们司令部各处人马约一百几十人，刚到五原城北五六华里处，敌人军车已赶到五原东门外。我们利用义和大渠隐蔽前进，想去梅令庙，刚到补红（五原西北），敌人骑兵已占领。我们皆非战斗人员，只有一个步兵特务连保护。刘处长下令南去郝镜桥，刚到郝镜桥，敌人骑兵又到。我们迅速乘夜赶往蛮圪素，休息片刻，吃了些干粮，刘处长命令往南到金锈堂过黄河南岸，再用电台向师长联系。天亮后到河畔已闻马七渡口方向炮声隆隆。过河南又听到扒子补隆，向西去再听见邓存店、黄合元、既而邬家地等，到处炮声不断，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下后套全完了。我们边走边议论，这下该向何处去？我们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后边尘土飞扬，一支骑兵快马而来。走近一看，原来正是傅作义将军，他浑身尘土，在马上仅和我们道了一句辛苦，便和刘处长并马而行，低声谈话，大约十几分钟后，快马西去。我们都很关心战况和师长下落。刘处长仅透露一点情况，说敌人已按我们计划进入埋伏圈，董师长现仍在五原附近，孙师长在五原以西，袁庆荣师长在陕坝临河之间，各部队分散游击，等待命令，其它各部（除骑七师现正伊盟防守）也是如此。我们西行大约快到对岸三盛公时，从高埠处远望西面有两个大村庄，相距约有五六里。走到近处，又见架有无线电台高杆，并有国旗迎风飘扬，估计这里必有高级指挥部。这两个村庄一个叫可可木独，一个叫巴拉亥。住下以后才知这里正是长官部，各师旅非战斗人员都在此地集中。当晚休息的最痛快。第二天上午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下午集合各部人员于黄河滩，傅长官在大会上讲话。他说：

“连日来大家作战行军是很辛苦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往西再不能走一步，谁胆敢再向西走一步，可就要杀头哩！大家要晓得，敌人能进入我们后套，难道就不能尾追我们到宁夏或兰州吗？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收复后套，消灭敌人于后大套！我们要让敌人有进无回。后套就是埋葬敌人的大坟墓。现在敌人已按照我们的计划，进入包围圈内，敌人想跑也跑不了啦。我们的部队都没离开后套，你们马上过黄河返回后套，寻找各自师旅领导，作好反攻准备……”散会后饱餐夜饭。（自开战以来，军队每天的伙食全部是现成的烙饼和炒米，走到哪里，哪里就开窖，大窖数千斤，小窖数百斤，每人干粮袋装得满满的。傅长官神机妙算，这些干粮都是在奇袭包头之前，预先通令各县乡政单位做好准备的）饭后于日落前整队过河，数千人马同时行动返回后套。行前宣布今晚正是大年三十，让老百姓安稳愉快地过好年，千万不准惊扰百姓，最好鸡犬不惊，凡能绕过村庄就不进村，并不准吸烟喧哗。

过河时我们一〇一师是最前卫，记得步行至黄河正中曾有一名战士偷偷吸烟，被一位师参谋发现，他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出言不逊乃至吵嚷，师参谋忍无可忍就下令特务连把他立即枪毙，这个战士这才害了怕，他马上求饶，我们也凑过去为他求情，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当我们一过黄河踏入后套土地，心情又是一番畅快。举目遥望各村家家户户悬灯结彩，点旺火，放鞭炮，热闹非常。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当军人为国为民连年苦战沙场，真不如老百姓安闲自在欢度大年。我们离村不远即有两个便服农民上来迎接，给我们带路，绕村而过，又过一村同样如此。此地系磴口县境，没被敌人占领，没有敌情顾虑，远望临河方向大火烈焰，带路人说那是头道桥，日本人就在那里再未前进一步。日本人放火烧毁头道桥后全部撤回临河城内。后续部队各师旅单位人员也同样有人接送，并由带路人引上分头寻找各自驻地。沿

途分设这些带路人，原是傅将军早已安排妥当的。我们每日白天住宿，夜晚行军。一〇一师活动地区是在五原县境，数百里之大，并非三天两日所能找到，有时还要穿越敌人封锁线，有时又得绕大圈子，有时甚至会和敌人突然遭遇，虽从未接过火，但也受一场惊吓，因我们并非战斗人员，幸好白天是敌人天下，一到夜晚敌人便龟缩在一起不敢动，因而我们才得以顺利通过，到四寡妇坨旦住下，距百川堡不到十里，老百姓没有一个去给敌人报信。后套的军民关系犹如一家，后套的老百姓都是我军的义务侦察员和通讯员，任凭敌人派出大量特务密探，一问我军去向行踪，百姓都说没见，而敌人的行动我军却了如指掌。因此，我军在后套两个多月的行动始终未被敌人侦知。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沿途在老百姓的掩护照顾下，顺利找到了师部。董其武师长见到我们，笑容可掬地说：“这些日子你们走了好几百里路，终于找到了主力，你们辛苦了，现在敌人虽然侵入我们后套，他们已被我军分割包围，占领临河陕坝之敌已被我三十二师每夜奇袭，退回五原，百川堡以西基本为我军收复，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最后一举歼敌。”

日寇自入侵后套所向无敌，数日之内占领全后套。他们在临河陕坝等地，见老百姓就问我军行踪，老百姓异口同声说：“三十五军已向宁夏撤走，现在后套已无傅作义。”敌人得意忘形地说：“这一次可彻底消灭傅军啦，今后后套就属于我大日本皇军的啦……”敌人的确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已陷入了我包围之中。大汉奸王英更是乐得手舞足蹈，马上组织伪政权机构，企图实现其称霸后套的美梦。

六、五 原 大 捷

一九四〇年春天，正是黄河将开未开、后套各大小水渠昼消夜封、地面反浆之际，傅作义将军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亚马来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全面研究敌情。当时驻百川堡之敌已被我军击退，龟缩回五原城。日寇总指挥水川伊夫驻五原城内屯垦办事处，军队分驻消费合作社及实行小学等处，旧城驻有蒙古军一部分；其外围据点，梅令庙、新公中、蛮圪素、郝镜桥等处皆日伪蒙古军第八、九师驻守；五加河、北四柜、同义隆至乌兰脑包之间驻守伪蒙军间有日军；五原城南之南牛棋、东西田大人地、邓存庙、扒子补隆等处由日伪绥西联军王英部各师驻守，王英总部设五原城内平市官钱局；五原城东因有乌梁素海（南北百十里，东西约四十里）作屏障，没有后顾之忧，未设据点。根据敌人分布情况，我军作战计划是：主力以三十五军攻取五原新旧城及前后补红；突击队仍以三十一师安青山团长率领附五临警备旅攻取新城，以三十二师攻取旧城，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城外据点由游击军各骑兵部队解决；赵炽昌骑兵团攻取蛮圪素；新六旅和一〇一师一部在五加河北；骑六军门炳岳部骑七师攻占马七渡口；骑三师、骑四师、安华亭旅（新五旅）等部负责五原以南等处。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外围据点经不起我军的突然袭击，未经一夜，尽丢下伤亡兵员、粮秣辎重、武器弹药，拼命夺路四散奔逃。但逃到哪里，哪里都有我军拦截堵追，敌人死伤不计其数。攻城的三十一师安青山团及警备旅，由我内应人员引导，迅速包围了城内敌人各据点。敌人凭借坚强工事、强硬火力及飞机配合，顽强固守。激战两天后，敌人弹尽援绝，外围依靠屏障已

失，只好凭借坦克、装甲车之威力，分头突破缺口，冲出城外。岂料城外地面反浆，机械化完全失去作用。我军见机一阵强攻猛打，远处使用火炮轻重机枪，近处手榴弹、枪榴弹发挥作用，打得敌人丢下汽车坦克，四下奔逃。刚逃不远又进入另一层包围圈，最后全被歼灭，生还的寥寥无几。特别是我三十二师在攻取旧城战役中，袁庆荣师长负伤不下火线，更加鼓舞了战士的歼敌决心，五原虽然全歼日寇于城内外，但从俘虏和死伤官兵中遍寻日寇总指挥水川中将不见。包头日伪援兵后续部队进入后套，通过五加河时，五加河已被我军炮火打开冻冰，敌人的军车坦克不能越过五加河，防守五加河南的一〇一师隔河炮击，敌人工兵架桥均为我军炮火轰塌。最后敌人采用了残无人道的手段，威逼老百姓在前架桥，敌人随其后，致使我军无法炮击。敌人二次进入五原，发疯似的遍找水川伊夫亦未找到。晚间经我军猛烈袭击，敌人在撤退之前，施硫磺炮焚烧五原县城，狼狈退去。在五加河北之我军新六旅，掘开河堤放水淹死敌人退军无数。至此，后套大战全部结束，我军取得全线胜利。五原大捷的辉煌战果已载入我国抗战史册，名震中外。

在整个后套大战中，日伪绥西联军包括李根车部的人马，既没打过硬仗，也没损失人马。其原因是我军对王英部根本没放在眼里，围歼重点是日寇和伪蒙古军。当围攻五原时王英正住在城内平市官钱局，他不是我军围歼重点，因而得以逃出五原，由陈秉义舍命救走，退至石嘴山正遭我石玉山和安华亭部。因石、安系王英在察绥组织的日军大汗义军中的两支师旅，在当年百灵庙大战前反正归傅。现今王英兵败至此，他别无生路，便下马乞求石、安留命放行。石、安等将感情用事，不顾国家民族利害，竟然私自放过，日伪绥西联军安全退过西山咀，并保护日本顾问和日伪蒙古军第九师师长及其溃军一同安返包头。王英在主子面前成为立了大功的座上客，而石玉山、安华亭等将领却于大战结

束后被捕入狱，成了阶下囚。收复五原后的第二天，我进入五原，亲眼所睹、横尸遍地。我们赶忙将伤员简单包扎后转运后方（不管敌我伤员一律治疗），清理战场掩埋尸体等工作自有后勤和政府安排。五原大绅士全官（满族人）自认和董、傅交情尚好，没有随敌逃离五原，被我军俘获后，傅将军下令立即枪毙。日伪司令李根车被俘后押送陕坝看管。马逢辰警备司令出榜安民。从此，日寇再未敢西进一步。

现在再说水川伊夫。原来此人诡计多端，看见五原难保，便乘混乱之机化妆逃跑，身旁仅带二十余名亲随和翻译，秘密地向大余太方向窜去，中途遇我游击部队张汉三连，张汉三发现水川伊夫骑一只骆驼，边走边看地图，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把部队埋伏于隘路口，身边仅带一随从，直奔水川伊夫而来。日寇见张汉三两人均戴有日伪臂号也放松警惕。张汉三连长面见水川，伪称是日伪军，都是自己人，并说去大余太的路不通，前边有中国军队，我送你绕道去大余太。水川信以为真，跟着张汉三直到设伏之处。敌人见事不妙掉头就跑，我张连长立即开枪射击，水川从骆驼上栽下来，其二十余名随从也都成了刀下之鬼。张汉三割下水川人头，解下战刀手枪，以及其它武器弹药和机密文件，一并上交董其武师长，立下大功，晋升为团长。

七、赵 焜 昌 去 台

五原大捷后，傅长官部移驻陕坝，一〇一师驻临河县城，各团分驻临河附近，骑兵团驻临河北干召庙滩。我常去见赵焜昌。有一次我提出想趁年轻去读书深造，赵焜昌说等有机会一定成全我。我也常去陕坝，也曾看见日俘由我军翻译陪同在大街游玩参观，以后听说所有日俘除留少数有利用价值者外，其他一律送往

兰州。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到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招生广告，我报名投考被录取，当即向董师长和赵团长说明此事，得到二位的赞助，并给填写了保证书，又资助了路费，再三鼓励我努力学习。从此我离开了董、赵，去西安上军校。关于赵炽昌以后细节我不太清楚，仅从他的来信中知道，骑六军番号撤销，门炳岳军长调兰州升任骑兵总监，董其武师长升任骑兵第四军军长，赵本人升游击第二区少将副司令，仍归董其武领导，孙兰峰升暂三军军长职。又过一年，赵又来信说他承傅长官之保荐，去成都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带薪受训，接受高级军事教育。我从军校毕业后仍回三十五军，在三十二师任排长时，去陕坝见到赵炽昌，他也是刚从军校毕业返绥，在长官部当挂名高参。抗战后期我由三十二师连指导员调军部参谋处任情报组长时，董其武早已调任三十五军军长，袁庆荣师长升任骑四军军长，后来改为暂四军。我在五原又见到赵炽昌，此时赵随三十五军军部任高参，并兼任高台梁行政专员，董其武军长派我深入敌后工作，赵炽昌甚为关心我的安全，他曾亲笔给王英写信，委托对我掩护并给予支持协助。日寇投降前夕，赵炽昌出任包、固、安保安司令；日寇投降后又兼任包头守护旅旅长及炭矿管理所（相当于现在矿务局）所长职务，继而当选为包头市参议会议长、国大代表，曾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九·一九”绥远起义前夕，因对共产党政策理解不深，疑虑很大，约同张遐明、王则鼎、潘秀仁、牛申之等人，赴兰州乘飞机去台湾。因他与董其武相处年长，私人感情甚好，董老曾一再挽留，但他去心已决，只好任凭于他。他去台虽已三十多年，但其妻子儿女孙辈们现仍在包头生活得很好。

（本文作者系黄埔同学会会员退休干部）

抗日时期的二三事

宫步生

鄂尔格逊建村于乾隆年间，是萨拉齐与包头之间比较繁华的一个乡镇。这里土地肥沃，人口集中，城垒坚实，商业发达，百货食品行行俱全，日伪时期已有蒙汉人民将近三千。因它北依青山，南临黄河，附近有京包铁路公积坂车站，交通很方便。所以日寇指导官铃木，亲自坐镇，有警察署四十多名伪兵保驾，“强化治安”，控制着全乡，沙尔沁、大小巴拉盖，上合气，苗六营子等十一个自然村，都在其管辖之内。西北城门，西门，东门设有双岗，有时日本人还带上军犬巡城，就连老百姓劳动进出城门时都要亮出“良民证”，否则“耳光”上脸。尽管这样，日寇还是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大青山游击队下山抄他的老窝。

—

铛！铛！几声铜锣响后，强振精神的银文壁边走边喊：“父老们！听着：皇军有命令，大年三十晚上不准响炮，如要响炮，受罚！”铛铛！一遍又一遍锣声在清冷的晨风中回荡着……可是，几千年流传下的过春节风俗，打扫家，贴对联，糊窗户，垒旺火，挂灯笼，响鞭炮……。虽然鬼子不让响炮，可老百姓却暗中憋着一股劲，心中想道：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叭！哗啦……一阵鞭炮鞭炮声后，不一会，一阵混乱，惊慌的问话声：“不准响炮！”“哪家响的？”伪警察队的狗儿们荷枪持弹，站在西市口上问着。恰巧铃木在潘家打牌，这时急忙紧握手枪跑出来，追问警察队长替大咀：“是不是土八路的来了？”哗啦……又响起了一阵鞭炮声。“东边地打！”铃木指挥

着伪兵冲向东边，西边又响起，北边接着连三赶四地不停顿地响，闹得铃木跑遍了全村，满头大汗，也没找到一个土八路。最后，活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那儿了，可是未过三分钟，他又蹦起来，声嘶力竭地嚎叫“全城查……”于是好端端的春节，被鬼子闹得鸡飞狗跳，老百姓也就只好在这白色恐怖中熬日子了。

二

一九四一年秋，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各个省区已进入了紧要的关键阶段。一天，一个陌生人给警察署送来了一张白麻纸，上面写道：“小鄂尔格逊东南二里的任大圪旦发现四名土匪……”

“哈哈！四个！？”“全队集合！”菅大咀（伪警察队长，人们都称他菅大咀，因为他咀长得大，再加上吃喝百姓，搜刮民财厉害，至今老人们还叫他菅大咀）向伪警察狼嚎一般的发出命令。伪军持枪向小鄂尔格逊村进发。

他们来到小鄂尔格逊后，先聚集在庙院中，商讨对策。可是那些从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伪兵只狗仗人势，依靠主子为生，吓唬百姓可以，一旦到了这时他们却七咀八舌，拿不定主意了。有的喊冲锋，捉活的，有的说，干脆拉开架势……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时，从中闪出一个中等身材，秀气中露着一股奸诈之态的中年人，他就是队副贾宝山。他说：“菅队长，你不是给萨县皇军打去电话，稍等一会，两兵合一再打也不迟吧！”但是，菅队长这家伙认为“立功”机会到啦，想抢个头功，在日本人面前，露一手。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等，马上打！”说完，带上伪兵向任大圪旦冲去！叭！叭！几声枪响过后，再看菅大咀栽倒在地，脑浆崩流；贾队副呢，也跟着躺倒在地，翻滚了一会儿，成了死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民谣：

一出东门一溜东，
南军打死个菅大咀，
贾宝山往上冲，

一坨且打了个倒栽葱！

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银万山、樊巨山、贾楞山……伪军的红人“五座山”，都被打了个脑袋开花，一命呜呼！其余伪军，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素日有个游手好闲的王志平，一步迟缓，只听砰的一枪，来了个狗吃屎，也上了西天。

事后，人们才知道是韩五的队伍消灭了日伪军的五座山，捎带了个王志平。可当时人们不知道，误称为南军。

三

“五座山”死了，伪警察署乱成一锅粥。皇军发脾气，也不起一点作用，只好打气助威。安排后事，老百姓又遭了秧，埋葬这伙人的花销，棺材、装穿、鼓匠、酒席等等全让鄂尔格逊人民负担。人民群众犹如雪上加霜，度日如年了。事毕，铃木再也不敢坐镇鄂尔格逊了，他窜逃到公积坂车站的炮楼中龟缩起来。铃木胆怯退缩后，并未死心，他一方面下令强化治安，另一方面，发现可疑人立即查处。这一下子，伪警察可有了发财的机会了。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十八日，正是奶奶庙会，当时讲迷信的人为求奶奶赐福、降子生孙而来赶会的人很多。我的三叔官三这天也来了。可是当他刚进西门，便被敌人当密探抓起来了，我赶忙跑回家。只见父亲愁云满面，说是警察要五十元现大洋，才能饶过我三叔，否则按匪探论处。天呀！到那弄这五十块现大洋呢？我母亲吓得当时就病倒在炕起不来了。四处奔波，二八的利钱，向贾保借了五十元交给警察署，三叔总算得救了，可我母亲却在那年连气带愁，离开了人世，可怜她年仅二十九岁，未能享到今天的幸福。

忆绥远抗日战争三事

张崇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十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即占领了平绥铁路终点包头。

从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起，日寇将平绥和同蒲铁路沿线的日军汇集于包头。从一月三十一日兵分两路向我国西北战略要地河套地区大举进犯。其目的在于扩大敌占区，巩固绥包据点。

在河套地区驻军的中国军队，是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将军直接领导与指挥的三十五军三个师、门炳岳骑兵第七师、五临警备旅、绥远省游击军、新五旅、新骑兵三师和四师，还有宁夏马腾蛟三十五师和骑兵旅，以及河套地方团队和屯垦等武装力量。

为了配合痛歼敌寇于河套，驻甘肃固原的陆军新编第二十六师（下简称二十六师），奉兰州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令，增援河套。二十六师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陕西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爱国抗日武装力量，始称“爱国志士”，继称“陕西抗日义勇军”。曾过黄河到山西、河南与抗日部队并肩作战，抗击日寇。我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西安王曲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一营机枪一连任少尉见习排长。

我们从甘肃出发，长途行军，经宁夏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河套，师部进驻安北之西桥。这时全师换发了新式武器：步枪是比利时的，轻机枪是俄造转盘式，重机枪是金陵造马克沁式……我们到达河套后，对河套地理地形做了研究，对五原大捷也做了一翻总结：由于傅长官指挥有方，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而得人

和：河套地区，黄河在南，阴山在北，广阔平原居其中，八道大渠纵横，经纬密布而得地利；时值阳春三月，冰融水溢，黄河上涨，掘堤引水而得天时。所以五原之战取得了胜利。二十六师虽未参加五原歼敌之战，然给保卫河套增加了一支新军。在陕坝军民共庆五原抗日胜利大会的同时，欢迎二十六师远道而来增援河套，保卫河套。

一、西山咀阻击战

一九四〇年八月初，我二十六师替三十五军一〇一师西山咀下乌加河的防御任务，与西山咀之日伪军只乌加河一水之隔。我师七十六团驻芦官壕塔布木头等地，为第二战线；七十七团南起马七渡口；七十八团北起乌梁素海，中间两个团相接为第一线，师部驻扒子补隆西桥。

西山咀是乌拉山之最西端，地形居高临下，可以扼河套去包头之咽喉，为军事要地。日寇从五原败逃时占据此地。当时日伪绥西联军汉奸王英部配有日本指挥官在此驻守。乌加河是河套南北八大渠的退水河，北沿狼山而东下，入乌梁素海经西山咀流入黄河，河宽二十米，水深三米。

西山咀前沿“卧羊台”是敌方炮台，白天清晰可数，为不暴露我方行动目标，所以在夜晚十一时接清了防地。我第一次担任放排哨，带领全排战士潜伏在前沿阵地的河边芦苇丛中，掩护我军并监视敌人的动静。然而敌人已知道我方换防，为了窥探我军虚实强弱，以攻为守，竟在第二天拂晓，从我第一连与第二营六连之间的乌加河对岸潜浮过河偷袭。我军二营和我一连机枪对准敌人，等敌军临近时，数挺机枪同时扫射，敌人一片一片躺倒了。没死的敌人趴下向我军开枪射击，双方形成对峙战局。继而

我们按师部的战地计划，且战且退，敌人以为我们要败退，一直往前追赶。这就把敌人两个连装进口袋里了。上午九时许，从包头飞来一架敌机，在我们阵地上低空盘旋、扫射、投弹轰炸。接着卧羊台上的敌军用大炮向我们猛烈轰击，以掩护其过河之敌。军中有句俗语：“新兵怕打炮，老兵怕的机关枪。”首次身临大敌的我和甘肃补充的新兵确实胆怯神乱。然而经过一阵飞机、大炮轰击之后，反而倍增了歼敌的信心和勇气。上午十时许，师部令下，反攻开始，团部追击炮向敌人卧羊台炮位连发猛击，二营正面攻击前进，我一营与七十七团一营从两翼夹击。这时炮声轰鸣，硝烟滚滚，遮云蔽日、枝折树残、弹坑满地，我副营长宋英杰人称“宋傻子”，此际脱去上衣，双手持短枪，身先士卒，振臂一呼：“弟兄们冲啊！”声如巨雷，敌人闻之丧胆。我们一齐冲杀过去。敌人早已乱成一团，抱头鼠窜，自相践踏，他们逃到河边，一有机枪射击，二有河水阻挡，除了河边死下一片外，落水而亡者不计其数，泅渡而生之敌，寥寥无几。至于对岸之敌，被我机枪封锁，自顾尚且不暇，哪有还手之力。经此一战，敌人再不虎口捋须了。直到十二月底，我部换驻五原兴公中时，前线再未发生过战斗。

二、夜 袭 新 城

一九四一年春，二十六师奉傅长官命令进驻黄河南杭锦旗之桃力民。伊盟地区，地瘠民贫，交通非常不便。我师驻此，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到此半年多的时间都是连排战士轮流从临河六天一程背运米面。直到一九四二年春才调离此地，我师驻东胜县城。七十八团驻东胜以北的哈石拉川，我一营驻川北之苟心召，当时我任二连中尉排长。

日寇为了巩固包头据点，其外围萨拉齐、西山咀、固阳、大树湾都驻守着伪军。位于大树湾之东三十华里有个土围子叫新城，亦驻守着日伪军，与大树湾遥遥相应，南窥伊盟。这支伪军经常四处骚扰，到各村宰鸡杀羊、抢窃耕马，甚至欺男霸女，农民不得安全生产，并威胁着我军安全。因而我总部下令夜袭新城，挖掉敌人南视眼睛，为民除害。

胡团长指挥夜袭，并做了部署：第一营从正面南城攻入歼敌；二十一团兵分两路，从北、东城攻入歼敌；西城给敌以退路，布有伏兵围歼。进城后各连与第一营紧密配合作战，以达到歼敌之目的。恐夜间与敌人分不清楚，各战士每人右臂佩带白布条为号。战斗结束后，以火为号，在此集结，返回原地。我连长陈泽渥奉营长令，至离新城不远的一道水渠边，重布置了具体任务：令我一、二排前进，三排随后接应。我带二个班即成“人”字形散开前进。在漆黑的夜幕下，战士们悄悄地匍匐前进。离城墙不远有两道铁丝网，我令各班爆破手用大剪迅速解除障碍，继续前进。摸到城下，为不暴露目标，扑倒在地上听候命令。时值二月，寒气逼人，地上是冰冷的，身子贴着地皮，冷气直往肚皮里钻，平日厚厚的棉衣，现在好象变成了薄纸，战士们咬紧牙关打哆嗦。连长见城头没有什么动静，攻城命令一下，连登城的梯子也不要了，战士们嗖——嗖——越墙而入。我率全排战士，冲进一座敌军驻扎的大院。敌一哨兵尚朦胧地坐在院中土台上打盹。一班长敏捷地夺了枪并顺手给他口中塞了军帽，背绑了双手推向一边。二班冲进营房里，敌人还鼾声不止地睡着。这个营房是里外两屋，三盘大炕，约有三十名敌军，我们的战士十几枝枪口对准敌人，同时十来个手电筒照着敌人，我们高喊：“不许动！”。他们可能为了保全性命，谁也没敢冒险行动，这时，我们迅速地把屋里墙上挂的步枪、手榴弹，手提式机关枪全部收了。出来后，倒关了门，扔进两颗手榴弹后，返出院外与二排合

兵，搜索前进。此时枪声四起，展开了巷战。我军从东撵来一股敌军，我排给以迎头痛击之后，敌人丢下几具尸体不见了。我们再往前搜索，见一些敌人慌慌乱乱，一阵枪声过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再也找不到了。不想活着的却爬到老乡们的猪圈狗窝里了。正在这时，忽然看见南面火光冲天，连长命令原路撤出。这次战斗我军缴获了敌人的大量军用物资、枪枝弹药，只我连就缴获敌人步枪二十七枝，机枪一挺，子弹两千多发。估计敌人死伤三分之一。天明之际，我们返回原驻地，开了庆祝胜利的大会。我营还得到司令部的传令嘉奖。

三、血战王爱召

王爱召是伊克昭盟郡王旗的蒙古召庙，座落在大树湾东沙梁畔。

一九四〇年春，宁夏马鸿宾部曾驻于此，修筑较坚固的防御工事。五原战役开始，马部离此增援河套。王爱召再无部队驻守，此庙乃遭日军一炬而成为焦土。

一九四二年春，我二十六师七十八团第一营同骑兵七师夜袭新城之后的三月下旬，我一营再奉伊盟守备司令部令进驻王爱召，戒备大树湾之敌，以维护东胜之安全。当日上午我们到达王爱召后，营长宁思治分配驻地：一连驻召上未烧毁的喇嘛住房；二连驻召两侧在农村，三连驻召东新民堡附近；机枪一连随营部驻召后兰四圪卜。安排好后，四个连长同副营长观察地形并检查马部所筑的防御阵地。战士们轻松地谈此论彼。正在此无敌情观念的一瞬间，日寇的机械化部队满载着纯是鬼子的三辆汽车从包头方向飞驰而来，敌人下车后如饿狼般地向正在观察地形的营连长扑来，敌车上机枪掩护地面之敌而凶狠射击。幸有纵横交错的防御

阵地，首长和一连战士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与敌开始了战斗。我二连听到枪声，我果断地留三排选有利地形监视敌人，遂带一、二排迅速跑步增援一连。避开正面迂回敌之侧后沿沙梁而接近敌人。三连也同时接近一连，三个连与敌开展战斗。这时机枪、步枪、手榴弹轰鸣，英雄的战士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敌军先战有利，越战越败。敌军冲了几次被我军打下去之后，停了一下，指挥官喊了一声，有的双手端着带刺刀的枪，有的手提大刀冲上来了，我一连战士，跳出壕沟，迎头冲杀，短兵相接，白刃血战，杀声震天，尸横疆场，状不堪言。敌人见势不妙，不及运走所留的十七具尸体便仓惶逃去。

战斗结束，我各连俱有伤亡，唯一连惨重，阵亡三十四人。连长乔德明阵亡，营长宁思治受伤。

时虽过去四十五年了，每回忆起我在二、三连任排长时，抗日作战牺牲者尽是我陕西关中各地青壮英雄，尤其一名叫张兴义的副班长阵亡于此，其当年音容犹记，遂写“舒怀”一首，以寄哀思。

誓杀倭寇不顾身，
秦川志士丧边尘；
保家血洒晋南地，
卫国汗流豫北村。
别陕伊盟经弹雨，
出关河套入枪林；
牺牲异域埋忠骨，
今朝怀念写祭文。

（本文作者系退休老教师）

日伪时期鄂尔格逊的烟市与俱乐部

官步生

日伪统治时期，日寇除用枪炮镇压中国人民外，还用软刀子杀人，这个软刀子就是大烟。大烟给某些地方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却留下了无穷的后患。鄂尔格逊村这个塞外小镇，就是这种千百万表面繁荣的村子之一。每年鄂尔格逊乡平均耕种大烟不下十顷。由于土质肥沃，又有水车灌溉，肥料充足，烟土质量非常高。每逢烟市，各地来割洋烟的就有两千多人，再加上商号，小吃饭馆，说书等民间艺人就更加热闹了。当时这里有“四官”：官种大烟，官赌，官抽洋烟，官开窑子（妓院）。由这“四官”又带来了四害：一是赌害，官赌输穷了好端端的人家。如郭四罗每年在小斗林沁种植十亩杏树园子的收入，都要白白地扔进赌场。二是烟害，官种大烟肥了个别人家，如贾宝每年三十把刀子割大烟，成为暴发户（土改时划为地主），同时，村中三分之一的人吸大烟成瘾，结果抽的人不想劳动，为继续抽和维持生计，只好典房卖地，甚至卖老婆、卖儿女，其景真是凄惨。三是嫖害，城里出来好多卖淫窑姐，官开妓院，公开拉一些人上钩，富家子弟上嫖无所谓，可坑害了许多本地和外乡来的受苦人，受了一季苦，不得半分文。四是匪害，烟市的“繁荣”也引来了土匪的横行，认为种大烟有钱，经常来刁抢。如机关张和鄂四儿等大股土匪经常出没，闹得人心惶惶，难以安生。“夜晚闻得狗咬声，家家户户不安宁”。

顺应这种形势，村中又生出一个毒瘤——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既是“官赌”的场所，又是贩卖精神鸦片的地方，它给过一

些人以精神上的享受，而更多的却是给人以无限的辛酸眼泪。

一九四〇年深秋，绥远的武德元，选中了鄂尔格逊乡这个地方，通过日伪在萨县的特务机关中的吴习天，领了警察署的“许可证”，在鄂尔格逊乡师文英大院内开办了“俱乐部”。俱乐部一班整套人马，约有二十四名，经理姓武。俱乐部以掏宝为主，还兼管联系唱戏事宜。宝官由瞎猫（薛猫）、武经理坐高凳盯注。每天纯收入大洋一千元左右。从每天早上至上灯，有时晚上点汽灯继续赌。此外还设有“麻将”、“牌九”、“赶拾叶”等形式。虽是官赌，后面有特务吴习天撑腰，但有时也惹不起地方伪警察，也得破费点钱财。有一次，伪警班长金光耀把抱的小孩押在宝上，吓坏了坐宝的，赶紧抱起小孩，好话千万，破费许多钱财，才息了这场风波。俱乐部赌博谁赌谁倒运，因他们出九入十，加之压黑处多，所以杀人不见血，大把票子银元进了设宝局武经理一帮人的腰包。俱乐部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雨无阻，整整延续了四年半。

唱戏先由武经理请来二人台三河旦和刘登等人登台表演，他们以最低级下流的节目毒害青年和群众，如《听房》、《吃醋》、《公公稍媳妇》等剧目。他们原想活跃俱乐部，但是群众不爱看这些玩艺儿，俱乐部就另打主意，从绥远请来了晋剧茂盛班一社。

茂盛班一行四十八人，班主梁玉文，成高志（艺名 阎刀子红），跑台口的是张三楞，青衣小筱玉青，花旦筱梅梅，花脸有著名狮子黑门徒张庆云（艺名小狮子黑），文武小生李玉亭，丑角小满贵（名叫寇祥、字建祥），司鼓柱柱，操琴怀刚，真是人马齐备，班底坚实。他们演出的《法门寺》至今人们还赞不绝口。除了大年三十、初一休息两天外，每日两场，常年演出。

刁子红，嗓音宏亮，字正腔圆，表演逼真，可算得名流一派。玉青、梅梅别有风格，身段优美，细腻感人。花脸别致新

颖，脸谱动人，台步大方，真有张老阁的风度。《八义图》、《美人图》等上中下八本戏，全能开，两个月才能翻熟地（就是再演唱演过的剧目）。

班里的全体演职人员包银（即工资）由俱乐部经理全部包下，吃饭每人每顿一份饭，场面、箱管是份半饭。住处也由经理包大店，负责店费的开销。主要演员按每天演出两场计算，平均包银六块现大洋；跑龙套的，分头把六角，二把至四把四角，司鼓四块半，操琴四块，底包平均每人两块。戏班每日开支一百块。这样俱乐部的经理，每天赚钱不下六百块。经营了四年半的俱乐部，害了不少人，喝了不少血，到日寇投降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 小资料 ·

何谓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现比喻事物繁多，变化莫测。其实在古时候，“五花八门”各有所指。

“五花”指：

金菊花——比喻卖茶的女人；

木棉花——比喻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

水仙花——比喻酒楼上的歌女；

火棘花——比喻玩杂耍的人；

土中花——比喻挑夫。

“八门”是：

一门中——算命占卦之人；二门皮——卖草药的人；

三门彩——变戏法的人；四门挂——江湖卖艺人；

五门平——说书评弹者；六门团——街头卖唱的人；

七门调——搭篷扎纸的人；八门聊——高台唱戏的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驻绥远军队概述

郭耀宗

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绥远省的国民党的军队情况大体如下：

一、傅作义将军的嫡系部队

是傅将军历时多年亲手培植教育练出来的部队。该部队精粹干练，军纪严明，意志坚强，富有战斗力。傅作义将军之能够名震中外，博得抗日名将、塞上长城的美称，所依赖的就是这支军队。这支军队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勇往直前，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为人民免受日寇蹂躏立下了不朽功勋。其中以陆军第三十五军战斗力最强，其次是陆军暂编第三军和暂编第四军，以及骑兵第四师炮兵第二十五团等部。现将各部组成沿革时间概略加以说明。

陆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由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兼任。绥远地处山西省西北部，在抗战以前受晋绥主任阎锡山节制，因阎对傅怀有戒心，所以派其嫡系七十师王靖国驻守包头，赵永授军驻集宁，并在河套驻有屯垦军，以田绣章和田素梅为旅长，驻五原，挟制傅作义，阎便遥控绥远省。因而军队也称晋绥军，民间风趣地说绥远是山西的“殖民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王靖国、赵永授先后调回山西，抗战军兴，又调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去保山西，并任命傅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五军军长，参加忻口会战，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深感敌强己弱，平型关之战虽获取胜利，但坚守平型关恐难如愿，忻口战况不

利，东线娘子关战事吃紧，预感太原也将难保，拟退保临汾，在太原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想留一军以保太原为名，而实为其断后，傅将军甘愿守卫太原，在血战六昼夜后，城破巷战不利，下令转移晋西和八路军交错驻扎收容整顿。八路军给予支持和帮助，并由延安抗大调来不少各级干部，协助整顿，傅军很快恢复元气。武功会议后决定傅作义率部仍返绥远，于一九三九年二月间从晋西经河曲返回绥远西河套。五原战后扩编骑四军，董其武任军长，负责整训骑兵，任孙兰峰为暂三军长，抗战后期又扩编暂四军，袁庆荣为军长。董其武整训骑四军为新编骑兵第四师，以刘万春为师长。董其武调任三十五军军长，这是傅作义将军的直辖主力军。

二、抗战军兴留绥部队

自傅将军率主力三十五军离绥转战山西后，绥远留下的几支傅部军队，有石玉山的骑四师，金德泉的骑三师，安华亭的新编步兵第五旅和王子修的新六旅，这四部原是大汉奸王英组成的日伪大汉奸军部，在抗战前傅发动的百灵庙战役中反正归来的四支杂牌部队，属于半游击半正规的部队。抗战前夕傅将军在绥远整训的四期壮丁（民兵），组成了国民兵团共六个团，抗战开始后由绥远省总参议兼民政厅长袁庆荣曾率两个团赴山西找傅作义部，留李大超任国民兵团司令，率领四个团两个旅西撤后套后，改编为绥远游击军。

三、民众抗日自卫军

这是一支由绥远省民众自发组织的守土抗战的地方武装力

量，由张钦和、于存灏任总指挥，设有十路人马，各路人马数量不等，每路千人左右，它由绥远省各县区乡的区兵自卫队和保安警察团队组合而成。其成员成份相当复杂，一种确是内心出自爱国，他们有一颗赤诚的共赴国难救亡图存救国卫民的决心，与入侵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血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这种人在知识分子中占的比重较多；另一种是失意官僚借抗日之机，拟谋取自身进取，将来或许能够大展宏图。值此国难当头，既可武装避难，又可乘乱发财升官；再一种人是绿林好汉鲁莽英雄，他们也知道困难当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可借抗日拥众自卫，对抗官府，逞雄称霸，鱼肉百姓；还有一种是纯属土匪流寇乘机拥众，借抗日之名可以独霸一方，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哪管什么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他们所作所为是祸国殃民，帮日寇的忙。这种人在自卫军中的上中下层都有。他们的一切行为与日寇伪军没有什么区别，把军纪国法视为一纸空文。在国难当头，国家对其也是无可奈何。原因是他们的人马枪支大部是自备，而且国家也不去培训，就连起码的薪饷待遇也不供给，仅仅按月发给少量的津贴和菜金，其他人粮马料都是自打自闹，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纪律根本谈不上，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都是同时组成的抗日自卫军，为时不久，先后有火并、哗变、占山为王、独据一方。也有坚持抗战到底的，由民众自卫经过锻炼成长，进入游击队，再进入正规部队或半游击半正规部队，享受较高的待遇。各路民众抗日自卫军的首领即头面人物及活动地点是：郭淮汉（郭死后由其参谋长郭友三代之）、王有功、荀子成等在大青山一带活动，郭长清、乔汗魁等在绥南，邱明星等在绥东，李正才、刘效贤等在伊盟。在包头中滩的由区长王文才率领的一部，在包头失陷后不战而退，撤往陕北榆林附近归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属下黎明军收编，王文才任旅长寿命最短，不到半年，由其下属郅才连长夜间枪杀，部众哗变，流

寧伊盟，于一九三八年正月间，由绥西警备司令骑六军军长门炳岳收复后，归中滩抗日第二支队司令赵炽昌领导，设有田、王、刘团。他们之间王万富率部叛国投敌，跪倒在日伪王英脚下当了汉奸。其它各团随赵炽昌抗战到底，终于走上了正规，编入傅将军嫡系三十五军内。李正才部于抗战中期，部属哗变，枪杀李正才后，部众零散，有的归了蒙旗保安队，有的被毗邻部队火并。鄂友三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相机歼敌，屡立战功，先称自卫军，继称游击队，后来编为绥远保安师。

四、游杂部队

有安北县武俊峰（绅士，商会会长）组成的绥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活动地区在明暗川、高台梁、大小余太一带。抗战胜利后，并入骑四师。此外还有邬青云部、冯子明部、苏义和部、李俊峰部和李干臣部、高振兴部、于振胤部。以上这几支部队，除邬青云、苏义和、李俊峰部编入骑四师外，其他各部都于五原战后归骑四军董其武军长着手整顿，并入游击区归李作栋指挥，但由于士兵接受不了严格训练，先后流散消失。

关于蒙旅保安部队，在抗战时期大体可分东西两部，包头以东各旗保安队，属日伪蒙汉奸德王控制，包头以西乃至伊盟各旗保安部队，是属抗战阵营，东西各旗保安部队，都是为蒙古王公贵族服务，也是蒙旗的看家兵，他们不过是各守其境，自征自养，维护各自境内治安而已。有的王公贵族暗中和日伪蒙汉奸德王相勾结，脚蹬两只船。战区为了便于控制伊盟各旗及指挥驻伊盟傅军（包括榆林二十二军派驻伊盟抗日前线部队），又在东胜县组成伊盟守备军，以老军阀陈昌杰任总司令。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兵力也就是一个营左右，陈昌杰可以节制伊盟军政，曾用武力

镇压过乌审旗和鄂托克旗，乱杀无辜百姓，故伊盟人民谓之“陈屠家”。

傅作义将军自山西率三十五军返回绥西，进入河套后改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五军军长，初驻五原后迁陕坝。先着手将阎锡山在抗战以前驻守的屯垦军，选其精壮者编成两个团，徐子珍任五临警备旅旅长。该旅在绥西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很大威力，而且在五原战役中贾晏如团长为国捐躯于战场。骑四师师长石玉山、新五旅旅长安华亭二人因在五原战役中私放日伪绥西联军王英全部，而被捕入狱。骑四师师长改由王宪章担任，归骑四军董其武军长领导。增设暂编第三军。孙兰峰任军长，直辖十七师（原国民兵团，后改绥远游击军），刘万春任十七师师长。将原新五旅新六旅改为暂十师和暂十一师，分别由王雷震和王子修任师长。抗战中期，整编骑四军为暂四军，袁庆荣任军长，董其武任三十五军军长。

傅作义将军直接领导培植的以三十五军为主体，渐次先后发展了暂三军和暂四军，骑兵部队以骑四师为主体，皆为国防野战军，其干部来源：

1、原三十五军随营干校，自进河套改称第八战区干部训练团驻绥分团（简称绥干团）轮训各级干部；

2、黄埔军校毕业生和由延安抗大调来一部分干部，上中层都有，发展暂三军和暂四军干部都由三十五军抽调补充，发展骑兵，干部都由骑四师抽调补充。

下面再叙述一下抗战期间绥远客军情况：客军即非傅将军直系部队，而从外省调来绥西前线受傅指挥的部队。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日寇沿平绥铁路长驱直入，进犯绥包，绥远自傅将军率主力三十五军去山西参战，留驻绥远部队有骑三师、骑四师、新五旅等部，皆反正归傅的非正规的杂牌军和刚召集训练装备起来的四期壮丁（民兵）组成绥远省国民兵团，何谈抵御穷凶极恶

的日本侵略者！军民无主人心惶惶，正好由抗战名将马占山将军率领的东北挺进军来到绥远（军权自主），深受军民拥戴，马将军也顾全大局，自愿担起重任，临时代理绥远省主席职务。继而又有师长门炳岳率领转战千里而来的骑兵第七师（亦即中央军）来到绥包，人心稍安。门炳岳（保定军校出身，他任军长后，由十七团团长朱钺林任师长，朱调职后由西安第七分校少将科长张绍成接任。师团长、连排长中黄埔学生占优势）。所率的骑兵第七师完全是德式装备，头戴钢盔（民称铁帽军），轻重武器全是德国制造。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最强。虽然添此两支生力军，也只好放弃绥包，另行截机歼灭敌人。大军按计划先后西撤后套，门炳岳升任骑六军军长兼绥西警备司令，总辖绥境骑兵，马占山将军坐镇五原。与此同时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唯恐绥西前线有失，复命宁夏驻军第十五路军派八十一军由军长马鸿宾率领并附马英才骑兵旅，开赴抗日前线进驻河套（军权由十五路军节制），军部设在五原后又移驻临河县城指挥全局。一九三九年春，傅将军自山西回军河套后，马鸿宾军长除留该军三十五师马腾蛟师和马英才骑兵旅归傅指挥外，其军全部调回宁夏驻防中宁县。在傅将军返绥不久，马占山将军率东北挺进军移驻府谷哈拉寨等地。抗战一开始何柱国率其二军驻河曲和伊盟一带，后不详。榆林二十二军派张子英率四个骑兵支队即王伯谦、王永清、邬青云、陈秉义等骑兵支队开赴伊盟前线（军权归邓宝珊节制）。邬青云、陈秉义两部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日寇进犯我抗日前线大本营河套前夕，曾许以大汉奸王英口愿：“在日军夺取后套全歼我傅军之后，后套即交由王英统治”，而邬陈两支队立即率部投敌，归王英领导。当我傅军反攻五原全歼日寇后，邬青云立即反正，复归傅将军直接领导，而陈秉义死心踏地为日效劳，直至日寇投降后才复归傅编制。此外尚有蒙族白海风（黄埔系）原为土默特旗保安部队，抗日战争前夕，奉命调甘肃归胡

宗领导，改编、装备和训练成熟后，改为新编骑兵第三师，至抗战中期仍由白海风师长率领，复返抗日前线驻防伊盟。五原战役后，由陕西调来陆军第二十六师由师长何文鼎（黄埔系）率领来到绥西归傅指挥，抗战后期何升为六十七军军长驻防伊盟。又由南方调来炮兵第五十二团，装备精良，有克虏武远射程野炮、重炮、曲射炮，也有平射炮（战防炮）和高射炮等，全部美式装备，归傅指挥，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两支军队属中央军系，归胡宗南控制。

抗战中期军统戴笠系派高荣（萨县人）驻后套，训练出一支军队称交通警察总队，亦称别动军，人马多少不详，该部由史义亭率领，装备全部是美式，武器几乎都是自动化，战斗力很强，训练成熟后深入敌后大青山活动，后来该总队全部移交鄂友三领导。该部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尚有一支客居绥西河套五加河北同义隆一带由张砺生领导的察绥边区挺进军，张任总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张砺生亦系老军阀，资历高于傅作义。张身旁仅随带不过千人而已，以保护其总部。其它下属各部都分散在敌后绥东察北，张对其属部只不过是遥控而已。人马多少不详，各部在敌后游击无固定地区，其官兵皆地方武装和招收的土匪流寇，纪律混乱，充其量也不过是借抗日之名而倾国害民罢了。八年抗战中究竟作过什么有益于民的事，我是茫然不知。

回忆往事虽属亲历和见闻，然毕竟时隔四十五年之久，疏漏谬误之处恐所难免，谨请知情者予以纠正。

别具地方特色的井坪梁冰窖业

章 瑞 焯

自清代中叶后，大批农民从山西、陕西迁来包头屯垦种地，同时也有山西、河北等地的一些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来包头经商；自清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大水冲毁托县河口镇码头以后，西北各省经黄河水运外销的货船，便停泊在包头南海子码头再转陆路外运，使包头商业和运输业倍加繁荣。特别是到了一九二三年京包铁路通车后，更使包头成为水陆码头的交通枢纽，成为“皮毛一动百业兴”的繁华商业城市。车船辐辏，商贾云集，人口激增；饮食



开窖取冰

行业也随之兴起，茶、饭馆达五十余家；但当时饭馆尚无冷藏设备，一些食品为了保鲜防腐，只能依靠天然冰块冷冻保鲜，所以便开始有人从事窖藏天然冰块的销售业务。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便有一位北京人（姓名已失传），小名叫大理五的来包头开始经营冰窖业务。一九二一年宏庆德村（今属兴胜乡）十八岁的王明登（一九〇三至一九六七年，祖籍山西河曲，老爷爷时代迁来此村）便跟随大理五学习窖藏和保管冰块业务数年。一九二三年京包铁路通车后，王明登便为开设在

中市街的聚德成饭馆、西祥饭庄、义和轩饭馆（回民）、中兴饭馆、三复鱼店等商店窖藏和保管冰块，每年与各店订有契约。窖藏冰块所需经费、工具、材料，均由商店负责。王明登只负责组织劳力窖藏和保管冰块；规定每月为各店提供若干块冰，于是每隔数天，饭馆便派车到冰窖拉冰块。平日管冰窖仅两、三人，每人年收入折合现在人民币约壹千多元。

王明登从十八岁到六十四岁病故，一生从事冰窖业务，冰窖主要设在西北门的大水卜洞和石桥沟（过去常流泉水，但需拦坝蓄水），砸取河、湖中的冰块窖藏，也曾在黄河边的邓家营子（三水壕口）、王太汗营子以及乌梁素海窖藏冰块（后者是专为天津人开的鱼店冻鱼鲜窖藏冰块）。建国以后，有了机电井，便不再砸取河、湖中的冰块窖藏。因井水比河、湖水洁净，所制冰块也较佳且卫生。

每到三九严冬，王明登便雇用十几名临时工，在河、湖中砸取冰块，每块重约两百斤，另外再雇二十多名临时工将冰块抬入冰窖，都是计件工资，每砸一块冰或抬一块冰都是五分钱，一个工人每天可挣一、两元或两、三元不等，但劳动比较艰苦，因过去没有水靴等劳保用品，工人需整天泡在寒冷的冰水中。当时井坪村的王虎旦等人，便受雇于王明登窖藏冰块，王明登的六弟王六，也随长兄从事冰窖业数十年，长兄一九六七年病故后，才回村务农。窖藏冰块有半月或二十天便结束，因在三九天冰块冻得最坚固，入窖后不易融化。在冰窖上需复盖一尺多厚的麦秸，然后再复上一尺多厚，以减缓冰块在夏天时融化。每年窖藏的冰块少则十万斤，多时达四、五十万斤。

春天冰块出窖，一般损耗率为百分之三十，夏天冰块出窖损耗率为百分之五十，秋天冰块出窖损耗率达百分之七十，平均损耗率为百分之五十。建国后，包头成为我国新兴大工业城市，人口猛增，需冰单位也增多，冰窖藏冰量增加，越能造成阴冷小气

候，使冰块的融化损耗率相应减少。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井坪村的刘维四也曾雇用十多人，年窖藏冰块百万斤左右；五十年代初，又有井坪村的王虎旦等十多人合伙搞冰窖，年窖藏冰块四、五十万斤，到夏天便销售完，每人每年能挣四、五十元。

一九五六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井坪农业社便组织窖藏冰块的专业队伍，作为一项主要副业，每年窖藏冰块五、六百万斤，毛收入达五万元左右，使井坪的年分红大大提高，一个工值达一元多。冰窖的成本主要是劳动用工，因当时尚没有机械提水工具，仍需砸取河、湖中的天然冰块窖藏，较费工，且冰块的水质不洁净，不符合卫生要求。

一九五八年实现公社化后，井坪大队（包括西北门三个自然村）窖藏冰块仍是一项主要副业，由王虎旦负责，每年窖藏冰块增至一千七、八百万斤，因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型厂矿企业的建立，包头市又成立了昆区和青山区，冰块极为畅销，不仅供应饭馆、食堂、肉铺，而且还供应其他一些用冰单位，如“义生”冰棍厂当时尚没冷冻机，需用冰块作制冷剂生产冰棍；包头精胶厂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在生产精胶过程中，也曾需用冰块作制冷剂；包头棉纺厂则至今仍是用冰大户，印花车间每天约需二千斤冰块作制冷剂，而印染车间每当染大红色布时，每次需冰块达四、五万斤；此外医院的太平房，也常需冰块冷冻保存尸体，尤其是意外事故的死者，用冰块冷冰较多，冷冻时间也较长，有的长达十天半月。火车上的餐车，至今仍需用冰块冷冻食品。近三、四年实行企业改革和承包，使原来用冰最普遍、销售量占第一位的饭馆、肉铺，便逐渐改用电冰箱保鲜食品，现已基本不用冰块，使冰块销售量大减。包钢有时也买几吨冰块用来降温。

一九六五年以后，井坪大队被划分为西北门（东风）和井坪两个大队，但传统的冰窖业方兴未艾。两个大队的冰块销售作了

划分，西北门大队的冰块供应东河区用户，冰窖仍设在西北门，由韩贵等人经营。井坪大队的冰块供应昆区、青山区用户，仍由王虎良经营，冰窖先设在青山区，一九七八年，因地方被市里占用，又迁到茗潭附近，一九八四年，因冰窖受昆区排放的污水污染，又移到大西滩（在沙河镇西北约三里处）。两个大队每年窖藏冰块一般在七、八百万斤至一千万斤。

西北门大队生产冰块原实行大寨工，出勤一天，冬季记一个工，夏季记一点二个工，分值随每年大队的分红有高有低，一般每个工的分值在一元左右，一年一个劳力能挣四、五百个工。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冰窖由韩贵等六人承包，年窖藏冰块约八百万斤，冬季冰块入窖需雇人，打一块冰为五分，抬一块冰为一角，外加工具费、材料费、水费，总成本为一万五、六千元，卖冰块收入二万五千元左右，除去上交给大队承包费，平均每个承包者可获九百元，比实行大寨工时收入约多三分之一。冰块的销售价，卖给饭馆优惠价（因招待送冰的吃饭）每斤九厘，卖给肉铺每斤一分。

井坪大队生产冰块为计件制，打一块冰为五至六分，抬一块冰为一角，一个工可挣三、四元至五、六元。再把冰块从麻池运到茗潭包钢技校附近入窖，每块运费为五角，外加工具费、材料费、水费等，平均每块冰的成本约七角，因此冰块销售价格也略高，卖给饭馆优惠价每斤一分一厘，卖给棉纺厂每斤一分八厘，一九八七年调整为每斤二分五厘。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井坪大队冰窖业平均年纯收入为四万三千多元，年费用支出为三万九千多元（见下表），因费用支出包括付给小队的人工和车工，所以显得费用较多；一九八一年以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冰窖业由大队独自经营，每年冰窖的成本（水费、材料费、人工等费用）约九千元左右，此外给负责冰窖的、看守窖的和司机每人月工资七十元，雇临时工抬送冰块每

个工三元，每月支出管理费约四百元，全年总支出管理费近五千元，加上冰窖成本费用为一万四、五千元，全年毛收入为四万余元，纯收入约二万五、六千元。

井坪大队生产冰块支出和收入统计表

年 度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平 均
支出（元）	43951	34435	40862	41769	34937	39191
纯收入元）	45267	54312	40563	31569	46381	43614

冰窖大小不一，能藏一百二、三十万斤的冰窖，长二十米、宽十米、深七米左右（窖越深，冰块融化越少），用人挖土、抬土约需六百多个工；能藏二百三、四十万斤的冰窖，长三十五米、宽和深同前一样，需工比前者多一倍；自一九八四年以来，改用推土机挖冰窖，工效大为提高，又减轻了繁重体力劳动，仅用一个车工便可挖成冰窖；但需再稍加人工修整。

运送冰块的交通工具也随时代变化。井坪大队在五十年代初，还是个体农民，经济贫困；只能用人拉车给用户送冰块；一九五六年成立农业社以后，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才改用畜力胶车送冰块；一九六七年以后，集体经济力量壮大，同时因向昆区、青山区用户送冰块的路程远，冰块需要量又大，畜力车已不适用，所以改用手扶、四轮拖拉机运送冰块；近五、六年又改用汽车运送冰块，使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西北门大队主要向东河区的饭馆、肉铺送冰块，用冰量不大，供应点分散，路程较近，所以一直用毛驴车运送冰块。

青山村的煤炭开采业

王德昌

青山村属后营子乡，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北约十五公里，四周群山环抱，由魏君窑子、小董瓜、大董瓜、井子沟、南董瓜、皂火沟六个自然村组成，总面积约三十多平方公里。青山村的海拔高度为一千三百一十一米至一千五百三十八米，平均海拔高度是一千三百九十五点六米。其山地主要由太古代变质岩系及不同时期的花岗岩、片麻岩等组成。

包石铁路和旧包石公路从这里通过，交通比较方便。地下蕴藏着较丰富的煤炭资源，此外还有粘土、石英、长石等矿产资源。解放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历代统治者也不注意发展山区经济，所以，这里人口稀少，经济、文化、交通等都不发达，人民生活贫困。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的道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截沟垫地，发展水地，山上修筑梯田、台地，才根本扭转了世代耕种旱坡田的习惯，农业生产量也逐年提高。而且，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开采粘土和煤炭等地下资源，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同时又富裕了本地人民的生活，一九八六年农民分红每个工值二元五角。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年挣工五百个，能分红一千二百五十元。

一、历史上煤炭开发情况

井子沟煤炭开采比其他矿早，在过去历史上就有过开采。据井子沟村民七十二岁的李长发老人回忆说，在满清光绪年间，

有个叫老旋的人，他在石拐给人家下过窑，省吃俭用积下一些钱，来到井子沟自己开窑，前后干了十几年，卖煤发了财。随后包头街上有五家财主，联合开煤窑，取名“五福窑”。后来由于无法排除坑道水，窑被淹而停业。国民党时期，当时有巴丝林、康丝林、赵子昌等有钱人家联合起来开窑；聘贺罗当掌柜，又干了两三年，也没有多大改变，只好停业。

据《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代宝玺、李春峰撰写《漠南矿业有限公司的兴衰》一文记载，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日本人霸占了漠南矿业有限公司在石拐沟的煤田、矿井，喇嘛坝煤厂局被迫迁移到井子沟开办煤窑，继续营业。由于井子沟煤田的煤质不佳，容易氧化，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动，仅经营三个月就被迫停业。

从上述情况看，井子沟开窑，是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初，断断续续时断时续，全凭人工开采，开采量不大。

二、解放后小煤窑开发情况

解放后，一九五四年开始合作化，成立初级社，为了发展生产，六个村子各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先后办起了七个小煤窑。具体是：皂火沟一个，南董瓜一个，井子沟二个，大董瓜一个，小董瓜一个，魏君窑子一个。

这些小煤窑，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不供应坑木等生产资料，同时，自身也缺乏资金和技术力量。所以，只好用人力手工开采作业；生产方式是用镐刨，出煤用人背。坑道里有水，没有水泵抽水，只好用人用桶往外挑水。据当时参加过下窑采煤的人们回忆说，由于没有坑木，只好往窑里背石头，用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做矿柱用；出来时用肩膀背煤，出进时都有干的，把

人累的真够受。

七个小煤窑，总共有七十多人，年产煤一万四千吨到二万吨。每个小煤窑当时常年平均有十几个人在作业，也就是说一年四季，夏天农忙时人少些，冬季农闲时人多些，一个小窑年产煤二千吨到三千吨。

小煤窑开采持续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公社化后开始



了大炼钢铁，小窑采煤告停。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陆续地开办了起来，但公社强调“以农为主”，开始了“农业学大寨”，批判了重副轻农的思想，对小煤窑不发放营业执照，不允许小队开采

小煤窑，又使小煤窑开采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将六个核算单位的小煤窑全部收回来，由大队统一经营管理，开始了青山大队的采煤业。

乌金滚滚流 郭怀恩摄

三、青山村（大队）采煤情况

一九六九年大队收回各队核算的小煤窑后，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只准开一个矿，搞一个井口。保存开采的是才木里矿，其它井口被封停，当时有采煤工人三十多人，年产量二万多吨。

到七十年代初期，为了巩固发展采煤业，扩大再生产增加经济收入，经大队研究，决定新增加二个窑口，这样就变成了三个

窑口，分布在才木里、杨树沟和井子沟。当时为了巩固和扩大采煤业，一九七一年派出李蛇小等同志到石拐矿务局和乌达矿务局去学习采煤技术和经营管理办法。对自己的煤窑进行改进和巩固。先后在才木里矿将出煤由人担改成用小车拉，七五年又从矿务局三矿借双缸的绞车一台，安装在才木里矿，从而使煤炭的年产量提高到五万多吨。

一九七七年，又改人工开采为打眼放炮开采，绞车出煤，从而年产煤炭达到七万吨。井下作业工人达到五十人。

到八十年代，较系统地培养了矿长和各种特殊工种技术人员。如电工、绞车工、技术安全员、瓦斯安全检查员、通讯检查员等。

现在，四个矿八个井口都有通风设备和上下道进出口，坑道里的电灯，全是防爆线路和防爆开关，生产作业全都是半机械化，每天人们采煤三吨左右。有大小绞车二十五台运煤，还有二百头毛驴，以畜力代替人力，在井下巷道里运煤和在井上拉运煤炭，现在平均年产煤炭十五万吨，有采煤工人二百多人。

采煤工人统计表（表一）

时 间	地 点		
	才木里	后 坝	井子沟
六九年	35人	／	／
七十年代	50人	／	／
八十年代	50人	60人	130人

历年采煤统计表(表二)

时 间	产煤量(吨)	时 间	产煤量 (吨)
1969年	28180	1978年	53700
1970年	19815	1979年	53536
1971年	27548	1980年	90336
1972年	36678	1981年	136263
1973年	41690	1982年	131982
1974年	49532	1983年	181486
1975年	57451	1984年	186187
1976年	55264	1985年	170776
1977年	70269	1986年	139055

现在的组织管理机构健全,村委会有总管煤炭开采的负责人,下面各矿设有矿长,技术安全员,矿下设班,班内有班长,工人作业有带班班长。同时还有总安全检查员和总瓦斯检查员,负责采煤的安全生产。

为了搞好安全生产,提高采煤技术水平,一九八四年秋初,选送出青年同志共三个到内蒙古煤炭学校学习,今年夏天毕业返回工作岗位。

四、煤炭运销情况

在发展采煤生产的同时,大抓了运输业,实行采运一条龙生

产方式，为顾主送煤。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养车，先是自己装配的一台“土”汽车，第二年发展到四台“土”汽车。一九七七年买回了黄河牌汽车，以后相继买回解放牌汽车，东风牌汽车，现共有运输汽车二十八辆，拖拉机两台。

青山村煤炭生产，由小到大，由人力手工作业生产到半机械化开采，现在，年产量达到十几万吨，在乡镇企业煤炭资源开发方面居领先地位。一九七七年出席过中央煤炭部“工业学大庆”会议，并受到内蒙古煤炭管理局的表彰。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青山村采煤业多次受到乡、区、市、内蒙古的表扬和奖励，在乡镇企业发展中是一个先进单位。

青山村煤炭，大都销售在我市各级厂矿和单位，有一电厂、二电厂、二〇二厂、市燃料公司，地方厂矿单位以及市民，还有本乡附近村庄的农民。煤炭的出售价格是稳定的，几年来一直执行国家标定价格。（见表三）

煤炭销售价格表（表三）

矿 单 名	类 别 价	公 用		民 用		备 注
		混 煤 (元/吨)	备 注	混 煤 (元/吨)	块 煤 (元/吨)	
后 坝		14. ⁹⁰ _—	主要供 一、二 电厂 公用煤	15. ⁶⁰ _—	24. ⁶⁰ _—	代装
才 木 里		10. ⁹⁰ _—		14. ⁶⁰ _—	24. ⁶⁰ _—	代装
杨 树 沟		10. ⁰⁰ _—			24. ⁶⁰ _—	代装

青山村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集体统一管理煤炭开采，到现在一九八六年底，共采原煤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四吨。平均每年产煤八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吨，总收入二千二百三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四元，平均每年产煤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七百一十五元。

随着采煤业的发展，工人增加了收入，每人每月工资可达三百五十元。工人劳动保护齐全，采煤工人的安全帽、矿灯、水靴

等都有，还有洗澡池供免费洗澡。农民收入也相应增加（见前面统计数）大队村委会公共积累金和公益金逐年增加。社会福利事业逐年发展和提高，村内有小学、中学，还有电影放映剧场等文化福利设施，青山村人民，现在是少有所学，老有所养，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佛 教 的 兴 起

公元前六世纪，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印度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权贵族婆罗门，力图维护其特权地位，刹地利神权贵族日益富有，不仅要求军在政方面，而且要求在宗教方面居于最高支配地位。原始佛教兴起来了。

佛教创造人释迦牟尼（悉达多·乔答摩）相传是释迦部落首领的王子，二十九岁出家修道，经七年冥思苦索，终于大彻大悟成了“佛”。“佛”意即觉悟者。此后，他在恒河流域收了许多门徒，宣扬佛教达四十多年。佛教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认为人不需要特殊的祭祀集团的引导，依靠自己修行的办法就可得道。这种主张，对那些不满婆罗门教统治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佛教在印度广泛传播开来。

但它不反对奴隶制度，它教训教徒必须遵守法令；不主张用斗争方法改变现实生活；它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欲望，甘心忍受剥削压迫之苦，以求将来“灵魂”进入“极乐世界”。这种用“来世”享福或“死后”享乐的谎言麻痹人民思想，瓦解人民斗志的教义，恰好适应剥削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所以，佛教产生以后，很快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统治人民的工具，人民精神上的鸦片。

公元一世纪初，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

（茂林撰）

忆“九·一九”起义将领陈秉义

郭耀宗 赵喜元

流窜为匪 浪迹西北

陈秉义，字永昌，伊盟达旗人。陈自幼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上学。少年时，曾随父进到煤窑背炭，也做过短工。青年时，正处在中国最黑暗之时，那时军阀割据，混战不息，匪患遍地，赋役苛重，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十八岁的陈秉义忍受不了兵灾人祸，赌气离家出走，加入匪患集团，跟随赵青山（外号赵半吊子）当了护兵。

民国十八年，赵半吊子率众窜入后套作乱，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他们用“请财神”的手段，索取钱财，危害人民。这股匪徒遭到五原护路队的围剿，赵半吊子在五原县境被击毙，余众则由杨耀峰（外号叫杨猴小子）统领，分廉存良、徐文标、小吕（名不详）三团，杨耀峰自称为旅长。这时，陈秉义已升为连长。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攻打宁夏时，杨猴小率众打头阵，不久，四十一军失败，杨猴小仍当土匪到处流窜。这时，王英在察哈尔以北组织“日伪大汗义军”，杨猴小欲去投靠王英，在途中遭到绥东赵承授军和察省刘汝明军的围剿，只好返回绥远活动，而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全力剿匪，根本没有杨匪存身之地，于是，又率众西窜宁夏、陇东一带，又为甘宁军队所败，逃入陕北。据说，杨猴小在陕北定边附近的洛阳桥被护兵走火击毙。群匪无首，于是各带一股窜扰伊盟。这时，陈秉义带领一股

匪徒，自称团长，旋即遭到驻守陕北榆林的二十二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陈秉义明降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改编为“骑兵第四支队”，陈秉义任支队长。骑兵第四支队辖三个分队：第一分队王伯谋，第二分队王永清，第三分队邬青云。此后，八十六师归张子英指挥，驻防榆林，就地整训。陈秉义结束了土匪生涯，走上了正规。

抗击日寇 保国守土

改编以后，陈秉义一面整饬部队，加紧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素质，另一方面还广集人才，礼贤下士，先后有卫兆铭、侯云亭、金城云等人来投，负责军事训练。几年之后，陈秉义的“骑兵第四支队”成为绥远地区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劲旅。

芦沟桥“七·七”事变以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寇沿平绥铁路西进，在德王和李守信的日伪蒙古军配合下相继占领张家口、大同、绥远，十月十七日攻占包头。

一九三八年春，榆林二十二军派张子英率领各骑兵支队（还有一部步兵）开赴抗日前线，进入达旗，分段驻守，阻击敌人南侵。陈秉义率骑兵第四支队驻守在东西社、大小淖、新城、三分子、五福社、永隆泉、南红雀等地，相机消灭敌人。与此同时，敌人也在黄河以南沿河村庄派兵防守。在河南驻守的主要是日伪达拉特旗部队、日伪蒙古军第六师之一部、日伪地方警察和地方民团，日寇则在柴磴、大树湾、树林召等地各驻一个中队，控制各附日伪军，相互策应、对付我军。

驻守达旗的抗日部队中，骑兵第四支队的战斗力最强，他们经常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战果比较辉煌。我回忆起的有如下战役：一九三八年春天，在二锁圪梁的一次战斗，骑兵四支队出奇不意，一战成功，全歼驻守在该地的日伪达旗蒙古部队满四

团，生俘满四团团长；又在小洋歼灭教堂民团百余人，所获枪支弹药充实了自己；同年，率部过黄河骚扰敌人，并奇袭大城西，全歼日伪军张文标部的第二团，生俘团长魏总义（外号魏结克）副旅长张志祥副官长李汉三等人，任务完成后，返回原地休整。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陈又率部过河进入萨县境内，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据点。日寇调集力量在日伪军配合下，将陈四支队围困于萨县以南的一个小村庄，战斗打的异常激烈，伤亡也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陈秉义下令撤退，但是旧路已被敌人切断，陈四支队便从敌人背后进入大青山，然后绕道归绥，察素齐，陶思浩，何家圈，大岱，渡过黄河，安返原地。就这样，陈四支队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军威大振。

屡次遭到袭击，敌人对陈四支队恨之入骨决定报复。敌人从萨县，包头调集日军五百多人，日伪蒙古军第六师的一个团，合力围攻驻扎在新城的陈四支队，企图一举全歼。陈秉义一面通报敌情，另一方面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集合官兵做了动员，号召大家抗日救国，守土保家，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官兵一致表示要浴血奋战，誓与新城共存亡。陈秉义将战斗任务分配到各连队，还抽调大量的预备队准备策应，并派陈宝山率步兵进入城外战壕，阻击敌人。刚刚部署就绪，敌人便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敌人的轻重火力，猛烈扫射，炮兵也集中向城中打炮，霎时，尘土飞扬，烟火弥漫。城内军民虽有伤亡毕竟是居高临下，容易发挥火力优势，敌人伤亡惨重，城墙曾被炸开几个缺口，迅速又用沙袋堵住。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敌人没有讨得半点便宜，于是，日寇下令强攻登城。在城外战壕边，陈宝山连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情况相当危急，陈秉义当机立断，命令陈三庚连乘夜突围。突围部队绕到敌人后面，袭击了敌人的指挥部和汽车辎重，攻城之敌顿挫，纷纷后退。待敌人重整旗鼓，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时，又遭到鄂青云支队从侧翼的袭击，新城始终牢固地掌握在陈四支队

手中。拂晓前，我二十二军张子英率步兵进入新城，接替陈秉义部转移休整。陈四支队撤离后，新城战事继续进行。

抗战初期，陈秉义勇敢善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坚持抗战，守土保家，这一段的成绩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投靠王英 充当汉奸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沿平绥线西进，据当时战报，日寇集中两千多辆汽车，兵分三路，猛攻后套，妄图消灭傅作义将军的队伍，直捣宁夏兰州。开战之前日寇利用大汉奸王英（原绥远境内大地主、大土匪头子）收罗旧部攻取后套，并默许在攻占后套后，后套地区归王英管辖。于是，王英派人四出勾串，收买了刘迷糊、张俊、李金泉、常子义四股匪众，又派人诱骗陈秉义和邬青云。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陈秉义率部投日，拜倒在王英脚下，当上了绥西联军第一师师长。从此，一个大名鼎鼎抗战有功的陈秉义，竟成了日寇侵华的帮凶了。关于陈秉义投敌，其动机不外有三：其一认为我二十二军中发展速度较慢；其二，通过投日充实装备，扩充力量；其三，称霸后套，将来向抗日阵营讨价还价，获得更多利益。

日寇进攻后套，陈秉义率部随军入套，傅作义将军主动放弃五原、临河、陕坝、安北等城，伺机歼敌。日寇进入后套，总指挥水川伊夫住在五原消费合作社，日伪王英总部设在五原平市官钱局。一九四〇年春季，傅作义将军出兵收复河套，全歼日寇于五原城乡，击毙水川伊夫于乌梁素海。在五原城，王英几乎被活捉，亏得陈秉义部拼死将他救出，向西山咀方向溃逃，当时傅军石玉山师和安华亭本是当年王英在绥军组成的日伪“大汗义军”旧部，是傅作义大破德王、李守信于百灵庙前，先将王英的“大汗义军”消灭于宏格图，上木尔台等地，石玉山、安华亭等率部反

正归附了傅军。今日王英兵败至此，适逢石玉山、安华亭把守，于是念及旧情，有意放走绥西联军。战后，傅长官逮捕石、安二人，下狱审判。王英逃过西山咀后，驻扎在中滩一带，总部设在公庙，陈秉义师驻在土黑麻淖。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王万富的叛变经过。王万富本是傅军游击独立第二团团团长，五原大捷时，王万富为保存实力，暗中与王英勾搭，不按上级布置的作战任务去阻击敌人。战后，王万富惧怕傅长官追究责任，率部投降王英，为绥西联军第二师师长（原二师师长邬青云在五原大捷中率部反正，归附傅军，驻守在中滩傅家圪堵一带。

王英所部的绥西联军驻扎在中滩一带，各部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自行委派乡政保甲，自收税收粮秣，还提倡大种洋烟。各部的收入，除一部分上缴王英，悉归己用。这一时期，陈秉义大发横财，达到顶峰。当时，人们流传这样一句话：“陈秉义的黄金白银多，王万富的洋烟土地多。”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打击下，日寇一天天走着下坡路，抗战必胜已成定局。王英、陈秉义等人也逐渐看清了这一点，为给自己留一条出路，开始逐渐心向祖国，暗中协助抗战。在绥西联军的势力范围内，我方敌后工作人员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的往返，爱国人士的过境，都是在陈秉义师长的精心安排下，派人护送的。在陈秉义师，第一团的驻地——兰桂窑子设有我方电台一部，负责人姓袁（名不祥）。第一师参谋长金程云，亦我方地工人员，在他身边常有二三人活动，因地工人员只许单线联系，明知是同行，也不知他们是哪一系统的。

一九四四年深秋，我奉傅部三十五军军长董其武亲自派遣，深入敌后工作，常住在陈师司令部驻地土黑麻淖。我的任务是侦察敌情，联络伪军，团结抗日，策应反攻。陈师长对我的工作竭力帮助。为工作方便，陈师长任命我为师属机炮连连长，我身边的

一名贴身通讯员王富，也在连内顶名，还有两名交通人员往返传递情报。沿途都没有落脚点。总部参谋处几乎都是我的团结对象。每当日寇由包头出动，他们的意图、兵力、装备情况陈师长就派金程云通知我，提高警惕，谨防意外。总之，陈师长对我等敌后工作关怀备至，因此，直至日寇投降，包萨一带的地下工作，从未发生意外事故。

率众起义 弃暗投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日皇裕仁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乞降，九月二日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败亡，日伪绥西联军的番号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该部由我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改编为第十二战区骑兵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王英及下属各师、旅官佐级职并未变动。该部由大同、丰镇失败返绥后，又改编为游击第十四总队，总队长王英。王英去北平后，由陈秉义代理。这段时期，该部盲目地奉行蒋介石的“戡乱”政策，与人民为敌。张家口溃败后返绥驻固阳，部队又改编为骑兵第十一旅，该部深悔已往错误，赞同傅作义、董其武和平起义主张，立待绥远和平起义早日实现，但是起义协议迟迟不签。陈即委派固阳县前县长石正中，取道丰镇面见杨植霖主席和姚喆司令员，要求提前起义，姚司令员给陈秉义师长复信说：“绥远的和平已成定局，协议短期必将达成，望原地驻扎待命，静候大局……”九月，傅作义由北平返绥，协助董其武迅速达成和平起义协议，于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陈秉义乃起义协定签字将领之一。“九·一九”绥远起义后，陈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骑兵第四师独立旅。一九五〇年，部队东移龙华，经过一段整训，陈秉义任副师长。一九五一年秋该师赴朝，陈秉义亦随军入朝参战。归国后，转业到河北省任水利厅参事。不久后患鼓症医治无

一九四五年冬我军阻击西军之战

杨锁贵 张芳外 口述

田茂林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包头城本应获得新生，却不料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中。

这时我党中央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收复失地的斗争，因此解放绥包的战役不久打响了。

这次战役的参加部队有：贺龙同志领导的一二〇师三个旅，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部队四个旅，还有吕正操领导的冀中部队二十七团和杨得志、粟裕部的一个团，总共二万余人，部队总指挥由聂荣臻同志担任，贺龙同志担任副总指挥，李井泉、许光达、罗瑞卿、张宗逊等同志亦为指挥成员。我大青山游击队支队的高克林、姚喆、张达志也参与指挥，并随军参加战斗。

由于整个绥远战场全面铺开，解放军不少兵力分散在各地，能集中到绥远和包头两城地区的约一万余人。

效，于一九五四年故于包头。包头市军政各界为陈秉义召开了追悼会，以表悼念。

陈秉义的一生，反反复复、坎坎坷坷，他先为上匪，后成官兵，也曾抗击日寇，也曾效忠敌人，也曾守土保国，也曾危害人民，但是在历史教训面前，他还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跟随傅作义、董其武促成绥远和平起义；解放后，又赴朝作战，载誉归来。他的这一坎坷历史，应当载入史册，启迪后人。

（本文作者均系退休干部）

敌方：绥远有傅作义部两个师，伪蒙古军两个师，还有杂牌军五千师，共二万余人；集结在包头的有三十五军一个师，鄂友三一个师，蒙古军两个师（其中有达旗保安队一一森盖部二百余人），共二万人。

我军由京包线向西挺进，在集宁把顽抗之敌五千人，围困在老虎山，全部歼灭，死尸满山遍野，这一下使集宁以西小城守敌闻风丧胆。当大军向卓资山、旗下营、卜尔合少、白塔、察素齐、萨拉齐进军时，有的守军不战而逃，有的守军虽然抗击一下，却早已布好了退路，一触即溃。我军由贺龙、李井泉率部沿大青山南麓策马西行，于十一月初浩浩荡荡到达包头。指挥部驻扎在沙尔沁召。

我军闻悉：包头由董其武亲自指挥防守，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市长王雷震任副总指挥。城内做了很久的战斗准备，工事如林，其中有钢筋水泥筑的许多碉堡，有用装有砂土的麻袋筑的不少掩体。我军到包仅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加二十七团总共不足三千人。黄厚同志在忆述时曾这样说过，我们在装备上是小米加步枪，要去对付兵力数倍于我们、并且装备几乎全是现代化的敌人，困难是很多的，但我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指战员斗志非常高昂。

战地指挥张达志同志下达了作战命令：二十七团扫西北门、官井梁、西脑包之敌，独一旅分兵专攻转龙藏高地，扫清东南方向的外围，并拿下火车站，而后一同攻城。

战斗打响了，包头城外的东、南、西、北双方机枪声，炮弹声轰鸣，烟雾迷漫，火光冲天。二十七团战斗了一天一夜，占据了西北门高地，打跑了西脑包之敌人；独一旅也抢夺了高地并拿下了火车站。前后共打了四天四夜，第五天结束了外围战，把敌军全部压回城里。在打扫战场时，到处可见敌人的尸体，并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它战利品。外围扫清了，张达志同志调整了

作战部署，步兵全部攻城，骑兵除负责四周警戒外，也编成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参加攻城战斗。

十一月八日，正准备攻城之际，忽接到支队部转来指挥部急电，说支援包头之战的西军两个师从河套地区向包头进军，已逼近包头。指挥部命令骑兵旅为主力火速前往阻击，并派一部分步兵援助。张达志同志见指挥部命令，急令暂缓攻城，步兵留下围困城内之敌，骑兵立即向西进军，阻击西军。

原来绥包战役打响后，蒋介石电令守宁夏驻军马步芳部支援三十五军。

暮色苍茫，我骑兵刚要出发，就接到侦察兵接二连三的紧急报告：“……马部从包陕公路急驰而来！”，“马部已过哈业胡同……”，“已过乌兰计，将达打拉亥村，明日可能进逼包头。”打拉亥村离包头仅有八十里，骑兵几个小时即可到达。为了掌握有利战机，我军决定连夜出兵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由于我军行动神速，黄厚同志率领的一支骑兵，午夜就进入麻池，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正当我军安排作战计划时，敌人的一个电话兵竟冒冒失失闯进村来架电线。他可能把我军当成他们的先头部队，满不在乎，正好被我军碰着，发现他的服装不对，便把他俘虏了，缴了一长一短两支枪。黄厚同志立即审问，这家伙闭口不言，后经反复向他交待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后，还是什么也不说。黄厚同志意识到：由于马部士兵大多是回民，加上马步芳用极其野蛮的奴化教育和训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很严重。黄厚同志把本部战士中的回民同志找来，让他给这个俘虏做思想工作，经说服动员并进一步向他交待了政策，这个俘虏自供说：“马部接到出兵支援包头的命令后，对军队做了一番部署，怕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抄他们的后路，把精锐部队留在青海宁夏，让小马弟兄（马鸿逵、马鸿宾）带领两个师约四千人援包，到河套留下一部分作预备队，到这里不足两个师，说三千人

马，实际两千多人。他们打着黑旗形分三路向包头进军，主体从张家营、南营、双安营、沙井营进军，右翼从麻池、万水泉进军。左翼从西营、公营、公营营、公营营进军。一明晨到达这里，故让我连夜架设电线……”。

黄厚同志派人把俘虏带到张达志同志那里，又问了一些情况，所述大致相同。得到各部援军实力和进军路线计划等情报后，张达志同志马上召集团以上的干部会，进一步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敌军人数虽是我军两倍多，但毕竟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本位思想严重，且被迫出外支援，三心二意；同时这支队伍流寇思想严重，只要挫其锐气，他们跑得比谁都快。经研究决定：从南到北将几里长的战线摆开，但主力要放在对敌人的中锋上，敌中锋一败，两翼不战自乱，再乘胜追击，把敌人彻底消灭或击退。

我军指挥部连夜赶到张家营子，先锋队驻扎在哈业脑包村，这时得知西军司令部驻扎在哈业脑包乡的打拉亥村，其先锋队白马连到达东圪卜，黄马连驻在背锅窑子。

九日早上七点钟，我军先锋队哨兵发现背锅窑子村有敌军，就抢先占了一条沟准备迎击。西军黄马连哨兵望见我军，也占了一条河槽，双方相隔约一华里接了火，炮火很激烈，我军所占地形有利，西军死伤部分人马后退回背锅窑子村。

与此同时我军张家营指挥部根据新的敌情，将作战方案作了周密部署。我军共分三路出击：西路的先锋队白马连，从张家营出发的指战员直达东圪卜村东，与白马连接了火；从宋家壕出发的指战员，占了杨家台庙，向东圪卜敌军射击；在哈业脑包村的指战员向东圪卜附近突击。这时正守在东圪卜的白马连，集中在杨锁贵家大院内，一部分敌军从院墙上用机枪向我军射击，下边的把院墙挖开许多窟窿向上打。经过两小时战斗，敌见我几面围攻，不敢久战，敌于五时退去，就想开溜，我军听到敌方逃

跑的号声，首长一声令下，战士便翻身上马冲向东坨卜村，敌军丢下几具尸体，拼命向打拉亥村逃去。我军很快占了东坨卜村，把活捉住的敌军都圈在杨锁贵家碾场里，一个一个地审问。

这时我军一个叫朱荣贵的团长，把东坨卜全村群众叫在杨家大院开了一个会，他首先安慰了因打仗受惊的群众，并号召群众，积极支援人民子弟兵，全面消灭敌人。

下午我军增援的步兵从前口子、昆都仑召、大塔、卜尔汉图沿山边各村搜索前进，他们与哈业脑包的我军配合袭击背锅窑子敌军，战斗不到两小时，背锅窑子的黄马连活着的全部退到打拉亥村。我军占了背锅窑子。这时背锅窑子、哈业脑包、东坨卜、贺义窑子的我军对打拉亥敌军司令部形成了半包围状态。下午四点钟，围攻敌司令部的战斗打响了。

敌军所占的打拉亥上下村都是大院，有院墙，村周围是菜园，有墙围子，所以敌人仗着有利的地形，机枪子弹仿佛雨点一样射来，我军如炮轰又怕伤害居民，因而下午的战斗不易前进，只能在远处紧一阵慢一阵的打枪。

夜幕降临了，我军从三面匍匐前进，爬到前面的刨个掩体，向敌方扫射，压住破人的火力，后面的向前爬……。约九点钟，把打拉亥村东贺家茅庵的一营守敌围住，击毙了指挥官营长和士兵多人，一部分跑回打拉亥村里。敌军一面打仗，一面举行了安葬仪式，他们把死者脱光衣服洗净，用白布裹上，跪下一片人祷告后埋葬在村北，栽了一块平面石头，写上字当石碑。（战后把营长的尸体起走。）

不一会儿，我军已冲到打拉亥的大院墙外，这时双方机枪已失灵了，墙里墙外开展手榴弹战斗。敌军扔出手榴弹，被我军迅速再扔回院内爆炸了，敌军老式手榴弹不炸，大概是年久失效了，我军扔的一种叫“空中炸”的手榴弹，扔向墙里不等落地就爆炸了，炸的敌人无处藏躲，只好向当中大院靠拢，敌人退一院，我

我为解放军征收粮草的一点回忆

王计小口述 程景华整理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司令员率主力部队，长驱直入，顺利地解放了绥西包头的广大地区。当解放大军进驻萨县以西鄂尔格逊乡（那时属萨县二区管辖）的时候，委派李泰仁任第二区区长。他到任开展工作后，任用我为财粮委员，曹廷富任秘书，王占彪、杨招财、霍俊山和魏子英等协助工作。我们活动在包头和萨县之间，为我军征收粮食，协助剿匪，搜缴敌伪人员私藏在民间的枪支，还积极动员群众捐款捐粮，支援前线。包萨的群众经我们动员，捐助了很多粮草，仅小巴拉盖的钦益堂（是天主教的一个堂名），一次就把所

军占一院，有的巷内展开了白刃战，有的敌兵舞弄大刀，我军利用刺刀拼杀，战斗非常激烈。这时喊杀声，缴枪不杀声，炮弹手榴弹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当村敌军架起了一堆旺火，火光冲天，这是进军号令吗？不！是逃跑的暗号。我军“突突突……突突突……”机枪步枪射向火堆方向，打的敌人心惊肉跳，魂飞魄散。再看，全村敌人集中到村西，很快上了马，飞也似的向西逃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紧紧尾追，使敌人无喘息之机，从乌兰计、哈业胡同一直追到中滩，望见马部远遁，我军才收了马脚。解放军围攻包头的二十五天中，再无听到西军的消息，原来他们一口气跑回老家了。

本文前一部分参阅了黄厚同志的回忆，姚品章整理的文稿。

贮存的三十多石糜子捐献出来。

我曾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管刮风下雨，奔赴包头、前旗等地，动员了一部分粮食，雇用民间骆驼，陆续运回本区，又加紧赶运到萨东办事处，交宋玉等同志接收。

以后，又集中运输力——骆驼、牛、马车，将西山嘴粮台的粮食，昼夜兼程，风餐露宿，一批一批转运到解放区的毛岱和托县，按期完成了任务。从开始动员征收粮草到结束，三十八天内，共征收粮食数万斤。在我们动员，征收粮食的同时，还从沙尔沁村内伪警察官刘德茂手中搞出自来德手枪一支，送交章业颢县长。

当我做了些应该做的工作时，李泰仁同志就热情地教育我，帮助我，鼓励我更好地为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在同年的十一月末，解放军和李泰仁区长向东转移了，我因下乡工作而掉队。后来尾追到托县境内，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住，关押了三天。返回故乡潜伏下来后，我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

伪乡长张子明率伙还乡后，开始反攻倒算，滥抓所谓给共产党办过事的群众，原二区通讯员李元挠、党福厚二同志，就是以通共、从共等“罪名”被杀害的。在当时那恶劣恐怖的环境里，我也落入敌手。被捕的次日，就解送到萨县监狱里，由国民党省里派下的人员冯铭堂直接审讯，加刑拷问，决定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杀害我。幸经绅士（县参议会议长）陈昆山营救，乡亲们做保，由我家付出三千多元的财物，把我赎出来，才免于死。

革命烈士李春秀同志

高少士

全国解放后，经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追认李春秀同志为革命烈士，他临刑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给河套和包头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李春秀同志的家乡在萨县（现土右旗）。解放前，天主教在那里盛行，他的家庭也信天主教，幼年时曾在小巴拉盖天主堂上小学，读完了高小。由于家庭困难，不能继续求学。为了谋生，去了河套的蛮会（现杭后水胜公主所在地），在天主堂小学当了教员，得到了求生之门路。后在我党组织培养教育下，献身于革命，一直搞地下工作。

一九三〇年春，他来到包头大德成帽庄接头，但未联系上，一直呆了四个月的时间。此间他到小巴拉盖看望同学，并在暗中宣传革命道理。后又从小巴拉盖到了鄂尔格逊。我父正教私塾，他通过熟人，结识了我父亲，经常向我父宣讲穷人受苦的原因，宣传革命理论，谈得很投机。那年我父因学生少，住地主的房子，交不上租金，地主几次上门逼要，恰巧一天李春秀在坐，就掏出自己途中备用的二块银元，交给地主贾某。替我家出了房租，我父亲感动得掉下眼泪。

有一次，他正从包头去小巴拉盖，在公积坂车站下车，途中遇上一位中年农民（解放后，调查烈士事迹，才知此人是公积坂村人叫老栓兔）赶着一花轱辘马车，拉着病人，去鄂尔格逊求医。马失前蹄，车辕断成两段，车不能走了。李春秀同志看到，急忙上前说：“让病人骑上马，你守护，我给你架辕拉上断辕车，咱们一齐走”。说完拉起车就走，他拉车拉得满身大汗，农民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听说李春秀同志牺牲了，每年清明节，我父亲就到西城外，烧纸哀悼。

解放初期县文化馆活动回顾

武虎瑞

包头县人民文化馆是在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半年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它是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打击敌人的组织机构。

旧社会，包头虽然有过类似的民众教育馆，在人民心目中，既没有它的地位，也不晓得它在干什么。设在市内，名为教育馆，其实是个点辘品，空架子，无所事事，因而人们非常陌生。

解放后，文化馆这一新事物一出现，就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为群众实实在在办起事情来。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县人民政府设在东河区文十字一号院。考虑到文化馆服务对象是农民，就把馆址选在比较适中的麻池城内，占用麻池行政村公房产一处，这是没收日伪警察所长王俊芝的房子，有正房七间，是个约二百四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院子。经过维修，分为三个单元，为文化馆开展工作提供了条件。

县文化馆的分工和机构设置，参照绥远省文教厅的规定，分为宣传文娱和社会服务两股。宣传文娱股：配合当时政治运动进行宣传，提高群众政治思想觉悟，通过文艺形式搞宣传，群众喜闻乐见，还组织学生、青年男女学跳秧歌舞，挖掘民间传统艺术，剪纸窗花，书写新春联，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社会服务股：分送群众读报，组织收听新闻，开展识字教育、问事代笔、社会调查和设人民意见箱等。

县人民文化馆成立时是由萨县专员公署批准的，编制暂定为五人，馆长姚振纲，系专署任命的。配备干部有李志鹏和邢华青。

省文教厅派来一名录音员叫梁国栋。通讯员李明德。拨给开办经费小米一万斤。小米变价购买图书四百六十九册，订阅五种报纸，杂志十八种。购买了乒乓球案一具，棋三付，广播喇叭筒三个，省文教厅分配收音机一台。

国庆节开馆，为了在开馆之日大造声势，文化馆邀请了绥远省行干校文工队同志们协助馆内开展创新的文化活动。文工队的同志们当时正在麻池、召湾两行政村搞秋征工作，他们不辞辛苦，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组织起非常活跃的青少年秧歌队。他们有十五人投入教扭秧歌、唱革命歌曲活动。

这几天，麻池城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非常热闹。邻村的男女老少涌至文化馆，可谓人山人海。台上有说有唱，台下有扭有跳，整整红火了三天。他们的演出新颖活泼，群众大饱眼福，也受到教育。新建的文化馆，打响了开台的锣鼓。

紧接着，文娱服务股，排练扭秧歌，排练新节目，配合剿匪、肃特、减租、反霸，进行宣传演出。运用二人台形式，表演《挖匪根》等节目，激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春节期间，群众剪窗花，写春联成为庆翻身颂解放遍及全县的活动。

社会服务股，举办了有村干部、积极分子参加的文化补习班和识字班，两班共有学员七十七人，其中有女学员五十三人。学员们既学习文化知识，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股的同志赴各村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通过座谈了解群众疾苦，以及他们的想法、看法、意见和要求，写成材料向上级汇报。还请工作团的干部在座谈会上讲解时事政策，解除疑虑，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和反封建运动。五〇年图书阅览人数达八百四十二人次，开展的《反对美帝侵略，拥护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一、二、三区签名数达二千八百七十四人。

在麻池村设置的三块黑板报和屋顶广播，都是由文化馆组稿、编排、书写、广播的。文化馆除设有读报栏外，还配合区、

村组织读报组，开展读报活动。馆内有中心读报组，组织群众学习时事政治，宣传政策、收听新闻等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成为群众的学习中心和新闻传播中心。

为了适应当时群众的要求，举办了问事代笔，设置了人民意见箱，把群众意见随时反映到有关部门。还配合村政府搞社会调查，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馆内体育活动也十分活跃，青少年打乒乓球、下军棋、打扑克，中老年人下象棋，中午和傍晚挤满了活动室，成为群众的活动中心。

一九五一年县政府拨给文化馆的经费是四万四千六百零三元六角，（折新人民币四千多元）。当时处于新政权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各项任务繁重。省文教厅提出的群众文化工作方针是：积极配合中心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区一年除了抽两名干部直接参加中心工作外，所留人员，坚持抓好馆内正常业务。

由文化馆组织的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由文教科唐叶封同志率领，馆内的何泉生、武师虞二同志进行组织辅导工作。宣传队的十三名成员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有参加过绥远省文艺演出的民间艺人，有擅长拉四胡的李登华，有弹三弦的好手范景，有打琴名手张贵才，有能拉会唱的崔昆仑，具有表演才华的祁凤英、李玉英、邢玉英、武月娥、李贵莲等。这支业余文艺队伍，来自群众，没有报酬，他们能战胜较多的困难。如五二年春节前后，背上铺盖、乐器、道具、幕布，跋山涉水，行程五百九十六华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到过二十一个重点村，巡回演出二十一场，观众达一万八千四百四十三人次。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露天演出，困难很大。为了演出搞个简易舞台，挖坑栽杆，确有困难，大家想出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利用当时农村唯一的运输工具二饼饼牛车带轱辘的车轴两对，各缚一根高杆，一面靠墙捆上横顺四根长杆，挂上幕布，点上两盏大汽灯就能登台演出。演出的

内容，围绕减租反霸、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反对买卖婚姻、宣传妇女解放、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进行的。如《三女劝夫》、《模范家庭》、《见狼不打留祸根》、《小女婿》、《三娃与改志》、《诉苦》等节目，均深受群众欢迎，而且针对性很强，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起到积极作用。每场演出前，请当地的工作团同志讲时事政策，部署中心工作，动员群众完成特定任务。利用换场间隙放映幻灯。映出的幻灯片有《鸭绿江上血泪仇》、《炭疽病》、《济公托钵》和《一贯道害人道》等。

一九五二年文化馆重点抓了业余文化组织的建设工作，并把文艺宣传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抓了读报组工作，全县建起读报组一百二十一个，能坚持常年读报活动的小组占半数。其余是农忙地头读报和晚间会场读报。读报组只有五千四百七十五人，其中女组员为三千二百三十一人。读报组长多由农村中有一定文化知识，政治可靠、工作积极的同志担任，有些是党的基层干部。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拔到县区、村当了领导干部。文化馆在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组织读报组活动过程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群众文艺骨干，大部分读报组内，建立起说唱等文艺小组。

在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基础上，较大的村庄组建起农村业余剧团。麻池、新城、哈林格尔、大树湾、二锁圪梁、二道沙河、前口子、等村的业余剧团都已初具规模。当时由于对剧目限制过严，对“推陈出新”的方针理解不够，限制了土生土长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二人台。业余剧团演出的新歌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出：《小二黑结婚》、《王秀鸾》、《新事新办》、《方四姐》、《杨三入了互助组》等。

这年文化馆内还组织群众收听新闻十五场，听众达二千零六人次。放映幻灯二十场，观众达二千七百多人次。

当时县文教科人员编制少，省文教厅把扫盲任务也列为文化

馆重点工作，因而文化馆就发动组织小学教师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利用晚间为政治上抬头、经济上翻身的农民摘掉文盲帽子而积极工作。

一九五三年四月，撤销了包头县建制，实行市县合并。这时除把原包头县第五区（升恒号至三湖河口一带）和第二区西段（土黑麻淖至傅家圪堵）划归乌拉特前旗外，其余的区乡统一于新建的包头市郊区。县文化馆归市后，改为包头市第三文化馆，馆址仍在麻池。服务范围仍是原县属区乡。一九五六年迁到转龙藏庙院。

在县文化馆的组织影响下，翻身农民纷纷起来组织自己的业余文艺团体，这些团体小型多样，唱革命歌，演革命戏，有力地配合了土改，表达了翻身农民无比喜悦的心情。据当时统计，在册的文化团体有：农村俱乐部一个，业余剧团十一个，文艺小组九个。全年演出累计四百二十五场，观众达十八万人次。

为了鼓舞群众搞文化娱乐的积极性，馆内人员做了适当的调整。宣传辅导组，配备了崔昆仑、刘德全和田沛时三名干部，开展农忙搞服务、农闲搞辅导活动。编创供应组：配备了武师虞、和李尧声二人。武师虞侧重编选文艺演唱材料，李尧声负责刻印、装订、分发。这一年春节前给农村业余文艺组织印发了两期说唱材料二百余份。在服务活动方面，演出幻灯、戏剧十七场，观众达四万人次；图书展览十三次，观众达五千人次；图书借阅达一万三千人次。

利用小学暑期放假，举办了全区二人台会演，其目的是挖掘二人台艺术。这次会演，是在杨植霖主席提出的“让二人台翻身”的号召下举办的。会演地点在麻池小学院内。县文教科科长陈瑞泉亲自主持，各区文教助理员带队参加。演出剧目有《打金钱》、《打樱桃》、《打秋迁》、《牧牛》、《挂红灯》、《走西口》等。在会演中还记录了不少牌子曲，也推荐了戏改中涌现出的优秀剧

目。如席子杰整理改编的《走西口》，就是保留了精华，剔除了糟粕的好剧目。会演后在全区推广，保留至今。

附文化馆成员名表

年 度	馆 长	馆 内 成 员
1950—1951	姚振纲	李志鹏、邢华青、梁国栋、李明德
1952—1953	陈瑞泉 (兼)	何泉生、武师虞、崔昆仑、刘德全
1953—1954	武虎瑞	武师虞、田沛时、崔昆仑、刘德全、李尧声

文史知识

廉 耻

《古文》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摘自《五代史·冯道传》

〔今译〕礼义，是为人的重要法度，廉耻，是做人的根本节操。不守廉洁的人什么东西都爱贪取，不顾耻辱的人什么事情都敢去做，人如果是这样，那末，祸败乱亡也就纷至沓来。何况居大臣地位的人，若是什么东西都要贪取，什么事情都敢去做，那天下岂有不丧乱，国家岂有不灭亡的吗！

（王能侨 译）

活跃在包头县的一支文艺宣传队

唐叶封

一九四九年包头和平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庆祝翻身解放，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其中主要是秧歌队，腰鼓队，歌咏队等。农村主要以学校学生为主，也有民间艺人参加。

一九五〇年，随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党的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文艺工作也被列入了党的议事日程，各级党政领导对文艺工作都作了具体安排。当时包头县政府文教科配备了专职文化干部。

一九五一年原绥远省政府在今呼市举办了全省第一期民间艺人学习会，包头县文教科配文化干部带领民间艺人范景、白庆小、崔昆仑、谢伟、郝云贵、李明德（文化馆干部）赴呼参加了学习。学习会期间，原绥远省主席杨植霖同志亲临学习会指导工作，还作了题为《二人台翻身》的讲话，绥远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讲话全文。当时省文教厅副厅长武达平同志也多次到学习会看望学员并审阅学员们创作的文艺演唱作品，省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刘启焕同志亲自主持学习会的工作。学习期间组织了部分艺人和干部编写了一批文艺演唱材料和二人台小戏。学习会结束前又组织学员赶排了文艺节目，分别在呼市街头和郊区农村进行了巡回宣传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郊区农民的欢迎。

学习会结束后，包头县参加学习的干部和民间艺人回包向县领导作了汇报，为了及时配合当时正在农村开展的抗美援朝、减租反霸，搞好生产，取缔一贯道等政治运动，立即在麻池村以参

加省学习会的民间艺人为主，又吸收了部分民间艺人组成了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员有李登华、张贵才、范景、崔昆仑、谢伟、郝云贵、李明德等。带队者是县文教科文化干部唐叶封同志。宣传队经过短时学习和排练，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麻池出发，先后到县属四区、五区、二区、三区、一区宣传演出。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五百九十六华里。在二十二个重点行政村演出节目，放映幻灯二十二场，观众达一万八千多人次。在宣传演出期间，县文艺队又在五个区内重点组织了四个农村业余文艺队，参加的民间艺人有六十多人。文艺队不仅演出文艺节目和放映幻灯，还教唱要求群众在当年“五一”节期间学会的三首革命歌曲。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当时还组织广大群众在爱国公约上签名，文艺队发动民间艺人一百八十多名，其他群众八百三十八名在爱国公约上签了名。

这个文艺队是解放后第一个下乡演出宣传队，每到一个未曾演出过的村时，群众以为和旧社会演唱的二人台一样（打玩艺儿的来了）。对文艺队的同志不太尊重。而每当他们看完文艺演出和幻灯后，群众的态度便迥然不同了。四区二狗子湾有个李老汉，过去一直不敢叫儿媳妇出去看二人台，这次看了宣传队的演出，高兴地说，这可和过去的二人台不一样，我在家看门，也要叫媳妇们来受教育。在演出二人台小戏《三女劝夫》时许多观众被感动得流下了泪，说这比开十回会、讲十回话还顶事。

在放映反映美帝侵朝罪行的幻灯片《鸭绿江上血泪仇》和取缔一贯道的《济公托梦》后，老乡们进一步认识了美帝侵略朝鲜的罪行和一贯害人道对人民的毒害。纷纷表示：要好好劳动，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抗美援朝。干部们也尽量安排文艺队多走几个村子，多演几场。

文艺队开始下乡时只能演出四个文艺节目，经过一个月锻炼成长，他们边演出，边排练新节目，最后能演出《三女劝夫》。

《模范家庭》、《拜新年》、《抗美援朝》、《料面鬼的下场》、《十二月小唱》、《十劝》、《诉苦》、《剿匪肃特》、《上民校》等十几个文艺节目，还绘制了一套揭露一贯害人道的幻灯片《济公托梦》。

文艺队不但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还制订了联系群众的好制度，发扬了八路军的优良作风。每到一村子住下后，首先帮助老乡扫院子，给老乡担水。

在每个村演完的第二天，还组织群众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对改进工作提高演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月下旬，文艺队宣传结束后，又制作了《仙班》、《为惨死在美帝国主义手下的婴儿复仇》、《七个小英雄抓特务》、《土改前后》、《生产运动》等五部幻灯片和一些漫画、标语，继续为配合当时取缔一贯道、镇压反革命运动及发展生产进行放映宣传，深受群众欢迎，说幻灯片比电影容易懂。

一九五一年十月，为了及时配合当时全县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运动，文艺宣传队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参加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毕业的新学员，共计十三人组成了包头县土改文艺宣传队，队员有李登华、张贵才、范景、崔昆仑，青年演员有：祁凤英（现在包头艺校任教）、邢玉英、李玉英、李桂莲、邬月娥、吕桂莲、胡存亮，文化馆干部刘德全，带队者仍是唐叶封。这个新队伍，除演出原有节目外，又排练了不少新节目。这些新节目有宣传土地改革的《长工与地主》、《见狼不打留祸根》；宣传婚姻法的有《二娃与改花》、《苦苗苗得雨结甜瓜》、《自由花儿结了果》、《柳树井》、《新事新办》；宣传大生产的有《姐妹割麻黄》、《李掌印进城》、《杨三入了互助组》、《张满囤变工组》、《防疫抗旱大事情》、《七寸步梨戴红花》，还有《一贯害人道》、《文化翻

身》等节目。

县土改文艺宣传队十月二十七日出发，深入包头县五个区的广大农村进行巡回演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同志们自带行李、乐器和道具，步行一村又一村，为农民演出，从不叫苦。后来农民们看到文艺队的同志们太艰苦，主动提出用二饼子牛车接送行李和乐器、道具等，演员们仍然步行。当时农村条件很差，晚上演出往往只有一盏汽灯，有时汽灯发生故障，还得用麻油灯照明，就这样坚持演出。每到一村，演员自己搭台子，没有幕布，只好用床单、毯子代替。在这种条件下，文艺队从麻池村出发，先后曾到四区所属二锁圪梁村、大树湾村、天义昌村、二狗子湾，五区的陈河鱼圪旦、白彦花、升恒号，二区的傅家圪堵、黑柳子、镜尔窑子、上黑麻淖、全巴兔，一区的哈林格尔、宋家壕、召湾、新城、万水泉，三区的古城湾、后营子、鸡毛窑子、大庙、石拐沟、宏庆德等村，历时三个多月，演出了二十四场，观众达二万多人次。

文艺队一边进行宣传演出，一边排练节目，最后能演出文艺节目四十多个。他们还建立了学习制度，每天早上除学习政治外，还学习业务，主要学习识简谱和演出基础知识等。

文艺队每到一个村演出，还辅导农村业余文艺队。如一区召湾村和厂汗以力更村的文艺队经县文艺队的辅导，演出水平大大提高，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到附近没有文艺队的村子演出，深受欢迎。

文艺队的宣传演出，不但配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教育了广大农民，同时也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因此，深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拥护和爱戴。

一九五二年二月份，文艺队结束了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后，集中在麻池村进行了总结整顿。演员们一致认为：经过三个多月的宣传演出，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对本职工作

包头地区的晋剧票友班

罗宏根

提起“票友班”，老年人是很熟悉的，就是一些晋剧业余爱好者，自筹资金、自由结合、自拉自唱、自排自演。他们的活动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要，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包头的晋剧票友班，也是随着包头的开发逐渐形成的。清朝末年，山西等地来“口外”经商的人逐渐增多，“广恒茂”、“复聚成”、“通和店”（粮油行）等一批字号成立，这些商号都要雇用店员（也叫住地方的）。后来，“义通厚”、“广恒西”等商号的掌柜们为了管束和防止伙计们出去胡混，学坏，就有意识给伙计们一点钱，让他们去看戏，有时还请一些内行或艺人给他们教学唱戏，进而就购买乐器（丝弦、鼓板——晋剧行话称文武场）甚至

的认识，同时业务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此后，在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文艺队的组织规模扩大，由原来的十三人增加到二十八人，演员素质、技艺提高了。排练了《小女婿》、《王秀兰》、《小二黑结婚》等大型现代歌剧。当时在麻池首场演出时，得到群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王秀兰》一剧成功的演出，对妇女教育尤大。麻池村妇女赵玉梅说，我以前很少参加农田劳动，看了戏，使我认识到劳动的确光荣，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得到彻底翻身解放。并表示：今后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变工组，带动其他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增产节约，支援前线。

（本文作者原系市群艺馆馆长，现已退休）

连掌柜的也加入在内，组织起来“打坐腔”（只唱不演）。以后，这种形式逐步扩展到社会上的中、小行业中（包括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不分阶层，纯属爱好，结合起来，利用闲余时间或喜庆节日来“玩票”（此地亦称打票）。另外，票友班的形成也与旧社会人们把“戏班”视为“下九流”的封建思想有一定关系。

包头地区的晋剧票友班，基本上分两大流派，一派为山西人“票友班”，他们活动在“大北纸庄”、“义生泰”两个点儿，参加者以山西人为多（当地票友称“蒲南派”）。能忆起的知名人士有：郝英潭、桑德仁、王礼新等。另一派为包头“票友班”，以包头、萨县人为主，活动地点不甚固定，但活动范围广泛，有时在买卖商号，有时在家会埠店。到六十年代，大多活动在杜来才开办的“三合义”毛衣铺和“长盛店”两派票友班的共同特点是：活动历史久、唱功好、戏路宽、戏文多。因此，过去外地来包头和萨县唱戏的艺人，都感到在这儿唱戏“不好交待”，原因是这一带的票友行家多，爱挑剔毛病，尤其在唱词（指戏文的深奥程度）、尺寸（指梆板节拍）、折口（指韵律）等方面挑剔较多。

包头人票友班比山西人票友班较为活跃，逢年过节、婚丧寿庆等场面，有请必到。一九五〇年，包头人票友班经常在“戒烟所”打坐腔。此外，他们还搞一年一度的“票庆”（即成立票友班的纪念日，具体时间不详）。每逢“票庆”之日（在夏季），票友们聚到“转龙藏”分成两片，老的一片，年轻的一片，对唱坐腔。唱完后，要在事先准备好的绸料上签名留念，并集体聚餐，很是隆重。他们活动的繁盛时期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尤以一九五八年为甚（山西人票友班，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后就逐渐衰落了）。据我所知，这个票友班在唱功方面有名气的有：吕学敬、夏大奴、夏二奴（回族兄弟俩）、金命（回族）朱文月（艺名稍美旦）王子光、杜昆山等“老八弟兄”，另有以杜来才为首的单金茂、王四来、石祥、刘守仁、刘德仁等“小八弟兄”。这些

人嗓音宏亮，戏文多，戏路宽，尺寸好，经常演唱，不断提高，还传授了不少后人。尤其是杜来才先生曾专为包一中培养过学生。如，现在《包头日报》社工作的常鑫同志，郊区文化局工作的李文同志，都曾受过来才先生的指教，至今人称“杜老师”。此外，宁成之，徐林宽，二崩楼（已谢世）杜金凤，苏霍秀等票友亦有较深造诣。在文武场方面有名气的有：白珍、高喜毛（已谢世）陈少梅、小宝子、贺德义、官步生等，深受晋戏爱好者的的好评和尊崇。郊区的官步生同志至今退休在家还培养徒弟学艺。

票友们还经常坐下来研究和探讨一些戏曲理论，鉴赏不同风格流派的特点，从中吸取艺术营养，有时，看法不一致，竟能争个面红耳赤。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年轻的一代票友，无论在活动方面，探索方面，继承传统方面，都“今非昔比”了。竟然在票友班内连个像样的鼓师也找不到了。《鸡架山》、《渭水河》、《捉放曹》等传统戏很少有人会打了，像《高平关》、《沙陀国》、《双锁山》等传统戏，除了在世的个别老票友，会唱的人也没有了。

历史转瞬间过去了，老一代票友们除少数健在，大多谢世了。但他们为活跃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作者原系郊区经委工会主席、现已离休）

包头郊区的梨园谱

宫步生

现将清末至解放初期，出身于我区在戏剧界中负有一定盛名的演员，择其要者简介于此，以飨读者。

冀素梅：艺名小果子红，沙尔沁乡人。生于民国十年。曾拜说书红、丁果仙名家为师。专工须生，四工坚强，五法精细，嗓音清亮，园滑，字正腔圆。表现力较强，以《斩子》、《八件衣》、《芦花》为看家戏，久占山西阳泉一带，名满山西、内蒙包萨地区，河北的张家口一带，可谓名流女演员。

尔德子：艺名北来关，鄂尔格逊人。生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名“下海”演员。以《坐曹营》负盛名。唱工特好。由于自己勤学苦练，专工须生，成名一时，后搭“一杆旗”的班子，在山西忻口病死。年仅五十八岁。

张万顺：艺名毛其来家，是古城湾毛其来人，久住包头李永泰班子。该人虽不是名演员，但戏路子宽，可谓好“底包”。生于民国初年。日帝投降后，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七岁。

班玉莲：鄂尔格逊人，从小专工歌剧，精通二人台，唱工刚柔相济，嗓音清脆，表演逼真，以《走西口》闻名一时，灌制唱片。在呼市（解放初期）前进剧团时是该团主要演员。生于一九三〇年，曾任内蒙艺校教师。

李德亮：鄂尔格逊人，专工花脸，票友下海，嗓音宏亮，以《忠保国》、《渭水河》等剧目为好，曾在伊盟晋剧团任净角演员。生于民国十三年。

宫步生：鄂尔格逊人，生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曾拜鼓师小

全全（苗全全）门下，专工司鼓，曾在固阳、集宁、张家口、巴盟、锡盟等地的晋剧团工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内蒙分会会员，已退休，回归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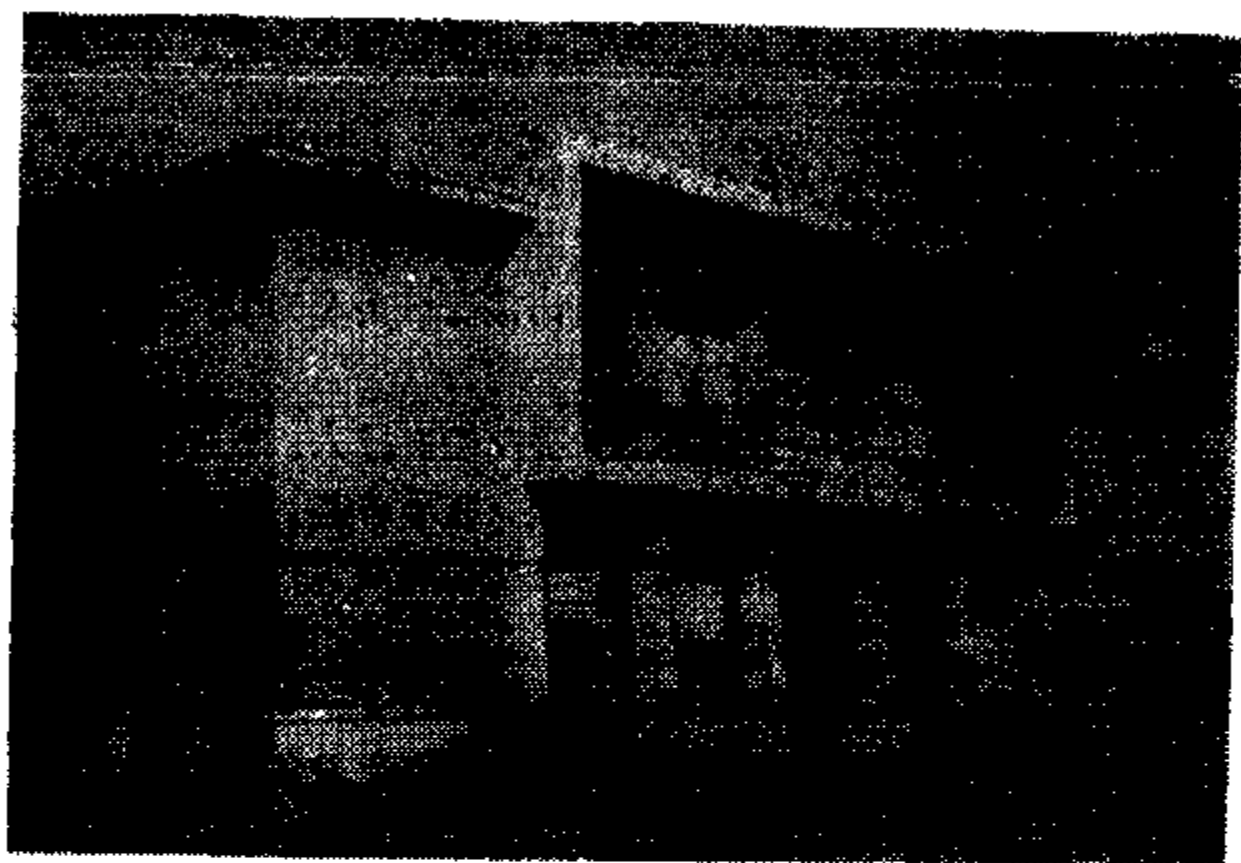
三毛旦：沙尔沁人，生于民国初年，是男演女角，专工青衣，表演细腻，唱腔清晰。《双官部》演技精良。搭萨县梁山戏班，日寇侵华后，改行，回归沙尔沁以做小买卖为生。解放初期病逝。

皮二秃：人称“小五魔鬼”。鄂尔格逊村人。以拉胡胡为主，吹、弹兼通。手音好，指法如流，弦琴若定。牌曲深厚，西大路亦称名家。生于清末年间，常住梁山戏班。

七牛子：沙尔沁乡海岱人，生于光绪末年，曾领班子，担任班主，并爱好晋剧，兼演丑角。以《梅绛雪》、《真假刘全》为主，表演滑稽，风趣，道白取方言，可称土产丑角，亦是“下海”演员。

陈秃子：因日本投降那年搭班演戏，故起艺名“原子弹”，鄂尔格逊人，生于民国十年。专工青衣，曾跟名家五月鲜（刘明山）学艺，日本投降后，回到原籍，在萨县、固阳一带演出，他的《九件衣》盛名。特长以大段唱词取胜，表现不同性格的古代女子，较逼真。兼演小旦，是票友下海中最好的一个。

关于梨园之事，甚为纷繁，且年代久远，我所记叙，有的眼见耳闻，有的仅据传闻，未曾在一起搭班，故失误难免，望知情者更正、补遗，笔者侯教。



郊区兴建的第一座影剧院

周富国 赵修明

七十年代初、经市革委会批准，郊区决定在二道沙河地区建设新区址，并组成以杨茂森、柴恒二同志为首的区基建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到一九七四年，新区址已初具规模，区革委会和各科局也先后从东河区迁来二道沙河。

由于二道沙河的不断建设和发展，职工群众也随着逐年增多，广大职工群众在工作学习之余，迫切要求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因此，在二道沙河兴建一座比较象样的影剧院，便成了一件

亟待解决的大事。郊区革委会也早就考虑到：建设一座影剧院，不仅能够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解决了召开各类大会的会场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郊区革委会决定投资五十万元，建设郊区第一座影剧院。为了认真抓好此项建设工程，区委决定由杨茂林主任和任兰峰局长挂帅，有秦德茂、王文才、李二根锁五位同志，组成了影剧院基建办公室，负责甲方的有关基建事务。建设单位的乙方是内蒙古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这是一支思想过硬、技术全面、机械化施工的建设队伍。英雄的建筑工人，隆冬冒着严寒，酷暑顶着烈日，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创业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加速了施工进度。同时郊区各级领导和全区干部、工人、学生，也曾多次深入现场工地，参加了各项义务劳动。

经过各方一致努力，影剧院一年的工程提前两个月全面完成了。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为庆祝国庆二十九周年献了厚礼。

郊区影剧院座落在沙河镇中心，总建筑面积为一千九百平方米，建筑最高度约达二十五米，墙壁为红色九〇砖，其它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剧院座西迎东，式样端庄新颖，给沙河镇增添了耀眼的风采。

正厅门脸儿清素淡雅，呈鱼肚白色，一色水刷石的墙壁方柱上，银有四把手举火炬灯，给人以美观大方之感。两层门厅里外共二十四扇银有透亮玻璃砖推拉门。门前南北两侧为售票处。前厅为三百平米，全部为水磨石地面。南侧为值班室和场务组，北侧为观众休息吸烟室，南北分单双号入场门。剧场分楼上楼下。上楼梯过道处是剧场会议室，楼上南侧为观众休息吸烟室，北侧为库房和机务组办公室。后台走廊内设男女厕所和八间演员化妆室；舞台宽敞出音，除上下场两门外，舞台南侧设有副台和演员休息室。舞台表演区南北二十米，东西深度十五米，台口十一

米。台下设有乐池，可容纳大型乐队伴奏，乐池北侧设有一百八十千瓦可供十八万度电配电室。台上装设有紫红色金沙点几大幕，浅绿色二幕，杏黄色三幕，四道深绿色横竖幕条予以衬托，显得格外壮观。每逢各类剧团演出大幕徐徐拉开，即刻把观众引向迷人的境界。舞台空间，设有两层天桥，南北墙上和舞台左右侧，均装有二寸钢管，可供剧团挂景或拴幕上吊杆使用。舞台左右各设侧光四孔，天花板上设聚光十一孔。由于剧场设备较为齐全，它可接待中央和省、市级各类大型剧团演出。

整个剧场装饰比较华丽，天花板上镶有园型灯和两组莲花吊灯，四周墙壁嵌有彩色花灯。楼上楼下均装有清晰的低音喇叭；剧场四周空间墙壁，全部装镶土黄色隔音板，无论放映或文艺演出，观众坐在那个部位，都看得清晰，听得清楚，音响效果十分良好。楼下观众厅设南北太平门；座位成双井字型，通道宽敞，出入方便，座位舒适，分单双号二十六排，设八百四十个座位。楼上座位成单井字型，分单双号九排（为确保安全，后去掉第一排），计二百八十八个座位，总计楼上楼下座位一千一百二十八个。它的建筑结构为拉梯式型，坡度较大，视线清晰。这种建筑结构因楼下没有园柱，毫不影响楼下后排观众的视线，是当今剧场建筑的新型样式。这所影剧院冬暖夏凉，冬季有暖气，夏季有风扇。抽风扇分设在南北两面墙上空，共八个，因而空气清新，十分宜人。

为了尽快开业，郊区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任命赵修明同志为影剧院主任，同时安置待业青年张跃武、陈志远、王宝荣下乡知识青年傅润琴、张桂英和电工刘恩源七名同志，筹备各项开业有关事宜。大家在筹备工作中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不到一个月，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当时，区财政局从区电影管理站调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出产的解放一〇三——A型三十五毫米提包移动放映机两台，暂归影剧院放映使用。经区政府办公室杨茂林

主任同影管站庞楨站长协商，决定调张在柱同志任放映员，借调赵德飞同志放映三个月。随着又做了一段放映准备工作，并参照市区兄弟影剧院的管理办法，设机务、场务、票务财务后勤三个组。在市电影公司的关怀重视和区影管站的无私援助大力支持下，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影剧院正式对外开业。

新开业的影剧院，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当时，正处于银饰舞台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多年来，因在十年“文革”动乱中一直被禁锢的各类影片陆续解放上映，丰富了影片上映内容，为广大观众带来了眼福。当时无论上映什么影片，观众蜂拥而来，每场必看，座无空席。记得一次傍晚下班后，临时串回一部五十年代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一声广播传开，即刻召来上千观众。虽然预先组织了好几位同志分别多处售票，但由于观众过多，争先恐后地抢着购票，过度拥挤，竟将售票室五公厘厚的玻璃窗挤得粉碎。

影剧院开业后，在区政府办公室的正确领导下，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学习，并着手搞一些宣传和设备性的建设。同时制定了各组职工岗位责任制，影剧院的工作就这样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使放映效果达到更高水平，经请示同意更新松花江座机。区影管站电影技师周九海同志，积极配合，多方联系，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购进了名牌松花江五五〇二型固定式全套放映设备，还配备了固定式幻灯机和上海产放映机械室专用配电柜，同时借调周九海同志安装座机。为了不影晌放映和收入，采取边放映，边安装的办法。安装人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努力，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了礼，松花江座机机头转动，开始为广大电影观众服务。

放映设备的更新，声光效果的改变，宣传工作的加强，使影

剧院更增添了光彩，上座率猛增，业务量也随之不断扩大，便开始觉得影剧院工作人员不足。经区政府办公室研究，先后调入了李新民，周哲军（接替赵德飞同志），张润兰、任秀文、吕金凤、王凤云，后张润兰对调了韩秀郁等六位同志。从影剧院开业到八三年底，影剧院正式干部和职工，一直保持在十二人左右。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由于工作的需要，赵修明和张在柱同志先后调离影剧院。区政府办公室委派张义成同志任影剧院第二任主任；不久又调来李水莲同志。当年五月张义成同志调离，影剧院工作暂由刘恩源和王宝荣同志负责。不久，影剧院交区文化局领导。一年后，文化局派王秉义同志任影剧院第三任主任，同时从文化局抽调周进财和张志英同志到影剧院工作。一九八六年五月，王秉义同志调体委，并调周富国同志任影剧院第四任主任。随着又陆续调入放映员张刚、票务场务冯东英、王艳震、韩翠英四位同志到影剧院工作。

一九八七年三月下旬，为了领导工作的方便，影剧院遂交沙河镇政府领导。

郊区影剧院八年来，除主要放映电影外，同时接待了中央、省市县各类剧团的演出。为了丰富活跃广大群众多方面文化生活，经常举办周末舞会，并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又增添了闭路电视放映。这些有益的文化活动，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

总之，郊区影剧院从开业到现在走过了八年的历程，在八年的历程中，有兴旺发达阶段，又有坎坷不景气之时，曾尝过甜，也吃过苦，影剧院的全体职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一定辛苦。为丰富沙河镇的群众文化生活，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曾得到市电影公司和郊区各级领导的表扬。一九八六年，被评为郊区文化系统精神文明单位。

郊区影剧院七九年六月至八六年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统计数字一览表

年度	收入 (元)	场次 (场)	片租 (元)	人次 (人)	戏剧场次收入 (场、元)	会议及 其它收入 (元)
79.6	17,190	159	8,595	71,687	3场 513	1,637
80	38,639	396	19,320	186,988	3场 224	1,903
81	35,708	351	17,854	193,856	2场 225	2,440
82	26,291	291	13,146	140,625	1场 136	1,800
83	23,406	231	11,703	99,415	1场 89	2,314
84	25,322	203	12,661	87,359	1场(慰问演出)	5,350
85	17,951	138	8,980	38,040	3场 150	7,477
86	41,801	264	20,900	127,786		5,140
合计	226,308	2,033	113,159	945,756	14场 1,337	28,061

蒙古族地名的历史溯源

〔蒙古族〕 荣 阁

蒙古族是一个有独特思维方式，用诗一般的语言表情达意的民族。研究蒙古语言的学者，无不对它发出由衷的惊叹。史籍或有关叙述历史传说、民族风情、故事歌谣等文献，其语言文字，均有浓厚的诗情画意。

给自己的房舍村落起名字，在蒙语中有着美妙隽永、意味深长、色彩绚丽的内涵，使人们联想翩翩，感到这些地名生动形象，仿佛其中有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在吸引着你。请看：

巴都来——兴旺； 白音楞——快乐处；
索尔图——威风、威严； 边立盖——险峻；
鸡圪拉——幸福； 曹立汗——狭窄；
尔德尼——珍贵； 北林达赖——吉祥；
蛇 令——凉爽； 红格——低凹；
韩 盖——宽阔； 壕赖——干涸……

用形容词作地名，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有，而其他民族地区却很少这样。

治羊羔者——忽拉格气； 画匠——祝乐沁；
厨 夫——土合气； 黄色匠人——索塔尔肯；
有妻者——圪力更； 挤奶者——萨拉齐；
长官的胞弟——威俊； 造房匠人——板申气；
专心凌虐者——毛其赖； 打柴者——斗林沁；
修理山岩的人——哈达不气……

以职业和技能命名自己的土地和村落，追忆历史，很有兴

味。

姑娘住房——口肯板申；有房子——板申兔；

大房子——依肯板申；七间房——捣拉板申；

新房——什尼板申；山拐处之房——哈麻板申……历史上只有“姑娘住房”、“七间房”的地名，后来发展为上百户、千户的大村镇，是蒙汉人民团结发展，不断开拓的结果。蒙族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满族、回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情同手足，是历史形成的。这些村落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具体、生活的写照！

有仓库之地——善岱；有蛇之地——毛盖图；

有碱之地——故济尔图；沿边湿地——康保儿；

有纸之地——察素齐；荆棘丛生地——鄂尔格逊；

有泉水之地——保力图；有碾子之地——英图；

有榆树之地——海留色太；有鸟之地——石卜太；

后面有鹿之地——阿路包头；有苜蓿之地——点力素太；

苍天似的平地——顶贵特拉；盐碱之地——黑鸡图……仅用其特征命名，使人们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过那样的特征，叫人展开想象，回溯历史的风貌。

并洲亥——有麻雀；腊卜——有海螺；

此老图——有狗鹫；阿什浪——有狮子；……

以动物名命名之村镇，给人们无限的空间想象，沧海桑田，生命生生不息。狮子、狗鹫哪里去了？海螺哪里去了？只有在老人们的回忆和神话传说中间，才能找到她绚丽多姿的影子！

苏计——胯骨；哈模——鼻子；

文圪气——心包；朱尔圪岱——六指……

以人体的某一部位命名自己的村镇，真是“独一无二”、“仅此一家”了！

脑木汗——忠厚老诚；纳太——软弱一团；
北只图——言有信；阿素——行动举止；
七布尔——讲卫生；乔圪气——神采奕奕；
吉忽伦图——庄严；各臭——勇猛……

以人的品质和行为赋予村镇，使土地人格化、形象化，
具有宗教色彩的地名有：

苏波罗盖——达赖喇嘛在此建塔；

呼包气——醒世人；麻迷图——经会之地（吉祥之处）阿西
德素——灵丹、仙丹；协力气——（喇嘛）席位；包尔汉
图——佛相；哈业色气——两个白塔；沙尔沁——白塔；三格尔
架——有神保佑；阿善——神水等。这些宗教神化的城镇出现，
与十六世纪阿力坦汗酷信喇嘛黄教有关。此时，青海、西藏的名
僧、活佛频繁到此传授佛经宗旨，故著名的五当召、沙尔沁召、
美岱召、梅力更召等寺庙出现在蒙古族部落，而“有神保
佑”——三格尔架等地名也就随之而产生。

著名的美岱召，建于明万历三年即一五七五年。原名“灵觉
寺”，清代更名为“寿灵寺”。因麦达力活佛在此坐床讲经的缘
故，俗称“美达召”了。召内殿宇楼阁，富丽堂皇，雄伟壮观，
对研究蒙古史、佛教史、建筑史、美术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明、清时期，山西、陕西、河南等省的农民，为了逃避徭役
和天灾，摆脱官、匪、兵、绅的勒索和压迫，冒着九死一生的危
险，出“口外”谋生。他们用铁锹在地下挖个洞窟，象老鼠那样
生活下来。这就是某村某镇称“窑子”的由来。“窑子”三处以
上，人口渐渐多起来于是就叫“营子”。“营子”和“窑子”
（也写作“尧子”）发音上差不多，其实都反映了汉族兄弟来到
内蒙古这块“天苍苍、野茫茫”的土地上的艰辛生活。如、王五
顺营子——清朝时期有个王五顺的在此定居而得名。杨家圈——
最早有个姓杨的汉人在此放牧，并建有拦圈牛羊的栅栏，故

得名。木匠窑子——最早有一木匠筑窑洞在此居住，因而得名。

“龙银锁”，是蒙名是汉名？原来有一个叫银锁的聋子在此定居。如今此村有一百四十七户人家，以种植蔬菜为主，有五百四十人。俨然是个大村庄了。

以地名演化出来的传说，非常动人。

如包头郊区有个叫“筐箩铺窑子”的村庄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传说二百年前，村民在此村的坡上打死一只猛虎，猛虎落在坡下，“坡落虎、坡落虎”久而久之，音讹为“筐箩铺”，故得名。“金钱铺窑子”，据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芦苇丛生，有一只金钱豹经常出没其间。后来汉族老乡在此定居下来，“金钱豹”——“金钱铺”——以“豹”转“铺”，于是得名。

蒙古族与汉族亲如一家，如兄似弟，确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谁也离不开谁”在历史上早有印证。

“谁也离不开谁”也反映在许多内蒙古的地名上！她以蒙语在前，汉语在后的形式出现。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结构形式，真是“谁也离不开谁”呢！

壕赖沟——干涸沟；

阿塔沟——马鞍孔式的沟；

蛇令沟——凉爽的沟；

色气湾——砂砾堆积的河湾；

章盖营——章盖（清时蒙古官名）住处；

板定窝——小喇嘛住过的地方；

斗林沟——打柴者走过的沟；

板申气窑子——有房子的地方；

马留窑子——有过野猫的地方；

蟒太背子——有树木的地方；

圪笨沟——有缝隙的沟，等等，举不胜举，俯拾皆是了。

包头回族土地经营史话

〔回族〕白宝〔回族〕马学明

包头有回族同胞安居最早可追溯到清乾隆初年。据说，河北沧州王家社桥的王修（王子和十一代先祖）老人，因其家境贫苦，肩挑八股绳（意思是肩挑两筐各拴四股绳），长途跋涉，徙居包头召湾莽盖图召附近，开始是经营小本生意。偶然一次，他在召附近因故营救了一条小蛇的生命，感动了召内喇嘛，便请他进召，并由此建立了友情，后安排在召上做杂活度日，接着拨给食粮地，由其自己耕种。

清光绪年间，土地发展到二百三十多亩，后因分家交给后代

“圪笨”是蒙语“缝隙”的意思，沟是汉语。“斗林沁”是蒙语“打柴者”的意思，沟是汉语。如此“蒙汉”相结合的村名、地名不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证明吗！

徜徉于此瑰丽丰富的地名世界中，探索其历史渊源，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人以诗情画意的陶冶！

蒙古族和汉族，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亲兄弟，以他们神圣的劳动，共同开拓了这块国土。他们的血汗奔流在一起，在这里生息，在这里繁衍！

而今，蒙汉人民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携手奋进，为建设繁华似锦的祖国北疆——内蒙古奉献自己的力量！

愿她高歌猛进，四季如春！

（本文作者系青山区政协文史干部）

经营。民国六年出卖给回族陈挠（陈善良之父）自耕，后来出租。一九四八年崇真中学发动回族群众集资办学，陈善良乡老毅然无偿地把这二百三十亩土地奉献给崇真中学作为校田，并办了地契。学校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其收入用于办学（由赵俊收租子）。

白万仓（楞柱），出生于同治年间（公元一七六五年）。他从小丧失父母，由二爷抚养到十几岁，从事体力劳动和牲畜行业赚了钱。从光绪年间开始，先后在今营子乡三黄壕、西大粪、黄草洼、前营梁等村购土地六百多亩。民国初年又将黄草洼、西大粪、三黄壕土地分别卖给马子义的父亲和靳裕等人。自己留下前营梁三百一十多亩耕种。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又在固阳阎贵壕村购轮歇地六百多亩，多半荒芜，后来出租。分家时，五个儿子中，三儿分得阎贵壕土地，大、二、四、五儿分得前营梁土地。以自耕为主。这是包头回族务农的又一家。

马文财是包头屈指可数的车马大户，光绪年间（具体时间不详），在后营子村与前营子交界处东坡一带购土地十几顷，在一个小山头上，取名马文财圪旦（现包石铁路西湾山坡，前营子村扬水站），解放前夕土地逐渐减少。

民国初年，马根荣（马兴之父）买前营子村王温水地五亩，相继又买村民旱地二十亩，到解放前共买水地三十三亩八分，旱地三百一十亩完全自耕。他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六个务农。一九四〇年分家后各自经营，平时自耕，农忙时也雇些短工。

以上是包头近处几家有地较早、土地较多的回族农户。

在民国八年，丁狮子（丁德小的父亲）在河套乡先明窑子村三道坝买水地五顷，旱地二十亩，相继又有马十、马金拴等十三户也在此买水地二顷三十亩，占三道坝所有水地百分之二十。

此外在小召湾、臭水井、南海子、开州窑子、二里半、共青农场、土合气等地，也有回族种过地。截止解放初包头附近种地的农民回族达四十七户，耕种水旱地四千零二十五亩（在伊盟和

固阳有的地，在城市居住的底家、马家的地均未统计在其内），名单如下：

丁根小、白殿元、何国瑞、马金拴、白文玉、金贵、马二秃、马林、马兴、马保鱼、马四秃、马来虎、马子恒、尹四命、陶三、马存亮、邓双恩、王德珍、陶有亮、刘秃旦、白土子、白富仓、王文、李常清、白尔利、白利、白贵、马尔利、马三明、杨玉亮、马四宝、马文财、马子义、靳裕、马板仁、马大五、陈大顺、马三三、王修、陈撓、王长胜、马尔利（磴口）、马和平、刘旦旦、白宝、石某某、萧某某。

在土地经营上，自耕者很少，多数出租。原因主要是：回族人民习惯经商，种地不在行，并认为土地是刮金板，故有钱买地买房已成惯例。自耕农以马家兄弟和丁根小、白家兄弟为主。生产技术由于在汉族老农的传授帮助下不断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平均每亩一百多斤，水地蔬菜作物亩产四千斤左右。在日伪时期种过一段大烟。

种植的作物，旱地以谷子、糜黍、高粱为主，山药次之，小麦稀少；水地种山药、黄萝卜、玉头、元白菜，其中以玉头为主。其他如架豆角、黄瓜、茄子很少。铺沙西瓜也有少量种植。

出租土地方式有下列几种：

一、固定租子：地户一切不管，租地的佃户负责税收、费用和全部人工。收租多少在春季商定，秋后一次结清。如租瓜田，山西老农有种瓜拢葱经验，来包挑选好地，租一亩旱地交五斗糜子，秋后按粮折钱，一次付清。这类地属于好地，大部分在黄草洼一带。

二、对半或四六分成

水地：地户到收获时去分百分之五十的菜或钱，税收也负担同样比例。而佃户投入全部费用和劳动力只得百分之五十。

旱地：地户除土地外，还要支垫籽种、牲畜、饲料、提供农

具等，而佃户投入全部劳动力，到秋后打下粮食，减去地户支垫粮草钱、上交公粮外，按四六比例分成。

三、小三股分成：佃户租地种，秋收时庄稼割倒捆好，通知地户到地里按捆好顺序，每隔两捆挑去一捆拉走，剩余三分之二归佃户，公粮按分成比例缴纳。

四、长期租佃：佃户与地户商定一租几年，每年交固定租子（钱或粮）。

解放前，城郊回族农户多数居住在城里，劳动在农村。如河东乡先明窑子村十八户农民，全住在东河区城里，而劳动要到五里以外的二道坝、前营梁。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中午带一点熟食，午休在小土房（称园房子）。遇有大风或下雨天，就不能下地劳动。且因路远、生活不便，上年纪的妇女不能下地劳动，生活受到影响。尽管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年复一年许多困难都被克服了。但在生产技术上比较落后，因而劳动收获少、生活水平较低。另外，除参加农业劳动以外，在解放前回族参政的也无几人，唯一的陶有亮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任过乡长，马四秃、马温道任过轮任保长、村长，解放初被镇压。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定成份，以前述租佃形式为主要界限，划分剥削与被剥削者，并将地户土地交给农会，多数人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少数人从此进城从事其它行业。通过土改划成份，有地主八户、富农一户，小土地出租居多，中农、贫农极少。

合作化后，由于一批年轻人成长，分红提高，生活上有些改善，骑自行车的人也多了。

三年困难时期，宁夏等地回族群众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背井离乡，迁居包头近郊落户务农者猛增，至今占郊区回族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用辛勤的劳动维持普通的家庭生活。并在生产劳动中，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情同手足、和睦相处，建立了平等团结的

小巴拉盖天主教史话

雷 鸣 春

小巴拉盖天主教会始建于一八九四年。早在一八九三年，教会就出钱向秦士英和大巴拉盖郭存礼购下土地。次年由准格尔旗程奎海子，党三尧及萨县二十四顷地迁来教友二十余户，开始建堂传教。当时的小巴拉盖的地址在现在村西约一里许（该地现叫火熬圪梁，也叫西伙房圪梁）。

一八九九年又由外地迁来二十余户，加之附近也有奉教受洗的，教友人数增至四百五十余人。

初建堂时由闵玉清神父主持。闵被调任圣母圣心会长后，由雷神父（gcellens）任第一任本堂神父；一八九六年孟神父调此任第二任本堂神父；一八九九年底孟神父病歿，由兰广济接任为

民族关系。

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也使近郊回族受到歧视。有的人蒙受许多不白之冤，有的人无辜被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的人被重新划为地主、四类分子、坏分子，还有的竟受到民族侮辱，使民族团结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回族群众在务农的同时，大力发展其他商品生产，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走上文明富裕的金光大道。

第三任本堂神父。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事，兰西走，只留教友们相持，终因寡不敌众，教友们弃村逃散，村内房屋财产尽被焚烧。

一九〇一年三月，南怀仁神父负责办理教难善后事宜，来至小巴拉盖，收容离散教友，进行抚慰。教会和教友分头工作，不久，一股凄凉气象才行减煞，遂于一九〇二年迁至现在村落。一九〇三年修筑城墙，开始设育婴院，养老院，专收被遗弃的婴儿和年老无人照料的人。这年梅佈桂神父调此任本堂职，其在任不久，便调往夏营子，遗缺由司怀智神父接补。

一九〇五年建公学院（是培英中学的前身），初招学生二十余名。这年小修道院在包海容院长神父的带领下，由巴盟三盛公迁来，与公学院合并。同年十月司神父调往二十四顷地，包海容继任院长又兼任本堂神父，遂将公学院学生迁送回家，只留修道生在此就读。

一九〇七年司神父又调回任本堂神父，修建了比较华丽的大堂（即在文革中被拆毁的经堂），一九〇八年，贺嘉宾任修道院长，穆青海神父助理之，同年又招收公学院学生，但仍与修道院合并上课，一九一〇年修道院迁至主教住地二十四顷地，只留公学院学生单独生活，穆青海神父任校长，同时定名为培英学校，学生从各地招收。

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教友人数猛增至一千五百多名，此后教务仍顺利地推进，儿童也随之增多，故于培英学校外，不得不另设男女初级小学各一所，专收本地学令儿童。这期间又在五盛公开设传教公所，盖有经堂，神父住屋、工人房舍等多间。此处神父定期去讲道理送弥撒，教务可称兴隆。

一九一四年收成欠佳，教会则由积谷中拨散赈济粮赈，教是按各该受赈济户儿童多寡发给，这是此方赈济之倡举。

一九一七年冬鼠疫流行，此村教友仅死十三人，这与司怀智

神父和教会会长们的同心协力防治分不开的。教友们为慈主恩计，集资修建钟楼一座，以作纪念。（此钟楼文革中被拆毁）。

一九一八年司怀智奉调回比选总会长，穆清海接任本堂，培英学校则由国籍神父郝道宾接任校长。一九二六年春穆清海奉主教命，大兴土木，修建了外籍修女院一处，继而改建了神父柱屋。

一九三〇年穆清海升任圣母圣心会绥远教区会长，遂调狄文华神父接任本堂。这年葛崇德主教视察教务至此，见培英学校学生人数剧增，原校舍狭隘，不敷应用，遂拨现洋一万四千余元，委托狄神父主持扩建长二十丈宽两丈之大寝室一座，经堂与饭厅也较前扩大三倍。此后又增设幼稚园，改建育婴院和女子初级小学校，同时增建了女子学校，专收外地女生，定校名为启秀女校。

一九三二年夏，鼠疫流行，此间已事先闻讯，加之狄文华医学有素，开示预防良方，张贴街头，广为宣传，本可制止发生，但因少数居民，为了赚钱，出外地割洋烟（鸦片），染疫归来，漫传村内，不数日死伤二十五人，殆觉察后，当即进行防疫注射，又忙于疾发针挑手术，疫势虽煞，但遗害已深，造成鳏寡孤独之惨景。

一九三五年狄文华因年老不能任此重任，被调往美岱召天主堂，遗缺由顾维德接充。一九三六年划分院落不少，使各归其局，并添建了神父饭厅和客屋数间。此间堂内事务日渐繁多，本堂神父兼职多，不好全面管理，故又调雷清渊、陶维新二神父来此，分管财务和启秀女校。

一九三八年秋，顾奉调到河北省文安县开办新教区工作，德安民调此接任，且于三八年春，鄂尔格逊村民记名要求奉教者多，大巴拉盖也有奉教者，两村遂都成立了谈道所，分别派贞女孟世贞和教员高天期为两村常驻谈道员。顾维德终因重病不能赴

任，留在归绥公教医院调养。

一九四〇年顾维德又调回原任本堂，德安民调往小淖，是年奉主教命，创建国籍修女会，招收初学修女九人，一九四一年初学期满，发愿为第一批修女，定会名为圣母圣心婢女会。此后又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分别招收四期修女，人数顺年序为十一名、六名、五名、七名。总共五期共三十八名，创始人为顾维德，会长为韩进珍。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日寇宪兵队将内蒙境内的外籍神职人员一律集中到山东游县达五个月，以敌对国俘虏待遇。以后转留到北京石虎胡同耶稣会德胜院内，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始恢复自由。在此期，此处本堂由国籍神父阎嗣良接任。

一九四三年冬，本地曾遭土匪张文彪（外号机关张）洗劫，天主堂内的骡马尽数被劫，培英和启秀学生的衣物也全被抢光，只留给学生每人一件裤衩，无奈两校只好停办，次年秋才复课。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培英和启秀奉政府命合并为一校定名为培英中学，但仍照教会传统，男女分治。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小巴拉盖教堂因拥有土地一万二千余亩，划为地主成份，土地房屋俱在没收之列。当时只给神职人员留下一处小院落（前后院），计房四十八间，供他们使用。又给教会留下东西菜园共十六亩多，还留下经堂一座（两屋共三十七间），钟楼一座，以上统作为天主教产，并分项发给产权证。自此后，堂内再无其他繁杂事务，专以传教为业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此期间，神职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教徒则定为帝国主义的愚民奴才，神职人员被赶到劳改队，分任在各队（造反派在七队，红卫兵在十队，红卫军在五队，陈德英在九队）造神父除揪出游斗外，最后被扣捕管押八年多。教徒则令全部退教，并令在退教书中签名书写退教声明。经堂钟楼被拆毁，改建为大队俱乐部，神职人员住房拆除改建为

大队办公处所，祭衣祭器圣物等均被没收，不知去向，自此宗教活动亦下令停止了。教徒有信仰的也只好转为地下，在自家私自偷摸地祈祷了。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落实，各地教堂陆续开放，小巴拉盖也得到了解放，宗教生活得以重新举过，信教群众喜形于色，称颂党的宗教政策英明伟大。

注：

1、文内除郝道宾、孟世贞、高天翔和阎嗣良四人外，其余都是外国人；

2、本文材料来自侯建章、李选有、韩效良和秦五香等人。尤其是秦五香是秦士英的孙女，韩效良是秦世英的外孙，关于小巴拉盖天主教的土地来由他们是很清楚的。

3、本文因供给资料的人少，知道的也不够全面，所以只能写出所知的一些大概情况，以后如再有了解到的资料，再以专题撰写，谨向读者致歉。

（本文作者系退休教师）

沙尔沁召喇嘛杨林匹尔

【蒙古族】齐达勒图

杨林匹尔姓兰，是鄂尔格逊满泰的叔父。“杨林匹尔”是它在沙尔沁召当喇嘛时，老喇嘛给起的藏语蒙名。杨林匹尔从小聪明好学，勤劳刻苦，深得师傅格勒僧的宠爱，因而给他买了一双香牛皮靴穿。他把这双靴子看得十分珍贵，每逢下山买东西或办事时，师傅让他穿上去，可他一出召院便脱下背着赤脚行走，直到快进沙尔沁村时才再穿在脚上。山路上荆棘遍地，山石嶙峋，他宁肯把脚碰得血流不止，也不愿损坏师傅给买的香牛皮靴。其权变邀宠之心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他精明干练又精通蒙汉藏语文，也深受众喇嘛拥护，因而在二十多岁时就被公推为沙尔沁召的当家喇嘛。

杨林匹尔接任大喇嘛后，遇事愈加勤谨卖力。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把沙尔沁新旧两召整顿得井井有条，并重修旧召，唱了两台大戏。又在新召东北角盖了一所佛爷厅，两厅五间，东西厢房各四间，建筑相当考究，绘有沙尔沁召美达尔大佛爷的彩色壁画。把召内外布置一新后，唱了开光戏。各地前来朝拜的蒙汉人很多，布施收入近万元银洋。此后沙尔沁召的名声远震，而杨林匹尔的名望也日隆。

五当召的众喇嘛和活佛也认为杨林匹尔很能干，恳请他上五当召当大喇嘛，他接受了这一邀请。临行前，他特留下原召苏木沁湾村子的二十户蒙族村民院落强行划入沙尔沁召庙产，赶走了全村居民。因满泰是土默特总管，又是绥远省代办都统，村民无人敢出头，只好忍气吞声移居别处。这些残墙破壁一直到解放后合

作化时期才清理掉，在原基础上盖起了新房，现有三十余户居住。

杨林匹尔当大喇嘛后，一方面治理庙院，另一方面也大力经营自己的私产，他占有的私人宅院占地约百亩，从东园东北角至铁匠沟门都归他私人所有。宅院四周围以土墙，有南北西三个门，养家兵二三十人，有管家记账先生，男女佣人数十，俨然是个土皇帝。院内果树成行，还种植大烟，每年可收千余两。在杨喇嘛死后，他的侄孙满纳森、满重森在他住宅的地窖里发现了两箱德国造大把子自来得手枪，有二十多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侄孙们谁也不知。当时满纳森是土默特保安师第一团团团长，日本人到绥远时跟荣祥退到伊盟东胜，把这些枪也带到伊盟了。

杨林匹尔在五当召当大喇嘛收了一个徒弟，叫丹毕尔。此人交游甚广，很有手腕，替师傅办了许多事。他会讲几个民族的语言，懂好几种文字，跑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结交了不少宗教界上层人物。他不仅经文背得熟，又能占卜行医治病。一次为阎锡山属下的一名官员治好了久治不愈之疾，阎锡山化布施一次给五当召二十匹大洋马，后繁殖发展到百匹以上。

杨林匹尔为给五当召弄更多的钱，命丹毕尔到外省各地化缘，筹划盖一座接官厅和一座关爷庙，但遭到了另一名东北籍大喇嘛的反对，因为关帝是汉满人敬奉的神，喇嘛召内是不允许供奉的。可杨林匹尔不顾反对，坚决要盖。接官厅建筑讲究，风格别致，回廊曲折，别有一番情趣。在此接待官僚贵宾，可以更多地募化布施。这一接官厅现在还在。

丹毕尔奉派常年在外化缘，他不甘只身寂寞，带着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白天假称师徒瞒人耳目，夜间则同枕共眠。但此事被云南的佛教徒察觉，给五当召致函致电质问五当召为何派此佛门败类周游全国化缘，给佛祖和召庙僧众脸上抹黑。这时，关老爷庙已盖好，只差一个戏台。而丹毕尔所化布施全被当地佛教

徒没收，他当卖了首饰才狼狈返回五当召。此事被揭露，杨林匹尔颜面无光，被他压服多年的喇嘛僧众对他群起而攻之，并将已近竣工的关帝庙一夜间夷为平地。众喇嘛面对染病卧床的杨林匹尔，当面历数其行事不当之处十余条，并迫令交出大喇嘛符印，让位交权。杨林匹尔一气之下，竟至身亡。

杨林匹尔是一位颇有心机的喇嘛，是沙尔沁召、五当召众多喇嘛中的佼佼者。可惜笔者对其生平经历知之不详，企望拙文能引出知情者的纠正和补充。

（本文作者系退休干部）

文史知识

生活清简的宋武帝

南北朝时的宋武帝刘裕，一生生活清简，不求奢华。《宋书·武帝传》中说他“未尝视珠玉与马之饰后，庭建立后，有关官吏要在殿堂上放局脚床，银涂钉。他却让用了直脚床，钉用铁。平时走路，他还穿连齿木屐。他死了三十多年以后，因他身前居住的屋宇坏了，其孙宋孝武帝准备在原处重盖一殿。重盖之前，孝武帝带领群臣前去观看武帝生前居室的陈设，只见床头必土帐（黑布屏风），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群臣都很叹服。大臣袁凯感称武帝俭素之德，也影响到他的子孙说：“田舍翁得此，以为过矣。”

一个封建时代的帝王，尚且能够到如此俭朴，成为群臣楷模。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当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俭养廉，严于律己，为广大群众做出榜样。

转《黄石纪检》

英勇无畏的郭家弟兄

郭全孝、王佑等口述 土夫整理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在土默川上肆无忌惮地强霸土地，勒索民财，妄图把辽阔、富庶的土默川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变为第二个比属刚果。但是，何为强悍、刚烈、正直的土默川人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对外国传教士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勇猛顽强的反抗。在小巴拉盖经营土地的郭誉盛、郭誉宏兄弟二人就是突出的典型。

小巴拉盖村位于土默川平原的西部，北距大青山、南离黄河均约十里。那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灌溉方便；又是联结土默川与包头、固阳、河套和达拉特旗的交通站口。光绪年间，萨拉齐的著名武术家郭存礼，先后在这里购买下几十顷土地，让其次子郭誉盛、三子郭誉宏经营。这郭誉盛、郭誉宏兄弟二人生得身材高大，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说话声如洪钟，性格刚烈耿直，忠厚仗义，敢作敢为。他们从小跟随父亲练得一身好武功，对宋景诗传下的阴把缠枪掌握得尤为娴熟。他们在经营土地的同时，还招收本地及四周壮年习武练拳，想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出一把力。

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担任比利时圣母圣心会联络员的闵玉清亲自选定小巴拉盖为传教据点，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仅次于二十四顷地主教府的中型堂口。这个闵玉清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特别善于官场交涉，外号人称“骗子手”。他考虑到要在小巴拉盖站稳脚跟，必须先得把郭家兄弟争取过来，于是他先行派

人引诱郭家兄弟信奉天主教，答应给其显要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郭家世代信奉佛教，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明确地答复来说：“我们是中国人，对洋人兴办的天主教根本不感兴趣！”

闵玉清看着拉拢利诱的一招不行，就依照“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又提出用钱购买郭家土地的要求。他派一个善于言辞的人跑去对郭家兄弟说：“你们不信教也好，能不能把土地卖给天主堂？你们原先花了多少钱，天主堂可以多付给你们一些！你们拿上钱再到别的地方办事业吧！”郭家兄弟严词拒绝道：“这是什么话？我们郭家在这里已经耕耘多少年了，怎么能把先辈的产业买给外国人开办天主堂呢？明话对你说吧，天主堂就是把银子堆成山也别想买走我们的一寸土地！”

闵玉清看到软的不行，就凶相毕露，于是生出了霸地的邪念。经过周密策划，他们首先编造谎言说：“郭家耕种的土地并不是花钱写约买来的，而是一个返回内地的地主的撂荒地。现在天主堂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已经买下了这片土地，并且拿到了地契！”接着便宣布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归天主堂，要强行耕种。开春的一天，天主堂组织一帮人，有的赶着牲畜，有的扛着犁耙，有的拿着武器，吆吆喝喝地去郭家地里强行耕种。

不畏强暴的郭家兄弟也早有了准备，见教会动了手，他们便立即召集起他们的徒弟和附近有正义感的村民，人人手拿武器，雄赳赳地涌向现场。双方对峙，据理相争。教会方面理屈词穷，狗急跳墙，首先动起手来。郭家兄弟一声召唤，众弟子和乡亲一齐动手，那些不会武术的教徒哪里低挡得住，一个个丢下农具和武器，狼狈逃窜。从此，揭开了土默川上反帝斗争的序幕。

一八九四年，霸地失败的闵玉清恼羞成怒，一面贼喊捉贼地萨拉到齐衙门起诉、控告郭家“侵占了教会的土地”，一面下令组

织教徒进驻小巴拉盖，在纠纷地区盖起几间茅屋，精心选聘了一个身体魁梧的神甫和为数众多的教徒住下来，一只手拿着工具，一只手拿着武器，继续强行耕种这些土地。这些人终日提心吊胆，白天黑夜放哨警戒，生怕遭到郭家弟兄的突袭。

对此，郭家弟兄毫不妥协，又相应地组织了多次反抗，带领他们的徒弟和乡亲向侵略者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双方各有胜负。后来由于闵玉清的再三交涉，对外屈膝让步的萨拉齐衙门口头认可了教会的土地所有权，进而又助长了闵玉清的霸地气焰，闵玉清竟命令教徒们把庄稼种到郭家住房的周围。郭家弟兄又组织了更加有力的反抗：当庄稼成熟时，经过周密的部署，发动了更多的群众，在一天夜里，由郭家兄弟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趁神甫和教徒们熟睡之时发起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纷纷四散败退。这时郭家弟兄便指挥附近村民，人背、车拉、牲畜驮，抢收了教会种起的庄稼。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闵玉清深知斗不过郭家弟兄及附进群众，但他却了解当时的官府衙门是怕洋人的。因此他又到衙门告状。衙门屈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明令郭家弟兄交还“抢走”教会的庄稼，并不准以后发生类似事件。

郭家弟兄不屈不挠的反洋教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支持，萨拉齐地区的各族各世界人民纷纷起来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官府的妥协投降态度。萨拉齐衙门怕出现教案，遂用调和的办法解决问题：撤办前任官吏；给教会白银三千两，交还郭家土地，到别处建堂。

霸地性急的闵玉清对这样的处理很不满意，在暴怒之下撇开萨拉齐衙门直赴北京去找法国驻华公使馆。一八九八年，法国领事经过强有力的交涉，终于得到总理衙门的批准：不许郭家弟兄“扩张”，“认可了教会是巴拉盖土地的合法主权者”（《小巴拉盖天主堂筒史》）。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郭誉盛、郭誉宏积极响应，在萨拉齐镇内大北街住处开始设坛练拳。他们的徒弟，一个个年轻力壮，武艺高强，有的揪住马尾巴就能急跃到马身上。出于正义，萨拉齐镇内的首富大户赵国安见义和团勇日众而其院落狭小，就主动提供“德泉店”（现旗邮电局大院）让其设坛练拳。当地的不少青壮年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也纷纷入团练拳，一时间就招下三四百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决定首先去攻打小巴拉盖天主教堂。农历六月十一日早晨，红旗前导，郭誉盛、郭誉宏身背弓箭，手执长矛，骑着大走马，带领着身着红色号衣，头裹红巾、手执武器的大队人马，威武雄壮地向小巴拉盖进发。当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鄂尔格逊的义和团首领许文会也率众赶来，两家合兵一处，向教堂发起猛攻。郭家弟兄的徒弟云连生、程全中等首当其冲。团勇们五人一列，十人一行，有的挥舞大刀，有的手执长矛，有的抡起大棒……奋勇向前杀去。这时教堂也早有准备，用双筒猎枪、牛腿炮和土制手榴弹拼命顽抗。战斗连续数日，双方不分胜负，各有伤亡。六月二十三日，当战斗打到十分激烈的时候，郭誉盛、郭誉宏带头冲锋，利用飞爪和百练索攀上围墙，杀进教堂。外国神甫眼见性命难保，拔腿便跑。教友们见势不妙，各自逃散。郭誉盛、郭誉宏带领团众冲进圣堂，将圣象砸了个粉碎，把粮食等财物分给群众，然后放火把教堂烧成灰烬。当郭家弟兄带领人马胜利返回萨拉齐时，人们看见他们的衣服上有不少弹片打下的窟窿和污渍。在萨拉齐稍事休息，郭家弟兄率领这部分义和团众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二十四顷地，和托县等地的义和团合兵一处，于二十四日攻克了主教府，活捉了老洋魔韩默理等人。不久，郭家兄弟又带领萨拉齐义和团打下了黄河南岸的小淖教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闵玉清急速返回萨拉齐进行疯狂报复。郭誉盛、郭誉宏骑了两匹走马，日夜兼程，跑到荒无人烟的后草

话“过年”

齐志龙

在我国，“过年”（过春节）已成为世代相传的至盛佳节了。身居国外的炎黄子孙也不例外，届时也依各自的传统习俗隆重进行欢度。我所描述的包头地区及中滩沿黄河两岸一带群众过年的旧风俗，有国粹，也有糟粕，现在大部分虽已被破除，但仍为一些老年人所迷恋，在这里我把它写出来，并非全盘维护它，而是望广大群众读后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它，“移风易俗，改造世界”，去建设自己文明幸福的新生活。

现在过春节，省事又热闹；过去过大年，繁琐又俗套。你看吧，一进腊月，家家忙得团团转，人人累成土圪旦，只有一些小娃娃，偶尔放一、二个鞭炮，才使忙乱的人们稍稍心闲一点儿，先拿吃得来说吧。一进腊月，家家推碾围磨，加工米面，还要炒炒米，蒸点心（馒头），炸油糕，切肉馅，焐萝卜，切酸菜蛋蛋。这些弄好后，都冻出去，做饭时，往锅里一放就行了，为的是正月里闲下来好红火几天。再说做衣服。妇女为给家里人赶做新衣、鞋袜，常常坐夜，如做不起新衣，就是旧的也要拆洗一番。真所谓“二十七八活见鬼，初一初二童男女”。此外人们还要栽葱、栽蒜，生豆芽，磨豆腐，这都是女人们的事。为了美化

地，隐姓埋名，浪迹天涯。民国时他们又和天主堂连续打了多年官司，也毫无结果。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通知郭家弟兄后代到小巴拉盖认领土地，此事才水落石出。

（本文整理者系土右旗志史办干部）

室内，女人娃娃还要用麦子、豌豆、扁豆等生豆青青，孩子们把蔓菁、芋头或萝卜切掉一半，用小刀挖个洞，放上水，侧立在室内，使其长出英子来，这些就是当时最美丽的“盆景”了。

腊月初八，家家户户要吃“腊八粥”，粥是用软米（黄米或江米），红豆、红枣做成的，有钱人家加入些玫瑰、葡萄干，吃时撒些红糖。做粥时用勺舀出些红米汤，倒在碗里，冻成冰坨坨，然后将红冰坨搁在粪堆上早已栽好的冰人头上，远望去，好象头戴红凉帽、身穿白袍的人在那里站着。这个冰坨，冻后中间突起，表示来年好收成。“腊八粥”都要在早上阳婆出窗前吃，而且先给小孩儿吃，并把小孩儿叫做小糜糜、小谷谷。是期望来年五谷丰登的意思。

过了腊八，人们就开始买香、表、年画、爆竹、窗花、红纸、糊窗纸和其他彩纸，人们称作打纸杂。俗话说“庄禾人打纸杂，见样样一张”，就是说的这件事。除此以外，每户必买灶神爷、财神爷、土地爷等印好的纸神位，准备过节供奉。

腊月二十三，搞祭灶和洗灯盏活动。过去农村没电灯，也没有煤油，都是麻油灯。油灯是由灯盏、灯盘、灯树、底座四部分组成的。灯盏是瓷的，灯盘是铜的，这都是艺人做成的。灯树是一根三公分粗、三十五至四十公分高的一根木棍，栽在一个十六至十八公分见方四公分厚的木座上。灯盏有三个眼儿，两边有两个纫灯芯的小眼儿，中间有往里加油的大眼儿，点燃后只有黑豆大的小明点，哪里要照明，可以挪动到哪里（详见油灯图）。腊月二十三，要把用了一年、有很厚油垢的灯盏洗净。人们常说：“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洗灯盏。”另外，这天要祭灶，因为这一天灶神爷要上天了，人们买些麻糖，用麻糖在炉口上划圆圈，口中念道：“灶神灶神你本姓李，一块麻糖糊了你的嘴，上天为百姓说好话，你把坏话各自埋。”祷告后，将麻糖仍进灶火里，开始烧香、敬表、同时将供了一年的灶神位焚了，这就把灶神爷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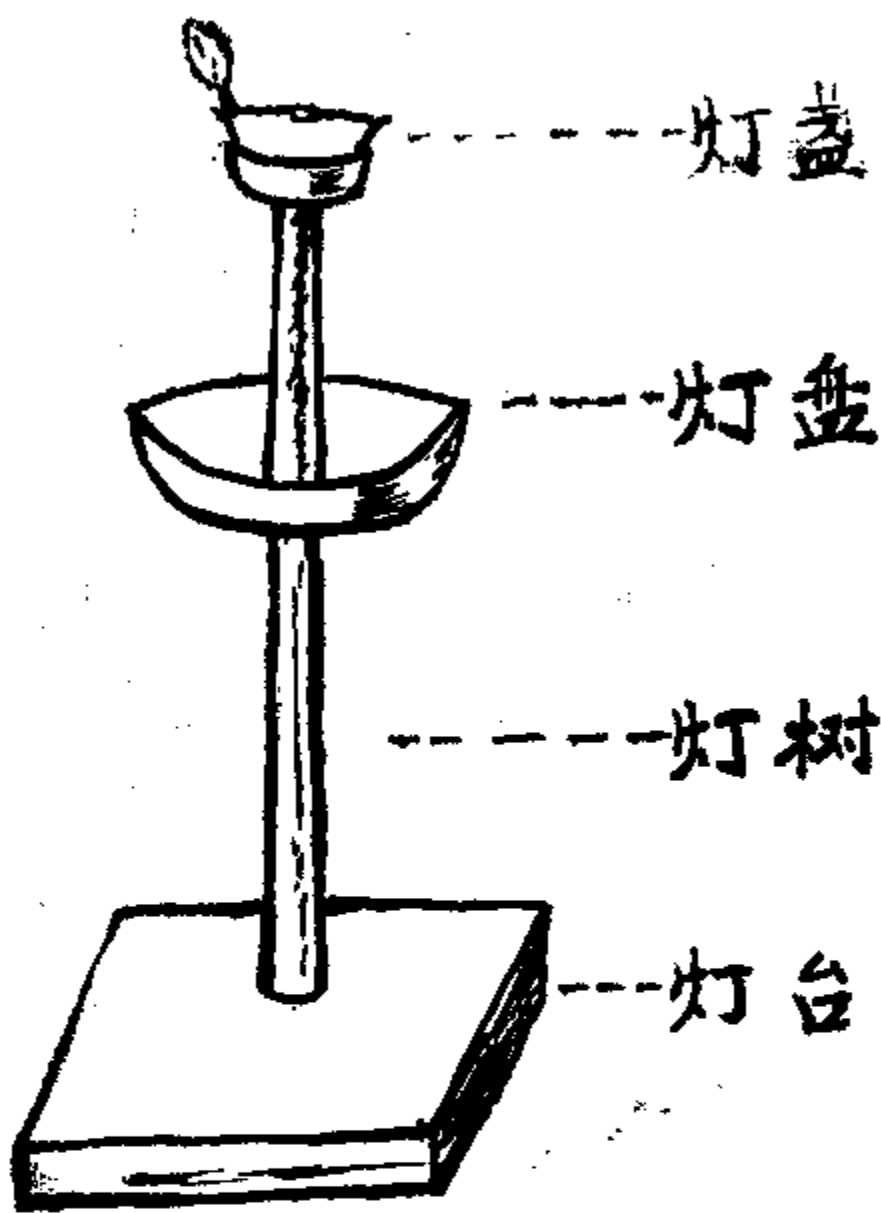
天了。

过了二十三至年前叫“乱水”，人们娶媳妇、聘闺女不再择吉日了，哪天都可办。因为这几天一切神位都归天聚会去了，向管它们的天神诉说地下一年黎民百姓的生计，并领受来年的旨意。

腊月，人们都要彻底打扫一次家，刷墙糊窗是两大营生。糊窗户是个细心的活儿，家家户户用红绿色纸，在窗户角处配置图案，中间把巧

手妇女们用红纸剪的各式各样的窗花贴上，或糊上印有图案的窗花。一般人家是三十六眼窗子，糊时比较省事，大户人家是满面门窗，还有窗心，糊时十分复杂，巧媳妇们糊出来的窗子，花朴拉拉，真有个看头。

大年三十早晨，家家都吃隔年捞饭，表示一年的收成够两年吃。这天，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干二净，贴好对联，糊好灯笼，架好旺火，妇女把屋内重新布置一番。贴好年画，把财神爷，贴在正面墙上，土地爷贴在院里醒目的墙上，灶神爷贴在锅台正上



油灯图

何国华、戴先 作

方。同时，都要写上吉祥的对联。这些对联都写吉祥如意之词，如灶神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天下午家家户户都吃好的，并习惯吃炖猪骨头，煮猪头蹄或吃炖肉。除夕晚上有些户家是喝茶炒米。

年三十晚上还有许多讲究：傍晚把所有的灯盏都加满油，连空房、凉房牛马圈棚都要点上灯，院内挂起灯笼，彻夜通明，灶火也不让灭，有炭的放些炭，没有的放些木柴，表示旺盛；全家人坐下来熬年，通宵不睡觉，认为这天晚上“神鬼”乱串，人睡着魂魄外游，恐怕遇上凶神恶煞被捉走。被捉走魂的人，轻者要病一场，重者还有更大危险，接神后就不忌了；这天晚上讲究安静，走路不让有脚步声，不许高声喊叫，不让孩子们串门，不准隔门说话，怕接了“鬼音”；有的人家门外立把菜刀或斧头，以示祛（镇）邪，晚上熬年时，大家庭弟兄们到一起谈论今年的年景，明年这块地种什么，那块地该种什么，概括的说是叨拉今年收成的好坏，提出和估计来年种植什么庄禾能得好收成；妯娌们包完饺子没事干，玩玩纸牌；一群孙孙围在爷爷跟前听爷爷讲故事，有时爷爷准备些碎冰糖，出谜语让孙孙猜，谁猜对奖冰糖一块。

大约在三、四点钟村里各户，陆续点着了旺火，全家人围着旺火放炮，表示迎接诸神位降凡。响完炮意味着接回神来了，男主人开始上香、敬表。财神、灶神、土地神等神位前各插三柱香，门神、圈神前各上一柱香。从三十到正月十五日每天早、午、晚吃饭前三烧香，九叩首。接神后便端着供拿着香表进庙敬龙王爷了。

天刚亮端上供，把牛、马、驴、骡牵上，到村外迎喜神。喜神还有方向，按“黄历”规定看在哪个方向就到哪个方向去迎。到村外老远的地方，烧香、敬表、放炮后，就表示迎接回喜神来了。往回走要拾几根树枝叫摇钱树，拾几块园石头叫元宝，

拿回家供在神位前。

初一早上，吃完饺子，在家里小辈给长辈磕头，先男后女。磕完头长辈要给晚辈们（孩子）押岁钱。接着小辈们带上一份礼物（七个点心——馒头）到老爷、舅舅、姑姑、姨姨家去拜年。拜年都要在午前进行，要跪在神位面前磕头。新媳妇拜年更有意思，小叔子、小姑子们围着要耍笑一番。大人们也要相互到亲朋友家贺年。一进门拱手说：“过年好”，回答是：“好，见面发财。”接着把熬好的红茶、炒米盘、油蛋蛋（黄米炸的）端上来，招待客人。桌子上点一盏小油灯，把羊腿（水烟袋）或旱烟袋递在客人手中请吸烟。年后近亲或近友都要互相请吃年夜饭，年夜饭以蒸馒头、油糕烩菜的居多，最好的是饺子，不上酒。

正月初五，天不亮搞一次送穷神活动：这天早晨，把家中初一至初五扫下的垃圾，用簸箕端上，剪个黄表人，带些香炮，送到村外，点香敬表、放炮，嘴里念道：“穷媳妇穷，离我门，一炮撵到你半天云。”另一种念道：“穷媳妇穷，早离我家门；去王柜打一尖，去李柜扎老营。”王柜、李柜指的是附近的大地户，穷人家希望穷神到他家扎老营都盼他们穷，我们富了才好。结果是年年送穷神，年年仍受穷，有剥削阶级存在，穷人是翻不了身的。

到初七这天晚上也有说道，一说这天是“人七”，意思是人生于“七”，这天谁也不能出门，出了门的也要回来。一说这天是熬小年，说是这天耗子（老鼠）娶媳妇，怕老鼠成灾，每家用糕面捏二、三十盏小灯，倒上油燃后，放在屋里最暗的地方（老鼠经常肯出没的地方）直至油干捻尽灯熄。这天黑夜，人们不熬通宵，只是比平日晚睡一会儿。

不知是懒人的借口，还是有意让人在节日后更好地休息和玩乐，所以有许多忌讳：过了年，说今天不动筐簸箕；明日不用锹锨斧头，后天不动升、斗、秤等；妇女们，初一不能洒水，初

二不动针线，初三不动剪刀……。初一到十五，几乎都有忌讳

正月二十日过小天仓，要吃填仓菜菜（饺子或捏成饺子样的包子）二十五日过老天仓，要吃盖窖饼。这天要打窖埋粮。即用炉灰在院内划几个大圆圈谓之“囤”，中心堆些灰，就在中心的小灰堆内埋些糜、麻、谷、豆、麦等粮食，表示今年要丰收了，各种粮食丰盛。

二月初二，说老龙要抬头，这天要搞一次囤舍，把住娘家的媳妇叫回来，一家人都在，用炉灰，把房周围圈起来，以示一年的安全。如果有出远门的人，去哪个方向，就在那个方向留个小口，表示留门，让出门的人顺利地回家，全家欢聚。

（本文作者系郊区政协干部）

· 小资料 ·

鄂尔格逊的礼门公所

官步生

鄂尔格逊的理门公所，在民国十九年间，由萨拉齐传入。由沙尔沁人郜旺选当家创办。

该教信仰释迦牟尼佛，是佛教中的一个流派。禁烟酒、忌食肉。以教友养教、办教。每年腊月初八，施饭一日，平时设有佛堂，烧香敬佛。定吉日，“附沙盘”也有乩手，说是佛主有法语来旨，抄录下来，可以普救众生，所以教徒发展较快。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已发展男女教友三百多名。他们所学经典以《金刚经》、《观音经》、《大悲经》等为主要经典。此外，还讲伦礼道德、因果报应，三皈五戒等。其为人处世之道是：爱惜生命，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沙罩灯。开笼放鸟，讲究善赏恶罚，必有报应。日伪时期，宣传禁鸦片，忌赌博，博得了人民赞扬。解放后停办。

谈“娶 嫁”

齐志龙

写 在 前 面

“男婚女嫁”历来被视为每个人终生的一大幸事，故有“办事宴”之谓。当我提笔写好这一题目之后，便激起我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瞬间回荡于我脑海中的又是解放初期，某首歌的几句歌词：“旧社会好比是，黑圪隆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低层。看不见那太阳，看不见那天；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当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罪，谁来搭救咱……”催人泪下。

“关于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一定的社会方式制约，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康克清语）。

“谈娶嫁”粗略忆述了解放前包头附近广大农村，操办青年男女婚事时的传统风俗。其间伴有良好的祝愿，有悲痛凄惨；有华夏精华，有封建糟粕……将其呈献给读者一阅，旨在为“破除旧风俗，树立新风尚。”若能为广大妇女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稍有裨益的话，更属笔者极大的欣慰了。

旧社会的婚姻，都听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前，互不见面，即使想看看，也只能碰机会在背地瞅一瞅。虽有个别原来就相识的意中人，不过成婚还得取决于父母。特别是女

方受“三从四德”的束缚，婚姻大事自己更作不了半点主了。

解放前，婚姻问题既无法可依，国家也不去过问。所以有三妻四妾的，有近亲婚配的，有老娶少妻的，大媳妇有小女婿的，有指腹为婚的等等，咄咄怪事无所不有。有钱人家的男孩子不是十三四岁就给完婚。没钱的则是二十多岁才给订婚。甚至打一辈子光棍。妇女则相反，有钱人家的姑娘都是十七八才出聘，穷人家的女孩子十三四岁就过门了。由于生活所逼，有的把几岁的小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妇，侍奉公婆。婆家养到一定年令，再给梳头完婚。

我这里既不讲老夫少妻，也不说妻大婿小，只叙述一般人家一夫一妻娶媳妇的风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古往今来的道理。所以在旧社会男女到了十七八岁时总有好心人来给提亲。多数是男方托人向女方求婚。双方父母各自了解了对方，认为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亲，便答应了。农村人婚姻上讲究很多，首先是看对方有无“根底”问题。（狐臭病或称臭骨子）。其次才是要求姑娘脚小，好针线，最后才是论人的品行、容貌。所以虽经媒人介绍，但还要作进一步的了解。过去的介绍人叫“媒人”，也称“宾公”。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女所为，认为他们说话有信用，办事又公道，必须取得双方信任才能说合，否则还得另换“宾公”。双方同意后，要写一个订婚文约，俗称“八字”。其内容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写经某某作媒，某某愿将女儿某某许配某某之子为妻，商定财礼多少钱，衣服几身，手镯几付，耳环几对等；一部分写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所谓生辰八字是指男女双方的出生年（又叫属相）月、日、时，因古代是以“天干”，“地支”计时，所以年月日时配上“干支”就有八个字。如双方“八字”相克，也不能婚配。所谓相克，即指男女双方的属相相背，什么“猪见猴泪长流了”，什么“白马怕青牛了”等。如属相“犯月”（指某一属相在某月不吉利，如生在一月属

“龙”就“犯月”也不行，如女方属“羊”，那更是婚配的大忌，尚有“女人属羊，家败人亡”的说法。“八字”写好后，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和媒人都要画押并各执一份，从此就算把亲事订下了，姑娘便属婆家的人了，有什么不测也是婆家的事了。婆家要陆续如数地把财礼、衣服、首饰交与娘家。农村因多数没有钱便把财礼折合成粮食写入婚约，男方即把粮食送去。订婚后，年令大的交清财礼、衣服当年便可成亲；年令小的则有三年五载才给清财礼、衣服后完婚的。不论订婚时间多长，在结婚前还要举行一次“探话”。带上羊腿酒瓶等礼品，把订婚文约带上到女家核实财礼、衣服交待没有。并商定娶聘日子。还要把娶亲是用轿还是用轿车，迎亲还是等亲，几班鼓匠，几顶轿，何人娶送，拿何礼物等等都要一一订下来。农村两班鼓匠、两顶轿便是最排场的了。也有用一顶轿的，来时新郎坐，回时新娘坐，新郎换骑马。所谓迎亲，就是随新郎一同去娶；等亲则是新郎在自己家等候。由娶亲的去娘家娶新娘。为使娶聘热闹，多数则是迎亲。用轿车娶媳妇的较为普遍。没有轿车的就在马车上自己用树枝编成圆顶上面围盖蓝布或红毯子，做一个简易轿车楼。

不论订婚还是“探话”到娶亲，都不是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女家商确，而是由媒人同当婚者的叔叔、大爷或舅舅代替。当地人讲究：没过门的亲家不会面——来往。

过去娶媳妇不仅要提前到亲友家请知，办喜事的前一两天还用车上门把亲戚接来，事后送回去，不需接送的亲戚也按请帖的时间，不论远近头一天都要请齐。晚饭前，新郎要穿好新衣服去坟地给已故的先祖烧一次纸，以示对他们的怀念。

傍晚时所有亲朋好友们都来了，新婚对联也贴好了，满屋满院都是穿红挂绿衣着整洁的亲友。这些出出进进的人群中，代东者最忙了。根据旧的规矩，东家依照自己事物的大小，需请一至二个有经验者代办，俗称代东。因为主家一则忙不过来；二则礼

掩上没有经验；三则如出了问题，代东的也好说话，代替主家遮路，所以谁家办红事宴都要请代东的人替他安排一切。

有鼓匠的在晚饭时要开始吹打。饭后要摆“宵夜”，亲戚们一边喝酒，一边要商议几件事：确定一个叔叔或大爷、一个舅舅、一个婶子或嫂子为娶戚，再从同辈人中选一个伴女婿，一个放炮的，一个挡红毡的。当然还需轿夫或车夫，有的还要跟一班鼓匠，往返一路吹打。定下去娶的人，帮忙的人，东家要给帮忙的每人满一杯酒，表示对他们的重托和谢意。然后便开始排礼单了。典礼（也叫拜人），有里三堂，外三堂、混三堂三种：里三堂即先给本家人轮大排小典完再给亲戚典；外三堂即先给亲友们典而后给家人典；混三堂，即不论本家或亲友，先按辈数，再按年令大小为先后行礼，多数是以混三堂拜礼。排完礼单就商议安席。过去有的财主娶儿聘女待三天人以示排场、大方、阔气，普通人家多是一天支持。但要分几批坐席，多的五六批，少的三四批。不论几批都能吃完。主要亲戚都得首批吃，并分坐正副席位。所以总得提前与众亲友们商议一番才妥，否则惹人不少。最后明确帮忙人员的责任，各自分头准备。

就以上这几件事，商议顺了也得到后半夜完，要是有些矛盾，那就要坐个通宵了。为什么要称“宵夜”，我想道理就在于此了。

天明便是娶媳妇的正日子了，这天人最多也最忙。天不明就要起来准备早饭了，所有娶亲人员，也都早早起来，吃过上马饺子便点炮起程了。娶时还要带：娶女羊、糕、点心、酒等礼品。那时所谓用轿或轿车娶，都是指专为新娘、新郎所准备而言，娶送亲大都是骑马。娶媳妇还讲究来回不走同一路线，要尽量绕着圈走。放炮的不论往返，每经一个村落或一个庙宇、及坟墓，都要鸣炮几响。挡红毡的则不然，去时不需遮挡，只有回来时每经水井、庙宇、坟墓或巷口都用红毡遮挡新娘的轿或车的一面。主

要祛邪，怕妨着新娘。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路程远的都要采取“就亲”的办法，“就亲”就是娘家提前把闺女搬到离婆家不远的亲戚家里，婆家再到就近地点去娶。

娶媳妇，由于人多显目，再加鼓乐、放炮，所以每过一村都要跑出一这男女老幼观看。这时除新人及女娶、送亲各外，其他人都得下马拱手作揖，离村后再上马前行。否则要遭到无礼的指责。

迎娶的队列到了娘家的村口，便要早早地下了马，牵马而行。娘家必有人迎接，并从每个人的手中把马牵去。分别迎进几个不同的房间。每个房内都有同辈人陪着，先茶后酒，酒后用饭，热情地招待一番。这以后媒人便与女娶亲把所带来的衣服、礼物送交娘家的有关人员。多数爱好结亲者，即使婆家的衣服礼物有点不周到之处也谅解了。也有少数人家不忍让的，嫌鞋不对了，手镯不好了，没带戒指啦……。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娶亲与媒人费一番口舌，以后再补，或者再给折点钱方可。否则不能把人娶走。

姑娘出聘这天，多数是只给吃煮鸡蛋，为的是耐饿、不喝、也不大小便。每个出嫁的姑娘总要大哭一番，有的甚至哭几天。这是因为或是年令小，从没离过家，不愿离开娘；或是对婚事不如意，强迫出嫁所致。有不少的女子为抗婚而自尽。此外是出聘女子哭，已形成惯例，否则会受到人们的嘲笑。说什么：当紧找女婿呀，哭也不哭两声。

准备就绪后，新娘的爷爷奶奶及父母亲坐在院里摆好的供桌后，新郎由伴女婿领挽，向新娘的祖父母和岳父母叩拜。伴女婿用他的口才说一套俗话：从天上到地下，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远到近，把满院的亲友都说乐了。最后鸣炮三声启程。这时由娘家选好的送亲人，舅舅或长兄用肩把新娘扛到轿（车）内了。

新娘上轿（车）时，头顶一块红布，连脸面遮住了，这叫埋脸红。娶送人员也都作揖礼让上车（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新郎总少不了要被耍笑一番才能放行。

聘闺女有出聘当天待人的，也有次日闺女、女婿回门时再待人的——也叫待女婿。如是当天待人，娶走后便要开始安席了。

过去讲究一个村同一天有几个娶媳妇者，要争第一娶回去，所以回时的车马更快了。如用的是轿，在回去的路上也不准停，轿夫累了只能轮换休息。回到村里已是鼓炮齐鸣了，所有人都出来迎接，有拉马喂牲口的，有迎接送亲的，有接拿陪送礼物的（过去由由于农村生活贫困，一般只能赠送几身衣服；别无他物）新人下轿（车）有用肩扛回新房的，有搀扶走的。如是搀扶走，新娘的脚不能踏土地，必须用两块红毡倒替，让新娘走在毡上。下轿（车）时还要“撒帐，即用糜麻谷等五种粮食约半斤，其中掺和核桃、红枣、铜钱等。撒帐人，一手端五谷，一手抓着五谷，在人群头顶上，特别是新郎新娘头顶上扬撒。口中念道：“一撒天门开，二撒地门开，三撒新人下轿来……”新人下轿往洞房走时接着撒，“一撒东方甲乙木，二撒南方丙丁火，三撒西方庚辛金，四撒北方壬癸水，五撒中央戊己土……”新郎走到新房门口，手持弓箭向屋内四角射箭。撒五谷和射箭都是镇凶神恶煞。每当这个热闹时刻，总会有几个要饭的手提酒瓶，瓶上还要拴上两叁元钱，给道喜祝贺，嘴里念着什么“走的不迟，来的不早，但等新人下轿，新人下轿贵人搀，一搀搀到八宝龙凤庵……”

新娘进到新房内，由新郎把“埋红”给揭起，并及时点好油灯；炕上放一斗粮，上插喜神牌位和梳子镜子、弓箭，把油灯摆在桌上，新娘便面向墙守着油灯、香斗，这叫守喜灯。新娘负有不让灯灭的责任。休息片刻，就有人来给新娘“开脸”、“梳头”。开脸是用线拔掉脸上的汗毛（姑娘时是不许拔汗毛

的），梳头则是把闺女发型，改梳成媳妇的发型（见图）。



就是新人进入新房的同时，小伙子他把新糊好的门窗纸撕个粉碎。

当送亲的人吃过早饭后，便要开始典礼了。有的人家去包头租赁头戴和衣服。梳洗完毕，戴上头戴，穿上绣有凤的红袍，像唱戏的坤角一样，有人搀出院中。出于礼节，代东的要请知送亲者，女婿给送亲者磕过头后。（闺女不磕）送亲的也要拿出早准备好的一份礼物。放在来人的盘子里。

拜人开始前，先要拜祖。拜祖不单是新郎新娘拜，而是家里所有的人按辈数一辈一辈的向院里摆好的供桌及悬挂在上面的“祖云磕头叩首。接着新郎新娘拜人了。新人面向供桌，站在铺好的毡上，由一男一女搀领，司仪把安排好的礼单念一个人便给磕一头。有两个既熟悉亲友又很精干的小伙子，（一般由伴女婿或其他女婿担任），手拿盘子接拜礼，受礼者便拿出准备好的钱

放到盘里。接礼者要高声唱喊：“他某某家某某某给大洋拾块、捌块、贰块。”随着落音把钱放在供桌上的大条盘里，转身又接下一个去了。

过去，礼和拜礼是两码事；礼是头天排礼单时已按户记了（没有钱的多先把粮折钱过后再给），拜礼钱，一则比礼要多，二则都是现钱，给谁磕头谁现给，这叫做花在人面前的体面钱，拿多少亲友们要互相商议一番，不能随心所欲。

拜人也称拜天地，拜过天地成为正式夫妻了，这就称得上阴媒正娶了。

拜天地时间长，冬天天又冷，有些人推来推去的耍笑，常常把年令小脚小的新娘折腾的哭了。

拜完天地，在盘里留下一部分钱，让新郎新娘轮流抓，谁抓了归谁，这叫“抓富贵”。而后同辈们要求新郎新娘作这个姿势，作那个动作，有时是没完没了的。往往要由长者出面劝解，才能“解围”，否则新人连门边都靠不了。

典礼结束，东家用酒席招待亲朋。那时的农村，席面很简单，不兴炒菜，只有猪、牛、羊、鸡四个蒸锅菜，一个大烩菜，就称得上“硬四盘”了，也是体面的席了。当然，大财主们也有八大碗的或六大碗的席面待客的。

在席间有人领上新人去“拜席”，拜席时，只给作揖、行礼即可。

夜间，要给新郎新娘另吃小锅饭，叫“和气饭”。饭后就开始闹洞房了。当地的风俗晚上是以说绕口令为主。耍笑的人们逼着新郎新娘说些有趣的绕口令。农村把它叫做“说令子”。你让说一个这，他让说一个那，一直要折腾到半夜，经长辈劝说后才散。临睡前，送亲人员要到新房看看闺女，安慰一番。

等新房息灯后，闹洞房的这帮人，特别是姐夫们又偷偷去听房，等新郎新娘熟睡后，他们把门撬开进去，偷东西，主要是偷

新娘的衣服、鞋等，天明要笑一番，才物还原主。

第二天早饭后，送亲的回时，就便请闺女女婿回门。这一天待女婿、同辈们、姐夫们，都在围耍新女婿。农村过去有个习惯：耍笑新郎新娘的同时，把长辈们双双揪出来耍笑，这叫“耍新的带旧的”。

第三天新女婿、新媳妇就回来了。有的父母送回来，有的姥姥或姑姑送回。送回门的亲者，总要向公婆说一番客气话，什么孩子年令小，没教养，不懂事，没本事，没离过家……要求公婆担待些。不管怎么说，新媳妇过门后仍是受气多，约束多，做在前，吃在后。做饭、洗锅、打扫家，打狗喂猪，给公婆倒尿盆、洗衣服，都是新媳妇的事了，有的婆婆还要经常打骂媳妇，小媳妇受不了这些折磨，女婿做不了主，或者女婿也不喜见，投河、悬梁，服毒自尽者不计其数。

过去新媳妇婚后允许住七住八，就是从娶回那天算起，在婆家住七天，再到娘家住八天。以后住娘家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允许住一次娘家，婆婆说几天回来，就几天回来，但走时，回来都要给公婆磕头。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诞生，使历史翻了新的一页。我国早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成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彻底打碎了套在我国广大劳动妇女脖子的精神枷锁。婚姻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建立起“妇联”组织，有力地保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妇女解放万岁！

昭君出塞与秦直道

〔蒙古族〕荣 阁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王昭君是自愿出塞，她“请掖庭令求行”。因为“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汉元帝既然已答应呼韩邪单于的“愿媾汉氏以自亲”婚事，昭君举国和议态不会和汉元帝相悖，而以“和亲使者”挺身而出，愉快地踏上出塞之路的。

王昭君出塞的故事，为历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所称颂和描绘，其形象光彩照人，不一而足。

“明妃（即王昭君）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北宋王安石诗），“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元张翥词）。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王昭君》一诗中吟道：“昭君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李商隐说：“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千里行，汉宫长为隔生春。”“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驼路几千”（清人吴伟业诗），或毡车、或乘车或骑骆驼，王昭君“丰容靓饰”与呼韩邪单于结伴而行，向着阴山，向着大漠缓缓而去。

在公元前西汉的历史上，王昭君的出塞和亲，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壮举，为汉族人民和匈奴人民带来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历史局面，给后人不断讴歌、怀念提供了重要素材。

“万种丹青绘昭君”，名留千古。岂是“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呢？（唐戎昱·“咏史”句）

民间将昭君出生的家庭称作“昭君宅”，生长的村落叫“昭君村”。后人为怀念她，树碑、建庙和修筑高大的坟陵。而今在

黄河北岸，阴山脚下的“昭君坟”就不下十几处。著名的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坟和包头市黄河南岸的昭君墓已被辟为游览胜地，吸引了无数中外游人，在这里凭吊和追怀！

土默川上、鄂尔多斯草原有一首流传的儿歌道：“过新年，响大炮。爷爷戴了个新毡帽，娘娘戴了个昭君套，妈妈穿上红腰腰，全家老少哈哈笑！”这里的“昭君套”头饰是红色的棉制品，即“红暖兜”，是为遮挡北国风沙用的。我们往往在年画中看到“昭君出塞”等美人图里，那丰容绰貌，服饰照人的王昭君，头上戴着的就是这种“昭君套”。可见人民对她的敬仰之深，缅怀之久了！

昭君出塞的路线和落脚点，史无明文记载。但从匈奴首领呼韩邪三次入汉“谒见天子”，所走的路线来考查，其路线大致和秦直道相符。秦直道修筑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百一十二年）至秦三十七年竣工。这条直道全长一千四百余华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之一。秦亡到汉元帝时期的一百六十余年间，这条直道上人夫车马，往来频繁。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从头至尾走过这条路线，在《史记》中只记了它的起讫点。南起云阳林光宫（秦始皇的军事指挥中心，在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北达九原郡（今包头市境内）。再看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汉的路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呼韩邪单于途经九原（今包头境内）——朔方（今杭锦旗境内）——西河（今东胜地）——上郡（今榆林）——北地（甘肃庆阳）——长安（今西安市）。公元前四十九年，第二次入汉朝，同样走这条路线。汉朝待他“礼赐如初”，希望他在政治上倒向汉朝共同对付郅支单于。

公元前三十三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要求“愿媾汉氏以自亲”元帝欣然答应了这门亲事，遂以王昭君妻之。昭君和亲出塞，迢迢千里坐毡车，乘马或乘驼去往单

于庭，所走的也就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与秦始皇所修直道的路线大致相同。当时有秦直道可走，何必舍近求远，人困马顿，载着自己光彩照人的妻子王昭君。绕道大同郡（今山西大同市，传说市内有一家“琵琶店”为昭君落脚处）返回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南）再往九原郡？至于传说王昭君路过大同郡，只是说明山西人民对这一伟大女性能够在汉代“胡汉和亲识见高”作出贡献的精神，永志不忘而已。

包头市南、昆都仑河东侧有座古城，汉时建成，称临沃城。在临沃城的旧址上，曾出土过“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的瓦当，当时的临沃城高屋建筑，宏伟壮观。北通昆都仑河可过漠北，南过黄河，经直道与汉庭相连；东走大同、居庸可进入幽州、并州，西趋西夏、鄯鄯，实为南北东西交通要冲。

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汉朝，而今歌舞升平，吹胡笳、奏鼓乐引昭君步入饰有“单于天降”花纹的宝帐，设喜宴于“单于和亲”的庭前。群臣列次，奶茶喷香，翩翩起舞，和拍应节，歌喉婉转，咏“天苍苍，野茫茫”之诗，颂“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之章，塞上风情绮旎，草原蜂蝶争芳，好一座繁华兴旺的临沃城！

临沃古城分南北城两部分。北城东西长八百米，南北宽五百五十米，南城东西长六百六十米，南北宽六百七十五米，总面积约九十万平方米，全城平面呈∞式形状。现存城垣高六米，底宽十米，顶宽三至四米。建国三十多年，有关部门和学者，曾对它进行过考古勘察发现了大量汉墓和珍贵文物，其中“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瓦当，文字清晰，构图优美，实为匈汉两大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佐证。

临沃城上草青绿，极目四望情满怀。

唐、宋、元、明、清以来，“夕阳半城血半城”，黄土告诉我们：“历史上不论哪些民族他们之间“和则兴，战则废”，黄河波光粼粼，浮光耀金从眼前奔流向东，南岸，在湛蓝的天空掩

燕家梁元代古文化遗址的发现

武 虎 瑞

一九六一年春天，市郊农田基本建设正向纵深发展。麻里乡城西的燕家梁，组织男女青壮年劳动力三百多人，计划用两三个冬春，引西塔口水岸之水和打机井相结合，把燕家梁的五百亩耕地实现园田化。在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在燕家梁西部一块方圆二百多平方米的凹地里掘土开渠时，挖出了许多遗存文物，这一异常发现，立即引起了施工领导的重视，当时的公社社长牛恒同志一方面指派了专人保护现场，同时停止了这一地段的施工，另一方面迅速上报各级领导直至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及时派出了张郁等同志，深入现场调查考证，终于肯定了这是一个规模较大，遗存文物比较丰富的元代文化遗址。这一文化遗址，南北长约六百米，东西宽约三百米。地表散布着大量的元瓷残片。以釉色区分，有磁州窑、钧窑、定窑和龙泉窑几种窑口的产品。器形有碗、罐、盘等日用常见器皿。调查时曾于遗址南端发现一处窑迹，并采集到支腿和石杵等瓷场用的生产工具。从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说明这里在元代

映下，昭君坟显得肃穆，粗旷而壮观。

昭君坟，以她神奇瑰丽的色彩，进入蒙汉各族人民的口头传说；歌谣和俚曲不断咏唱这位古代少女。王昭君是和平的使者，是名留千古的巾帼英雄！

坐一叶轻舟，捧一掬黄河水，迎风而酹，昭君墓巍巍，草原百花开。忆古思今，蒙汉人民情同手足，谁也离不开谁！

青山千古！黄河千古！昭君千古！

曾有烧瓷作坊。按出土磨研用的瓷杵头，下部为半球状，上有孔，便于安柄；釉壶，枣核形，耳部有突起的棱槽，高二十八点五厘米，腹径二十三厘米，口径八厘米，底径十三厘米，稍残缺；人物铜镜，有柄，镜轮廓成花蕊状，上尖下圆。此外有陶模、小铁刀、石磨盘、乳白小瓷罐、黑釉瓶、天青瓷碗、赭黑色双耳小口瓷坛、牛鹿骨器，以及宋币“绍定通宝”、“淳祐通宝”等。西地南边，还挖出直径四十厘米的圆形生铁一块。

附近发现砖墙基础，多系有棱有角的短墙，上复数层，无火烧痕迹。墙基用砖多数是淡灰色，有方形的或长方形的。其方形的规格是 $24.5 \times 28.5 \times 5$ （厘米）；长方形的规格是 $50 \times 14.5 \times 4.5$ （厘米）。也有表面按有手掌印的，为元代砖的特色。从出土砖推断，短墙可能系当时居民房舍的墙壁。

在东南坡下发现土窑一个，有很厚的烧土和烟灰。前部残缺，后有烟窗和烟道保存尚完好，窑成圆形。因无共存遗物，不能断定是何窑址。

土梁北部，地表暴露之砖房窑或其坑，比比皆是。窑灶大都为圆形，保存较好。据观察，梁之东侧布满居住遗址，其中南部为遗址的活动中心，地面散布着各种瓷片和烧流炉渣。曾采集到粗厚茄青青瓷碗片，影青印菊花瓷碗，油赤莲花双鱼刻瓷盘等。其花纹均敦朴粗放，笔法生动。

此外，遗址又陆续出土过许多完整瓷器，其中的青花瓷罐珍贵而少见。该罐器形巨大，造形古雅，通身图案由草叶、石榴、牡丹、卷草和仰莲等五种花卉组成，层次分明，技法娴熟，色泽又清新悦目，是现今国内出土和传世元代青花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收藏在内蒙古文物管理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有摄影图像。

燕家梁元代文化遗址，填补了元代文化考证资料，对研究包头的历史沿革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不具有重要的价值。

质疑·补充·订正

一九五〇年程远同志不任中共包头县委书记

我看了《包头郊区文历资料》第一辑，发现《南龙王庙村种植蔬菜发展史》（第六页二段一行），“一九五〇年，由中共包头县委书记程远，会同范俊亭、王达仁同志，带领工作组进驻南龙王庙村”有误。当时，程远同志任包头市第二区区委书记；王达仁同志任包头市民政局局长兼市农协主席；范俊亭同志是二区区委委员。我当时是这个工作组的组员。

这三位领导同志，除范俊亭去世外，现都健在，已经离休。

张继先

对《包头郊区清末时期教育概况》的两点补充

读了《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一辑刊载的《包头郊区清末时期教育概况》一文，作如下两点补充：

一、土合气私塾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九七年），由佛教徒马云先主任教。

二、小巴拉盖教会办的培英中学教师有：刘文孝、雷鸣春、郎虎臣、乔绥卿、彭贵仁等。

官步生

1987年4月1日

对《包头郊区中等教育发展概况》的补充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在三湖河南岸的前进大队建立中学一

所，称为“前进中学”，由姬茂林担任校长；赵志春任教务工作。当年设十三个教学班，共有学生六百七十八人，教职员工四十二人。

田茂林

《夜袭德胜泰》有两处不翔实

第一辑《包头郊区文史资料》上，齐达勒图同志撰写的《夜袭德胜泰》一文中（见史料四十七页），有两处史实不翔实。

其一、陈秉义于一九三九年秋，就投靠了日伪绥西联军，文中所写的陈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夜袭德胜泰，时间大错。

其二、陈秉义投日前，系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骑兵第四支队（相当于营的建制），故陈秉义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任过师长。

郭耀宗

1987年5月10

一点更正与补充

喜读《包头郊区文史资料》一辑后，做一点更正与补充：

一、万国道德会萨拉齐分会会长应为许子文，理事长应为杜立堂。

二、《王英与绥西联军的兴衰》一文中（见第三段八十三页倒数第二行），一九三九年临冬之际，傅作义部队乘我共产党游击队李井泉部牵着敌人鼻子转圈子的机会（后面应补充），同时也乘湘北日寇调兵攻打长德之际，出其不意，进占包头一昼夜。

程景华

1987年7月7日

首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回顾

政协包头市郊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我区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是从八四年下半年开始起步的，是在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中开展起来的。三年多来，我们共召开了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自治区和包头市三级政协关于征集、“抢救”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级政协文史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提高认识，培训队伍，明确方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区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有

· 来 函 照 登 ·

编辑同志：

最近看了你们编辑的第一辑文史资料，感到征集面广，不拘一格，存真求实，苦心经营，琳琅满目；给读者以面目一新，获益非浅。

刚写了《昭君出塞与秦直道》和《蒙古族地名的历史溯源》稿，寄给你们，望提出修改意见，如能见用，可为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上微薄小礼！

出版社、编辑部不在大小，而以其眼光和肚量赢得读者为上乘。眼前有若干文史资料，读来确有精品，但未若郊区富有乡土气息，兼容并蓄，“百家”登台者。

或许我是土默特人，偏爱自己的水土和乡亲，闻到了“旱地香瓜”和葡萄馨香的缘故，挚爱之情，不能自己。

荣阁 1987年3月17日

长足进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研究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今人，启迪后代的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关怀下，我们根据市政协文史会议布置的任务，结合郊区实际，每年做出征集、“抢救”文史资料的统一部署。三年来，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有重点地深入郊区九乡一场，十八个自然村，十二个区属机关，截至八七年八月底，先后走访了二百九十八人次，组织发展撰写人员四十多名。在积极组织扩大撰写队伍的同时，采取自报撰写题目，或以题定人，因人命题等方法，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上下了一定功夫，较广泛地征集、“抢救”了我区的文史资料。三年来，共征得各类文稿一百七十七篇，近五十四万字，这些稿件经过加工整理后，分别油印出版了第一、二辑《郊区文史资料初稿》和编辑出版了铅印本《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从征集到的文稿内容看，都比较广泛真实，大部分稿件是撰稿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这些稿件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我区近百年来所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发展沿革。其中《王英与绥西联军的兴衰》、《南龙王庙种植蔬菜发展史》、《幽风社创建始末》、《昔日荒野流沙滩而今林茂瓜菜香》、《抗日战争中的赵炽昌》、《日寇侵包前后包头的政治经济情况》、《包头郊区清末时期教育概况》、《包头郊区战国赵长城遗址及沿线出土文物记述》等文稿，都是较有重要价值的史料。这些文史资料，对研究郊区的历史和两个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年来，我们在征集、“抢救”文史资料工作中，深深体会到：

首先，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是搞好文史资料工作的关键。政协首届一次会议后，便把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入列重要议事

日程，配备了专职干部，并由一名副主席负责分管。其他各主席也经常过问文史资料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八六年八月，我们又专门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制定了必要的章程、办法，使文史工作纳入更科学更健全的轨道。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区委书记郝存柱同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伍龙同志、区长杨茂林同志、区政协主席杨茂森同志为我们第一辑的出版题了词，给我们以很大鼓舞。当我们在征集史料，特别是出书遇到困难时，他们更是有求必应，给我们以很大支持，这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以很大推动。

第二，我们对征集的史料，采取征集一篇加工整理一篇的办法，随时打印上报市政协文史办，年终装订成册，复印封面称《郊区文史资料初稿》第一辑。八五年采取同样办法出了第二辑。这样做，既积累了资料，又能及时广泛地征求意见，省时省事，起到了史料的宣传作用。此后，我们在条件成熟后，出版了铅印本，其效果更加明显了。

第三，征集和“抢救”文史资料，必须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同时还要严格编审制度，认真把好三关，实行两个三审制。在把好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的同时，必须坚持编辑审，办公室主任审，文史会主任审，知情人审，集体审，文史委员审。三年来，我们在征集到的文稿中，曾发现有的文稿史实不够翔实，为了提高史料的质量和真实性，曾多次与撰稿人员商量修改，如果作者难以补充修改，或有种种困难不便寻找资料充实，编辑人员就直接查阅资料 and 进行调查走访工作。如去年撰写《南龙王庙村种植蔬菜发展史》时，为了史实可靠准确，曾先后组织了两次老菜农座谈会，通过座谈，共同回顾，为这篇史料提供了大量素材，较准确地考证出了南龙王庙村种植蔬菜，始于清朝嘉庆年间，整理出南龙王庙村一百多年的种植蔬菜发展史。另一篇《幽风社创建始末》。

作者除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工作外，为了确保史料的真实性，脱稿后，曾请创建幽风社的掌柜之一米建平的后代、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景枯同志审阅，使这篇史料更加完整翔实。《包头西脑包和大照壁の由来》一稿，在加工整理过程中，觉得照壁大小有出入，就先后三次到现场进行了勘查考核，较准确地丈量了照壁的高度、长度、厚度，翔实地记载了照壁的建筑结构。

第四，广求人才，不断扩大撰写队伍，是做好文史资料征集和“抢救”工作的组织保证。三年多来，我们挖掘发现了不少人才，扩大了撰写队伍。象程景华、康兴中、田茂林、章瑞炽、高崇岭等就是较积极的几位。他们既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又有一些文史知识和一定的写作能力，而且自身掌握不少“三亲”史料，他们利用工作之余，积极撰稿，对有疑问和不踏实的地方，又不辞辛苦，走村串户，深入调查走访，较好地保证了史料质量，为我区征集和“抢救”文史资料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

第五，必须明确认识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的关系。文史资料工作是按照征集、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等程序进行的，其中征集是首要环节，是基础工作。“抢救”是征集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注意征集，忽视“抢救”，就会造成“人去史亡”的危险。因此，史料的“抢救”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三年多来，我们在广征博采的同时，基本上注意了“抢救”工作。如沙尔沁乡的黄维新和张玉林两位年近七旬的老同志，身体状况都欠佳，一位患三叉神经痛，一位患半身不遂，他们都拥有大量的“三亲”史料。经过动员工作，从他们身上“抢救”出多篇较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玉林同志，他以颤抖的手，写出了近万字的长稿《玉英与绥西联军的兴衰》。这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文稿，在《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一辑刊出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三年来，在领导和全体撰写人员的共同势力下，我区的人文史

资料征集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起步较晚，又缺乏征编史料工作经验，所以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认真深入全面走访，广泛发现人才和搜集资料不够；撰稿人员少，力量不足；同撰稿人员普遍联系和传递信息也做得不够；重点“抢救”工作做得不够突出。

通过总结我们还认识到，今后做好这项工作，一要经常不断地认真学习贯彻三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武装头脑，提高认识；二要继续深入调查走访，全面发动，进一步扩大撰写队伍；三要进一步摆正征集与“抢救”的关系，以“抢救”为主，看准目标一抓到底，把有价值的史料“抢救”回来；四要认真发挥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严格把好“三审”和“三关”，加强征编出版付印等一系列工作；五要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密切合作，传递信息，为我区征编文史资料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为了认真做好经常性的史料征集工作，我们根据自治区政协召开的全区第一次盟市政协文史办主任会议，商定的二十八个专题征集项目，制定了与我区有关的二十一个专题征集项目（见附表）。今后以这些重点专题项目去征集、“抢救”我区的文史资料。

郊区政协文史资料专题征集项目

类别	专题项目	主要内容
政治类	傅作义主政绥远十年史料	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
军事类	抗战期间绥远国民党军队史料	抗战期间，除傅作义部外，其它驻绥国民党军队史料。
	解放战争史料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贺龙解放包头和一九四八年冬解放包头史料。
工商类	南海子变迁史料	南海子宫渡口，南海子村落的形成变迁，南海子庙会史料。
	蔬菜发展史料	解放前后各乡蔬菜发展史料。
	农牧林水史料	解放前后郊区农牧林水电发展情况史料。
	农牧场史料	解放后郊区农牧场情况史料。
	石拐沟煤炭开发史料	石拐沟原始开发煤炭，解放前后煤炭史料。
宗教类	天主教史料	天主教在小巴拉盖传教经过史料。
	宗教史料	除天主教外，其它宗教史料。
	召庙史料	梅力更召、昆独仑召、沙尔沁史料。
社类会	郊区土匪史料	解放前郊区匪患情况史料。
	郊区地区鸦片史料	解放前郊区各乡鸦片种植、销售及人民受毒害史料。
	帮会道门史料	解放前郊区各乡帮会道门发展及消亡或被取缔史料。
	剿匪肃特史料	解放后郊区剿匪肃特史料。
	减租反霸史料	解放后郊区各乡减租反霸情况史料。
	军警宪特史料	解放前后郊区军警宪特活动情况史料。

编 后 记

金风送爽，硕果丰实，值此收获季节，我们也将《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二辑奉献给了广大读者。

当您打开目录，从还洋溢着油墨香的字迹中不难发现，此辑较之第一辑，有了新的特点。其一，撰稿队伍进一步扩大，并有了领导干部的文稿；其二，征稿范围扩大，出现了翻译文章，增加了质疑订正栏目。这充分表明我们广大热心文史工作的领导干部，作者和读者，关心本书，爱护本书，愿意使本书日臻完善。

自今年三月份区政协召开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后，稿件接踵而至。仅半年时间，便征集到各类文稿七十八篇，计二十七万八千余字。直到本辑付印之际，稿件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这是我们第二辑赖以迅速出版的基础。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新限，我们不能将作者心血全部负载，而仅能精选其中的四十四篇、十九万余字。

就我们所选篇什，不乏精品，内容也有了新的突破。从《昔

类别	专题项目	主要内容
社会类	烟市俱乐部史料	日伪统治时期郊区各乡烟市、俱乐部史料。
文教类	文化教育史料	解放前后教育情况，文化发展社史料。
文物类	古文化遗存史料	解放前郊区各乡的古文化遗存史料。
	古庙遗存史料	解放前郊区各乡的古庙遗存情况，及其活动史料。

日荒野流沙滩而今林茂瓜菜香》中，我们看到了当年创业者的雄姿伟业，从《日寇侵包前后包头的政治经济情况》中，闻到了日寇侵华的血腥气，而从“抗日战争史话”一栏中，我们更看到了中华儿女不甘屈服、御侮卫国的赤胆侠肝。陈秉义一生坎坷，终归大道，傅将军剿匪抗日功载史册，李英匪性难改遗臭千古，赵炽昌抗日有功，秉笔直书。也有几篇村寨小史，读来使人身临其境，也有部分旧俗佚闻，看后使人回味无穷。听几段“票友班”的清唱，心旷神怡，看一场文艺队的演出，群情振奋……总之，篇篇史料，各有侧重，诸君读后，定会看到十几年前乃至几十年前我们这一带的历史风貌；诸君读后，也会必有所感，望以所述，或补充，或斧正，或新撰稿件，及时惠顾，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本辑史料出版，承蒙各方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包头郊区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3 1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